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马克思主义 文化研究



主办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2022年第2期
总第10期

RESEARCH ON MARXIST CULTURE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本期焦点：

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
朱旭旭

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与对共产主义的再认识
王彩霞

问题、方法和视域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著作述评
胡栋材 张国庆

文化自信的唯物史观分析：价值、依据与条件
张永奇

从文化相对主义的反思到文化一元多线论的建构
郭海龙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二〇二二年第二期
总第十期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马克思主义 文化研究



RESEARCH ON MARXIST CULTURE

2022年第2期
总第10期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 济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2022 年. 第 2 期 : 总第 10 期 /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 济南 :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22.12
ISBN 978—7—5607—7753—5

I. ①马… II. ①张… ②程… III. ①马克思主义—
文化理论—研究 IV. ①A811.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3) 第 012631 号

责任编辑 楚洋洋

文案编辑 肖世伟

封面设计 王秋忆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发行热线 (0531) 8836300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华林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15.25 印张 300 千字

版 次 202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学术顾问：王忍之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
张全景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
滕文生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
王伟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编委会主任：李慎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尹作升 山东大学（威海）党工委书记、教授

编委会成员：（第二届）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党圣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会长
张政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
林建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李正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张国祚 中国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刘润为 《求是》杂志原副总编、全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
孙熙国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戴木才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秦 宣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
李 冉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尚庆飞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庞立生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原副部长
王韶兴 山东大学世界政党研究中心主任
何中华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导师
吴文新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
孙绍勇 西北工业大学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东方毅 世界文化论坛联袂主席、东方毅文化协会会长
李 明 东方毅文化协会董事局主席
娜·根·奥西波娃 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谢·奥·叶利谢夫 《莫斯科国立大学学报》政治学与社会学卷编委会第一副主席

主 编：张士海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程恩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文化论坛联袂主席

常务副主编：郝书翠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常务副院长

编辑部主任：马秋丽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副院长

编辑部成员：焦 佩 鲁法芹 闫惠惠 于少青 李谷悦 陈 旭（英文）

主 办 单 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指 导 单 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
世界文化论坛学术委员会

目 录

访 谈

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

..... 朱旭旭/3

论 文

优化文化供给，为美好生活提供精神支持

——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繁荣高端论坛暨世界文化论坛

第三届中国文化分论坛”上的致辞..... 王伟光/15

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与共产主义的再认识..... 王彩霞/21

论恩格斯对自然主义的否定之因 徐 振/34

唯物主义视域下社会主义共同体文化的革命性重构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理论的哲学诠释..... 魏海华/48

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整体性理论特质..... 王 跃/60

问题、方法和视域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著作述评

..... 胡栋材 张国庆/7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道路自信的内在机理..... 张兴毅 苏星鸿/9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百年历程与展望

..... 王廷隆 钱国玲/102

文化自信的唯物史观分析：价值、依据与条件 张永奇/114

1978～2012年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突破和坚守及新时代启示·····	李 阎/131
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马玉婕/142
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的内涵与特质·····	刘腾骏 董沐夕/151
从文化相对主义的反思到文化一元多线论的建构·····	郭海龙/162
爱尔兰民族文化建构的深层意蕴·····	周 琦/175
百年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李梦睿 鲁法芹/190
背离与回归：基于行政发包制的社区文化治理研究·····	刘彦武/204

动 态

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与共建文化繁荣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繁荣高端论坛暨世界文化论坛第三届

中国文化分论坛”综述····· 崔 微/219

论点摘编····· /231



访 谈

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
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

朱旭旭*

【李慎明简介】李慎明，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代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国际问题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政治组成员；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党的建设、民主政治、国际战略及党史、新中国史和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主要著作：《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对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社会主义的体悟》《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系列）、《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系列）等20多部学术著作。先后在《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光明日报》等中央重要报刊发表文章300多篇。数部作品获国家有关奖项。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① 文化繁荣发展是中国

* 朱旭旭，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41页。

道路和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全面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是党和国家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也是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现实要求。围绕这一主题,本刊记者就学界关心的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研究员。

访问者: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时代课题,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您能帮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吗?

李慎明:首先,我想谈一谈文化的内涵。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应先把文化的内涵探讨清楚。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外延非常宽泛。可以从以下四个不同层次进行分析和定义:一是从人类历史发展长河积累的总成果形态界定,这是“泛文化”的概念,即文化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进程中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的总称,即物质成果加精神成果。二是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精神生活特指界定,这是“大文化”的概念,即文化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是自然科学加哲学社会科学。三是从一定社会形态结构的构成界定,这是“中文化”的概念,即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形态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形态。比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分别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形态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形态。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分支。四是从一定社会的观念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界定,这是“小文化”的概念,即一定的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哲学、宗教、道德、文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态。一定意识形态的内容,是对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反映。一定的理论是一定的意识形态乃至一定社会文化的核心。因此,“泛文化”“大文化”“中文化”“小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其根本前提是要高度重视坚持和发展正确的理论。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经济、政治、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才有正确的方向与灵魂。

其次,我再谈一谈文化与文明的关系。要真正弄清文化这一概念,也必须连带弄清文化和文明的联系与区别。不同的社会形态都有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在阶级及有阶级存在的任何形态社会的文化中,总是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同社会形态文化中的精华,组成了人类历史中的文明。对于社会主义新文化诞生之前的所有文化,我们都应批判地汲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同社会形态文化中的精华,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但其中的糟粕,也必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最终被人类新的进步的文化抛弃。而文明是指人类所创造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可特指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和哲学、宗教、法律、文学、艺术、教育等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精神财富，亦可指社会从低级逐步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文化有先进落后、精华糟粕之分，但文明仅有程度上的高下，没有先进落后、精华糟粕之分。如任何时候也不能把“ $1+2=3$ ”这一常识说成是落后和糟粕，更不能把其“与时俱进”为“ $1+2=4$ 或 5 ”。

最后，我们来谈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指相对于经济、政治和文化而言的整个大社会中的文化，主要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上层建筑。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党领导人民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产生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是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四是我国积极借鉴过来的世界各国、各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但这四个部分，并不是并列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即我们的指导思想，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厚土壤，积极借鉴过来的世界各国、各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益滋养。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访问者：近年来，如何提高文化软实力，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也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①明确要求不断夯实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您认为，我国可以从哪些方面推进文化软实力建设。

李慎明：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文化软实力。我认为，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具有精神感召力、社会凝聚力、价值吸引力、思想影响力等的文化资源。国家文化软实力带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它是我们国家整体的文化显现，是我们国家利益的独特呈现方式，体现了我国国家利益与国家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着力发展的作为软实力的文化，源于我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和精神力量的重要作用。中国革命和建设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创造一个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0页。

又一个人间奇迹,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视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革命传统的伟大的精神力量。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一个重要时代命题,揭示了文化的深刻内涵及其对国家民族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从而确定了文化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维持,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凝聚与团结,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存在与发展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第一,要切实增强国家文化安全忧患意识,自觉捍卫文化安全。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针对当前我国文化领域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我们要审时度势,居安思危,正确应对,真正筑起抵御各种腐朽思想文化侵蚀、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思想防线。我们应该记住:一个国家被消灭了,只要这个国家的文化依然存在,这个国家迟早要复兴;如果一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文化被同时被消灭了,这个国家也就永远被消灭了。

第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借鉴世界各类文明、抵御西方腐朽文化和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提供了牢固的经济基础。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一经产生,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基础具有一定的反作用。社会主义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它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不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又极大地反作用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①我国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必须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文化,并通过社会主义文化的反作用,来维护我国的经济基础不受侵害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我国文化软实力不断提高,才能在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牢牢掌握主动权。

第三,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为借鉴世界各类文明、抵御西方腐朽文化提供理论支撑。理论正确,党就坚强,政策就正确,思想就统一,经济就发展,社会就稳定。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在党内,而且根源在于思想理论,是其逐渐脱离、背离马克思主义所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灵魂和旗帜。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繁荣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关键,

^①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报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49页。

也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只有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真正确在国内外各种思想、理论、思潮的相互激荡中不迷失方向，在和世界不同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中学习、借鉴、扬弃、升华，丰富和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

第四，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证。借鉴世界各类文明，抵御西方腐朽文化，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观，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的主体观，并把这一思想统一和落实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人民执好政的全过程，统一于我国文化软实力丰富发展的实践中。

第五，正确处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与积极借鉴世界各类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文明的存在，使世界文化丰富多彩。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有其长处，这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世界文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应以宽广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在尊重差异中扩大认同，在包容多样性中达成共识，积极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博采众长，使其熔铸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中。但所有国家和民族，尤其是处于经济弱势地位的国家和人民，必须首先对本国的文明做到自尊、自爱、自信、自立，维护和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文明。因为文化和文明有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绝不能仅仅把科技和物质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文化先进与落后、文明高下与优劣的尺度，否则就会把西方个别超级大国所刻意构建的意识形态作为所谓的“普世文化和普世文明”顶礼膜拜，把西方个别超级大国在全世界的文化扩张当作向“未开化”国家和民族传播的“文明”去推行。其实，当今世界那些所谓的“普世文明”，说到底还是西方霸权主义对全世界实施文化侵略和统治的工具。这种观念的侵蚀，使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些人产生了“文化自卑感”，有意无意地对西方文化如痴如醉，而对本土文化苛求甚至鄙视。实际上，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我们应该倍加珍惜我国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生生不息。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十分注意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但是，对于那些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与文明存有敌意甚至妄图摧毁的行为，我们的一贯态度则是“威武不能屈”。

访问者：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要求到2035年把我国建成文化强国。您能否针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谈一谈您的观点？

李慎明：我认为，维护文化安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前提和必然要求。维护文化安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国家根本制度安全。国家根本制度是一国软实力的核心,是保障国家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石。维护国家根本制度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前提。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维护国家安定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应当看到,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与问题相互交织,引起社会震荡的因素仍然存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安全在文化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第二,意识形态安全。即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政治意识不受威胁与侵害,能够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是该国的立国之本,如果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必将导致该国既有政治和经济制度衰落甚至消亡。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渗透和颠覆:在经济上宣扬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在政治上企图颠覆中国国体、政体与政党制度,在历史上否定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巨大成就。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第三,价值观念安全。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本质内涵,体现了人们对社会与自然现象的是非判断和基本态度。每个社会都有占据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它规定着社会的性质。价值观念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能在社会和公民中得以保持、延续和发展。影响国家价值观念安全的因素很多,如来自家庭、社会、政府等不同方面的教育因素,国外的文化影响与文化渗透因素等。维护价值观念安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重视的问题。

第四,优秀传统文化安全。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性,都积淀在该国家、该民族的骨骼里,奔腾在该国家、该民族的血液中。因此,所有国家和民族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 and 民族应高度重视维护和弘扬本国和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世界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维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安全,包括本国、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坚持和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此外,我认为文化安全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①他又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00页。

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①他还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②。文化安全，十分重要。一个社会，就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部分组成。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是社会的支柱，而文化则是社会的灵魂。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③马克思曾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④苏联亡党亡国，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从意识形态的解体开始的。我们一定要加强文化安全方面的研究，要抵御国内外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决不能步苏联亡党亡国之后尘。

访问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向全世界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过程中，我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也不断扩大与深化。请问，从国际视角来看，我国进一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及实施策略有哪些？

李慎明：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又由于从建立新中国之日开始，全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勒紧“裤腰带”，逐步建成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拥有了以“两弹一星一潜艇”为标志的强大的国防实力，特别是打赢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对手的抗美援朝等正义之战，这对我国而言，就迎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期。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深知用硬实力遏制中国越来越不可能，更多的是采用软实力和巧实力，从而加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力度。因此，我们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必然受到国际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围剿”，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迫在眉睫。

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仅靠军事、经济等硬实力最终是行不通的。国家间的友好合作，更是需要文化力的发挥，要靠自身文化的吸引力。当今中国绝不保守，恰恰是一些发达国家坚持顽固的保守主义。我们翻译引进多少外国版本的著作及文化产品，他们把中国作品翻译介绍过几本？我们讲文化“走出去”，孔子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00～201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0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要“走出去”，老子要“走出去”，烹饪要“走出去”，太极、少林要“走出去”，中医药要“走出去”，但是也应该“夹杂”点新中国的文化“走出去”，其中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点十分重要。有的人羞于谈新中国文化，羞于谈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文化，归根结底，中国文化就没有了根和魂，从根本上说也说服不了世界各国人民。以文化软实力做支撑，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彰显中国气派。发展中国本土文化和文明必须固本守源，坚持自尊、自爱、自信、自立。霸权主义文化，过去、现在有，将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仍会有，甚至在特定的时期内还可能发展。因此，所有国家和民族尤其是处于弱势的国家和人民必须首先对本国的文化和文明做到自尊、自爱、自信、自立，应首先维护和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文明。文化和文明有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绝不能仅仅把科技和物质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文化先进与落后、文明高下和优劣的尺度。

在国际交往中，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培育与交流要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这样才不会照抄照搬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文化并与之区别开来，才能最终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

第一，要尊重和维护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是一个国家文化、文明的核心和本质所在，是这个国家其他文化和文明形式所依附的本体和灵魂所系。一种文化和文明一旦失去了作为其母体所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失去其适合本国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无论对其文化和文明怎样提倡甚至斥巨资去保护，都会从根本上失去生机与活力。这种文化和文明在本质上只能成为人类历史博物馆中的标本，或者成为受资本逻辑支配的现代旅游业、娱乐业的景点，成为聊供强国和富人奢侈消遣的“后花园”。这就需要在尊重和维护文化和文明多样性的同时，必须尊重和维护基本经济制度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政治的多极化，从而反对世界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单边主义。国际垄断资本和单边主义政治无视各国的历史传统、民族关系和社会环境的多样性及复杂性，肆意扩张，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为自身的战略利益任意发动战争，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也就根本无从谈起。仅靠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不可能改变经济和政治上的单边主义；缺少了经济和政治的多样性，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也就根本无法单独存在。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最终依赖于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多样性。

第二，要坚持和维护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发展模式。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共同构建几千年的人类文明的历史大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都是全人类、全世界的精神遗产。承载文化和文明的国家与民族有大有小，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有先有后，但绝无优劣高下之别，这就如同联合国每一个成员国都有平等一票的投票表决权一样，都应获得平等的尊重和人类

共同的保护。坚持和维护不同文化和文明间平等对话的权利，不仅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各文化和文明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观点，而且也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根本途径之一。要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之间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要真正做到平等对话，关键是强国、大国的态度。2000多年前，中国的哲人老子说，“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道德经·第六十一章》）。这就是说，大国尤其应谦下，大国要像居于江河下游那样，使天下河流在这里交汇。老子的这一思想，可能是中国最早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的思想胚芽。善待他国，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与文明的标尺，而且是一个国家文化和文明长盛不衰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历览人类历史文明的兴衰更替，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文明在兴起之后，若是与其他文明平等相处，并能积极学习借鉴，常常是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并走向世界；若是企图侵蚀甚至用强力铲除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则必然会使自己发生异化，并逐步走向衰落直至最终被毁灭。这一现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绝不鲜见。环视当今世界，个别超级大国所奉行的“文明逻辑”不正在造成更多的流血、苦难和冲突，导致更多恐怖主义吗？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性，都积淀在这些国家和民族的骨骼里，奔腾在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血液中。这些传统和特性，并不是外来文化能够随意更改替代的。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应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不同特色和风格的文化、文明。国际社会对于地区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应给予更多的尊重、理解和支持。可以说，随着全球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全人类思想文化水平的极大提高，全球的生产方式、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最终会实现“大同”，但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多元性将不会随之消失。经济全球化使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各国都应以开放和平等的精神，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加强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以和平方式处理国际和地区争端，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收并蓄的和谐世界。

第三，要坚持各种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不同文化和文明不仅需要各个国家与各个民族代代相传，需要相互平等地交流，而且需要相互之间学习和借鉴，进而通过糅合产生自己新的文化和文明，从而为全人类的共同繁荣与发展提供和平的国际环境和智慧保证。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是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深化，不仅是对世界上其他文化、文明与传统的鉴赏，更是对世界上其他文化和文明之精华的汲取。这就需要世界上不同文化和文明都应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同样，任何一种文化与文明，也不应凭借自己经济、政治和科技上的优势，封锁其他人类文明精华的传播。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这是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世界各种不同文化和文明振兴与发展的重要途径。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文明是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与其他文明碰撞、交流、融合

的过程。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来自东方的四大发明,近代西方文明赖以自豪的地理大发现和工业化进程将根本无从说起;资本主义文明没有过去奴隶制文明及封建制文明的传承和积累,同样只能是空中楼阁;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制度、文化方面的进步,也有不少是在与社会主义文明的竞争、学习、借鉴中取得的。当然,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样是学习借鉴包括资本主义特别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关文明在内的世界文明的结果。在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不能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否则就必然落后甚至挨打。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又必须结合各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坚持趋利避害的原则,有所取舍,而绝不能照抄照搬,否则同样会从根本上危及自己的生存。

总之,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文化的培育、发挥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需要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优秀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放出的异彩,必将与人类永存。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承接前人的智慧,中国文化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责任编辑:马秋丽]



论 文

优化文化供给，为美好生活提供精神支持

——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繁荣高端论坛暨世界文化论坛第三届中国文化分论坛”上的致辞

王伟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两个确立”的提出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具有决定性意义，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性贡献。全会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优秀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就启发我们要以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引导我们在时代变化中把握历史主动，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化繁荣，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并对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作出重大部署。这一重要论述既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立场和态度，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又对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因素。可以说，衡量美好生活，文化是一个重要尺度，是一个显著标志。如果没有精神文化生活的充实，就不可能有真正幸福的人生和美好的生活。以高质量的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为美好生活提供精神支持，乃是新时代文化工作的重要使命。

为此，我愿谈以下几点看法。

^{*}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

一、精神充实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在维度

文化所对应的，乃是人的精神世界。马克思说，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的存在。对于动物而言，它与自己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无所谓意义。人与动物不同，人是既动物而又超动物的二重化存在。人具有社会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一种肉体存在物和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诚然有着自身的生物学意义。但是，他还是另外一种意义的社会存在物，还拥有—个精神世界、心灵世界或意义世界。这是人所具有的、无法被还原和归结为自然存在的特质。它引导人不断地超越本能、提升自我，使人能够按照意义所昭示的理想境界重塑自己。正因如此，人类才成为宇宙中唯一没有等价物的存在。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分爲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当人从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时，则会产生更高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求。物质文明的发展对于低层次需求的满足效果显著。而对于尊重和自我实现这样的高层次的需求而言，则需要文化的力量。对于个体而言，意义的缺乏将引发信仰危机；对于社会而言，社会的有机整合所赖以形成的基础在于对理想境界的设定，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形成社会成员对意义尺度的普遍认同。这是一个社会保持真正稳定和持久稳定的重要前提。这就需要社会精神资源的深层次支撑。这种精神资源的最深沉基础即人对意义世界的终极观照，属于文化的内核。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道：“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美好生活是人们在物质需求基本满足之后进一步追求的人生幸福、精神充实、富有意义的生活，是人自身素质的提升和内在精神的充盈。单纯物质文明的发展并不能满足人的所有需求。对于个体而言，人之为人的特质就在于超越物质经验层面的追求，达到精神层面的满足。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在由大向强的征程中，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强起来的中华民族不只应该强在物质力量强大，还应该有强大的文化理论、精神力量，还应该有足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烈，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工作。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巩固和坚定文化自信、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毋庸讳言，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文化建设领域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理想缺失、信仰缺失、道德缺失、诚信缺失等现象仍然比较突出，拜金主义、享乐

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没落的东西还有着一定的市场，人民的理论素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化素质以及全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有待大幅提升。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待文化供给的不断优化，以促进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更充分，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更充实。

二、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是优化文化供给的根本保证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文化建设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其人民性，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这一本质特征才能彰显，才能在社会主义文化改革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上不发生错误与偏差。

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就展望过新中国的文化前景：“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坚持结合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任务，把握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制定文化发展目标，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随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越来越高，更加期待好看的电影、电视剧、图书、戏曲，更加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更加盼望社会风气和文明风尚的提升。如果不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就不可能有效促进国民素质提高和社会文明进步，就不可能使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更充分、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更充实。”习近平总书记说：“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担当，凝魂聚气、强基固本、守正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得到更好阐释，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得到更好彰显，人民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同时，也要看到，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表现在文化领域即是不同文化的深度交流碰撞、各种思想文化风云激荡，一些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这种复杂局面对党

的领导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代以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对待文化？用什么样的思路和举措发展文化？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和目标推进文化建设？这些问题都考验着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另外，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复杂性，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文化传播途径、接受特点以及人民群众审美要求的新变化等，也对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新领域。面对这些新领域、新业态、新趋势，一旦偏离大局，文化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只有坚持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文化与文化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注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创新文化发展的思维理念、思路举措、科学方法，不断增强党领导文化创新发展的本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才能不断优化文化供给，促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力量、道德滋养。

三、优化文化供给，需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全方位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8月在甘肃考察时指出：“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善莫大焉。”“要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在坚守主业基础上推动经营多元化，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这一重要讲话又一次启发我们，优化文化供给，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需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方位发展。

文化事业的发展可以为文化供给的不断优化提供体制机制和政策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多项改革举措高频推出，重点难点改革实现突破，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正在逐渐形成。这一体制机制的进一步完善，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进一步围绕增强文化引导力、创造力、竞争力这一目的深化改革思路和举措，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更加清晰地凸显“服务人民”在一切文化事业中的地位和意义。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提升文艺原创力，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促进文艺作品反映生活与创造生活的双重作用的发挥。鼓励文化文艺工作者跳出“身边的小小的悲欢”，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走出象牙塔，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解释并服务于现实问题。

其次，更加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及人民共享文化成果的体制机制的完善，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让收藏在故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指示，细致、深入地挖掘传统文化，高度深度提炼其中向上向善、给人以正能量和精神动力的精神财富，大力整合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走进人民的生活，让百姓在生产生活中感受到文化的力量，增强文化自信。进一步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加大、拓展特色群众文化活动的力度、广度，让更多群众美起来、笑起来。

最后，进一步引导公共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向贫困地区倾斜。抓住城乡基层及贫困地区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问题，加强基层和乡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文化礼堂、文化广场的平台与内涵建设；因地制宜开展文化扶贫，推动文化小康建设；大力加强基层文化骨干人才培养，配齐配强乡镇综合文化站服务人员。

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为文化供给的不断优化提供更为丰富的形式和产品，更好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活力显著增强。要想进一步发挥文化产业在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巩固和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还需要在以下方面持续发力。

其一，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管住管好文化产业的导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把“兴文化”作为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方向，这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保持清醒的文化安全意识与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兼顾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是增强国家文化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中之重。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品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诚然不能忽视当前多元文化存在的事实，但必须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性。在网络已经成为重要传播媒介的背景下，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在坚持党管媒体、党管导向的前提下，适应新的传播方式和受众特点，推动中国融媒体信息传播理念的发展创新。使之成为思想理论学习、形势政策宣传、新闻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社会宣传教育和精神文明创建、文艺文化活动的工作平台，加快营造清朗网络空间，使正能量更加强劲、主旋律更加高昂，汇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精神力量。

其二，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激活市场潜力。着力提升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进一步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壮大文化市场主体。通过更新思维方式和文化产业运作方式，激发文化产业、创业活力，扩大文化消费试点，积极探索文化创新及成果转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企业建立具有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带动和实现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的升级，推动文化产业倍增发展。

其三，进一步在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产业优势方面重点发

力。中国是目前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我国 5000 多年的历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建筑、绘画、诗词、歌赋等资源。在国际文化竞争中，我国的文化资源优势尚未能转变为文化竞争优势。许多宝贵的文化资源正在为别国所侵占，无论是美国拍摄的动画片《花木兰》《功夫熊猫》，还是日本开发的具有中国风格的游戏软件，都给予我们以警示，因此必须重视、保护和开发五千多年文化的资源。只有质量高、数量多的文化产品才能形成强大的文化生产力，才能对人的思想产生持续冲击效应。因此，要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进一步挖掘整理传统文化资源，大力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民族优势特色的民族文化品牌，向国内外市场提供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文化产品及其服务，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不断增强中国文化产品的感召力。

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与对共产主义的再认识^{*}

——法国左翼学者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反思

王彩霞^{**}

【摘要】法国左翼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博采生命政治学等理论，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下资本主义健康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叠加爆发进行了现象分析与理论批判，并以此为契机，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新共产主义”发展模式。一方面，“新共产主义”发展模式揭示了疫情背景下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表现形式，丰富了对资本主义不平等制度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对“新共产主义”的探索中，无论是巴里巴尔对广义“国家”概念的重塑，还是巴迪欧主张的以“人类生命铁律”为基本原则的国际左翼学派联合会的倡议，仍存在乌托邦色彩浓厚、缺乏现实解决方案等问题。

【关键词】法国左翼；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负面优生学；新共产主义

法国左翼学界以重视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剖析和强调共产主义思想的运动观、实践性及其实现条件著称。^①特别是近些年来，法国左翼学者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矛盾、生命政治危机、生态灾难和剥削方式隐秘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解析，并在此过程中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解释力，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复兴共产主义思想极具启发性的观点^②，为消除资本主义弊端提供了左翼方案。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全球肆虐则进一步为法国左翼分析与批判资本主义危机的多重性和反思如何在新时代下复苏共产主义提供了新视角。

^{*} 本文系2018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基于‘防反相对主义’的中法对比研究”（63182023）的阶段性成果。

^{**} 王彩霞，语言学博士，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政治哲学及国别。

① 参见张忠胜：《进入21世纪法国左翼学者对共产主义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8期。

② 参见张忠胜：《进入21世纪法国左翼学者对共产主义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8期。

一、再生产危机与阶级矛盾的多重叠加

疫情背景下,法国资本主义体制下日积月累的种种问题逐渐暴露:失业率屡创新高,种族冲突加剧,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经济止步不前等。在疫情导致健康危机的同时,也伴随着一场不容忽视的经济危机,从而引发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 疫情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内在矛盾

法国长期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奉行国家对市场干预最小化的原则,削减公共服务投入,推动公共部门私有化,从而导致医疗系统无力应对疫情。此外,马克龙执掌下的法国政府在疫情防控上踟躇不前,甚至提出前后矛盾的主张:一方面,呼吁个人落实隔离防控责任,以保证疫情防控的有效性;另一方面,继续鼓励人们外出工作,以保证生产继续运转。这种犹豫不决被阿兰·比尔(Alain Bihr)称为“走走停停”的策略,导致法国疫情多次反复,进而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潮”(vague)^①,从而使法国一直深陷疫情泥潭。

事实上,上述问题正是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矛盾在疫情大背景下被激化的结果。首先,新自由主义催生的“榨取”(extractif)式资本主义^②决定了其必须借助无限生产,以满足其无限攫取利润的本性。然而,无限生产却不得不依靠无限再生产来维持。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与再生产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如果生产是无限的,那么必要的再生产就必须满足这一需求。^③

其次,再生产本身既包含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又包含劳动力的再生产。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一方面体现在对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破坏,如“人力资本”竞争白热化。法国左翼哲学家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摧毁了社会保障体系,削减了社会服务的投入,导致工人既没有得到充足的就业保障,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失业救济,从而使疫情带来的失业风险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人力资本竞争白热化,迫使劳动者要么面对失业,要么为求得工作岗位而被迫接受低薪工作,致使劳动者因失业或减薪而丧失购买力,进而造成消费环节受阻。^④另一方面还体现为对劳动力再生产的破坏。比如,染疫会导致部

^① Alain Bihr, “Les contradictions du capitalisme révélées par le Covid-19” (Septembre 18, 2021), <https://www.contretemps.eu/covid19-capitalisme-incoherences-bihr/>.

^② 巴里巴尔将“榨取式资本主义”视为对“绝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诠释。其表现在于对生命存在(existence)的方方面面都实行“商品化”,这其中就涵盖了生命的再生产。

^③ Aurore Koechlin, “Crise du Covid-19 : donner la priorité à la reproduction sur la production” (Mars 18, 2020), <https://www.contretemps.eu/coronavirus-capitalisme-reproduction/>.

^④ Etienne Balibar, “Ce que devient le politique-mi-temps de la crise 1/3” (Juillet 15, 2020), <https://aoc.media/opinion/2020/07/14/ce-que-devient-le-politique-mi-temps-de-la-crise-1-3/>.

分劳动主体丧失劳动能力。同时，糟糕的公共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也无法为该群体提供应有的保障，从而降低了劳动者工作的意愿，生育率也会随之降低，致使劳动力严重短缺。而作为经济关键的劳动力大面积缺口又会反向影响经济的再生产。^①

所以，马克龙“走走停停”的策略正是这种困境下的无奈之举。疫情严重时，限制人员流动以保护大众的健康安全；疫情好转后，又取消相应的保护措施以恢复生产。^②而这一政策也暴露出资本主义在疫情下的左支右绌：一方面，资本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需要通过无限生产以便最大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只有确保劳动力的再生产才能保证资本能够继续榨取剩余价值。^③

可见，法国疫情防控失当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的难以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以攫取最大利润为首要任务，优先将所有资本投入高利润的生产行业，从而极大挤压了对被认为是无利可图的公共健康行业的投入，由此产生的健康危机也直接导致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危机。所以，将生产置于再生产的优先位置使资本主义无力解决这一矛盾。^④在奥罗尔·科奇林（Aurore Koechlin）看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优先考虑再生产而非生产，将资金重点投入最基本的食品和卫生行业，并推进相关医疗设备制造公司国有化。^⑤

（二）疫情加剧了“工资铁律”原则对无产阶级的压迫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2020～2021全球工资报告，受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三分之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月工资有所下降或增长放缓，其中女性和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所受影响更为严重。^⑥法国左翼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两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私有制与资本过度集中下的“工资铁律”（loi d'airain）之间的耦合。^⑦

资本主义逐利的本性使其保持着控制劳动力成本的冲动，通过资本主义技术

① Etienne Balibar, “Entre l'Etat et le Commun: le service public”, in Soraya Nour Sckell, ed., *Crise pandémique: qui suis-je dans ce nouveau monde?*, Lisbonne: CEDIS, 2020, p. 48.

② Etienne Balibar, “Entre l'Etat et le Commun: le service public”, in Soraya Nour Sckell, ed., *Crise pandémique: qui suis-je dans ce nouveau monde?*, Lisbonne: CEDIS, 2020, p. 48.

③ Etienne Balibar, “Entre l'Etat et le Commun: le service public”, in Soraya Nour Sckell, ed., *Crise pandémique: qui suis-je dans ce nouveau monde?*, Lisbonne: CEDIS, 2020, p. 48.

④ Etienne Balibar, “Entre l'Etat et le Commun: le service public”, in Soraya Nour Sckell, ed., *Crise pandémique: qui suis-je dans ce nouveau monde?*, Lisbonne: CEDIS, 2020, p. 48.

⑤ Aurore Koechlin, “Crise du Covid-19: donner la priorité à la reproduction sur la production” (Mars 18, 2020), <https://www.contretemps.eu/coronavirus-capitalisme-reproduction/>.

⑥ OIT, “Le COVID-19 tire les salaires vers le bas, affirme un nouveau rapport de l'OIT” (Décembre 02, 2020),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762561/lang-en/index.htm.

⑦ Alain Badiou, “Pandémie, ignorance et nouveaux lieux collectifs” (Juin 02, 2020), https://www.liberation.fr/debats/2020/06/02/pandemie-ignorance-et-nouveaux-lieux-collectifs_1790106/.

改进制造了大量的过剩人口，加之新自由主义下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削减，使得缺乏生活保障的劳动者为了竞争就业岗位而被迫接受低劳动报酬，从而驱使工资水平下滑至仅能糊口的最低水平。这便形成了“工资铁律”：在资本利润不断集中于资本家的同时，劳动者特别是底层弱势劳动群体的薪资却始终维持在低水平，从而使对无产阶级的压迫进一步加深。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则促使“工资铁律”将剥削从本国无产阶级扩展至全球无产阶级。这是由于资本的全球化和国际流通自由化，将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从“中央编队”（formation centrale，发达国家）转移到“外围编队”中（formation périphérique，发展中国家），使得亚非拉农村数以亿计的农民成为“中央编队”下游产业链上的廉价劳动力，大大扩展了劳动力后备军的规模，从而将“外围编队”的无产阶级卷入全球劳动力竞争，导致其被迫接受低廉的工资待遇与恶劣的工作条件。^①正如左翼哲学家乔治·加斯托（Georges Gastaud）所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使得垄断型寡头企业和寡头政治体制打破了国家边界，同时也将其危机转嫁给了全球。^②

疫情和全球化的叠加成倍放大了“工资铁律”对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剥削。一方面，“中央编队”国家的工人因为疫情防控和经济危机造成的停产停工而面临失业风险，为竞争有限的工作岗位，在接受低薪并承受更严重的剥削的同时还要承受更高的染疫风险，但这种风险和后续治疗成本全由劳动者承担。另一方面，“中央编队”国家通过实行不平等的全球化产业分工，将最容易染疫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外围编队”国家。当“中央编队”国家可以执行防控政策停工停产时，却以合同毁约赔偿和搬迁工厂为要挟，逼迫“外围编队”国家的工人不间断生产，以为其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它们在通过不平等的产业分工和价格剪刀差剥削这些工人的同时，也将染疫风险和治疗成本转嫁给了他们，甚至还通过国内外工人的相互竞争，进一步压低双方工资，以攫取更多利润。

面对疫情下资本主义“工资铁律”对无产阶级的进一步压迫，左翼学者哈德琳·克鲁埃（Hadrien Clouet）和马克西姆·奎朱（Maxime Quijoux）呼吁无产阶级树立工资意识（conscience salariale）甚至工薪阶层意识，通过各种形式的罢工抗议活动开展阶级斗争，以便将无产阶级从“工资铁律”中解放出来。例如，疫情期间医护人员针对法国恶劣的公共卫生条件和严重缺少必备防护物资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罢工维权活动。此外，两位学者还认为“工资意识或工薪阶层意识”还体现在无产阶级内部发起的团结互助行为（solidarité），如克勒兹省的失业裁缝为医护人员和社工制作口罩，马赛市麦当劳处于罢工状态的员工将

① Alain Bihr, “Les contradictions du capitalisme révélées par le Covid-19” (Septembre 18, 2021), <https://www.contretemps.eu/covid19-capitalisme-incoherences-bihr/>.

② Georges Gastaud, “Virer la mondialisation virale-par Georges Gastaud #Covid19-fr.” (Mars 23, 2020), <https://www.initiative-communiste.fr/articles/europe-capital/virer-la-mondialisation-virale-par-georges-gastaud-covid19-fr/>.

其工作场所作为弱势群体的互助平台等。

在两位学者看来，如果抗议罢工运动是与资本的正面斗争，那么无产阶级内部的互助行为则起到凝聚斗争力的作用。就本次疫情引发的危机而言，工薪阶层拥有的权利和工资意识或工薪阶层意识则是应对这场危机的关键。^①

二、负面优生学催生变相屠杀

疫情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反映的不仅是经济发展模式问题，更是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巴里巴尔曾指出：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更像是一场精神危机，是人类在几种价值体系之间以激进或暴力的方式展现出的社群观、生死观和人类观的问题。疫情使弱势群体更加边缘化甚至是被社会遗弃，^②由此产生出了更多且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如社会达尔文主义（darwinisme social）和负面优生学（eugénisme négatif）的回魂等问题。

（一）负面优生学的回魂

负面优生学也称消极优生学，是由社会达尔文主义派生而来的优生学理念，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③其目的是借助进化论思想中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理念，实现去除“劣质人种”，达到人种优化的目的。该理论一度被用来论证人种优化论、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以及阶级矛盾等现象的合理性。^④事实上，被认为是现代生命政治下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手段之一的优生学，特别是打着“适者生存”“劣质淘汰”旗号的负面优生学，本质上就是一种为阶级或种族偏见服务的伪科学，是基于人口、禀赋、属地、国家、种族甚至阶级这几大要素进行的结构性歧视的政治手段。^⑤

疫情的蔓延使负面优生学在德国纳粹覆灭后的今天以更隐蔽的形式死灰复燃。巴里巴尔认为，资本主义政府在疫情防控上采取的措施看似同等对待所有群体，但实际上并不公平，也无法做到保护所有人。普遍存在的阶级、种族和国别

① Hadrien Clouet & Maxime Quijoux, “Lutte des classes pendant l'épidémie. Le pouvoir des salarié·e·s comme réponse à la crise?” (Avril 19, 2020), <https://www.contretemps.eu/lutte-classes-travail-covid/>.

② Etienne Balibar, “La philosophie à l'épreuve de la pandémie avec Etienne Balibar” (Avril 24, 2020), <https://www.radiofrance.fr/franceculture/podcasts/les-chemins-de-la-philosophie/la-philosophie-a-l-epreuve-de-la-pandemie-avec-etienne-balibar-9555947>.

③ Daniel Becquemont, “Darwinisme social et eugénisme anglo-saxons”, *Revue d'Histoire de la Shoah*, No. 2, 2005, p. 144.

④ 参见邵鹏：《社会达尔文主义：被时代抛弃的主流思潮》，《经济观察报》2021年2月22日。

⑤ Nicola Bertoldi, “L'eugénisme comme objet pour l'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comme problème contemporain” (Septembre 5, 2019),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cdst/720#tocto1n3>.

等结构性差异使得人们无论是在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还是预防风险的能力上都是不平等的,而这种不平等的加剧会转化成人文学意义上的差异,即人类社群的内部分化,从而为实施负面优生学创造了基础。^① 具体而言,这场健康危机会淘汰掉那些低收入、低社会保障、低健康水平的弱势群体,加剧各阶层、区域、职业尤其是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等于是在传统的结构性歧视的基础上又为边缘群体附加一个疫情背景下的局势性歧视,从而放大了负面优生学的效应。^②

左翼学者丹尼尔·塔努罗(Daniel Tanuro)也指出,疫情期间美国政客呼吁对新冠病毒抵抗能力更弱的老年人牺牲自己以拯救经济和所谓的“自由”的行为,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下的负面优生学的集中体现。^③ 由此甚至触发了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各种神秘主义、谣言和诅咒等非理性行为的复现。^④ 然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者却往往把自己描绘成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捍卫者。他们一边占据道德制高点谴责某些资本家的阴谋,一边却悠然享受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表象下弱肉强食所带来的利益,以牺牲他人和地球环境为代价来致富。道貌岸然的“自由”和“自然法则”的面具下,隐藏着古老的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支配、剥削、消灭。^⑤

更严重的是,疫情加重的局势性不平等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系统性的交叉^⑥,由此导致了种族冲突的激增。正如左翼哲学家阿兰·布罗萨特(Alain Brossat)所言,疫情下资本主义国家暴露出的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缺失,体现出的不仅是生命的不平等和负面优生学的再现,更严重的是由此产生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再次升级。疫情下,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等国政府挤压的是弱势群体——居无定所的外来移民、养老院中的老人、不稳定工作者和无家可归者的生命权。面对疫情的威胁,生命机会的不平等已成为一些国家的大丑闻。在统治者和精英眼中,最弱者(所谓“无用之人”)被认为是消耗性的。^⑦ 令人讽刺的是,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却自称是“民主和人权的引领者”。

① Etienne Balibar, “L’histoire ne continuera pas comme avant” (Avril 22, 2020), <https://www.pierremansat.com/2020/04/etienne-balibar-l-histoire-ne-continuera-pas-comme-avant.html>.

② Etienne Balibar, “L’histoire ne continuera pas comme avant” (Avril 22, 2020), <https://www.pierremansat.com/2020/04/etienne-balibar-l-histoire-ne-continuera-pas-comme-avant.html>.

③ Daniel Tanuro, “Face à la pandémie: écosocialisme ou darwinisme social?” (Février 16, 2021), <https://www.contretemps.eu/pandemie-covid-ecosocialisme-darwinisme-social/>.

④ Alain Brossat, “Il doit faire quelque part un sale temps peu ordinaire. La pandémie, vue de France et de Taiwan” (Juin 25, 2020), <https://www.contretemps.eu/pandemie-brossat-france-taiwan/>.

⑤ Daniel Tanuro, “Face à la pandémie: écosocialisme ou darwinisme social?” (Février 16, 2021), <https://www.contretemps.eu/pandemie-covid-ecosocialisme-darwinisme-social/>.

⑥ Etienne Balibar, “Ce que devient le politique-mi-temps de la crise 1/3” (Juillet 15, 2020), <https://aoc.media/opinion/2020/07/14/ce-que-devient-le-politique-mi-temps-de-la-crise-1-3/>.

⑦ Alain Brossat, “Il doit faire quelque part un sale temps peu ordinaire. La pandémie, vue de France et de Taiwan” (Juin 25, 2020), <https://www.contretemps.eu/pandemie-brossat-france-taiwan/>.

随着疫情下资本主义各种危机的显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急于转移人民对疫情防控失败的注意力，不断将这一卫生问题政治化，通过病毒溯源和造谣抹黑等伎俩煽动国民对中国的种族主义和敌对心理。^①对此，巴里巴尔揭露道，美国的种族主义根深蒂固，这场疫情使其产生了新的表现形式。通过对中国的指责自欺欺人地产生一种虚幻的自我道德满足感，并在将种族敌意转向中国的同时，借助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共鸣来徒劳应对中国的崛起。^②因此，疫情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的种族冲突问题，并非疫情单方面冲击的结果，而是深埋资本主义社会已久的内在矛盾和疫情危机共同作用的必然产物。如果说前者是资本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的内因的话，后者则是加速这一问题爆发的重要催化剂。

（二）由主动屠杀转向变相屠杀

布罗萨特曾指出，现代生命政治制度下的统治者被赋予了维持人民生命的任务。他们是人类生命的守护者，或者说是“活着的（人类）牧羊人”。疫情时代，正统的人权与生命政治理性之间的冲突从未如此激烈。^③特别是疫情暴发初期，资本主义国家，因医疗资源短缺而选择评估病患生存率的高低，并据此做出了任由部分病人自生自灭的决定。这种对病患的分流筛选与纳粹分子在集中营中选择将一部分有技能的人送去劳动而将剩下的“无用之人”送去毒气室集体销毁的行为并无差别。^④

这种对病患的分流方式等于是通过不救治的行为放任底层人民死亡，进行变相屠杀。从福柯生命政治的角度来看，现代化统治制度往往是以“所有人的利益”的名义，通过将一部分人置于死亡之地，来保全另一部分人的生存可能。^⑤这种对部分民众生命权利的裁决，虽然也被认为是传统权利中对顺民的生与死裁决的体现^⑥，却采取了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放任死亡。正如福柯在《认知的意识》中所述：“我们甚至可以说旧体制的生杀大权已经被‘让’人活和‘不让’人死的权利取代了。”^⑦因此，布罗萨特指出，当代生命政治体制下，在环境范

① Alain Brossat, “Il doit faire quelque part un sale temps peu ordinaire. La pandémie, vue de France et de Taiwan” (Juin 25, 2020), <https://www.contretemps.eu/pandemie-brossat-france-taiwan/>.

② Alain Brossat, “Il doit faire quelque part un sale temps peu ordinaire. La pandémie, vue de France et de Taiwan” (Juin 25, 2020), <https://www.contretemps.eu/pandemie-brossat-france-taiwan/>.

③ Alain Brossat, “Il doit faire quelque part un sale temps peu ordinaire. La pandémie, vue de France et de Taiwan” (Juin 25, 2020), <https://www.contretemps.eu/pandemie-brossat-france-taiwan/>.

④ Alain Brossat, “Le ‘style tardif’ de la biopolitique. Pandémie et sélection” (Septembre 21, 2020), <https://www.contretemps.eu/biopolitique-pandemie-covid-selection-brossat/>.

⑤ Alain Brossat, “Le ‘style tardif’ de la biopolitique. Pandémie et sélection” (Septembre 21, 2020), <https://www.contretemps.eu/biopolitique-pandemie-covid-selection-brossat/>.

⑥ Alain Brossat, “Le ‘style tardif’ de la biopolitique. Pandémie et sélection” (Septembre 21, 2020), <https://www.contretemps.eu/biopolitique-pandemie-covid-selection-brossat/>.

⑦ Michel Foucault, *La volonté de savoir*, Paris: Gallimard, 1976, p. 181.

式倾向于压制历史范式^①的普遍背景下,疫情中的资本主义利用现代权利模式,采取了一种更为隐蔽的(甚至狡猾的)以放任其死亡取代主动杀戮的做法。^②所以,布罗萨特认为,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已进入一个生命政治的新时代:“晚期生命政治”(biopolitique tardive)^③时代。^④

事实上,对于布罗萨特而言,如果说生命政治核心的转折点在于实施对人民生命负责的各种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只能存在于一种包容的维度中,譬如所有女性都可以享有乳腺癌筛查的福利,所有男性也都可以获得同等的保障(结肠癌或前列腺癌等)。然而,疫情大背景下,在生命政治机器证明其价值之时,“让所有人活”却隐含了另一范式:人类计划性地抛弃或放弃。这是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并非所有生命体都可以被动员,以满足和优化发展生产力的需求。^⑤

三、对共产主义的本土化再认识

疫情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暴露出的上述问题,使法国左翼学界普遍意识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从资本主义体制这个根源入手,通过复苏共产主义思想,尝试以共产主义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行方案。^⑥

(一) 联合全球先进力量,以“人类生命铁律”复苏“共产主义”新思潮

正如巴里巴尔所言,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已未必适用于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任何新事物、新体制的发展都涉及本土化的问题。为此,巴迪欧曾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战时”的共同敌人,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只能通过将当权阶级的利益与更普遍的利益结合,以稳定当前局势。^⑦ 尽管如

① 布罗萨特的“历史范式”是一种自然界的范式,是人们在自然界中具备的最直接也最不容置疑的对历史的直觉,进而从自然界历史发展视角去看待问题,譬如政治或革命政治都从属于这种历史范式。“环境范式”则是从重大的环境危机去看待或分析问题,例如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在环境范式下常被处理成如福岛核事故般的问题,而不是“历史范式”下反映的一个政治问题。“环境范式”取代“历史范式”也正是当代生命政治的一种体现。

② Alain Brossat, “Le ‘style tardif’ de la biopolitique. Pandémie et sélection” (Septembre 21, 2020), <https://www.contretemps.eu/biopolitique-pandemie-covid-selection-brossat/>.

③ 布罗萨特参照托洛茨基主义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和文学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提出的“晚期风格”的理念,将疫情时代统治阶层通过“变相屠杀”实行的生命政治定义为“晚期生命政治”。

④ Alain Brossat, “Le ‘style tardif’ de la biopolitique. Pandémie et sélection” (Septembre 21, 2020), <https://www.contretemps.eu/biopolitique-pandemie-covid-selection-brossat/>.

⑤ Alain Brossat, “Le ‘style tardif’ de la biopolitique. Pandémie et sélection” (Septembre 21, 2020), <https://www.contretemps.eu/biopolitique-pandemie-covid-selection-brossat/>.

⑥ 参见王彩霞:《法国汉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果的认识与启示》,《法国研究》2021年第4期。

⑦ Alain Badiou, “Sur la situation épidémique” (Mars 26, 2020), <https://qg.media/2020/05/26/sur-la-situation-epidemie-par-alain-badiou/>.

此，巴迪欧却认为：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全球疫情，对法国这类国家政治层面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共产主义革命的尝试。

针对当前全球形势，巴迪欧提出了一项倡议：创立一个汇集了世界各地知识分子、工人、艺术家及各个民族男女老少的学派，并通过集会以人类生命铁律（lois de la vie des gens）为基本原则开展新思潮运动。^②“人类生命铁律”的概念是相对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工资铁律提出的，其宗旨在于以保护与保障人们最基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需求为基本原则，借助学派的集体力量，向弱势群体提供物质和行政援助，如爱心食堂、急救药房等。此外，这一理念还涉及弱势群体居住条件，维权性援助服务等涵盖了人类生命与生活权利的方方面面的思考。^③巴迪欧强调这种人类生命铁律需要以条例的形式落实，并且这些具体条例需要被人们承认，进而被人们遵守。在此期间，条例的制定和落实则需要整个国际学派联合会共同努力。

为此，巴迪欧表示，未来国际学派联合会将是一个复苏共产主义的重要阶段。由此将会诞生超越现有虚假民主式资本主义的新体制。^④巴迪欧的这一倡议立刻得到了法国著名出版社伽利玛（Editions Gallimard）的积极响应，并于2020年6月以公益的形式线上、线下同时出版了《危机手册》^⑤，其中汇集了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甚至不同民族的人们对疫情危机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思考。

与此同时，巴里巴尔和比尔也曾发表过类似观点。巴里巴尔指出：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正在为“联合”各种抗议性政治运动或在它们之间建立等效链（chaînes d'équivalence）创造条件。^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等效链理念来源于阿根廷政治学家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理论，其作用在于可以实现政治力量的有效凝聚，以便进一步推进革命进程，并实现一种普适性的统一。^⑦

与巴里巴尔相比，比尔的观点似乎更为接近巴迪欧“人类生命铁律”的主张。比尔表示，面对当前局势，我们迫切需要明确界定一套具体维护民众阶层利

① Alain Badiou, “Sur la situation épidémique” (Mars 26, 2020), <https://qq.media/2020/05/26/sur-la-situation-epidemie-par-alain-badiou/>.

② Alain Badiou, “Pandémie, ignorance et nouveaux lieux collectifs” (Juin 2, 2020), https://www.liberation.fr/debats/2020/06/02/pandemie-ignorance-et-nouveaux-lieux-collectifs_1790106/.

③ Alain Badiou, “Pandémie, ignorance et nouveaux lieux collectifs” (Juin 2, 2020), https://www.liberation.fr/debats/2020/06/02/pandemie-ignorance-et-nouveaux-lieux-collectifs_1790106/.

④ Alain Badiou, “Pandémie, ignorance et nouveaux lieux collectifs” (Juin 2, 2020), https://www.liberation.fr/debats/2020/06/02/pandemie-ignorance-et-nouveaux-lieux-collectifs_1790106/.

⑤ Éric Lelann, “Un rebelle assagi. A propos du ‘Tract de crise’ d’Alain Badiou” (Avril 13, 2020), <https://communisme-et-politique.org/un-rebelle-assagi-a-propos-du-tract-de-crise-dalain-badiou/>.

⑥ Etienne Balibar, “Le politique et la pandémie” (Janvier 18, 2021), <https://www.cahiersdusocialisme.org/le-politique-et-la-pandemie/>.

⑦ Fabrice Flipo, “Laclau. La guerre des identités-grammaire de l’émancipation” (Juin 2, 2016), https://www.journaldumauss.net/spip.php?page=imprimer&id_article=1308.

益的方案,并最大程度地动员周围群众,通过集体行动开展相关运动。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加剧要求我们完成一项波及面更广但也更令人振奋人心的使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即共产主义。^①巴里巴尔补充道,寻找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关键,并非追寻传统意义上的过于缥缈甚至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而是要把共产主义看作一种具有可行性的实践和生活方式,^②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一种顺应新形势的新共产主义制度。^③

(二) 重塑国家概念与重建公共服务作为新共产主义的起点

巴里巴尔曾指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无法摆脱国家干预——金融干预、压制性干预、监管干预、恢复性干预、适应性干预。疫情的不断发展证明国家才是应对疫情的关键所在,被新自由主义削弱得羸弱不堪的国家必须得以重建。巴里巴尔多次呼吁:应在当前形势下,思考如何重塑广义“国家”概念,特别是要反思如何在对新自由主义纠偏的基础上重塑“国家”概念。^④巴里巴尔主张国家应该集财政预算、货币政策和承担公共服务于一体,以便为适应社会需求提供保障。这种公共服务涵盖了分担意识甚至无私忘我的精神、公民责任和共同意识,而这些都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拥有的。^⑤

事实上,在巴里巴尔看来,此次疫情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公共服务在国家与共同体(commun)之间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对公共服务的重建,也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新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起始点。^⑥这是由于公共服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被认为是个人和集体生存的必要条件,或者说个体为了继续有人性地生活而连接彼此的必要条件。^⑦因此,公共服务可以说是联结国家与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为实现从国家到共同体的转变,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显得尤为关键。为此,比尔呼吁:在强调个人之间合作与团结互助的基本原则下,将社团、工会

① Alain Bihr, “Les contradictions du capitalisme révélées par le Covid-19” (Septembre 18, 2021), <https://www.contretemps.eu/covid19-capitalisme-incoherences-bihr/>.

② Etienne Balibar, “L’urgence des alternatives au capitalisme catastrophe” (Décembre 30, 2020), <https://www.humanite.fr/politique/centenaire-du-pcf/lurgence-des-alternatives-au-capitalisme-catastrophe-pointe-le>.

③ Etienne Balibar, “Entre l’Etat et le Commun: le service public”, in Soraya Nour Sckell, ed., *Crise Pandémique: qui suis-je dans ce nouveau monde?*, Lisbonne: CEDIS, 2020, p. 47.

④ Etienne Balibar, “L’histoire ne continuera pas comme avant” (Avril 22, 2020), <https://www.pierremansat.com/2020/04/etienne-balibar-l-histoire-ne-continuera-pas-comme-avant.html>.

⑤ Etienne Balibar, “L’histoire ne continuera pas comme avant” (Avril 22, 2020), <https://www.pierremansat.com/2020/04/etienne-balibar-l-histoire-ne-continuera-pas-comme-avant.html>.

⑥ Etienne Balibar, “Entre l’Etat et le Commun: le service public”, in Soraya Nour Sckell, ed., *Crise pandémie: qui suis-je dans ce nouveau monde?*, Lisbonne: CEDIS, 2020, p. 48.

⑦ Etienne Balibar, “Entre l’Etat et le Commun: le service public”, in Soraya Nour Sckell, ed., *Crise pandémie: qui suis-je dans ce nouveau monde?*, Lisbonne: CEDIS, 2020, p. 47.

和政治组织等社会化场所作为集体行动的依托和社会解放的手段，并开展相关运动，以迫使当局承认公共卫生的公益性属性，而保障这一属性的基础就是必须存在一个独立于私人利益之外的公共卫生机构。换言之，就是借助一切（政治或非政治性的）社会力量与统治阶级进行博弈，迫使其承认公共卫生的公益性质，并建立非私人利益性质的公共卫生机构。^①

而在国家层面，巴里巴尔则提出：由国家管理的公共服务除了必须独立于私人利益之外，还需要国家在市场和行业竞争方面给予保护。^②与巴里巴尔相比，比尔提出了更为具体的举措，他指出：国家必须保障医疗人员的正当权益，并推动从城市医疗到跨国制药公司的整个卫生系统进行社会化转型。在疫情治理中，当权者需将全民健康保障作为首要任务，特别是要优先保护为工作和生活条件所迫的最易感人群。此外，国家应取消疫苗的专利权，并以成本价提供疫苗。在此基础上，必须强制“中央编队”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统治者资助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实现全球人口快速大规模疫苗接种。^③

在公共服务运转层面，巴里巴尔指出：公共服务应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公共行为逻辑。在横向层面上，这种逻辑指的是“社会团结、平等合作和互惠服务”的逻辑，甚至可以说，以国家为主体的公共服务需要体现的正是一种共同体（common, commonwealth）意识。^④而要形成这种共同体意识，还需要在公民层面加强公民集体责任感建设，并强调公民的自我意识特别是自我集体意识的重要性。为此，巴里巴尔指出：“（我们）需要全体公民包括患者及其周围人员，以及他们的雇主在疫情中采取措施以应对其所带来的危机，并支持医护人员，以确保恢复公共服务的完整性和行动能力，以及更广泛、更平等的社会保障体系”。^⑤

比尔则积极主张全民接种疫苗，并将其上升至公共卫生共同利益的道德性责任高度，且将其视为集体承担个人医疗费用的必要条件。此外，比尔还强调对当权者施加压力迫使其放弃现有的失败的抗疫策略，采取呼吁有针对性的个人动员，并针对具体排斥接种情况施予科学合理的解释，而非通过限制人身自由和以降薪或失业为威胁来迫使人们接种疫苗。必须将当前抗击疫情的斗争视为公共卫

① Alain Bihr, “Les contradictions du capitalisme révélées par le Covid-19” (Septembre 18, 2021), <https://www.contretemps.eu/covid19-capitalisme-incoherences-bihr/>.

② Etienne Balibar, “Entre l’Etat et le Commun: le service public”, in Soraya Nour Skell, ed., *Crise pandémique: qui suis-je dans ce nouveau monde?*, Lisbonne: CEDIS, 2020, pp. 48-49.

③ Alain Bihr, “Les contradictions du capitalisme révélées par le Covid-19” (Septembre 18, 2021), <https://www.contretemps.eu/covid19-capitalisme-incoherences-bihr/>.

④ Etienne Balibar, “Entre l’Etat et le Commun: le service public”, in Soraya Nour Skell, ed., *Crise pandémique: qui suis-je dans ce nouveau monde?*, Lisbonne: CEDIS, 2020, p. 48.

⑤ Etienne Balibar, “Entre l’Etat et le Commun: le service public”, in Soraya Nour Skell, ed., *Crise pandémique: qui suis-je dans ce nouveau monde?*, Lisbonne: CEDIS, 2020, p. 50.

生行动,而非警察的暴力行动。^①

为此,巴里巴尔总结道:我们需要某种共同体性质的意识形态。更确切地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群懂得反思的积极大众,这些大众能在普遍智慧或自身能力的引导下自发地思考、计划、组织互助与合作,并且通过从地方层面到国家乃至全球层面的公民集会来逐步实现这一目标。这意味着需要实施普通公民的民主化管理制度。事实上,公共服务的理念正是共同利益的实现。^②

四、总结与反思

进入21世纪后,尽管资产阶级经常利用管理技术革新、矛盾转嫁和自我调整完善等手段,力图缓和阶级矛盾,但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改变。^③法国左翼学界从底层大众的经济社会问题着手,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生命政治学等理论,对疫情下法国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种族冲突和阶级矛盾加剧、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等问题的剖析与批判具有一定的见地,深刻地揭示了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总爆发的导火索。在对新共产主义的探索上,法国左翼学者以疫情中折射出的问题为契机,主张先进力量和先进思想的碰撞与联合,以开启共产主义思潮的复苏之路,对促进共产主义思想传播,推动资本主义变革具有积极意义。

巴里巴尔曾写道:“正是这场危机催生了实践共产主义的高光时刻。”^④ 尽管如此,法国左翼学者对新共产主义的探索仍存在乌托邦化甚至带有较为浓厚的伦理社会主义痕迹等问题。从理论层面来看,法国左翼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和道德的批判还停留在纯理论研究的层面,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经济变革方案,恐使其最终陷入空想的泥潭。从实践层面来看,法国左翼学者未能将其设想转化为实际行动,加之长期脱离群众,难以有效凝聚反资本主义力量,进而无法真正撼动资本主义的根基。

如巴迪欧复苏共产主义的主张实质上还停留在学院派的脱离群众的理论性探索。因此,这种以人类生命铁律为基本原则的国际左翼学派联合会的倡议,仍显缥缈且理想化,其可行性还有待商榷。与此相比,巴里巴尔的观点相对更为实际,其重塑广义国家概念对新自由主义的纠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是资本主

① Alain Bihr, “Les contradictions du capitalisme révélées par le Covid-19” (Septembre 18, 2021), <https://www.contretemps.eu/covid19-capitalisme-incoherences-bihr/>.

② Etienne Balibar, “Entre l’Etat et le Commun: le service public”, in Soraya Nour Skell, ed., *Crise pandémique: qui suis-je dans ce nouveau monde?*, Lisbonne: CEDIS, 2020, p. 51.

③ 参见遇荟:《法国左翼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审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25日。

④ Etienne Balibar, “Entre l’Etat et le Commun: le service public”, in Soraya Nour Skell, ed., *Crise pandémique: qui suis-je dans ce nouveau monde?*, Lisbonne: CEDIS, 2020, p. 51.

义彷徨期对替代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新的尝试，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如何确保公共服务体系有效建立上未能给出具体方案。此外，就如何在一系列抗议政治运动之间建立等效链的问题上也缺乏实践性的反思。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思考。

The Multiple Crises of Capitalism and the Reunderstanding of Communism

——French Left-Wing Scholars' Reflection on the Covid-19

Wang Caixia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biopolitics and other theories, French left-wing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a phenomenon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criticism on the superimposed outbreak of capitalist health, economic, social, and spiritual crises triggered by Covid-19. They tak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explore a “Neo-communism” development model suitable for the country’s national conditions. On the one han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e new manifestations of the capitalist crisis in the context of the epidemic, and enriched the research on the capitalist inequality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exploration of “neo-communism”, whether it is Balibar’s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state” in a broad sense or Badiou’s initiat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eft Schools which advocate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iron law of human life”,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Utopian” color and lack of practical solutions.

Keywords: French Left-wing; Covid-19; Negative Eugenics; Neo-communism

[责任编辑：焦佩]

论恩格斯对自然主义的否定之因^{*}

徐 振^{**}

【摘 要】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这一判断在高度赞扬巴尔扎克的同时，也对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进行了贬低，亦即是对自然主义的否定评价。究其原因，在于恩格斯的评价标准与左拉创作特点的冲突。自然主义文学的形成是欧洲科学精神向文学领域的渗透，左拉的小说追求真实，以科学精神为思想主导，注重考察人物的生理遗传属性和所处的外部环境。恩格斯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为现实，追求真实是内涵之一，但更注重历史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他评价文学作品的隐性标准为政治倾向，更注重人的社会属性。

【关键词】恩格斯；自然主义；现实；政治倾向

在新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上，长期以来我们对以法国作家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秉持否定的、负面的评判。这种否定的、负面的评判既因苏联的立场不断得到强化，也因国内研究者的政治批判而不断得以确证，同时还因影响力甚大的教材而得到推广。

在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中，自然主义意味着政治上的反动。如在苏联关于思想问题的历史性决议中，自然主义与形式主义并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①。《苏联大百科全书》则将自然主义定位为“资产阶级艺术和文学

^{*}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号：2019J013）阶段性成果。

^{**} 徐振，文学博士，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讲师，西安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伦理学与当代强军伦理建设研究中心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① [苏联]布洛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反对艺术中的自然主义》，金诗伯、吴富恒译，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第1页。

中的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社会反动势力的思想武器”。^①即便是后期修订过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对自然主义的定位依然带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重点强调自然主义是“资产阶级文化所产生的思想意识和风格体裁上的一种倾向，而且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一种艺术方法”^②以及它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格格不入。受苏联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研究者也多从政治批判的角度看待自然主义。如吴富恒认为自然主义者在描写真实生活时仅仅强调平凡事实与琐碎细节，自然主义“拒绝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主要的、本质的东西，拒绝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③。再如，吕恩谊认为自然主义者“往往死抱住某一地某一事的现象，要求绝对确实地照样翻版，这就注定了他们不能抓到事物的本质，因而不免歪曲了现实。他们以‘真实’为口号冒充现实主义者，其实他们的哲学基础是机械唯物论，他们是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映论为基础的现实主义毫无相通之处的”^④。周扬1958年发表在《红旗》上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将自然主义定位为“鼠目寸光”，是对现实主义的“歪曲和庸俗化”^⑤，为自然主义的性质定了基调。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文学史等教材对自然主义的“反动”属性的定位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影响甚大的以群主编的高校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完全对立起来，指出：“现实主义作家如果缺乏远大的目光、积极的思想，在观察生活、反映生活时，只局限于一些表面的、局部的真实，而看不到真正典型的、本质的东西，就容易把现实主义庸俗化，而庸俗的现实主义，就很容易流为鼠目寸光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在表面上似乎跟现实主义相近，实质上却正好是它的反面。”^⑥著名学者杨周翰先生等主编的高校教材《欧洲文学史》亦认为，自然主义作家“用自然规律来代替社会规律，抹杀人的阶级性……把艺术创作和实验科学等同起来，实际上是取消了艺术的存在。根据自然主义原则写成的作品，总是着重对生活琐事、变态心理和反常事例本身的详细描写，缺乏具有社会意义的艺术概括，歪曲事物的真相，模糊事物的本质，把读者引向悲观消极，丧失对社会前途的信心”^⑦。教材中的这一观点在李赋宁先生主编的教材《欧洲文学史》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⑧

① 《自然主义》，《美术》1956年第5期。

② 《自然主义》，《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3期。

③ 吴富恒：《论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别——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和方法》，《文史哲》1955年第1期。

④ 吕恩谊：《艺术的真实不是事实的实录——对王琦的“画家应该重视生活实践”的意见》，《美术》1955年第10期。

⑤ 谢冕总主编：《中国新诗总论 1950-1976》，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232页。

⑥ 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258页。

⑦ 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欧洲文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80页。

⑧ 参见李赋宁主编：《欧洲文学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65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仍然有研究者对自然主义继续秉持否定的立场,如徐德峰认为自然主义一方面企图消解精神的人,用没有灵魂的动物代替对人的全部理解,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的价值取消艺术存在的价值与权利,造成“人与艺术的双重失落”^①。但不可忽视的是,国内学界在对待自然主义文学遗产的评价上出现了转向,从此前的简单的政治批判转向了深入的学理探索,如于思曼认为,自然主义是“对现实的耐心研究,就是观察细节所得的整体”^②。金嗣峰认为左拉的创作与现实主义大师之间有着一定的继承关系,自然主义是“一个在世界文学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文学流派”^③。柳鸣九先生认为,从左拉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的表现到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这种社会史小说创作的种种情况来看,左拉堪称巴尔扎克的“伟大后继者”^④。吴岳添先生从折中调和的角度看待恩格斯对自然主义的否定,认为不能把革命导师的某些话当作“一字不改的经文”,恩格斯这一评价的重点是称赞巴尔扎克,这就如同讲“太阳比月亮明亮得多,意思不是贬低月亮而是赞美太阳”^⑤。曾繁亭则从左拉所追求的真实感出发,论证了自然主义文学的科学化倾向,这种倾向并不是要将文学“化”为科学,而是“避免作品流于观念的虚妄与描写的虚幻”^⑥。此外,还有研究者从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着手论证自然主义文学对20世纪崛起的现代主义文学有先导之功。如蒋承勇先生认为,意识流小说实则是一种心理的自然主义,是生活现实与心理现实的合流,在表现主义的作品中,“作者所遵循的是细节和人物内心感受的绝对真实自然”,象征主义也不乏自然主义的倾向与痕迹。^⑦曾繁亭也认为,自然主义对生理学的重视,“为20世纪以弗洛伊德心理学为武器专事揭示‘自我’内心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学事先进行了一次开创性的探索 and 实验”^⑧。

追根溯源,对自然主义的否定并不始于苏联,而是恩格斯在一封书信中对左拉的评价。1888年,恩格斯在给作家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书信中高度赞扬了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因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为世人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无比精彩的“现实主义历史”。恩格斯在赞美巴尔扎克的时候采用了刻意贬低左拉来褒扬巴尔扎克的方式:“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

① 徐德峰:《自然主义:人与艺术的双重失落》,《学术月刊》1992年第2期。

② [法]于思曼:《试论自然主义的定义》,博先俊译,《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3期。

③ 金嗣峰:《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与创作——兼论对〈小酒店〉的批评》,《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

④ 柳鸣九:《关于左拉的评价问题(二)——对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与左拉论断的质疑》,《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

⑤ 吴岳添:《全面理解恩格斯对左拉的评价》,《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0年第1期。

⑥ 曾繁亭:《“真实感”——重新解读左拉的自然主义文论》,《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⑦ 参见蒋承勇等:《欧美自然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200页。

⑧ 曾繁亭:《自然主义:从生理学到心理学——兼论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东岳论丛》2012年第1期。

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① 故恩格斯在评价现实主义伟大的同时实际上也形成了对自然主义的否定评价，这一否定评价影响到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判断，进而也对我国学界造成了持久深远的影响。

此处的核心问题是，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伟大为什么非要以贬低左拉作为前提条件？他完全可以只称赞巴尔扎克而不必对左拉给出否定评价。论者认为，要准确理解这个历史遗留问题，需要从左拉创作的特点和恩格斯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两个维度进行考察，也就是说，只有将作家的创作特点和评论家的标准分析清楚，才能理解和把握恩格斯对自然主义的否定的形成之因。

一、左拉创作的特点：自然科学精神向文学创作的渗透

1888年恩格斯对左拉给出“否定性”评价时，左拉已经48岁。但是，无论是从他的代表性理论批评著作问世时间^②，还是从他的自然主义小说创作实践看，左拉的创作风格已基本定型。故此，我们可以认为恩格斯所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指向的，就是这种成熟的自然主义风格。

欧洲自然主义文学的形成基础是欧洲文明中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主义文学的形成本质上是科学精神向文学创作进行渗透的结果。约翰·西奥多·梅尔茨在谈到中世纪的欧洲时，认为科学精神是19世纪欧洲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中世纪可以恰当地称为“科学的世纪”^③。相较于欧洲其他国家而言，法国尤为注重致力于科学的普及，其优雅文学在中世纪就“带上了现代科学思想的深刻烙印”^④。左拉在这种时代精神的熏陶之下，逐渐形成一套自己的创作理念，其中泰纳在《批评和历史论文集》中对自然主义的界定，以及法国医生吕卡斯的《自然遗传的哲学和生理学论著》、勒图尔诺医生的《情欲生理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莫洛的《关于梦与疯狂状态同一性问题》、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等，都是左拉形成自然主义文艺原则的理论资源。而这些著作大多是以现代科学研究人的生理特征、遗传本能，因此，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也重在表现人仅仅是更为高级的动物，他的性格与行为完全受遗传因素与环境的制约，他的各种本能则由他出生的家庭、阶层、环境的社会经济力量所决定。^⑤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0页。

② 左拉的《我的恨》发表于1866年，《实验小说论》发表于1880年，《戏剧中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小说家》《文学资料》发表于1881年。

③ [英] 约翰·西奥多·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1卷，周昌忠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9页。

④ [英] 约翰·西奥多·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1卷，周昌忠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22页。

⑤ M. H. 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Heinle & Heinl Thomson Learning, 1999, p. 261.

左拉认为,自然主义的原则久已有之,“自然主义开始于人所写得第一行字”,从亚里士多德《诗学》到布瓦洛《诗的艺术》,都在强调作品“应该以真理为基础”^①。科学家从对象出发,以实验为工作基础,通过分析进行工作,这便是存在于自然科学之中的自然主义的手法,在文学领域,则以自然和人为对象,通过直接的观察、精确的解剖和对事物的描写把握世界,故此,“作家和科学家的任务一直是相同的”^②。克洛德·贝尔纳《实验医学研究导论》是左拉创作的“坚实的基础”^③,因为科学实验方法既然能帮助人们获取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那么也能帮助人们获取感情生活和智力生活的知识,“这只是同一条道路上的程度问题,这条道路从化学通向生理学,接着又从生理学通向人类学,通向社会学。实验小说就是目标”^④。

如果说自然科学家是自然界的检察官,那么小说家就是“人们和人们的感情的检察官”^⑤。左拉甚至感慨目前还“不知道有什么试剂去分解感情”^⑥,如果可以,它必定是要用化学知识去分析感情的组成部分的。可以说,左拉的文学创作就是将科学实验方法应用于小说和戏剧,用科学来控制文学的思想,“把人类智力的一切表现都驱入同一条科学的道路”^⑦。从《戴蕾斯·拉甘》的创作开始,左拉就以明朗的科学态度走上了实验小说的道路,明确提出小说研究的是“人的气质,而不是人的性格”,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完全受其神经质和血缘的支配,没有自由意志,他们一生中的每一行为都命里注定要受其血肉之躯的制约”。小说的主人公戴蕾斯·拉甘和朗朗都是“人面兽心的畜生”,作家所做的就是“对他们的本能冲动以及由神经病发作所引起的脑机能失调做逐步观察”^⑧。小说的每一章都可以说是对“生理学上一种奇特病例的研究”。戴蕾斯·拉甘是一个欲壑难填的女人,朗朗是一个强壮的男人,左拉所做的是“找出他们身上的兽性,甚至只对他们的兽性进行观察,并把他们抛到一场惨剧之中,一丝不苟地记下他们的感觉和行为”,他的小说创作“只不过是两个活人身上做了外科医生在死

① [法]左拉:《戏剧上的自然主义》,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45~246页。

② [法]左拉:《戏剧上的自然主义》,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46页。

③ [法]左拉:《实验小说》,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49页。

④ [法]左拉:《实验小说》,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50页。

⑤ [法]左拉:《实验小说》,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52页。

⑥ [法]左拉:《实验小说》,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51页。

⑦ [法]左拉:《实验小说》,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49页。

⑧ [法]左拉:《〈戴蕾斯·拉甘〉第二版序》,柳鸣九编选:《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8页。

人尸体上所做的分析工作”。^① 其他的作品，诸如《玛德莱娜·费拉》《小酒店》《娜娜》《土地》等，都具有类似的特点。

左拉奉自然科学精神为核心原则，在文学创作中所推崇的标准也紧紧围绕这个核心原则而展开。在创作中，左拉将真实视为小说家“最高的品格”^②，而真实也是他创作小说所追求的结果。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结果？左拉认为，“剖析我们的机体，指出其中由遗传所构成的隐秘的弹簧，使人看到环境的作用”^③就能道出人类的真实。遗传和环境正是左拉小说的两个突出特征，如小说《戴蕾斯·拉甘》中，戴蕾斯·拉甘的母亲是野蛮的非洲部落的妇女，她继承了来自母系的旺盛的生机与本能，与羸弱多病的格弥尔的婚姻对她来讲就是一种折磨，一旦受到淫邪的罗朗的引诱，她那长期克制的情欲就如同破闸的洪水一样泛滥开来。再如左拉的鸿篇巨制《卢贡·马卡尔家族》小说系列，也是包括遗传和环境两种成分，“一种是纯人类的成分，生理学的成分，即对一个家族血缘遗传与命定性的科学研究，另一种是这个时代在这个家族身上所起的作用，时代的狂热使它毁损，即环境的社会作用与物理作用”^④。《卢贡·马卡尔家族》总计二十部小说，成员共五代三十二人，左拉重点表现了一个家族的遗传规律，祖先的病态必然在后代的身上重现，这类遗传有融接性，即后代继承来自母系和父系特点的混杂遗传。有隔代遗传或超隔代遗传，如第一代的病理在第二代身上没有表现出来，可能在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第五代爆发。有遗传变异类型，如绮尔维丝的长子克洛德·郎第耶，祖先的神经病在他的身上转化变异为特殊的绘画才能；绮尔维丝的次子雅克·郎第耶，祖先酒精中毒症在他身上转化为嗜杀狂症。种种不同的病理遗传随新的婚姻、代际、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既有继承也有变异。《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二个重点是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在左拉的设想中，家族史系列是“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⑤，并以编年史的方式描绘了19世纪后期法国社会的现实生活图景，第二帝国时期贪欲和野心的放纵，追求享乐使精神肉体疲惫不堪乃至毁灭的过程。这一方面是向前辈巴尔扎克表达崇高的敬意，另一方面也是自然主义重视细节实录、资料详尽、描写真实准确的内在规定。

① [法] 左拉：《〈戴蕾斯·拉甘〉第二版序》，柳鸣九编选：《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8页。

② [法] 左拉：《论小说》，柳鸣九编选：《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8页。

③ [法] 左拉：《关于家族史小说总体构思的札记》，柳鸣九编选：《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35页。

④ [法] 左拉：《关于家族史小说总体构思的札记》，柳鸣九编选：《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34页。

⑤ [法] 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总序》，柳鸣九编选：《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37页。

二、恩格斯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现实主义

在所有的文艺流派中，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情有独钟，而在所有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中，恩格斯唯独对巴尔扎克赞赏有加。敏娜·考茨基在伦敦旅行时，曾和恩格斯谈论文学，恩格斯不忘劝导考茨基向巴尔扎克学习。^①在恩格斯的评价中，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大师”，尽管他不是历史学家却用小说“汇编了一部完整的法国社会的历史”，后人从中可以学到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而最重要的是巴尔扎克能够“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因为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所以就把这个群体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进而找到了法国社会“未来的真正的人”。^②这一点，被恩格斯视为巴尔扎克最大的特点，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这一可谓至高无上的评价，是巴尔扎克独享的荣誉，而在其他的现实主义作家那里，这种评价从未出现过。

对恩格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的理解与阐释是卢卡契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对于恩格斯的这一论断，一般的理解是作家的世界观及其创作方法之间的矛盾，而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即作家如何能够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然在恩格斯的书信中并未详细说明。卢卡契在研究巴尔扎克成熟时期最重要的小说《农民》时指出：“主观意图和客观实践之间的矛盾”与“政治思想家巴尔扎克和《人间喜剧》作者巴尔扎克之间的矛盾”构成巴尔扎克的“历史伟大性”^③，其根本原因在于作家的真诚和正直，“伟大作家对真理的渴望，他对现实的狂热追求——或者用伦理学术语来讲，就是：作家的真诚和正直”。在这种真诚与正直的感召之下，即便巴尔扎克创造的场景和人物与他的偏见甚至“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发生了冲突，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些偏见和信念来描写他真正看到的世界，所以“对自己的主观世界图景的这种无情态度，是一切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优质标志”^④。巴尔扎克的伟大就在于“他描写现实时的至诚，即使这种现实正好违犯他个人的见解、希望和心愿，他也是诚实不欺的”^⑤。

卢卡契将巴尔扎克的创作风格简化为真诚、正直、至诚，将现实主义视为是描写作家“真正看到的世界”，这种观点在此前及当下的时代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同。但问题是，现实不等同于真实。再者，真实绝不是恩格斯所讲的现实的最高标准。如果真实是最高标准，那么恩格斯为什么说从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所学到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

③ [匈] 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④ [匈] 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

⑤ [匈] 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

东西比从当时的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还要多呢？因为论“真实”，巴尔扎克只是小说家，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与小说家相比，所提供的内容无疑更真实，但恩格斯却将小说家凌驾于历史学家等之上，说明恩格斯所讲的现实另有深意，恩格斯所谈的现实主义也有别于文学史家和文学评论家所讲的现实主义。

按照文学研究领域的公认观点，现实主义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欧洲 19 世纪的文艺思潮运动，一是指准确表现真实生活的创作原则或技法，如著名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就持此种观点。^①但是，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使用的现实和文学史家及文学评论家所讲的现实其实是两个层面的，恩格斯走的是黑格尔哲学阐释的途径，而文学史家及文学评论家仅仅关注到了事实如何。

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之所以引发“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核心原因就是这两者对现实的不理解。德国大诗人海涅拜访黑格尔的时候，也表达了对“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命题的不满意，因为这个命题正如恩格斯所讲，是将“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警察国家、专断司法、书报检查制度祝福”^②。在那个时候，海涅甚至还将黑格尔看成是奴颜婢膝之辈，按照诗人的说法，当海涅表达不满的时候，黑格尔怪笑了一下，回答说：“也可以这么说：凡是合理的必然都是现实的。”在黑格尔解释之后，海涅才明白这一命题的真实含义。^③这就是恩格斯所讲的，黑格尔那迂腐晦涩的、笨拙枯燥的词语中竟然隐藏着革命的思想，不论是政府还是代表革命的自由派都没有明白这话的意思，而海涅在 1833 年的时候就明白了黑格尔这一命题的真实含义。

从黑格尔的立场来看，绝非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是现实的，现实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④，因此“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⑤。这个过程在历史上不断出现，罗马共和国被现实的罗马帝国排斥掉，法国的君主制度在 1789 年丧失了现实性，必须由大革命消灭它。所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实际上说的是“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

① M. H. 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Heinle & Heinl Thomson Learning, 1999, p. 260.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8 页。

③ 参见 [德] 亨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165～166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8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9 页。

从黑格尔哲学阐释的途径出发,恩格斯形成了对现实主义之现实独特界定,实存是存在与反思的直接统一即现象,而现实则是本质与实存的统一,是历史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已经点出了巴尔扎克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能看到“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就是看到了现实。《人间喜剧》的全部写作都与这个必然性相关,因为《人间喜剧》三大主题——资产阶级的发家史、贵族群体的衰亡史、金钱的罪恶史——指向的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资产阶级崛起的必然和贵族群体灭亡的必然,法国社会未来的主人就是资产阶级,巴尔扎克能够看到这个现实,所以他才将心爱的贵族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这种穿透历史的眼光只有把握了现实即历史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才可能做到,仅仅拥有正直、真诚的品格或者如实地描绘眼中的世界是做不到的。故此,理解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需要回到哲学阐释的道路上。^①

三、恩格斯评价文学作品的隐性标准:政治倾向性

文艺作品的政治倾向是文艺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恩格斯在评价文学作品时一贯注重作品的政治倾向。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七月革命和德国人民起义的影响下,青年德意志这样一个文学流派诞生,他们主张信仰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实行立宪制、解放妇女等,因为思想不成熟和政治不坚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沦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恩格斯就其创作特点,评价其“用一些定能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自己作品中才华的不足”,在这些人的作品中充斥着“反政府情绪的羞羞答答”^②的所谓“倾向”。恩格斯对青年德意志的政治倾向是很不满意的,原因有二:第一,青年德意志在才华不足的情况下,试图用政治暗喻弥补缺憾;第二,青年德意志的反政府情绪以一种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的方式呈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向来强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③。

关于艺术作品的政治倾向性,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④,而艺术和法律、政治、宗教、哲学一样都是“意识形态的形式”^⑤,或

① 参见陈祥波、徐振:《从“现实”的哲学内涵分析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6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者说是“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那么艺术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所以文艺的政治倾向属于文艺的内在规定。

恩格斯对于文艺作品的政治倾向有着明确的规定。第一点，优秀的文艺作品必然有政治倾向，而不必回避政治倾向。在写给敏娜·考茨基的书信中，恩格斯提到：“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① 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涉及内容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再到近代和现代欧洲文学的主体脉络。就古希腊戏剧而言，或者更准确地讲，古代雅典戏剧所形成的现实基础就是城邦政治，在雅典的剧院，“在一个半圆形的空间里，观众感到他们仿佛置身于第二公民大会”^②。众所周知，但丁的《神曲》具有鲜明的反教皇干涉佛罗伦萨内政的倾向，他在《论世界帝国》和《神曲》中都清楚明白地表达了政教分离的政治理想。塞万提斯《堂·吉珂德》用戏拟的手法抨击了骑士制度。恩格斯特别提到了席勒的《阴谋与爱情》，这部戏剧是典型的反封建专制作品，自由恋爱毁于封建贵族的阴谋诡计与恶德败行，市民阶层与腐朽贵族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在这部作品中席勒可谓立场鲜明。此外，北欧代表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俄国果戈理的讽刺小说，无一例外都是对丑恶社会现实的揭露与批判，有明确的思想倾向性。

第二点，恩格斯认为，仅仅拥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是不够的，他批评青年德意志用政治暗喻弥补才华不足即是此意。马克思在写给费迪南·拉萨尔的书信中就曾批评他将弗兰茨·冯·济金根“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③，亦即是只有纯粹的政治倾向，失去了文学艺术固有的审美属性。恩格斯也认为，作家“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④，政治倾向固然是明确的，但绝非孤立地显现出来，而是应当与文艺创作自身的内在规律有机结合，即“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⑤。在这一问题上，恩格斯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标准：“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⑥ 当然，这一标准建立在对文学艺术内在规律真正把握的基础之上，只有作家的政治倾向与人物形象和环境（即社会关系）融为一体，“倾向自然而然地流露”的状态才可能实现。如果脱离了人物形象和环境进行赤裸裸的说教，那不过是将文学艺术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用政治倾向强行绑架文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9页。

② [瑞士] 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0页。

第三点,恩格斯期待文学艺术工作者发扬“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将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带入创作实践。当恩格斯阅读了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之后,最不满意的应该是作者对城市无产阶级的描写。在小说中,“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他们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①。恩格斯认为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已经长达半个世纪,“在文明世界里,任何地方的工人群众都不像伦敦东头的工人群众那样不积极地反抗,那样消极地屈服于命运,那样迟钝”^②。事实是,工人阶级已经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抗,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令人震撼的努力,不管是半自觉的或是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③,而不是被作家们视而不见。恩格斯特别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令人震撼的努力”,因此他期待哈克奈斯在另一部小说中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积极面”。

当德国诗人卡尔·倍克在诗歌中歌颂小市民的鄙俗风气,歌颂怀着卑微的、虔诚的和互相矛盾的愿望的人,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但就是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④的时候,恩格斯是很不满意的。他批判了倍克那装模作样的哭哭啼啼的社会主义,认为他身上唯一的不幸就是德国的鄙俗之气。当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针对1813年普鲁士保皇党人的叫嚣“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创作了《西里西亚织工之歌》,在诗歌中为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喊出“古老的德意志呵!我们正为你织着寿衣,把三个诅咒织在寿衣上”,“诅咒上帝”“诅咒那富人的国王”“诅咒那虚伪的祖国”时,恩格斯高度赞誉,认为这首诗歌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⑤。

由此可见,恩格斯一直在期待着伟大作家塑造无产阶级新人形象,这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在文学艺术领域的直观表达,是恩格斯所谈论的文艺作品政治倾向的根本目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把握得非常准确:“在我们的现实中,千千万万的大众,已经有了在世界史上第一次的对于生活、对于知识。对于有意识的社会的觉醒。我们的现实,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已经把孤独的、唯我的、虚伪的个人的恶梦,远远地抛在后面了。是时候了,我们的文学也要拿出它的一切力量和勇气,转向着那些觉醒的人们,描画出他们的个人的感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2页。

的和智力的，在真实地经验得到的社会里的共通的世界。”^①

四、恩格斯对左拉的否定性评价的必然

在分别梳理了左拉的创作特点和恩格斯评价文学作品的两条标准之后，再来看恩格斯对左拉的评价，就会发现这种否定性评价的形成是必然的。退一步讲，即便不是为了衬托巴尔扎克的伟大，对左拉及自然主义进行单独的评论，恩格斯也不会给出较高的评价。

第一，恩格斯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是现实主义。蒋承勇先生在论及我国学界评价自然主义的历时进程中的两种立场时指出：“无论是贬抑者还是翻案者，他们研究的结论虽然不尽相同，但评价的尺度和研究的方法是一致的：他们差不多都用现实主义这一价值尺度去衡量自然主义以及左拉在何种程度上投合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趣味和文化模式。”^② 这一论断点出了问题的关键，即对自然主义的评价（否定的和肯定的）都是以现实主义原则为圭臬，而这一局面的开创者正是恩格斯。

从欧洲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演化规律来看，自然主义文学在追求真实的维度上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与发展，故此，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往往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相提并论，如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词典》中就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合并为一个词条，而韦勒克在论 19 世纪后期法国文学批评时则指出：“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是产生于法国的十九世纪后期文学上的两大口号，并由此流传到其他国家。两个口号至今不绝于耳，只是名义翻新含义更改而已。”^③ 左拉更是直接提出“自然主义因巴尔扎克而胜利”的观点。从真实的层面来讲，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确有相通相同之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甚至作家在理解现实主义的内涵时也是着眼于这一点，然而恩格斯的现实是哲学意义上的现实，是黑格尔所讲的“实存与本质的统一”，而在左拉创作的作品中，实存的方面是毋庸置疑的，甚至比巴尔扎克做得还要精细，范围还要宽广，然而它在本质的方面则完全欠缺，或者说，左拉主观上将本质归结于人的自然生理属性，而这是完全不符合本质的真实内涵即历史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的。故此，从恩格斯的最高标准来看，自然主义文学的确是先天不足。

第二，恩格斯评价文学作品的隐性标准是政治倾向。左拉的创作追求的是科学性而不是社会性，这一点与恩格斯的评价标准也是有所出入的。如小说《玛德

① [匈] 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21 页。

② 蒋承勇等：《欧美自然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 页。

③ [美]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 4 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 页。

莱娜·费拉》，少女玛德莱娜继承了父系强壮的身体，后委身青年雅克但未能与之结婚，此后根本无法摆脱与雅克肉体结合的生理欲望。这部小说突出主人公受遗传和环境影响，也深受吕卡斯博士浸透论观点的影响。小说写到玛德莱娜和孱弱的纪尧姆所生的女儿在相貌上也酷似雅克则颇有些滑向非理性主义的倾向。又如左拉的名著《小酒店》，劳动妇女绮尔维丝具有底层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一生虽有挣扎奋斗，但终究抵不过酒精中毒症的危害。左拉从法国社会制度的根源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去描写巴黎郊区工人、个体手工业者因酒精中毒症而沦落的时候，又将人生的悲剧必然归因于家族的生理遗传和变异。再如惊世骇俗的小说《娜娜》，通过娼妓娜娜的沉浮暴露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糜烂，作者强调娜娜因为遗传了祖辈和父辈的酒精中毒症，性欲旺盛，故此小说也不遗余力地渲染娜娜肉体的魔力、性欲的火焰等。复如影响颇大的小说《土地》，左拉以真实案件为蓝本，以毫不遮掩的方式描写了人的贪欲与罪恶。小说描写人对小块土地所有权的顽固与执着，对土地财富的贪婪使得人心发狂，家庭中的亲人互相残害，小说中那些冷酷的面孔、激烈的争夺无不将人身上的粗野本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左拉创造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的成员散布于社会的每个角落，“通过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叙说出第二帝国从政变阴谋到色当投降的全部历史”^①，暴露了那个时代的疯狂与耻辱，揭露了第二帝国统治阶级的黑幕和整体性的道德堕落，刻画了底层人民所承受的残酷的压榨与剥削，《小酒店》中对贫民窟的描写、《萌芽》中的矿工生活区都让人触目惊心，是社会黑暗的真实写照，这都可以说是“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也能“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②，但是否就“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左拉的文学世界中，工人、农民大多是以消极面出现在读者眼前的。追根溯源，这种消极又是由生理遗传及外部环境所决定的，这种命中注定是不可更改的。

左拉追求的是真实，恩格斯固然提出了“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样的命题，但更注重历史展开中的必然性。左拉将当时的科学精神作为思想主导，注重考察人的生理遗传属性。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无论从恩格斯的最高标准还是隐性的政治标准来判断，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都不符合恩格斯的“期待视野”，恩格斯对自然主义的否定评价具有必然性。

① [法] 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总序》，柳鸣九编选：《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9页。

Engels' Negative Evaluation on Naturalism

Xu Zhen

Abstract: Engels believed that Balzac is a far greater master of realism than all the Zola'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ngels highly praised Balzac while demeaning Zola and naturalist literature, which is a negative evaluation of Zola. The reason lies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Engels's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Zola's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The formation of naturalist literature is the infiltration of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spirit into the literary field. Zola's novels pursue truth, are guided by scientific spirit, and pay attention to examining the characters' genetic heritage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Engels' evaluation on literary works is "reality", the pursuit of truth is one of the connotations, but h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things that appear to be inevitable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hidden" standard of Engels' evaluation on literary works is "political tendency", and he emphasizes more on social attributes of people.

Keywords: Engels; Naturalism; Reality; Political Tendency

[责任编辑: 鲁法芹]

唯物主义视域下社会主义共同体文化的革命性重构^{*}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理论的哲学诠释

魏海华^{**}

【摘要】文化是20世纪以来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点，也是雷蒙德·威廉斯文化观、文化唯物主义的关键词。威廉斯以唯物主义作为基本方法论，对当时英国社会的文化、教育展开了研究并进行了实践，为伯明翰文化学派开辟了“元”文化理论构建的马克思主义范式。在他看来，文化是一种总体性的生活方式，是由社会大众生活所凝结的价值观、感觉结构，既具有书籍、器具等物质性特点，也具有语言艺术等表意性的精神特点，有融聚物质性与精神性于一体的本质特征。基于此，威廉斯提出了其社会主义共同体文化建设的构想，倡导要从人们的生活方式、感觉结构等方面出发，以文化革命的方式夺回本属于多数人的社会教育平等权利、大众文化传播权利以及文化主导权，赋予文化以日常化、大众化、平权化的特点，打破精英文化桎梏，重构社会主义共同体文化。

【关键词】唯物主义；生活方式；感觉结构；共同文化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文化的含义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且正在从学术研究走向人们的社会实践，不断地接受来自人们对日常生活、文化实践的关注。文化变得越来越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成为大众化、消费化和娱乐化的产物，同样它也接近了每个人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距离。在威廉斯看来，文化就是一种人民群众总体的生活方式，甚至还会升华成为整个社会的感觉结构和集体性记忆。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不再只是简单地被定义为上层建筑的成分，同时还可以作为基础部分的构成要素之一，具有了一定的生产性、实践性。

^{*} 本文系中央马工程重大项目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2017YZD10）、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建构思想文化高地的文化理论与文化战略研究”（19WTB002）阶段性成果。

^{**} 魏海华，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哲学。

基于此，威廉斯批判地吸收了英国精英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形成了一个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流派——文化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是威廉斯文化研究及其理论最为突出的成果，贯穿于他的整个文化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中，极具创新性与解释力。因此，威廉斯认为社会各阶级都要平等拥有文化权利，提出了大众要不断推动实现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建设，为大众文化进行传播、教育、革命提供了参考。

一、对文化内涵的三重建构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文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意义。工业革命之前，文化与文明的意义相近，都是教化、耕种等含义。19世纪以来，英国文化学界对文化的研究变得热衷起来，威廉斯也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文化展开了最新的研究。在他看来，文化是一个总体性、过程性的存在。同时，他还从对文化进行了分析^①，认为文化以及文化发展有三个逐层递进的方面：一是“理想地”，依据某些“绝对的或普遍的”价值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二是“文献式地”，把文化界定为“知性和想像作品的整体”^②，它们以不同方式详细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三是“社会地”，把文化界定为“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③，它表明了艺术、习得、制度和日常行为所体现出来的意义与价值，因而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威廉斯提出文化是一种融汇精神性与物质性的总体性过程，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中重要的过程性存在。威廉斯强调文化的这三个方面的含义是一个完整的、大于单个方面的整体。在此前提下，威廉斯把自己的文化理论定义为是对人类社会整体生活方式与感觉结构等各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文化从其物质性出发，发挥着重要的载体性功能，承担着记载、传递、模仿、重现的重要使命。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习惯、风俗文化等构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形成了一种带有地方性、群体性的总体文化。这种总体文化中就包含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情感投入与感觉结构等，反映了某一群体的生活习惯和日常行为等。

（一）文化是一种总体性的过程

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对文化的研究在英国逐渐成为主流。“文化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性概念，它与个体生活、社会结构间有着内在联系，是与经验中的真实相对应的复杂综合体。”^④威廉斯提出了对文化本质的理解，认为英

① 参见[英]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② 阎嘉：《情感结构》，《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3期。

③ [英]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④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1, p. 60.

国主流的文化与文化观念有两种形态：一是对人的精神及其反映的成果文化；二是描绘人类社会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威廉斯认为文化应当是一种物质性、知识性与精神性相统一而构成的“整体的生活方式”，而英国的这一整体生活方式就是这个总体。^①一方面，在基础层次上，文化是一种以典籍、文本等作为载体的物质性产品。这种文化记录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以及生产生活行为等。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文化就成为一种以工业革命为背景的现实性文本写照，记录着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工业进步以及对工业生活的公开批判等。因此，作家的作品、演奏的音乐、朗诵的诗歌以及优美的语言等，都属于文化的实践意义范畴。另一方面，在更深层次上，文化是一种总体性的过程，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方式与整体性的感觉结构。整体性感觉结构的不确定性也受到了现实中工业革命与经济社会状况的影响，因而也会对包括工人在内的社会群体产生精神上的影响。文化作为对个人或社会的总体生活方式的描述，或多或少都会呈现出其具有独特意义和价值性的层面。为此，威廉斯提出，任何一种人类社会都有自身的形态、目的和意义，而这一切都需要通过人类社会的制度、艺术及学问来对其进行表达。与以往直接将文化归属意识形态领域有所不同，威廉斯的文化与文化领导权都是指更高层次的意识形式，这种文化是指一种对自身及周围世界的构成性知觉体察。^②因此，文化作为一种经验性的知觉体察，它既涵盖个体的意义表达，也包括社会整体的共同意义，成为人类社会总体的生活方式与感觉结构。

（二）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

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the whole ways of life）。^③威廉斯认为，整个社会都在孕育着一种文化模式，而这种模式涵盖着人们的利益活动形成了一种习惯，因而不同的文化模式生产着不同组织和人群的生活方式。^④整体的生活方式都是源自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主观感受和具体实践所组成的，从而产生出的共同生活习惯、作息规律、日常饮食等基本生活体验。通过对各个阶级与各个群体间的具体感觉性生活方式的描述，促使了社会中的风俗习惯、制度约定以及民族情感等整体生活方式（或称文化模式）的形成和深化。因此，只有凭借着对各种特殊生活习性、活动方式的解读，才能理解整个人类群体的文化或总体生活方式。一方面，文化是人们日常的起居坐卧、茶食宴饮等衣食住行各方面所构成的最基本的具体

①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1, p. 60.

② 参见[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③ 参见[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337页。

④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1, p. 64.

生活方式,这种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人们生活当中的最为日常的、普通的文化。威廉斯通过描绘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态、饮食起居、工厂作业等,展现了当时作为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实践。这些日常的生活方式也是展现当时工人群体的最基本文化形式。“真实的生产生活,涉及家、家庭和工作,涉及工资和物价。”^①因此,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指一种渗透、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之中的具体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文化不仅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简单反映,而且是一种对源于日常生活实践的文化的总体上升和发展,是对形成以文学、艺术等物质性载体(如文本、语言等)的政治意义与社会公众意见的总体性表达。因而,威廉斯认为文化既是共同意义(所有人产品的总和),也是被展示的个体意义(个人性及社会性的经验产品),而这些在我们所不能预知的方式中被生存生产和再生产出来。^②而这种文化作为总体生活方式的社会总体性意义,也脱离不开最精细的人类个体的意义创造和参与。因此,文化既作为社会态的实践过程与生活的总体方式存在,也渗透在每个社会和每个心灵当中。^③

(三) 文化是一种感觉结构

文化是一个时期民族的感觉结构,是集体性的感觉记忆,而这一感觉结构是当时流行的主流文化或是占据领导权的文化。伴随着文化意义的不断深入,文化并不完全是文学等想象性作品与艺术,而是每个社会的特殊集体记忆。威廉斯通过感觉结构将文化转向了人化文化的形式,主张对过去存活的经验进行感知和体验,从而彰显其潜意识性与抽象性,“它在我们的活动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部分中运作”^④。他强调感觉结构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它将文化分析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进行动态的考察。一方面,文化是某一特定时期的“活”文化与选择性传统。威廉斯认为感觉结构是一代人的群体性记忆和鲜活的文化遗产。他认为有哪类人的存在,文字的记录就会保留哪一类人的生存手段与集体性记忆,而这些都是“活”文化(感觉结构)。因为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多数人都无法亲自经历这一切,所以也就只能存留在特定时期及地方性的感觉或记忆之中。正如他在《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一书中所言:“在某一时代的所有行动中挑选出某类东西加以评定并予以重申。”^⑤历史是不彻底实录的意识,文化也是在不断挑选与变更中获取的存在。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感觉结构,同时也反映着人们的共同价值取向。通过文化的基础性形式(如诗歌、小说、戏

① Raymond Williams, *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Verso, 1989, p. 98.

② 刘进:《文学与“文化革命”: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批评研究》,四川大学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88页。

③ 刘进:《文学与“文化革命”: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批评研究》,四川大学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86~87页。

④ 李丽:《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哲学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

⑤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1, p. 67.

剧等)的记录和传播,一代人的感觉结构才得以保存下来。因此,20世纪的电影与传媒技术的发展,其实在威廉斯眼中就是英国资本主义社会感觉结构的物质性实践的中介。^①因而,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物质性载体和中介来承接当时人们的集体性感觉结构与文化记忆,不同的社会阶级当中存在着差异性的价值观念与感觉结构。正基于此,威廉斯寄希望于大众(主要是劳工群体)能够进行自我觉醒。因为只有无产阶级不断在现实文化实践中培植自己的感觉结构与集体记忆,才能在社会发展和整体经验中占得一席之地,从而提升大众群体对自身的认识。

二、唯物主义文化观的延展逻辑

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性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②。威廉斯将文化重新定义为一种融汇其物质性与精神性生产的总体性过程,其中包含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与集体性感觉结构。与历史唯物主义有所不同,文化唯物主义致力于将文化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过程,文化的实践和生产并不是一个封闭的、静止的过程,而是大众群体能动性的生产劳动过程。因此,威廉斯重新从经济基础、生产以及上层建筑的几对关系出发,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联系,打破了以往经济作为单一基础的决定性关系。从文化的本质特点出发,应当将文学视为体现马克思主义“人们生产自己的全部生活”的理念,而不仅仅只是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主体。正因为此,威廉斯才将文化与文学等形式作为特殊的物质性生产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展

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是根植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创新、发展。威廉斯从大学期间参加共产主义俱乐部开始,就注定了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缘分。威廉斯的文化理论与其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延续了马克思唯物史观视角下的大众文化分析方法,他认为文化应当是社会的集体产物,应当由全社会人民群众所共同享有。但是他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力”这一观点略微不满,威廉斯以此为突破口对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经济决定论展开了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是“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

^① [英]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② [英]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①，为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首先，文化唯物主义继承和创新发展了文化具有丰富的精神性内涵的特点。虽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再地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性，但他和恩格斯并没有否认文化在社会整体中所具有的精神性价值与影响。文化实践虽不同于物质生产，但是物质生产却是文化产生的原因。文化唯物主义对文化的看法依然带有价值性、社会性，强调的是人类共同创造的历史文明与精神价值。其次，文化唯物主义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文化观。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威廉斯吸收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共享观念，以此来对利维斯等人进行了批判，真正地将文化从精英的文化观念中延伸到社会大众，促进了平民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最后，文化唯物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观念进行了批判。唯物史观指明了阶级之间矛盾的对立，倡导通过阶级斗争来夺取政权。然而，文化唯物主义则希望社会从整体上来理解和变迁，威廉斯还强调通过整体生活方式的改变来促进社会共同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以文化的革命来推进社会整体的进步。因此，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既根源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又突破了其二元对立格局，重新建构了文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二）重构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

威廉斯的唯物主义文化观认为，经济基础并不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唯一因素，同时他还提出文化作为一种感觉结构、生活方式，贯穿于整个社会的全过程。文化既可以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也可以作为基础性的物质生产实践的组成部分。威廉斯打破了以往历史唯物主义所认可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简单逻辑，强调文化也有作为物质生产性的特性。文化作为感觉结构时，既具有物质性文本形式，又具有价值性塑造能力。文化唯物主义对经济基础决定论先后进行了两次批判，形成了“文化贯穿于社会全过程”的重要观点，并且在加入文化因素后又重新建构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首先，威廉斯运用普列汉诺夫的五因素说否定了以考德威尔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单一经济基础决定论的观点。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顺序性影响因素包括：生产力水平、经济状况、社会—政治制度、社会成员心理以及反映这类心理的各种意识形态。”^②威廉斯从对马克思对“基础”及“上层建筑”的论述出发，指出了“基础”就是实际的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不是脱离具体历史的抽象概念或范畴。威廉斯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非只是将基础与上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9页。

^② [英]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层建筑视为可分割的实体,而是现实的人的全部、具体的活动和产物,二者间也并非简单的抽象关系概念。”^①其次,威廉斯认为“必须要把‘决定’评价为设定限制和施加压力,而不是可预见的、可预料的和可控制的内容”^②。“基础”并不能作为简单的抽象观念,而是处于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动态变化之中,而这背后就蕴藏着整个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与运动。同时,他还特别强调文化其实并不是简单地被看成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而是一种关联性的实践过程,这一过程贯穿在基础反映至上层建筑的全过程排列。此外,上层建筑也并不仅仅是被反映和被再生产出来的或明确依附的抽象内容,还应当包括一个阶级的政治与文化实践。最后,威廉斯认为包括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与以经济为主要指标的基础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并且提出文化实践作为社会革命因素之一,其实也与经济一样起着长期的、深层次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即便如此,这种决定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抽象独立,而是一个具体而又长期的总体性革命(矛盾的运动、变化)过程。文化作为一种布朗运动式的社会存在,既是作为物质形态存在的基础实践,又占据着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政治顶端。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过程中少不了文化的关键性作用,文化既属于经济基础层面的物质实践,也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式,而且始终贯穿于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

(三) 坚持大众文化的人民立场

唯物主义文化观从一开始就以坚持人民群众的大众文化立场为核心,有力地批判了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精英主义文化,倡导要使大众平等地获取文化领导权利、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出生于铁路工人家庭的威廉斯,对文化和教育的不公平有着真切的感受。他提出,文化应当是大众的整体生活方式,社会是人们的生存空间,而人民群众才是文化的主体和落脚点。^③因此,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认为,文化是每个人参与社会变迁的具体形式,因而文化应当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而非属于某一特定的阶级。首先,文化是可以超越阶级性而实现人民共享的。威廉斯指出:“文化本身是超出阶级的范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差别正在日益缩减。”^④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极其反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二元划分方式,提倡文化是属于社会大众所共有的生活方式与感觉结构,绝对不是仅仅局限于几件奢侈品或者精英阶级,而是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其次,人民大众的文化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和进步。威廉斯认为,人民群

① [英]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0~81页。

② [英]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

③ 参见[英]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67页。

④ [英] 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8页。

众的斗争史也就是大众的文化史，无论是哪一个阶级夺取了文化的领导权，其实也只是大众文化中一股新兴力量的崛起，并不能掩盖大众文化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事实。威廉斯也曾指出：“大众隶属于多数人，并不能说明大众属于乌合之众。”^① 假设人民群众就是大众，那么大众也应当包含作为少数的精英。最后，文化唯物主义强调，文化必然会从一个群体流向另一个群体，也就意味着精英文化必然走向大众文化，而在社会实践中大众才是创造文化的主体。在社会运行过程中，人们统一的生活实践和共同选择就是文化本身。为此，威廉斯将唯物主义文化观引向社会实践，倡导各个阶层之间应当相互团结，重建属于整个人类的集体性记忆与生活方式，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精神创造力。威廉斯始终都主张广大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开创者，才是文化的拥有者，才是整体生活方式的主体。因此，威廉斯将平民文化教育作为终身事业，以期通过文化的革命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三、共同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共同文化是威廉斯为社会大众构建起自身文化的一个社会主义理想和目标。社会大众形成共同的大众文化，拥有共同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感觉结构，以文化革命的方式打破了艾略特等人的精英利己主义文化模式。唯物主义文化观对于威廉斯来说，就是让社会大众都能够获得平等的教育文化权利。共同文化的创立是有意识的制造过程，是“一种选择、一种强调、一种特殊的扶持”^②，是社会所有成员积极参与、通力合作的过程。共同文化的建设是以社会大众的“团结观念”为基础的“复杂组织形态”^③，需要“不断地加以调整和重新规划”^④。20 世纪的英国存在着不同社会阶级的文化，每个阶级的文化都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阶级立场，因此难免存在冲突和矛盾。为此，威廉斯提出了“共同文化建设”的构想，他认为这一代表人民大众的共同文化将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威廉斯指出：“我们需要一种共同文化，不是为了一种抽象的东西，而是因为离开了这种共同文化，我们将无法生存下去。”^⑤ 换言之，共同文化建设也必须超越各阶级的立场和界限，让社会成员共同参与，让人民群众都能够有平等的机会自由而

① 李兆前：《范式转换：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8 页。

② [英]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版，第 343 页。

③ [英] 雷蒙德·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6 页。

④ [英]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版，第 347 页。

⑤ [英]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版，第 330 页。

又自觉地参与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实践过程。

（一）促进教育平等化

共同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大众教育的平权化，让文本、文献式的文化形式能够送到各阶级群体的手中。只有从教育资源与受教育的权利方面出发，切实地解决好社会大众特别是工厂工人的教育问题，才能使社会共同文化建设成为一种可能。一方面，要加大政府对文化教育资源的投入，拓宽平民教育与成人再教育的实践方式。威廉斯一直都身体力行地致力于成人教育、夜校教育事业，也希望政府当局能够增加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对平民教育进行扩张、增容。英国社会顺应现代工业革命的发展，使文化教育的方式发生了变革，形成了校外教育（夜校）和函授教育（远程）两种模式。威廉斯认为，要通过成人教育的方式让工人和妇女群体都能够接触到本属于精英群体的文学小说、诗歌等文化作品形式，他指出：“19世纪晚期的文学研究创新，都出现在了各种各样的正规教育之外。当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有组织的英国文学教学之时，这种要求就在这个社会被忽视的、在某种意义上受到压制的两个文化领域（工人和妇女群体）里出现了。”^①当时英国社会的工人和妇女群体难以获得正规的高校教育资源，也只能通过成人教育的方式来自我提升，因而要不断促进成人教育等方式的形成。另一方面，要不断地增加阅读受众（reading mass），丰富大众出版的资源和途径。威廉斯认为，社会大众的共同文化建设需要更大范围地去发展社会阅读受众，让越来越多的原本处于受教育边缘的人员能够接受同等教育。只有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阅读受众，才能使少数高雅文化变得更加容易获得，才能让公众都能有机会得到再教育。阅读受众的增加和扩张，对文化的生产并不造成直接的影响，反而成为加快共同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只有让更多的阅读受众接触到文化的创造过程，才能让社会的文化与意义全面涌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与大众印刷术的不断更迭，越来越多的大众印刷出版商涌现，文化印刷品也成为廉价的商品，从而增加了社会大众对其易获性和可读性。从书籍手抄年代的“洛阳纸贵”到现今的“飞入寻常百姓家”，将以往的少数精英独享的文化作为共同文化的一部分传播给大多数人，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文化带来的益处，即让精英文化实现大众化转变。^②因此，为了更快地推进社会主义共同文化建设，要将各阶级融合为一个社会总体，从而对多数劳动工人等群体进行平等化的教育，使社会大众都能够有资格、有机会获得学习文化、受教育的权利，形成属于整个社会的结构感觉和集体记忆。只有社会大众群体的自主性得到唤醒，其才能主动地争取平等权利，为漫长的文化革命发出“平权”的先声。

^① Raymond Williams,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Against the New Conformists*, Verso, 1989, p. 153.

^② 参见乔瑞金：《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189页。

（二）推动大众文化传播

共同文化的建设还要借助新兴媒体技术和传播手段。威廉斯从电视传媒理论出发，批判地指出了当前英国精英主义的盛行在于少数人对多数新兴媒介的垄断。为此，英国工人等群体要对当前的垄断资本主义传媒格局与传播方式进行变革，让大众传媒变得越来越接近社会大众。但是伴随着大众出版、新兴媒介技术的出现，电视、广播、电影等新兴媒体开始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在消费的同时还应当积极地将其运用起来，从而推动大众文化的传播与发展。首先，要构建大众文化的民主传播模式，打破少数资产阶级垄断的局面。威廉斯提出要对现有的大众传播模式进行民主式变革，要让维护少数人传播意图的多重传输（multiple transmission）手段重新回到绝大多数人手中，让人民群众共同享有。新的传播技术促生了大众文化新的生产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生产方式的变化仅仅只是因为科技的更新。^①因而，威廉斯认为，应当从完成沟通的传输、接收、回应三个环节进行变革，形成一种由大众主导的整体传播新模式，破除目前大众文化受支配性的传播困境。其次，要加强对民众的传播媒介素质教育，唤醒群众积极地参与民主文化的建构，推动社会大众自发地投身信息的交流传播过程。面对英国媒体的支配性传播模式，要想破除了少数人群对单一信源的垄断，就要让社会大众愿意接受电视、广播等新兴的传播媒介，实现人民大众对传播媒介的操纵和控制，这样才能真正地将文化传播的权利交还给社会大众。威廉斯认为电视媒体超越了阶级，凸显了大众作为社会文化的传播主体地位。为此，他提出要对社会大众进行电视教育，以召唤人民投身民主文化建设。^②最后，要适当减少广告等物质性力量对大众生活方式的影响，让商业化传播逐渐变为民主化传播。在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广告作为资本渗透性的物质力量仍阻碍着社会主义民主观念的形成，对其运用不当可能会起到错误的引导作用。威廉斯指出：“广告以及背后的大众传媒给予现代受众一定的指导性，但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干预，会让现代受众丧失选择权而盲目迷信广告和大众传媒系统。”^③因此，大众传播媒介应减少对消费型广告的传播，避免为社会大众提供虚假信息，控制资本蔓延的速度和深度，正确引导受众尊重大众文化的发展规律，一起建设好社会主义共同体文化。因此，威廉斯提倡要大力推动大众文化传播模式的变革，引导人民群众主动地掌握新兴媒介技术，生产属于自己的文化产品和感觉结构，构建起全民共享发展、民主式传播的社会主义共同体，最大限度地推动全社会一起打造共同文化。

① 参见许继红：《雷蒙德·威廉斯技术解释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0页。

② 参见张亮：《雷蒙·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电视》，《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

③ [英] 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0页。

（三）争夺文化领导权

面对英国工人群体的大众文化建设困境，威廉斯提出要使工人阶级等群体通过争夺文化领导权来实现社会文化的更迭，以此促进社会大众形成共同的文化记忆与感觉结构。当时英国社会当中最为突出的文化实践主体就是人民群众，占据边缘话语权的多数人群体（以工人群众为主）。威廉斯引用葛兰西的“霸权（领导权）”理念完成了对社会文化领导权的转移与过渡。他认为葛兰西已经用文化领导权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在精神领域的统治秩序。为此，威廉斯认为社会大众的共同文化建设依然逃不开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威廉斯提出，英国社会的文化存在三种形态——新兴文化、主流文化、残余文化。为了实现共同文化的构建，他提倡通过文化革命来实现大众对文化实践的复兴和领导。威廉斯将领导权与文化革命联系起来，认为“革命不仅强调政治、经济权力的转移，而且强调推翻某一种特别霸权……其存在于生动活泼的经验、意识形式中”^①。因此，引导社会大众构建社会主义共同文化使争夺文化领导权成为变革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大众文化实践，积极引导社会大众在意识形态层面进行思想斗争，通过文化实践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内进行斗争赢得主动权、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是改变生活方式的主要体现。威廉斯强调人民群众的文化实践活动对发展大众文化有极大帮助。因此，要不断促进大众参与社会生活，使其深入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中，与社会形成有效连接，为大众文化争夺话语权提供机遇。另一方面，要避免大众文化新兴之时陷入被收编的僵局。对绝大多数新兴文化形式而言，它们在文化形式更迭的进程中极易被霸权文化收编。威廉斯认为，英国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曾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但经过大众传媒的普及和常识教育，这一文化总有一天会转向大众文化并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为此，威廉斯总结出了社会中同时存在的三种文化形式——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残余文化与新兴文化，而这三种文化形式在人们实践的同时也是不断变化的。主流文化在对新兴文化和残余文化的收编过程中，也会对其进行吸收和改造，一定程度上会磨灭新兴文化的特性使其成为合乎主流的文化。而多数人拥护的大众文化也应该警惕当前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文化，避免被其同化，最后被抛弃。因此，威廉斯认为，作为多数的大众特别是工人群众同样具备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资格，能够参与到社会文化形式的变化当中，积极主动地与其他阶级作斗争——争夺文化领导权，打造符合社会大众需要的社会主义共同文化。

^① [英] 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48页。

The Revolutionary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mmunity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ism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Raymond Williams' Cultural Theory

Wei Haihua

Abstract: Culture is the ideological basis of British cultural Marxism since the 20th century, and it's also the keyword of Raymond Williams' cultural view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Williams used materialism as the basic methodology to carry out practice and research on the culture and education of British society at that time, and opened up the Marxist paradigm of "meta" cultural theory construction for the Birmingham Cultural School. In his opinions, culture is an overall way of life, a value concept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s condensed by the life of the general public. It has both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books and utensils, and expressiv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language and art. Therefore, culture ha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integrating materiality and spirituality. Based on this, Williams put forward his conception of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community, advocating that from the aspects of people's ways of life, structure of feelings, etc., to take back the equal rights of social education and mass culture communication that belong to the majority in the form of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ultural dominance, endow the cultur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ailyization, popularization, and equality, break the shackles of elite culture, and reconstruct the culture of the socialist community.

Keywords: Materialism; Ways of Life; Structure of Feelings; Common Culture

[责任编辑: 郝书翠]

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整体性理论特质^{*}

王 跃^{**}

【摘 要】整体性是马克思大历史观的重要理论特质。马克思历史观立足“现实的人”，从时间、空间、理论和实践四个维度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及其历史演进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形成了习近平大历史观。习近平大历史观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整体性是其总特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其根本理论特质，而时间整体性、空间整体性、实践整体性和理论整体性是其四个基本理论特质。习近平大历史观在时间、空间、理论和实践四个维度上，是统一于人民这一主体的，即根本理论特质统摄于四个基本理论特质之中。

【关键词】习近平大历史观；整体性；理论特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更加突出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作用，把人民的现实需要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在实际工作中，他身体力行，经常到深度贫困地区考察调研，模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性问题，特别在许多场合都阐述和强调了树立大历史观，形成了习近平整体性的大历史观。国内学界围绕其形成背景、理论来源、主要内容、形成过程、理论特征和当代价值等诸多方面开展了研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为研究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整体性理论特质提供了重要基础。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习近平大历史观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认知历史在时间上要具有“全程视角”，在空间上要具有“全球视野”，在整体上要具有“全局视界”。^① 分析阐释

^{*}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SK2020A0945）阶段性成果。

^{**} 王跃，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建设。

^① 参见王永友、李卓：《论习近平历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习近平的大历史观的整体性理论特质，对于深入把握其科学内涵和方法论意蕴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民根本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人民根本性可以说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根本理论特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陆续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学习教育实践活动，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①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大历史观的人民根本性。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从人民根本性上把握和分析问题，习近平大历史观的人民根本性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等方面得到生动体现。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前人的群众史观，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等关于人民的重要论述。这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叙事特色。

人民根本性之所以在习近平大历史观中居于统摄地位，就是因为“现实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和前提。这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的根基和宗旨，也是习近平大历史观人民根本性特质的集中体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党的历史是一部始终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是站在大历史观的角度，强调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我们要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其次是以数字为时段突出中国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书写的内容不同，既强调自古至今人民书写“文明史”的整体性，又突出不同时期书写“斗争史”“奋斗史”“发展史”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历史观的视角，把阶段性、连续性与整体性结合起来，阐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可见，人民性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根本所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页。

（二）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这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人民根本性的集中体现。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群关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环境和国内局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面临新的挑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直言不讳地指出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着诸多挑战，一再强调保持党群关系的重要性。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历史都是人民创造的。他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①“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②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人民军队的力量，根基在人民，“人心就是力量”^③。可以看到，人民群众信任是党建功立业最大最深厚资源，^④在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方面，也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大历史观的人民根本性。

（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习近平大历史观人民根本性的又一集中体现。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话中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⑤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的目标……归结到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⑥这都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大历史观的人民根本性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旨在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一词高频出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强调坚定人民立场。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根本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它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也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根本特征。

所以，习近平大历史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9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日。

③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63页。

④ 参见曹泳鑫：《人民群众信任是党建功立业最大最深厚资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4页。

立足于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视野。^① 人民立场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根本立场；人民实践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人民幸福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目标追求。人民根本性也成为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根本理论特质。

二、时间整体性：历史的中国

所有历史都是有关时间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民族的历史看成一个有机整体，为中国未来发展勾画了崭新的时空坐标，把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完整图景呈现了出来^②。历史是一个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他在讲话中经常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中华民族发展史中考察，深刻地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现在是在哪里、将来要去哪里等历史问题。可以看到，习近平大历史观是立足于中华民族历史和人类历史的整体性而言的，而且在时间上呈现出大时段、中时段和小时段相统一的整体性特征。

（一）党史与国史的整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历史的发展是阶段性、连续性与整体性的统一，党史、国史是一个整体。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共产党历史分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阶段，认为这三个阶段是“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接续”表明三个阶段之间具有连续性，即三者之间具有整体性。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实践与近代以来“救国、兴国、强国”的奋斗历程结合起来阐释，既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性、连续性与整体性相统一的阐释，也是还击历史虚无主义企图打着“告别革命”“补资本主义的课”“向西方民主看齐”等荒谬论调的强有力武器。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在历史学习方面，要注重古今中外历史的统一性与全面历史地给予评价。他说：“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③ 他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实践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阐释，强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连续性与整体性相统一的集中概括，同时对历史虚无主义企图歪曲历史、故意颠倒黑白的险恶论调予以强有力的反击。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要有一种“大历史观”的视野。可以看到，将党史与国史看成是一个整体，是习近平大历史观在时间整体性上的一个集中

^① 参见卜宪群：《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历史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0页。

^② 参见章忠民：《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1期。

^③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体现。

（二）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共同构成中国完整的历史。他在讲话中多次将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联系起来，将这两段历史看成是一个整体。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篇便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①从屈原的感慨到杜甫的憧憬，再到孙中山的夙愿，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摆脱贫困和丰衣足食的深深渴望。所以，摆脱贫困是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学习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性，提出要深化对近现代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醒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历史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整体化的历史意识，综合运用归纳和比较等手段，通过长时段、大视角的观察来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事件的真正意义。可以看到，这是习近平大历史观时间整体性的又一集中体现。

（三）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历史的整体性

在历史分期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历史不容割断，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认识。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传承、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探索的探索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有着必然的历史关系，这种关系不能割断。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纳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突出了其连续性。

其次，在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评价方面，习近平强调这两个历史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时间上是连续性的整体。针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我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两个历史时期对立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②，不能用前者否定后者，也不能用后者否定前者。习近平指出，我们要遵循“历史不能割断”的原则，深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探索的根本成果。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整体性

历史与文化密切相关，历史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孕育出

^①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页。

了灿烂的文化，每个阶段又体现出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是一个整体。在继承和弘扬中国历史文化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统一，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继承和创新、传承与发展的关系。这三种文化是中国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在历史现实性上具有继承与发展的统一性，它们共同构成当代中国文化的历史底蕴、现实基础，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呈现出一幅整体性图景。在历史连续性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三种文化联系起来，把它们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整体。这体现了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时间整体性。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到，习近平大历史观在时间上立足的主要是历史的中国，它十分强调历史和文化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强调不同历史阶段的统一性，不能前后相互否定，每个历史阶段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时间整体性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基本理论特质之一。

三、空间整体性：世界的中国

习近平大历史观在空间上把世界历史看成一个有机整体。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空间整体性，体现了立足中国国情与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的辩证统一，彰显了世界眼光和人类情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的。习近平主席立足中国和世界两个大局，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他还指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就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①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论述历史问题，并不只是为了历史去讲历史，他面向的是现实中国际和国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②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空间整体性理论特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强调从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是在整个世界的空间整体下认识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也是在这一空间下准确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空间视野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社会对此普遍关注和积极响应。这是习近平主席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深

^①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0期。

^② 参见曲青山：《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的历史观》，《北京日报》2015年4月20日。

邃的历史眼光和广阔的空间视野,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发展和生动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世界历史作出深刻论述。他们深刻认识到,随着“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①。在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在他的倡导下,中国举办了多场高级别的主场外交活动,如G20杭州峰会、APEC北京峰会、上海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其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就是在习近平大历史观指导下的一次生动实践。习近平主席指出,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经过多年的不断发展,一系列公认的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确立起来。而这些原则也是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习近平主席基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结合当下中国对外开放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形成了新形势下中国的对外开放空间格局。这就从历史上找到了中国现实的发展空间,并实现了把这种空间由历史向现实的转变和空间范围的扩展。这充分展现了习近平大历史观空间整体性的理论特质。

自古以来中国就与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有经贸往来,只是从明朝末期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一些国家,到了近代,更是陷入被列强欺凌和被动挨打的境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中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这都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大历史观空间整体性的理论特质。

(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视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视野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空间整体性的又一生动体现。习近平主席针对当代世界发展的现实格局,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和全世界的广度和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作为各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的“总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整个人类“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②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摆脱贫困一直是困扰全球发展和治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

^② 参见鲁品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当代飞跃》,《哲学动态》2018年第3期。

的突出难题”，中国的脱贫攻坚历史伟业“创造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样本”^①，对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要历史贡献。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几亿人脱贫，中国取得的这个成绩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看成是世界的一部分。他在中国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注重带动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善于把握不确定性增多、人类面临更多共同难题的当今世界，在空间视野上十分广阔。这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空间整体性的集中体现。

（三）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空间视野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步伐要更加坚定和深入。在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科学指引下，目前我国已经和世界各国签署了一系列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东亚经济一体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融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我国在高标准经贸投资规则等领域也取得了很多重大建设性成果。在如何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上，我国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促进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这足以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辽阔的空间格局和广阔的国际视野。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国际会议上重申中国的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所以，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空间视野也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空间整体性的重要体现。

综上，空间整体性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又一重要基本理论特质，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旨在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潮流。这些重要论述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深刻回答了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②而且相应地在历史观上表现出理论整体性和实践整体性两个基本理论特质。

四、实践整体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续奋斗

实践是人类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进行的有意识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实践的整体性可以从实践活动的内容、实践活动的过程、实践活动的结果等多个视角进行理解。特别是今天，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实践活动的整体性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

^①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页。

^② 参见艾四林、康沛竹：《掌握科学的历史思维和方法，提高解决改革与发展基本问题的能力——习近平历史观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8期。

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①在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历程中形成的习近平大历史观具有十分鲜明的实践整体性特征。习近平指出,历史、现实和未来是相通的,实现中国梦的接力过程就是其集中体现。习近平立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可以说,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都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实践整体性理论特质的重要表现。

(一)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整体性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是中国人民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习近平大历史观实践整体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②如今,中国人民正处于为实现中华民族“强起来”而努力奋斗的新时代,针对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和文艺座谈会等重要会议,都是立足于“站起来”和“富起来”的伟大实践,在历史上是一个接续性的过程。从时间维度看,革命、建设和改革是前后相继的三个历史阶段;从空间维度看,革命、建设和改革共存于不同历史时期,相互交融、相互促进。^③这三大历史时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整体、实践整体和发展整体”^④。所以,习近平大历史观在实践上紧紧抓住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的实践的接力奋斗过程,是实践整体性的生动写照。

(二) 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整体性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完成两大历史任务是习近平大历史观实践整体性的又一重要表现。中国梦是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致力于建设物质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全面发展的社会。^⑤在完成历史任务的实践过程中,在实现中国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是一场接力赛。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4页。

③ 参见秦宣、秦睿:《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革命、建设、改革的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④ 戴木才:《为什么说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是一项“完整事业”》,《红旗文稿》2015年第19期。

⑤ 袁久红、陈硕:《“历史周期律”难题的时代解答论习近平的历史观》,《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近平总书记在讲话的最后强调，“回首过去，我们在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上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就”^①，这都是通过不断实践奋斗取得的。可以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各项事业的接续奋斗在实践上是连续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是相通的。这是习近平大历史观实践整体性的生动体现。

（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实践整体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实践上有其独特的整体性特质，“五位一体”是一个整体性目标要求。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来看，这五个方面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而从其发展历程来看，这五个方面也有其历史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在实践上，它们是一个整体，相互联系又相互渗透，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只是在每个阶段问题凸显的程度不同，同时也是实践过程中认识的程度不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生动写照，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总体要求。习近平大历史观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根据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实践成果，在实践上生动展现了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方面的实践整体性的客观要求。

总之，实践永无止境，实践的不断发展，构成一个不断发展的实践整体性叙事。正是由于实践的永无止境，理论才会不断发展，逐渐完善。正因如此，习近平大历史观与时俱进，科学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逻辑，实践整体性也由此成为习近平大历史观一个重要的理论特质。

五、理论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继承和发展

整体性始终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包括内容的整体性、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研究方法的整体性等方面。习近平大历史观在理论内容的整体性上涉及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上是对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历史的论述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在研究方法的整体性上坚持系统分析的方法，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由此，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理论整体性特质得到充分展现。

（一）研究方法：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

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到思维中的具体，这是整体性思维方法的关

^①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2页。

键。习近平大历史观从马克思主义“现实的个人”这一历史前提出发,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科学理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强大的生机活力。这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理论整体性的重要表现。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开始担负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任务。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沿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明的方向锐意进取,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①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了这一点,就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向不动摇,就在理论上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本质规定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和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习近平提出的坚定这“四个自信”,历史地在理论上反映了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理论整体性理论特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回顾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论述。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同一问题在不同时代给出了符合时代的科学回答,在研究方法上始终坚持系统分析方法,把握住一个总的发展趋势。这些都体现了习近平大历史观在研究方法上的理论整体性。

(二) 理论内容: 涉及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十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为核心要义,涉及治国理政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外交、民族、宗教、生态等领域,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大历史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治国理政各个领域、方方面面。

此外,习近平大历史观主要围绕对待历史的态度、观察历史和研究历史的方法、应用历史和把握历史的目的三个方面展开,已逐步发展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②习近平大历史观从历史的本质、重视历史、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等方面系统全面回答了历史是由谁创造的、以什么样的正确态度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学习历史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研究历史是为了什么、如何从历史中获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等事关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为治国理政找准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抓住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等一系列新变化,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树立了“四个自信”。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习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6页。

^② 参见曲青山:《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的历史观》,《北京日报》2015年4月20日。

近平大历史观的理论整体性特质。

（三）历史发展：对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历史论述的继承和发展

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这两个大局，围绕“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历史的新论断，对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历史的论述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历史理论体系。这就是习近平大历史观。

在建党百年之际，《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和《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出版，充分体现习近平大历史观对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历史的论述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与时俱进、一脉相承在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理论整体性上得到了生动体现。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生动体现了理论整体性，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历史的论述都是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理论整体性特质的又一重要表现。

六、结语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的主体是“现实的人”，历史是人在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的创造性活动。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以广阔的历史和空间视野，系统研究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和人类当时面临的时代难题，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的历史观把历史、现实和未来看成是相通的，呈现出整体性的逻辑体系。习近平大历史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其生成具有自身特有的主体、历史、空间、理论和实践整体性特质，共同构成了其整体性原则。习近平大历史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历史哲学，是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具有很强的历史思维，我们要善于从整体上对其进行认真研究把握。深入把握其理论特质，对于我们深入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5页。

The Holistically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Xi Jinping's Grand View of History

Wang Yue

Abstract: Integrity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 of Marx's View of History. Based on "real people", Marx's View of History scientifically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law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ime, space,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 Jinping h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Marxist View of History and formed Xi Jinping's Grand View of History of Integrity. Xi Jinping's Grand View of History of Integrity is a complete ideological system, with integrity as its general characteristic,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ought as its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 and temporal integrity, spatial integrity, practical integrity and theoretical integrity are its four basic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Xi Jinping's Grand View of History of Integrity is unified i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ime, space,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he main body of the people is the people, that is, the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four basic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Xi Jinping's Grand View of History; Integrity ;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李谷悦]

问题、方法和视域*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著作述评

胡栋材 张国庆**

【摘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是近年来学界持续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何中华的《马克思与孔夫子》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目前的研究水准，尤其是在问题意识的挖掘和探讨方面让人印象深刻。它指出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历史相遇应以中国的现代性为问题指向，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一历史相遇的最佳例证。田辰山的《中国辩证法》较早聚焦方法论问题，专门探讨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之间的内在相通性，以丰富的思想例证说明这种相通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张允熠的《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展现了宏阔的思想视域，进一步破除了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梳理了明清之际到清末民初以及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时期中西文化互动及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进程，最终指向张岱年、方克立等的“综合创新论”。21世纪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而言，这三部著作在问题、方法与视域等方面作出了重要探索，在此基础上可以找到继续推进相关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述。“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者进行认真研究，并结合实践不断进行创新性转化。

* 本文系教育部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问题研究”（19JDSZK186）研究成果。

** 胡栋材，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气论哲学；张国庆，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实际上,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就自觉探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问题,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还产生了张岱年、冯契等具有重要创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近年来,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上进展颇多。笔者认为,何中华的《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田辰山的《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张允熠的《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哲学的互动与融通》三本著作值得关注,现将一些阅读体会付诸文字,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马克思与孔夫子相遇之后:读《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

近年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问题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结合问题多有关注^①,何中华就属于其中较有成绩且值得重视的学者之一。他的新近力作《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以下简称《相遇》)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目前的研究水准。其问题意识尤其值得分析。

(一) 追问现代性:问题意识的明确与深化

找到问题进而找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的前提。平心而论,在对这一问题的问题意识方面,不少研究者缺乏思考甚至理论自觉。这就会导致以下情形:其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既定事实理解为理所当然,不作具体分析,无法深入把握,大多停留于宏观论述,看不到其中的问题所在。其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结果是窄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地,误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要义,无法弄清楚或直面中国的现实所要求解决的理论课题。简单地说,就是找不到真正的问题所在。就理论研究而言,这两种情形都不能轻忽。

何先生对此有高度的问题意识。他在《相遇》的前言就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早已成为基本事实,但对该事实的理论认知和诠释还很不够。也就是说,我们的理论已经远落后于事实。进一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同儒学的结合问题,现在不是回答“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要弄清楚“如何可能”的问题。^②在“如何可能”的问题上,书名本身可以表明作者的基本态度,即马克思主义

^① 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9期;张曙光:《现代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与“孔夫子”——兼论传统的人文维度及其意义》,《哲学研究》2010年第2~3期;田辰山:《从孔夫子到马克思: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契合性》,《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

^② 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和中华传统文化是在历史中相遇。那么，二者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中相遇，又如何相遇？阅读全书可以找到答案：二者在中国传统的现代化历史行进中相遇，这种相遇存在丰富的可能性，包括同向而行的相遇、错向或背向而行的相遇甚至无方向而行的相遇。当然，第一种相遇应该是主要方面。

不得不说，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历史相遇，这个说法本身表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思考既是立体的、多方位的，又有其理论准绳。正因如此，作者才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时代性维度上具有融通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应对现代性的挑战方面，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着一致或相近的指向和功能。^①这就倾向于认为在反思现代性或构建中国的现代性上，马克思与孔夫子相遇而知。《相遇》一书的问题意识及其核心观点就在于此。这一问题意识的深化，表现为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性和儒学的前现代性的考量，可以说，围绕现代性问题，马克思与孔夫子相遇并且各展所长。这抓住了现代性问题，切中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结合的关键。同时，本文认为该书的某些观点有待进一步商榷。

（二）中国的现代性图景：毛泽东思想及其诠释

在反思现代性的道路上，或者说在追寻中国的现代性方案道路上，作者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找到了最具有理论说服力和现实影响力的代表，即毛泽东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历史相遇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反过来说，毛泽东思想无可替代地确证了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历史相遇。关于这一点，《相遇》中有诸多阐述。作者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不过是清末以来西学东渐的一个缩影，一种人格化的形式。^②“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浸润，无疑构成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所已有的‘前见’。费正清因此甚至认为，‘谁要是不懂一些儒家思想的传统，他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冯友兰同样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两个哲学的来源，一个是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一个就是中国的古典哲学。正因为它有中国古典哲学的来源，它的中国特色才有着落。这一点，许多人还不理解。’”^③由这段引述可以看出，作者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传统文化滋养和马克思主义传入相互作用之下形成的。笔者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其中的作用机理就需要作出理论分析和交代。

在笔者看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绝不是简单地把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杂糅在一起就可以实现。结合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来看，作者特别指出，更值得注意的

① 参见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4页。

② 参见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8页。

③ 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9页。

是在启蒙现代性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性和后启蒙性被严重忽视。其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启蒙意义上被解读，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同儒学的虚假对立。^①由此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理解和定位现代性以及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作者似乎认定马克思主义具有后现代性或后启蒙性质，而儒学传统具有前现代性质。人们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存在双重误解：“一是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关系的误判，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误读。”^②也就是说，被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被误读为一种适合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与此同时，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被误判为阻碍现代中国诞生的历史因素。作者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定历史语境，启蒙现代性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解读甚至塑造了一个启蒙意义上的马克思形象。这不能不妨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同儒学及其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肯定性的关系作出正确的理解。不得不说，作者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传统关系问题的重要论题，因而不失为理论的洞见。

问题在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传统的理解和双重判定值得商榷。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不同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将儒学认定为具有前现代性性质的传统，进而判定马克思主义对于儒学而言存在着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某种一致性。^③这种理解和判定以现代性为准绳，但对现代性本身的理解似乎不一致，故作者的见解不尽妥当。实际上，现代性本身具有包容性，尤其对于中国的现代性方案而言，难以简单论定马克思主义就是“后”，儒学传统就是“前”。根据作者的界定，围绕中国的现代性，儒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前后呼应，二者的交融由毛泽东思想实现，这是对中国现代性方案的确证，表现了中国现代性道路的自身逻辑。对于毛泽东思想而言，它的确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传统，但更是被实践所检验的中国的现代性方案，这中间存在复杂的理论问题，需要给予更多探讨。《相遇》一书虽多处论及，但还不够深入具体，而是把更多篇幅放在马克思与孔夫子结合的具体开展方面。

（三）中国现代性的推进：马克思与孔夫子从相遇而知到携手而行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结合，这是学界长期探讨的论域。张岱年、窦宗仪（Tsung-I Dow）、汤一介、方克立、陈卫平、张允

① 参见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02页。

② 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03页。

③ 参见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3页。

熠等就给出了相关看法，其中不乏某些共通之见。^①对此，《相遇》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1) 世界观与方法论方面。作者认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儒学传统尤其是宋明儒学存在相契之处。也就是说，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明儒学具有唯物主义性质。^②而在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着运思上的一致。举例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所说唯物辩证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与儒家易学传统所主张的生生不息和变易观存在一致之处。^③实际上，此观点张岱年多年以前有所论述，在某些汉学家那里也能找到类似说法，所以并没有多少创见可言。

(2) 对实践观的强调方面。作者指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鲜明、最突出也是最本质的特征。^④这种认识当然是准确的，更进一步说，实践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照之光”，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意义上就是实践本体论，用马克思的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⑤。在这一点上，作者仍以毛泽东思想为例，指出毛泽东对实践的强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体现，也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既是认识论的立场，更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原初基础的奠定。^⑥遗憾的是，对于儒家传统所讲的知行观，如王廷相提出的实践，究竟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有何关联，作者缺乏比较分析。

(3) 在人性论方面。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同儒家在此方面有相通之处。无论是儒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其人性论预设都是强调人的超越性的一面，亦即人的社会性对作为肉体存在物的人及其自然属性的超越。这是使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会通成为可能的重要原因之一。^⑦笔者认为，这种见解有点含糊，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实质上还是实践的人性观，并非强调人的超越性，更不能说有此预设；儒家传统的人性观主流有强调超越的一面，但不能说仅此而已。

(4) 理想社会追求方面。作者援引梁漱溟晚年的论调，提示现代新儒家对

① 张岱年：《21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序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1期；汤一介：《传承文化命脉 推动文化创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4期；方克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红旗文稿》2009年第1期；陈卫平：《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五个问题》，《思想理论教育》2013年第5期；张允熠：《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异同论》，《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4期。综合性考察参见胡栋材：《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及其反思》，《文化软实力研究》2018年第1期。

② 参见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27～128页。

③ 参见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91页。

④ 参见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2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140页。

⑥ 参见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28页。

⑦ 参见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3页。

社会主义中国的欣赏与某种接纳。^①实际上,这更是一种误解。我们不否认梁漱溟对于社会本位的倾向,但以此表明他倾向于社会主义,显得有点望文生义。关于这个方面,作者的思想视域有点局限于现代新儒家,看不到儒学的多元传统和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5)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结合方面。《相遇》一书毫无疑问提出和抓住了问题所在,此即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然而,其中有些理论分析有待完善,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具体结合的分析仍过于笼统。这些都有待我们认真吸收借鉴,如此才可能真正推进该领域的研究,获得真正的思想创见,以不负时代的要求。总之,我们不能满足于揭示马克思与孔夫子的现代性相遇,更要推进二者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携手而行。

二、方法的契合与契合的方法:读《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领域,田辰山的《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前十年值得关注的一部作品。^②该著从辩证法角度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从理论上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视域和新方法。在此之前,美国学者斯塔尔(John Bryan Starr)较早指出,辩证法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比在欧洲文化传统中影响广泛而深刻,中国哲学经典《易经》和汉译本的佛经早已明确表达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在辩证法方面有相通之处。比较具体而深入探讨此论题的,当推田辰山的《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中国辩证法》)。

(一) 以辩证法为切入点

唯物辩证法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就开始在中国传播,且在瞿秋白、李达、张申府、艾思奇等的推动下在30~40年代高涨起来,并被接受和运用到中国传统文化领域。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知识界从俄文翻译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其中较重要的事件为瞿秋白在上海的辩证唯物论演讲。稍后,中国共产党重要理论家进行的辩证法的通俗化运动,前期当推李达和艾思奇,后期以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为代表。^③

^① 参见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84~285页。

^② 参见杨金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视野——读〈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4期。

^③ 参见[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页。

观 20 世纪上半叶,真正从辩证法角度深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结合问题的专著并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是,在张申府等人的直接带动下,张岱年很早就注意到辩证法问题,致力于沟通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936 年他写出《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指出“唯物、理想、解析之综合,实乃新唯物论发展之必然的途径”^①。在发掘中国传统哲学的唯物辩证因素方面,张先生作出了体贴入微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解运用方面,他指出“对立统一律为辩证法之最基本的规律,其余诸原则皆可谓对立统一律之特殊运用,而皆可由对立统一推衍而得之”^②,没有陷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泥淖,因而在二者的结合问题上能够作出无可比拟的贡献。委实如此,张先生的学术工作和思想创建仍有一些缺憾,主要表现为两点:他的综合创新论或新唯物论只是呈现了大致轮廓,很多方面有待深化;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缺乏专门考察,有些认识不够准确。

同在 20 世纪 30 年代,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把握和绍述比张岱年要全面且系统。他于 1937 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不仅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也是真正意义上第一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有专门绍述的著作。针对张东荪和叶青等围绕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以及抗日战争的革命需要,李达认为中国社会十分有必要准确而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社会学大纲》将唯物辩证法放在第一篇进行阐述,具体分为四个内容,即“当作人类认识史的综合看的唯物辩证法”“当作哲学的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当作认识论和伦理学看的唯物辩证法”,这些内容占据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李达对唯物辩证法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难能可贵的是,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问题在于,他将自然辩证法简单视为唯物辩证法在自然领域的运用,将历史唯物论简单视为唯物辩证法在历史领域的运用^③,未能摆脱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更加遗憾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几乎只字未提。

张岱年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有深入阐发,并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出理论创发的要推冯契。早年的革命实践特别是抗日救亡斗争使冯契逐渐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尤其是《论持久战》则使冯契心悦诚服,深刻影响他并使他坚定地“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前

①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 1 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64~265 页;方克立:《张岱年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2 期;李存山:《张岱年先生与新唯物论》,《哲学研究》2005 年第 9 期;李维武:《20 世纪 30~40 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 年第 2 期;梁隽华:《张岱年对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哲学的互论及其方法论意义》,《中国哲学史》2014 年第 2 期。

②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 3 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8 页。

③ 参见李达:《社会学大纲》,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16 页。

进”^①。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贯穿于冯契的“智慧说”哲学体系之中。以“智慧说”三篇为例，如果说《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是基于实践的认识过程的总体考察，那么《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致力于将认识的辩证过程转化为一般方法论，《人的自由与真善美》致力于将认识的辩证过程转为人的德性与自由。三者共同构成了所谓“广义的认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论思想体系，或者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因而成为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收获。

该著作力图回答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变成存在于中国语境中的这种形式”。作者重点研究的，是中国人如何获得对来自西方的辩证法的理解。作者意在论明“通变”如何作为一种哲学思维体现中国“dialectics”的特点。与此相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什么会被中国人所接受而一举成为风靡社会的思维模式？^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Chinese Dialectics: From Yijing to Marxism*）原本是写给西方读者的，因而更具有中西文化比较与会通的意味。

（二）通变：《易经》的方法传统

田先生之所以选取通变作为揭示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在方法论上的契合，与他对马克思主义及儒学的理解把握相关，更与他对郝大维、安乐哲的思想观点的继承与发扬有关。作者写道：“我以为我的工作是郝大维、安乐哲二位学者互系哲学模式论点研究的继续。”^③郝大维、安乐哲在中西哲学思想比较方面建树卓著，蜚声海内外，他们在《通过孔子而思》《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等英文著述中将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的思维方法表述为“互系性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作者对此表示认同：“中国古代思想家正是在相反相成的作用观念上，在这些互系性偶对物事的观念上，来认识变化的本质……互系性偶对是一种古代宇宙学生成、演进的根源阐述原则。”^④根据作者的认识，最能体现这种变化的互系性思维且影响最为深远的元典毫无疑问是《易经》。《易经》所体现的通变法则乃是中国传统关于物事变化的最核心观念，通变就是任何互系偶对物事之间变化着的延续，通变思维所看到的宇宙是一个融会贯通、具有互系关系的宇宙。如《易经》讲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

① 参见刘明诗：《冯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41页。

② 参见[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③ [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④ [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⑤ [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5页。

统的辩证法讲的就是多重、复杂、斑驳的宇宙中一切事物内在和外在之间的关系和变化。通变哲学的核心即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不是上帝而是阴阳这样的两端偶对物事基本方面的相反相成互动才是生成变化的源泉。由此，道是变化之道，道即是通。为此，作者反复指认，中国哲学的传统思维模式是由通变之道确立起来的。《易经》的核心范畴“道”“易”“阴阳”“通变”等可以理解为一种事件本体论的概念，而不是本质本体论的概念；它们没有西方哲学那种超越的抽象意义，讲的是自然宇宙的道和具体人物的道。^① 简单地说，就是在中国传统中“事物”（things）更多地被视为“物事”（event），物事即体现通变之道，诚如《易经·序卦》所言：“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

以通变来理解和定位《易经》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并非毫无依据。这一点从中国传统儒道思想资源中可以找到相关重要表述。^② 在作者的阐释之下，“通变”成为指认“中国辩证法”的核心特质，《易经》成为这一指认的根本依据。从中西思想文化交往的历史来看，17～18世纪欧洲文化巨人莱布尼茨所创制的二进制算术的表达原则，在《易经》的阴阳卦图及辩证思维中找到了某种思想支撑与前行的力量。《中国辩证法》将“通变”设定为《易经》的方法论前提，但对这一前提本身缺乏专门考察。由于基本接受郝大维、安乐哲的互系性思维观点，故作者的重点在于揭示近代以来通变的思维风格是如何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提供辩证哲学发生的基础，并融入马克思主义的“dialectics”，发展为一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定形式。也就是说，在中国近代进步人士那里，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中，他们表面上使用的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这一术语在深层仍然植根于传统的通变哲学之中。^③

（三）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瞿秋白到毛泽东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中国辩证法》一书较为集中地梳理了辩证法在近代中国的境遇，尤其是揭示了从瞿秋白到毛泽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演进。其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dialectics”这种崭新的西方语汇融会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中，产生出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这个中国版本如果要寻找它的思想源头，应追溯到《易经》的通变法则。^④ 为了论证这一要义，作者对梁启超、蔡元培等在译介西方辩证法时体现的融合特征进行勾勒，也就是说，西方辩

① 参见[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② 参见吴根友：《易、庄哲学中“通”的观念及其当代启示》，《周易研究》2012年第3期；吴根友：《通之道（引论）——一种新的形上学之思》，《哲学分析》2013年第1期。

③ 参见[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④ 参见[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7～78页。

证法的论说变成了中国的通变观念。比如在蔡元培这里,黑格尔的“dialectics”经过汉语再生产的过程被转化成了辩证法,至少在表象层次上,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中国的通变思维可以互相兼容。^①

作者把大部分篇幅用于描刻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首先是“在中国系统讲解辩证唯物哲学的第一人”瞿秋白。作者认为,瞿秋白在辩证唯物论里看到的是与中国传统的通变哲学类似的思想。举例来说,他将上层建筑对立经济基础的二分概念转化成了一种互系范畴:“物质的经济基础产生精神的社会现象,好像树的发叶开花,并非单供给你主观的欣赏,而是有客观的营养传种的作用的。所以政治、思想等当然能返其影响于经济。”^②这种认识充满洞见。对于受第二国际或列宁主义影响十分明显的瞿秋白来说,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并非完全教条地被接受,而是在创造性的理解中被赋予中国的特点。实际上,对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而言,能够比较好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理论原貌和思想精义的,要推塔尔海玛(A. Thalheimer)的《现代世界观》(德文原名为《辩证唯物论的入门》),以及后来李达撰写的《社会学大纲》,这两部书在当时的确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其次是论及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化以及通俗化的代表人物艾思奇。作者认为艾思奇看到了中国固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即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与中国传统通变哲学相类似的东西。^③在此基础上,他最突出的贡献是在使唯物辩证法中国化的同时也将其通俗化。结合抗日战争的时代状况来看,真正做到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所说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

最后是毛泽东。作者将最浓重的笔墨留给了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将传统通变思想发展到一个现时代的新阶段。这个通变思维的新阶段可称为“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其重要特征就在于毛泽东不只是自己理论的创作者,而且也是自己理论的实践者。^④比如,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解读多使用中国典故和古汉语用语,尤其是老子哲学和易学思想。在这方面,其中国特色比瞿秋白和艾思奇更为强烈,也更为娴熟。为此,作者分析了毛泽东宇宙观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及其表现。第一,通的观点。在毛泽东眼里,“万象之众,息息相通”。他

① 参见[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② [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③ 参见[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页。

④ 参见[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

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① 第二，变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天下万事，万变不穷”^②，“天地盖唯有动而已”^③。作者由此推论，毛泽东深厚的通变思想根源可以从两个并行不悖的方面看，一方面，他的思维方式造成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通变解读；另一方面，他将古代思想也作为唯物辩证法看待。^④ 总而言之，毛泽东相信唯物辩证法与古代中国传统思想的通变是相通的，并且取得了理论创新和实践成功，如著名的《矛盾论》《实践论》及《论持久战》等。

毛泽东思想确乎是中国辩证法或中国版本的唯物辩证法的最佳例证，怎么肯定都不为过。然而，不得不说，有些重要的问题在《中国辩证法》中被遮蔽了。比如，如果说这个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视为辩证唯物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的东西，其实是通变思想的现代版本^⑤，那么这与所谓的“西学中源”说有何差异？如此一来，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即矛盾分析法以及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就被简单地抹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换言之，只是从思维方式论证通变与唯物辩证法相契相通，是否有足够的理论说服力？退一步看，既然作者认识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将自己传统的通变当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那么这种行为是否顺理成章？其理论后果如何？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辨析和论明，而不能简单了事。如作者所指出的，在通变哲学里进化与退化是互系的、相通的，这种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就真的一致？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综上所述，尽管郭沫若、张岱年、李石岑、郭湛波、陈唯实、李豹隐等人曾在先秦哲学经典中探索中国辩证法，而且在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化方面，他们的工作在某些方面比瞿秋白、毛泽东可能更加翔实、更加精细。问题在于，中国版本的唯物辩证法应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能停留在中国版本的样式上。

三、中华文化综合创新的当代视域：读《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哲学的互动与融通》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过程是中西文化互动与交往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8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④ 参见[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140页。

⑤ 参见[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的重要进展,是一次革命性进程。某种意义上,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使中西文化互动与交往获得实质性推进。所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命题置于中西文化互动与交往的视域来加之认识与评析,可以丰富这一命题的内涵。21世纪以来,自觉认识到并从学术研究上有实质性推动这一点的要求张允熠的近著《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哲学的互动与融通》(以下简称《大变局》)。这部60多万字的大著从总体上考察梳理了从明清之际至清末民初以及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世纪之初的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大变动,其主题是对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的哲学互动与融通进行理论把握与阐释,最终指向以张岱年、方克立等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综合创新说。

《大变局》的最大特点集中表现在思想视域方面。中西文化的相遇必然带来互动与交流,其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思想的碰撞和视域的融合。从明清之际到清末民初、从五四运动到五四运动之后、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这些重要阶段都被纳入《大变局》的思想视域并加以宏观把握和理论分析,其中一条思想主线就是从中西互动到中西马互动再到中西马融合与综合创新。也就是说,思想视域并非简单的时间划分,更是作者学术立场、观点与方法的反映,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对此作者有高度理论自觉,他在全书结尾处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视域是“一种历史的眼光”“一种文化的眼光”“一种中西合璧的眼光”“一种实践的眼光”^①。如果将该著与许苏民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稍作比照,就会发现二者的研究领域多有重叠,然由学术立场、观点与方法所彰显的思想视域却差异明显。概括而言,该著有几个突出的方面值得注意。

(一) 对欧洲中心论思想的破除以及对中西文化互动的客观态度

作者在论述西方文化发展时多次指出,欧洲文化在哲学、宗教以及语言等方面缺乏真正的原创性,欧洲中心论事实上不能成立,更不具有历史合理性。与此同时,作者强调中西思想文化互动的过程是双向的而非单线的。基于这种客观态度,利玛窦、龙华民等在华传教士得到重视。特别是龙华民的《灵魂道体说》,被视为第一位真正意义上中西文化互动的见证者。《大变局》指出,在欧洲欲从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思想禁锢中走出并努力寻求思想自由和理性进步之时,中国哲学助推了近代欧洲哲学的形成和启蒙运动的进程,在客观上为欧洲思想发展注入了活力。^②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因素在17~18世纪的欧洲推动了反神学的启蒙运动,到19世纪,马克思批判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中国哲学在

^① 张允熠:《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的互动与融通》,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661~662页。

^② 参见张允熠:《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的互动与融通》,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319页。

欧洲文化土壤中终于找到了知音。^① 最早专门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揭示出来，并与西方宗教神学以及各种唯心主义哲学传统加以比较的，就是龙华民的《灵魂道体说》。在此意义上，《灵魂道体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大变局》进一步指出，龙华民认为中国哲学的第一本原是物质，孔子是无神论者，中国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这种对孔子和中国哲学的性质判断，随着《孔子及其教理》在西方的广泛流传，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利玛窦对中国宗教和哲学的介绍。^② 龙华民试图运用亚里士多德哲学原理来论证天主教教义比宋明儒学更加高妙。《灵魂道体说》的立论核心在于道体被视为质料，灵魂则作为形式，或道体是物，灵魂是神。由此一来，容易造成一种观点，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缺乏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从而引发思想争议。事实上，利玛窦早已有此观察。他虽然颂扬中国，但也指出中国传统缺乏真正的宗教信仰。不仅如此，利玛窦对中国思想学术缺陷的认识值得重视，即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辨科学）和形而下学（物理学或自然科学）不甚完备，尤其是缺少形式逻辑概念及规则，数学和天文学比较落后等。^③ 为此，利玛窦、徐光启等人做了不少有针对性的工作，这些工作构成中西文化互动交往的重要表现。

（二）对西方进化论在近代中国思想作用的充分揭示

《大变局》用了不少篇幅介绍探讨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情况。如作者所说，严复引介的进化论，其影响之大，除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之外，超出此前和同时的任何一种外来思想，很快成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思想之大宗。无论是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还是革命党人孙中山、章太炎、陈天华等，无不是进化论的信奉者，五四时期的新文化人物陈独秀、胡适等起初都信奉进化论。^④ 关于这一点，冯契、李泽厚等早已有所提示，高瑞泉、王中江等有专著进行考察。《大变局》的突出表现在对康有为、孙中山、马君武等近代进步人士关于进化论的理解，以及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这一重要转变的分析。

《大变局》指出，康有为的进化论思想具有糅合 19 世纪欧洲生物进化论与中国儒家传统进化思想的理论特质。这体现在他对《春秋公羊传》之“三世说”的阐释上，即康有为的进化论基本上是在今文经学传统的范围内援西学之进化论，编织了一个神秘的“三世说”，把儒家固有的进化思想确切地冠以“进化”

^① 参见张允熠：《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的互动与融通》，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第 146～147 页。

^② 参见张允熠：《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的互动与融通》，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第 168 页。

^③ 参见张允熠：《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的互动与融通》，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第 31～32、81 页。

^④ 参见张允熠：《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的互动与融通》，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第 263～264 页。

的概念。^①与此类似,进化论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政治学说的哲学基础,其实也糅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易学思想。章太炎讲“俱分进化论”,能够指出西方进化论单线思维的某些缺陷。这些做法对五四时期新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不得不多加注意。

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大变局》对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转变给予重要考察,指出进化论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影响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使其成为从中国封建的旧意识形态(儒学)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转型的一个重要的过渡环节,其中较关键的环节就是从进化论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②对于能够自觉推动这一转变的人物,作者给予肯定性评价,比如马君武1903年所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指出马克思是“以唯物论揭示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马氏之徒,遂谓实与达尔文言物竞之旨合”^③,并且认识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故值得肯定。还比如胡汉民在宣传、介绍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唯物之研究》《阶级与道德学说》等一系列哲学论文,进入真正研究并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阐述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哲学理念的领域,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之后一个真正的质变,其理论水平之高、思维之严谨、见解之精辟,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人群之中是首屈一指的。^④相较而言,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孙中山始终没有超脱社会主义论域,因而未能契合唯物史观的要义。

(三)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问题指向,重塑“中西马”文化互动与会通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曾把中西方的相遇称为“两极相逢”或“两极相联”。他本人未能想到的是,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迎来实质性进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西文化的“两极相联”变得更加具有革命性、科学性和实践性。诚如作者所言,五四运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学派、西方哲学文化派、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三派“争鼎中原”的大致格局。这种格局大约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至抗战全面爆发后略有分化。^⑤那么,如何正确看待和分析这种思想文化格局,就显得十分重要。《大变局》一书在丰富史料的基础

① 参见张允熠:《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的互动与融通》,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66~267页。

② 参见张允熠:《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的互动与融通》,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536页。

③ 参见张允熠:《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的互动与融通》,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362~363页。

④ 参见张允熠:《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的互动与融通》,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380~381页。

⑤ 参见张允熠:《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的互动与融通》,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403页。

上论述马克思主义学派、西方哲学文化派以及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情况，同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问题指向和重点线索，以此说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文化进程。

相较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介，瞿秋白重点引进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至20世纪30年代李达《社会学大纲》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系统传播的完成。与此相呼应，随着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一系列重要论著问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迎来第一个重要创获即毛泽东思想。

当然，思想史的进程并非如此简单，西方哲学文化派和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的论战或质疑如影随形。其中有些讨论绝非意气之争，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道路十分重要。比如，张东荪、张君勱、牟宗三等人在唯物辩证法辩论中主要坚持两种观点：一是从本体论上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二是从形式逻辑上否认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① 这些看法至今仍有理论启发价值。更不用说作为现代新儒家开创人物的梁漱溟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的微妙关系。尽管毛泽东本人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多次变化，^② 但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如《矛盾论》等，毫无疑问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巧妙地与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思维糅合起来，充分展示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故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思想领域最具创造性的哲学著作。

另一位现代新儒学大师冯友兰在抗战期间的“儒学复兴”运动中成效显著。他在抗战期间著“贞元六书”，之后遭到唯物主义阵营即马克思主义学派（陈家康、杜国庠、胡绳、赵纪彬、周谷城等）的严厉批评。经此种种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出现了以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任继愈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派或史学派，“今日我们所说的‘中西马’三学之中的‘马学’群体，实际上就是他们开创的，今人只是他们事业的继承者”^③。改革开放之后有张岱年、冯契甚至李泽厚等既坚持或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又致力于创建具有民族性、世界性的中国哲学话语的著名学者。

至于西方哲学文化派所参与的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建构，如从严复到胡适、金岳霖等，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文化缺少逻辑并不必然导致对中国哲学的漠视或极端偏见，而应该致力于建构符合现代性要求的中国思想文化，冯友兰的“新理

① 参见张允熠：《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的互动与融通》，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459页。

② 参见张允熠：《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的互动与融通》，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629～630页。

③ 张允熠：《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的互动与融通》，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605～608页。

学”和金岳霖的《论道》就是运思中西、潜心古今的本体论建构。^①在汲取西方优秀思想文化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及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并不比西方哲学文化派消极。问题在于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无论是从金岳霖到冯契，还是从张申府到张岱年，抑或冯友兰从早期到晚年，都印证了这一路向。更准确地说，即是否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从而坚持中华文化立场，吸收西方优秀文化。

在《大变局》看来，如果说从张申府的“三流合一说”到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说”的实质是树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过程，那么从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说”到方克立的“马魂中体西用论”则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反复指认和不断强化，这一过程就表现为思想文化问题上的具体针对性。其结果是，在中国化的视域下，经过四百年中西文化互动和近百年来“中西马”的互动，实现了中国民族文化一次空前的大转型，也就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新主流的生成。这一观点进一步印证了作者的意图，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问题指向和核心线索。相较之下，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会通之处的揭示倒显得是其次。^②由此可以说，《大变局》并非要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如何融合会通，而是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才是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或许这就是《大变局》所要彰显的中国化的思想视域。

Problems, Methods and Horizons

——Reading of the Research Works on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Hu Dongcai Zhang Guoqing

Abstract: The issue of combining Marxism with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that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have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in recent years. He Zhonghua's "Marx and Confucius" in a certain sense represents the current research level, especially in the excavation and discussion of

^① 参见张允熠：《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的互动与融通》，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504页。

^② 参见张允熠：《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的互动与融通》，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541页。

problem consciousness. It points out that the historical encounter between Marx and Confucius should be directed to China's modernity, and Mao Zedong Thought is the best example of it. Tian Chenshan's "Chinese Dialectics" focuses on methodological issues, explores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al thinking represented by I-Ching and Marxist materialist dialectics, and uses rich ideological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and complexity of this connection. Zhang Yunyi's "Four Hundred Years of Great Changes in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shows a broad ideological horizon i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further dismantles the Eurocentrism in culture, and sorts out the interac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he overall process of moving towards Marxism in the period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and from the May 4th Movement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ultimately point to the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Theory" of Zhang Dainian and Fang Keli.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on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se three works have made important explorations in terms of problems, methods and horizons.

Keywords: Marxism;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Horizons

[责任编辑: 闫惠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道路自信的内在机理^{*}

张兴毅 苏星鸿^{**}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提升道路自信的文化根基，同时也承载着提升道路自信的时代使命。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充斥着各种文化病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克服和破除这些文化病垢的精神利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道路自信，要理性对待传统文化，夯实道路自信的文化基础；贯彻“双创”发展战略，增强道路自信的文化动力；秉持开放包容理念，扩大道路自信的文化空间。

【关键词】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道路自信；内在机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撑，是坚定道路自信的文化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被实践不断证明了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更是承载着悠久绵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条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①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道路自信的契合性成为广泛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明晰并且解决好这个重大命题，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是增强道路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就要全面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道路自信的可行性、现实性和实践性，深刻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道路自信的内在机理。

一、智慧积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道路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先贤智慧的结晶和思想的凝结，有着极其强大的历史穿

^{*} 本文系甘肃省教育厅优秀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2022CXZX—587）的研究成果、2022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2022YB067）的阶段性成果。

^{**} 张兴毅，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苏星鸿，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9～40页。

透力和现实影响力。自信是国家、民族、政党对于自身价值、信念、文化积极肯定的态度。中国道路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的选择,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选择,不是偶然的突发的,而是由中国独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基因所影响的,是植根于中国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土壤所进行的理性抉择和制度变迁的结果。”^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实践方式和精神品格涵养道路自信。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提升道路自信的价值观念

第一,“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从《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道德经》中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从《孟子·尽心下》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荀子·大略》中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从《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到西汉贾谊提出的“夫民者,万世之本也”,这些古训都旨在告诫统治者在做决定时应从民意出发,以民为本。从古至今中国历代思想家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和契合性。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即人民性,人民立场是其最根本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② 中国道路就是践行“以民为本”发展理念的结果。“中国道路的成功选择,根本因素就在于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融合人民的智慧;中国道路的不断拓展,根本动力就在于高度重视人民的智慧和创造精神;中国道路的最重大价值,就在于这是一条能够造福人民、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之路。”^③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赋予民本思想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国道路得到人民的充分认同。

第二,“尚和合,求大同”的发展理念。中华民族历来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著称于世。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强调“礼”是手段,“和”是目的。《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里的“中和”并不是调和主义,而是“因中致和”与“和而不同”。《古今贤文》中提到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反映出“和合”的最终目标是和谐共生。“和合”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现已成为中国道路发展中独特的政治文化基因。近代以来经过战争洗礼的中华民族,对和平有着不懈的追求,也倍加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和平。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

① 王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文化渊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7期。

②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

③ 包心鉴:《道路自信的政治价值、文化底蕴与时代逻辑——认识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三个维度》,《党政研究》2017年第5期。

大变局,顺应时代潮流是大趋势,任何“国强必霸”的企图都是妄想,任何单边主义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和平、交流、合作、发展才是应势之举。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致力于为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①我们对和平发展道路的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②。正是因为这种自信和自觉,中国积极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提升道路自信的实践方式

第一,“不日新者必日退”的实践动力。创新是中华民族历经千年风霜所孕育出的宝贵思想,追求自我革新是古人早已明晰的实践方式。《易传·系辞上》中有“日新之谓盛德”。《诗经》中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记·大学》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北宋程颐指出:“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在古人看来,只有不断革故鼎新,才能达到至善之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坚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创新理念,通过创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我国创新能力仍然不强的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中华民族创新思想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必然要求。

第二,“实事求是”的实践方法。“实事求是”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求实精神的一个重要范畴。班固讲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里的实事求是是指做学问时要充分占有资料,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实事求是”也是儒家倡导的实践方式,孔子曰:“知之为之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作出创新性的阐释,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此后,“实事求是”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并贯穿于党全部工作的始终。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破浪前行,不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67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65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98页。

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胜利，实事求是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缺少的重要法宝。实践表明，中国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继续胜利前进，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即不断根据时代发展需求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实际，赋予其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提升道路自信的精神品格

第一，“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周易·乾卦》中讲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表现为力求进步、不断革新、发愤图强、永不停息，是流淌在我们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永不断流的精神血液。《周易·坤卦》还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是一种博大宽厚的表现，体现为宽以待人、和谐共处、包容万物、海纳百川。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一直彰显着“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在其鼓舞下，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民开启了新时期，进入了新世纪，站上了新起点，迈入了新时代。40多年的艰苦奋斗，使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政党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①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发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不断乘风破浪，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使中国道路行稳致远。

第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是中国古人治国理政的智慧。将“安不忘危”的意识由个人上升到国家治理，认为身家性命和江山社稷得以保全和持续的关键在于时时刻刻保持头脑清醒，不能有高枕无忧之思，不能有安逸享乐之举。“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②历史上，凡是安不忘危和夙兴夜寐的明君，国家都能兴盛；凡是贪图享乐和骄奢淫逸的昏君，国家最终灭亡。中国共产党深知“居安思危”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前夕，就告诫全党要提防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邓小平也一直强调，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一定不能掉以轻心。进入新时代，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以全球化视野来看，机会与风险挑战并存，中国虽前景光明但也是面临众多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前景光明，越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全面认识和有力应对一些重大风险挑战。”^③百余年党史深刻表明，忧患意识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丰富的历史经验，我们是从忧患中诞生、从忧患中成长的

①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页。

② （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97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17页。

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更是赋予其时代新义,只有务本务实、把握全局、坚持底线思维,不断增强驾驭风险和挑战的本领,才能在中国道路上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二、现实要求:应对和消除道路自信的文化垢症

道路自信,顾名思义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探索并选择的道路的认同和坚守。从广义看,道路自信包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革命道路、改造道路和建设道路的自信;从狭义看,道路自信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本文的道路自信是指狭义上的道路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觉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在提升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中国道路自信。但是,在“两个大局”交互作用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道路自信也遭受着各种不良文化的冲击,需要进一步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予以应对和消除。

(一) 应对和消除文化复古主义的现实要求

文化复古主义就是文化复古势力极力推崇的复古思潮和运动。文化复古主义的流行并不是简单的思想形态,而是带有很强政治目的的社会运动。文化复古主义从近代以来就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目前文化复古主义也成为阻碍中国道路不断前行的思想病垢。倡导这种思潮的人主张尊孔复儒,认为儒学是匡时济世之学,不仅主张“儒化”当代中国,而且主张“儒化”当代世界;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处于所有文化的前列,对于中国及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人类文化的危机只能靠中国的传统文化”^①。这种极力推崇儒家思想的文化复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东方文化中心主义,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大势不符,与中国道路的文化精神不符。时下的国学热中,文化复古主义思潮有抬头的迹象。

从外在表现看,就是“尊孔读经”。封建社会的“尊孔读经”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手段,当然是要反对的。近代以来,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借“尊孔读经”对抗马克思主义,拒斥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属于道统层面的文化复古主义,同样是需要反对的,因为它主张一切向后看,将中国文化与人类文明发展割裂开来,无法更好地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尊孔读经”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应当受到应有的尊重,经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应该予以认真阅读。问题是“尊孔读经”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什么。那种以古为出发点,认为今不如古、一切向后看的文化复古式做法是不合时宜

^① 韩蕊:《浅谈复古主义思潮对当代社会的危害》,《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的，是历史的倒退，必须止步。以今作为立足点，努力做到古为今用，一切向前看，这种文化创新的态度是需要大力提倡的。可见，彻底划清文化复古和文化创新的界限，对于克服文化复古思潮对道路自信的影响至关重要。我们要高度警惕复古式“尊孔读经”的沉渣泛起，给中国道路的正常前行制造新的障碍。

从内在表现看，就是儒家马克思主义。儒家马克思主义就是把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并列起来，甚至用儒家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这属于政统层面的文化复古主义。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是主流意识形态，但是近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形态的变化，儒家思想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基础不复存在，其退场是历史的必然，因此用儒家思想代替马克思主义是痴人说梦。儒家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以儒反马”，诬称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异族文化”，造成了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和民族精神根基的缺失”，使中国失去安身立命之本，精神彻底丧失，誓要“儒化”当代中国，这是彻底的政治复古主义；有“以儒化马”，虽然表面并不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强调用儒家思想化马克思主义，最终必然走上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有“崇儒淡马”，即把孔子和马克思截然对立起来。^① 这些表现形式虽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政治复古主义，都会对中国道路自信产生方向性的不良影响。

总之，无论是道统层面还是政统层面的复古主义，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经济政治发展等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都会弱化我们对中国道路的自信。各种复古主义想通过重建一个所谓的“儒家中国”来满足社会需求和解决社会矛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升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作用，但由于没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积极的扬弃，反而声称马克思主义是具有破坏性的革命学说，实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思潮。因此，抵制文化复古主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不仅是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关键，而且也是提升道路自信的前提。

（二）应对和消除文化虚无主义的现实要求

近代以来，文化虚无主义一直不绝于耳。进入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在全球化不断发展和信息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以更加隐秘和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各种形式的文化虚无主义充斥整个社会，企图通过娱乐、庸俗的方式扭曲人民的价值判断，阻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干扰中国道路的正常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② 当前，文化虚无主义不仅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① 参见梅荣政：《对当前几种错误观点的评析》，《红旗文稿》2015年第13期。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9页。

“大传统”进行虚无，而且体现在对革命文化的“小传统”进行虚无。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虚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属于“大传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价值动力。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是在不忘本来中开辟未来，在善于继承中更好创新。但是，文化虚无主义把未来与本来、创新与继承割裂开来，经常发表带有明显偏见的极端论断，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否定，导致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断裂。新文化运动后期出现“打倒孔家店”的极端运动，片面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予以打倒；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西化论”极力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当前，文化虚无主义形式上表现为片面地夸大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借以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在实质上表现为否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性，甚至否定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脉络，认为它是一种非历史性的存在或者是一种异己的存在，将其排除在人类文明进程之外或作为西方文化的附庸。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虚无切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使中华民族丢掉“根”与“魂”，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对革命文化的虚无。革命文化属于“小传统”，是中国革命事业的精神遗产和宝贵财富，是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巨大精神宝库，也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当前，一些文化虚无主义者以“评价多元化”为名，以寻找“历史真相”为幌子，以所谓的“细节性史料”为依据，刻意抹黑英雄人物，造成诸多不良影响。比如，有人说“狼牙山五壮士”是逃兵，火烧邱少云违背人体生理学，黄继光是摔倒凑巧堵的枪眼，董存瑞炸药包被人贴了双面胶，等等。这些言论反映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通过把革命历史“碎片化”和“娱乐化”，进而歪曲革命历史、消解革命经典、解构革命文化，最终到达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共谋，公然挑战全社会道德底线和中华民族的底线，其危害不可小觑。

总之，和文化复古主义一样，文化虚无主义夸大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目的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根基”^①，不仅歪曲中华传统文化，也阻碍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更给中国道路自信带来严重影响。因此，如何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抵制文化虚无主义，就成为提升道路自信面临的突出问题。

（三）应对和消除文化主体性迷失的现实要求

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是任何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回

^① 王勇、许静波：《新时代反对文化虚无主义的“理”与“路”》，《思想教育研究》2019年第12期。

答的重大问题。无论是文化复古主义还是文化虚无主义,在处理这个关系时都走向上极端化的道路,造成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最终难免导致文化主体性的迷失。文化主体性的迷失是当下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其对道路自信会产生实质性影响。当前,文化主体性迷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市场经济建设中文化主体性迷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经济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超越了自然经济和传统的计划经济,而且超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没有彻底摆脱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但是又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有利于个人独立人格的形成和创造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培养人们的民主、法制、公平、平等、竞争观念,同时也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弘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也有负面影响。比如市场经济容易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等不良思想,甚至产生崇洋媚外的文化心理,最终导致民族文化主体性迷失。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中国道路前进过程中,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必须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最大努力把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小。

二是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主体性迷失。当今时代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处于数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两个大局”的交互作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国际条件。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必然促进文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给我们文化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和资源,同时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搞文化霸权主义,对我国进行“普世价值”的渗透,影响甚至威胁我国文化安全和文化主权,同时极大地侵蚀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使一些人丧失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当前,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一切向西看,这更加快了我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丧失。这也是一个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我们必须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找回民族文化的自我,以有效应对西方文化对我国的“和平演变”和渗透。

总之,凡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一个民族和国家失去了文化的自我意识,谈不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谈不上对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当前,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到底能够给世界提供什么?这是我们必须予以回答的现实问题。毫无疑问,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那些跨越时空的具有永恒魅力的东西奉献给世界,这是我们以文化自信提升道路自信的实质性问题。

三、实践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道路自信的多维向度

文化关乎民族命脉，道路关乎国运兴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和魂，是中国道路持久前行的文化根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道路自信，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理性对待传统文化，贯彻“双创”发展战略，秉持开放包容理念。

（一）理性对待传统文化，夯实道路自信的文化基础

理性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既要反对文化复古主义，又要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做到古为今用和推陈出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就是对待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理性态度，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民族文化的过去，而且要知道我们民族文化的现在和未来；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民族文化的优势，而且要知道我们民族文化的劣势。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更应该像毛泽东指出的要古为今用，今天的“用”主要就是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于中国道路的发展，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道路自信，说到底就是一种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①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道路自信，根本在于提升文化自信和增强文化自觉，没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道路自信就缺少灵魂支撑，民族复兴就缺少精神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道路自信、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就是教训，各种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无法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除了没有正确革命纲领和没有认识到正确的革命阶级外，就是摒弃了中华民族千年来形成的文化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更是实现革命胜利的精神力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中国共产党不断保持自身文化生命力，不断从中华文化宝库中汲取能量，实现了革命的胜利，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符合国情、民情、世情的康庄大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有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②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滋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是培育文化自信的宝库。文化

^①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98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9页。

自信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滋养下与道路自信休戚与共，成为应对与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各种思想与文化问题的尖刀，成为提升道路自信不可缺少的原生因子。

（二）贯彻“双创”发展战略，增强道路自信的文化动力

民族复兴离不开文化复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推动中国道路不断向前，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这就需要将中国传统文化变为能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相契合的当代的中国文化。而达到这一要求必须与时代需求并行，与自身发展需要相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母体，源失河枯。“一种文化的活力不是抛弃传统，而是在何种程度上吸收传统，再铸传统。当然，传统的惯性也可能变成阻碍历史前进的重负，问题在于要正确对待传统。”^① 因此，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从实践和时代要求出发，在继承中发展，同时更要在发展中继承，建立与我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即“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②。创新性发展即“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③。二者虽侧重点不同，但又相互影响、相互贯通。前者强调用现代形式与手段来继承和发展文化，后者则注重在前者基础上，在现实需求上加以补充、拓展和完善，但不管是创造性转化还是创新性发展，其最终目的都是为坚定道路自信提供文化力量和文化资源。而且，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道路自信，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迸发强大的现代活力，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坚定理想信念和砥砺奋进的精神动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发展与完善的精神支柱，必然要通过贯彻“双创”发展战略，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使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丰富、充实和发展。同时，通过贯彻“双创”发展战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在提升道路自信的过程中表现文化气力和文化底色，彰显文化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

^①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3页。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3页。

（三）秉持开放包容理念，扩大道路自信的文化空间

优秀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既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学习和借鉴不同国家和民族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这样才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就国内来看，当前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指导下，辩证地吸纳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实现三种文化资源的有机结合，而不是相互割裂或者是相互对立，因为那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延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国由大国发展为强国是历史的必然，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大国必须有大国形象，强国必须有强国的胸怀。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进行文明交流、文明互鉴，希望通过交流互鉴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文明，为人类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华文明绵延千年，不仅要薪火相传，更要与时俱进，引领世界发展。“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① 这条道路是开放的道路、发展的道路、互利共赢的道路。“义利相兼，以义为先。”中华民族历来讲义，提升道路自信关键也在于义。而义的体现就在于秉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兼收并蓄”的理念，同世界各国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共解世界难题，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强调民族性并不是鼓吹自身排斥其他国家的文明，而是要在比较中、批判中、交流中，使民族性能够不断同时代发展并行，在与时代的变奏中唱出时代的最强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更是全人类的宝贵遗产。古老的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必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② 因此，既要立足当代，背靠传统，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同时尊重世界各国文明，在不断学习中获得更大进步。总之，只有尊重文化多样性，只有与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交流借鉴，中国道路才能走得更加坚定，世界才能可持续发展和丰富多彩，人类文明才能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56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58页。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Improving Path Confidence by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Zhang Xingyi Su Xinghong

Abstract: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enhancing road self-confidence, and it also carries the mission of the times to enhance road self-confidence. At present,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full of various cultural diseases, and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 spiritual sword to overcome them. To enhance road self-confidence with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we must treat traditional culture rationally and consolidate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road self-confidence; implement the “doubl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power of road self-confidence; uphold the concept of openness and tolerance, and expand the cultural space of road self-confidence.

Keywords: Chinese Natio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Path Confidence; Intrinsic Mechanism

[责任编辑: 闫惠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百年历程与展望^{*}

王延隆 钱国玲^{**}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坚持把为人民群众谋福祉作为奋斗目标，不断探索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途径，为人类文化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中医药文化发展的脉络可以通过党的全国性卫生大会和中医药大会展现出来。新中国成立前党的代表大会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医药相关大会，大体立足国家资源、政党价值观和人民诉求这三重关系，相继发布了一系列决策文件，推动中医药文化走过了以1921年、1949年、1978年、2009年为节点的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文化建设发展之路凸显了党执政为民和中医药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价值内核的内在统一，对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辩证规律的遵循，并提供了中医药文化“走出去”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中医药政策；决策文件；文化传承和创新

中医药文化是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制度的重要精神内核。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科学看待中医药文化在宣传健康理念、维护人民健康方面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重视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因时制宜的中医药政策给人民健康与文化带来了很大帮助。中医药事业发展从举步维艰到逐步发展壮大是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本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重要文献以及全国性卫生大会、中医药大会进行文本分析，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发展变化，将中医药文化政策的发展和演变划分不同的阶段，一是选取13份国家层面的中医药政策性文件，二是选取新中国成立至今的10次全国层面

^{*} 本文系2019—2020年度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浙江实践”研究成果、浙江中医药大学科研基金项目“基于健康中国战略的新时代健康伦理学研究”（编号：2020SR05）研究成果。

^{**} 王延隆，浙江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钱国玲，浙江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的医学大会,体现我国中医药政策的演变以及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方向。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尚未在全国执政,较少举行卫生工作会议和中医药大会,故以中医药相关领域的党的重要文献作为研究对象,更深入地理解我国的中医药发展道路。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百年历程

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事业的精神内核,其变迁与社会主义文化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关于中医药文化所经历的阶段,不同学者按照不同标准进行划分。鲁琴等从历史时间角度,将中医药文化划分为初步建立阶段、发展阶段和迈向成熟阶段。^①张海波等从中观视角,将其划分为资产化发展(1978年至21世纪初)、情景化发展(21世纪初至中共十八大)和生态化发展(中共十八大至今)三个阶段。^②黄建银从空间角度,划分为中国的中医药、亚洲的中医药和世界的中医药三个阶段。^③学者们对中医药文化发展的阶段划分标准因人而异,尚未有学者从百年历史跨度进行研究,1921~1949年,党领导根据地人民注重发挥中医药在医疗卫生实践中的作用,对完善医疗卫生模式和中医药文化传播进行诸多有益探索,为党执政后中医药文化的推广、传承和创新奠定实践基础。本文通过把握中医药文化相关政策的改革走向和关键事件节点,以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和新医改等历史节点,将党的中医药文化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一) 实践探索, 自强发展(1921~1949年)

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医药文化建设历经艰苦的发轫时期。这一时期以苏维埃时期和延安时期实践探索中的中医医疗行为为文化载体延续文化传承,为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以后促进中医药文化建设奠定基础。20世纪20~30年代,我国中医药发展举步维艰。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④禁止中医中药开业,打压中医药事业,同时也坚定了中医药界保护中医传统文化的决心。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极为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健康展开斗争。通过发动群众共同开展以中医“未病先防”文化理念下的预防为主的卫生运动是党早期卫生工

① 参见鲁琴等:《后疫情时代中医药文化自信的路径研究》,《时珍国医国药》2021年第2期。

② 参见张海波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医药文化发展的演进与特点探析》,《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20年第4期。

③ 参见黄建银:《走向世界的挑战》,《中国医药报》2014年11月8日。

④ 参见左玉河:《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作的重要手段。土地革命时期,党特别重视军队医疗卫生工作,把建设“红军医院”作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事项来抓。为应对部队疟疾、痢疾流行和医治伤兵,小井医务所、茅坪医务所等红军医疗机构主要采用中医药治疗伤员。1929年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提出,党要重视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征调招募中医医药医务人员,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群众路线。^①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解放区以及边远山区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发挥中医药的治病救人作用,服务于革命需要。在苏区医药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及时指导医院“用中西两法治疗”^②,将中医中药重视起来。此后,中医药资源在治病救人中的作用逐渐受到苏区政府的关注,苏区政府采用中医中药防疫,扶持、保护、发展中医药事业。在红军应对国民党的反“围剿”斗争中,为缓解药品供应紧张问题,江西瑞金朱坊村成立了第一所军医学校,发动学生采集中草药制备中成药,提倡用中草药替代西药。^③根据地政府重视推进卫生组织建设,先后在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成立以中医、中药为主的医疗机构和卫生组织。同时,根据地还举办中医训练班,中医医院以师徒相授的方式培养党的卫生事业急需的中医人才。^④中医中药的推广应用,由最初作为军队的应急措施,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自主选择并行之有效的卫生工作方针,有效地破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成立之初极度缺医少药的难题。

毛泽东同志指出:“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二者又各有所偏。”^⑤“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这两种医生都要合作。”^⑥革命战争年代,面对缺医少药的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主张通过挖掘中医药资源的潜力,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满足工农群众医疗卫生需求,中医药发展处于调整恢复阶段。抗日战争时期,通过成立乡镇集市与组织医药卫生合作社,将中医药资源与救死扶伤紧密结合起来,以一个村、乡的范例推动全局发展。在正确的医疗卫生方针的指引下,党领导的根据地的医疗卫生水平有所改善。革命战争年代,党通过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有效抗击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其中以东北解放区用中医药抗击疫情最为典型。

民国时期,中医药面临生存危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作为,自强进取,

① 参见刘雪松、高莹光:《〈古田会议决议〉中医疗卫生论述的历史考察》,《党史文汇》2020年第6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③ 参见《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编:《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1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④ 参见林国标:《毛泽东的中西文化比较及其抉择》,《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年第4期。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97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把中医药作为防疾病的中坚力量，不仅解决了根据地人民缺医少药的问题，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保留了行为载体。

（二）事业奠基，曲折前行（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中医药建设百废待兴，医疗卫生事业从业人员以西医为主，中医数量较少。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平均寿命仅有35岁，新生儿死亡率高达20%^①，急慢性传染病、鼠疫和天花等疾病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亟须探索筹建整体的医疗卫生政策体系。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团结新老中西各方的医药卫生人员”，凝聚中医药文化建设的人才力量。会议确定了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②在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中，党新增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方针，为新中国卫生工作开展和中医药事业发展确立了指导方针。

在党中央的重视和推动下，全国各地开始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新中国卫生部于1949年成立，下设医政司、医政处和中医科。国家建立职能部门，专司中医药发展，明确中医药政策法规。1954年，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医问题……是文化遗产问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③要推动中医药这一中国传统文化重要载体传承发展，以其实用性、科学价值在健康维护和文化涵养的双重维度造福人民。1957年，国家深入推进中西医结合，卫生部取消中医司，成立中西医结合办公室，以西方近代科学探究中医内在规律，发展中国新医学。1965年，党和政府抓住农村这一中医药发展的薄弱环节，“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④。在中医药文化普及发展过程中，我国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在劳保医疗、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制度实践中发挥了历史性作用，该时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发展初级卫生的制度——赤脚医生制度。赤脚医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利用中医药治病救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被世界卫生组织作为落后地区发展医疗卫生的成功典范获得了肯定。

1949～1965年，中国中医药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肯定中医中药的应用价值，保护和促进中医药的发展；坚持“中西医结合”方针不变；加强中医中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团结中西医”以来，政策虽在落实上多有反复，但党对传统中医药传承的理念没有

① 《70年来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77岁》，2019年9月26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9/09-26/8966320.shtml>。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183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页。

④ 姚力：《“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六·二六”指示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变化。1954年,毛泽东同志强调要重视和发展中医事业,指出:“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① 新中国新设中医药科研院系、中医研究院及中医医院等一系列专职机构,改变了中医以前无地位、无科研、无系统的境地。加大中医药教育投入力度,新建中医药类高校和中医进修学校。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中医医院已达到330所,病床数量累计为14200张,高等中医院校23所,学生10000余人。^② 1956年,卫生部宣布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废止《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开始大力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为下一时期中医药政策的出台提供制度保证。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医要“走出去”,指出“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③,对中医药文化振兴和国际传播提出具体的工作要求。

1966~1976年,中医药文化传承遭受巨大灾难。其被贴上“旧文化”的标签,划归应受革除之列。这一时期众多中医药古籍典藏被毁,中医药事业发展陷入萎缩。1978年,卫生部调查发现,1959年到1977年间中医工作人员数量减少了1/3,从361000人下降到240000人,而西医工作人员数量却翻了一番多,从234000上升到738000人。^④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中医药资源回流至农村,客观上充实了农村的医疗保健资源。农村的西医资源少,主要依靠中医、土方治病。中医师和中医资源的大量流入,使城乡间卫生资源的不平衡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⑤

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推行“中医科学化”^⑥,其结果是中医边缘化。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及时纠正,出台了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的政策。这一时期,中医药文化建设虽遇曲折,但也为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改革探索, 制度保障 (1978~2009年)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对我国中医药文化建设造成巨大冲击。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使“否定传统、呼唤西化”一度形成较大影响。但此浪潮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归,帮助中医药文化在“肯定传统、再造传统”的呼声中继续探索前行。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页。

② 参见朱建平:《中国医学史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页。

④ 参见孟庆云:《中国中医药发展五十年(1949—1999)》,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4页。

⑤ 参见[美]吴章、玛丽·布朗·布洛克编:《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在二十世纪的变迁》,蒋育红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57页。

⑥ 宫正:《新中国中医方针政策的历史考察》,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41~42页。

后，相继推开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促使中医药领域也进行市场化改革摸索，以一系列文化产出满足人民基础文化需求。邓小平提出“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医药文化传承获得较快发展。1982年宪法新增“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条款，从国家根本大法的高度为接下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医药文化的稳定有序发展扫清了制度障碍。1985年《药品管理法》规定国家要同时发展现代药和传统药，加强对传统药的传承和保护。1988年，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中医药的生产经营职能从国家医药管理局分离出来，专司中医药管理，自此传统医药发展筑牢制度和人财物保障的四大支柱。

面对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医药事业，西医以对病症讲究精准的学理和临床用药效果立竿见影而迅速走俏的局面，中医因缺乏人体数据日益边缘化，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面临严重危机。^②1980年，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提出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这三支力量要共同发展，推进中医药现代化。^③1985年，党中央发布《关于卫生工作的决定》，“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④1996年，江泽民同志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发展中医药”，“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实现中医药现代化”。^⑤党和国家逐步理顺中西医关系，推进中医药文化在中西医并重的格局下进行有效管理和转化。2005年，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首次明确中医文化的初步定义，即中医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⑥。2009年，中医文化学被列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古籍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等科研、文化研究机构的成立和《中国中医药报》和《中医系统论》等期刊、论著的创办与出版，以联合广大中医药研究者共同表述的显性化途径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探索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文化产出途径。

在这一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国于思想文化领域持续推进科学现代化的文化战略布局，提供制度保障，激发文化产出活力。但革新之下，现代化进程中技术推崇和市场经济逐利机制的双重冲击，使激发中医文化创新、凝聚人民文化诉求和促进中医药文化资产化产出等问题成为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核心目标。同时，这也带来中医药文化创造商业化、中医药文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页。

② 参见欧阳雪梅：《中国共产党与中医药的百年传承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

③ 参见《廖沫沙杂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94页。

④ 新华月报编：《新中国70年大事记（1949.10.1—2019.10.1）》（上），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33页。

⑤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2页。

⑥ 文哲：《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纪要》，《医古文知识》2005年第4期。

化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体现了我国中医药文化发展尚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意味着中医药文化须回到公益性轨道,坚持中西医并重战略,继承发展中医药文化理念,逐步探索推进中医药现代化进程。

(四) 全面发展,走向世界(2009年至今)

中医药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文化自觉和自信,破除既往西医身体观哲学本体论下“以西律中”的标准规范全面发展。在中西医并重的发展格局中,以中医原创思维为整体框架、西医精细化医学模式为补充和资源产业多业态融合发展为特征的文化建设新途径迈向世界舞台。“十一五”期间,中医药文化建设被首次纳入中医药重点工作任务。200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这是中医药文化发展的新历史节点。2013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强调“把中医药工作放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事业大局中谋划、贯彻和落实”^①。可见,党和国家将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的文化资源纳入国家战略,以系统的政策设计和规划联动人事物等要素,对中医药文化、医疗、产业、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在新格局下的全面发展做出系列部署。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②的指示,我国把中医药文化作为落实“四个自信”的载体,充分挖掘其资源、文化优势,推动其融入“一带一路”,积极“走出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健康中国”战略,并于2016年制定《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提出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系构建,要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③将中医药“三分治、七分防”“治未病”等文化理念融入“健康中国”战略。《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首次提出培育发展中医药文化和健康旅游产业。由此,2017年举办首届中医药文化大会,提出建设“中医药文化与产业共同体”,以大健康产业为依托,促进产学研融合视域下中医药文旅产业的新发展。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出台,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在法律层面对中医药及其重要地位、发展方针进行了明确”^④,为充分促进中医药文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同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

①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工作动态》,2018年3月25日, <http://hgs.satcm.gov.cn/gongzuodongtai/2018-03-25/5430.html>。

② 《习近平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贺信》,《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3日。

③ 桑滨生:《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解读》,《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6年第7期。

④ 王晨:《推动中医药法贯彻实施 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7月31日。

议首次提出把“中医药文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的全国中医药大会强调科学技术在中医药文化创新中的重要性,扩大中医药社会资本及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实现中医药传承创新体系的协调发展。国家聚焦中医优势病种、特色疗法,结合精细化医学模式守正创新。2020年,国家对43项“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立项投入经费4.27亿元。^①2021年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中部署全面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以常态化疫情防控为重点,建立大规模高水平的中医药服务体系。^②新冠肺炎疫情考验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体制,中医药运用于重症与危重症治疗,取得明显疗效。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将中医作为治疗方案之一。研究表明:“共收治新冠肺炎患者564例,实现零死亡、零转重、零复阳、零回头、零感染(包括医护人员、后勤安保人员)、零投诉。”^③倒逼我国医疗应急体系改革,培养中医药医疗卫生人员参与到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之中,强化其参与重大传染病防控理论技术方法和相关现代医学技术的培训,构建中医新型公共卫生急救治,并借由我国中医药文化疗效的彰显,为国际社会感知中国形象、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提供重要窗口。

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推进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紧密结合。这一时期,物质消费水平和文化水平的稳步提升使人民对中医药文化的需求显著增加,但中医药文化创新模式仍有欠缺。我国致力于解决民众中医药文化需求日益增长与中医药文化服务应用和创新不足之间的矛盾,开启中医药文化建设新征程,基本建成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核,中医原创思维下“取象运数,形神一体,气一元论”的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为主要理念的多途径、多层次、多形式的文化建设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促进中西医结合,中医药在海外发展”指示的落实中,要循序渐进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不断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以伦敦第一家海外中医孔子学院的成立、首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的建设和“中医药+”跨界融合体系的打造等为抓手,推动中医药文化全面融入世界。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实践特征

纵观中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之路,在初创、改革、完善的各个历史时

^① 《2019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立项43》,2021年2月5日,2020年2月24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2/24/c_1125618716.htm。

^② 《2021年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在京召开》,2021年2月5日, <http://www.nhc.gov.cn/xcs/yqfkdt/202102/e2cfa0c84ede4b7ead2495a747b5094e.shtml>。

^③ 史锁芳、刘清泉:《从“江夏方舱中医模式”探讨中医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中的价值》,《江苏中医药》2020年第4期。

期,可以发现中医药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的命运与党领导下的国家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党对中医药事业的一贯保护政策,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医药风雨飘摇几近被废止的历史命运。^①党领导下的中医药文化建设蓬勃发展,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提高文化素养作出重大贡献。当下,在社会各界大力推动我国传统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要加强我国中医药健康服务、技术创新和国际交流等,更有效地推进我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

一是彰显党执政为民和中医药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价值内核的内在统一。全面振兴中医药已经发展成为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基础工程。中国共产党积极弘扬和践行中医药文化,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和医疗卫生状况下,始终坚持为全体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文化素养提升的奋斗目标,在向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方便价廉、全方位高水平中医药服务的同时传递中医药文化理念。早在1933年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卫生运动纲要》之时,党领导苏区各地方政府和当地人民群众“一齐起来,向着污秽和疾病,向着对于污秽和疾病的顽固守旧迷信遏逸的思想习惯做顽强的坚决的斗争”^②,通过中医药医疗服务改善生活环境,减少疾病发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重视中医药资源的保护利用,号召苏区人民群众利用好、发展好中医药,让中医药切实为老百姓健康服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与长期以来危及群众健康生命的疾病作斗争,并在历史上第一次彻底消灭了疟疾、天花、肺结核等恶性传染性疾病,为群众健康生活织起防护网。为了更好地盘活医疗资源,党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发展中医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这些举措使人均寿命得以延长,生活也得到很大改善。在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党和政府更加注重中医药发展的顶层设计,遵循全面协调发展规律,根据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地域的不同中医药文化需求,充分把握整体性,从知病防病到治病养生,构建完善的中医药文化建设体系,打造人类健康共同体,为全世界提供中医药的健康治理方案。

二是体现对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辩证规律的遵循。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统一调配社会医疗资源,化解我国以温饱需求为主的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还是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阶段引进社会力量和国内外企业投资,最大限度地盘活文化资金和资源促进文化产出,总体而言,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发展历程

^① 参见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90页。

^②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中国共产党防治重大疫病的历史与经验》,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8页。

与对中西医内在关系认知的转变、传统文化批判和肯定观念的激越相互交织。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现实考虑,发展中医药文化走“双创”道路,在实践中推进由浅入深、由局部至整体的渐进式改革与探索。总体统筹上,从依靠政策调控到全方面系统思考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新时代党和政府从制定政策、资金投入和人才队伍建设多个维度协同推进中医药文化发展。国家层面,召开全国中医药大会,对发展中医药做出总体部署,拟定“十四五”中医药发展专项规划,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制度和行动的协同效应。现代创新层面,基于中医学原创性思维,逐步建立契合时代的新型医学体系和文化内涵。按照“组织标准化培训、建设标准化人才队伍、开展标准化项目立项”等要求,推进中医标准化制定进程,致力于构建符合中医药研发特征的评价审批体系。加大科技创新驱动力度,发挥高校、科研机构在科技驱动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强中医药科研院校与中药企业的产学研融合发展,深入推进中医药发展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经典传承层面,在医学文化教育中构建承古而不泥古的新型中医药师承培训模式,培养具有中医辩证思维和传统文化素养的中医药人才。在融合当下民族复兴历史视域下政治或社会学的同时,巩固中医药文化的中医学根基,进行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文化诠释和解读。

三是提供中医药文化“走出去”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①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2016—2017》显示,中医药文化在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中排名第二。^② 为了让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国家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等文件,将中华医药作为代表性项目重点打造,推动中医药技术、典籍和文化国际传播,发挥其在促进全球健康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同时,“将中医药纳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实施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③。《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显示:中医药传播遍及183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建立的中医药中心已有10个,中医药事业已成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开展人文交流、促进东西方文明互鉴的重要内容。^④ 全球化背景下,中医要实现国际化和快速发展亟待建立自身的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重视中医药经典医籍挖掘,系统性继承历代学术理

① 《中医药文化》编辑部:《习近平同志涉及中医语录选摘》,《中医药文化》2015年第1期。

② 参见秦宇龙、朱璐璐:《中医药成为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元素》,《中国中医药报》2018年1月8日。

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

④ 《我国首次发布中医药发展白皮书〈中国的中医药〉》,《中医杂志》2017年第2期。

论,推进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构建中医新型公共卫生应急救治体系,共建中西医药科技交流与合作平台机制,共享中医药防病治疗成果,推进中医药文化和产业“走出去”。重视中医药产品标准体系建设,支持中医药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定中医药文化发展规划,系统推进中医药文化和产业“走出去”。

三、总结与展望

中医药是中国医疗卫生的特色学科,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我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的百年历程,我国中医药事业是基于国家中医药资源、党的执政理念、国民卫生与健康文化需求三者的三重关系不断发展和演化的。在不同历史阶段,党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而是否将人的健康诉求和精神文明放在决策的中心位置,是检验一国政府优劣的重要标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秉承对人民健康、生命文化的关切,并以此作为社会发展的逻辑起点。科学地对待中医药,在实践中利用、传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在两种医学模式的比较和协同中逐步推进中医药文化发展和现代化转型,并取得显著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通过制定政策、加大资金投入、重视人才队伍建设,通过系统化的改革、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医药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中医药文化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但其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遗产和创新的矛盾在短期内无法迅速解决,广大人民群众中医药权益无法完全得到保障,一些基本的健康、文化需求仍存在缺口。

“十四五”时期,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应根据国家经济发展需要来调整方针政策,深化“双创”仍是中医药文化建设的主攻方向。一百年以来,我国的中医药传承和创新历经内外部的多重考验,经济转轨与中医药体制改革相伴相生。今后经济发展固然是我国的工作重点,但不可忽略公共中医药服务及文化的提供,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同时,补短板、补漏洞,构建强大的中医药体系,始终坚持中医药“双创”,在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的基础上持续涵养中医药精神文化。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将人民放在中心位置,进一步使中医药在我国健康治理和文化提升中发挥更大作用。未来中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应顺应全球化趋势,遵循中医药事业的科学发展规律,积极统筹中医药本土化发展与全球化发展,在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前提下与其他国家共同推进人类健康共同体建设。

The Centennial Course and Prospect of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ng Yanlong Qian Guoling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has adhered to the goal of striving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constantly explored ways to inherit and innovat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human cultural undertaking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development can be shown through the party's National Health Conference and Chinese medicine conference. By combing the decision-making documents of the party's Congress befor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the conference related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ripl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resources, party values and people's demand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with 1921, 1949, 1978 and 2009 as the nodes. The CPC's leadership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highlights the internal unity of the party's governance for the people and the value co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protect people's life and health, follows the dialectical la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nd provides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going ou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olicy; Analysis of Decision Documents;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责任编辑: 吴文新]

文化自信的唯物史观分析：价值、依据与条件^{*}

张永奇^{**}

【摘要】唯物史观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在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对于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深入把握坚定文化自信的内在规律同样离不开唯物史观提供的视角和方法。从唯物史观视域来看，社会发展总是与文化进步紧密相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协同作用。缺乏坚定的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的文化共同体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主要依据。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持续的文化自强行动，以及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的合力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的生成条件。

【关键词】新时代；文化自信；唯物史观

1883年，恩格斯说：“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①十分精辟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唯物史观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对于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文化领域，唯物史观否定了脱离物质生产实践讨论文化的思想误区，为文化发展确

^{*} 本文系西北大学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专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重要论述的唯物史观阐释”（22XNZX002）及西北大学2022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元宇宙背景下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 张永奇，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2页。

立了物质力量，完成了对唯心主义文化观的祛魅。^① 新时代，深化对文化自信的认识，把握坚定文化自信的内在规律离不开唯物史观提供的理论视野和方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② 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文化自信的重视，学术界围绕文化自信展开了广泛研究。通过中国知网（CNKI）文献统计，以“文化自信”为篇名进行检索，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的论文已经多达 980 篇，其中以唯物史观为视角对文化自信进行分析的论文仅有 2 篇。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③ 这对于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从根本上弄清楚文化自信的时代价值、主要依据和生成条件提供了根本遵循。那么，在唯物史观视域中文化自信的价值何以表征？文化自信的依据何以构成？文化自信的生成条件何以确证？回答这些根本性问题，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意义深远。

一、文化自信价值的时代表征

在唯物史观看来，文化根植于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又对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能动的反作用。文化自信正是这种能动的反作用的集中体现，它表达的是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等价值所抱有的肯定性、正向性、积极性的持续心理状态。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提供精神动力，为理论自信提供思想滋养，为制度自信注入价值引导。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内在动力和关键标志。

（一）文化自信的本质规定

说起文化自信，首先需要对文化及其作用有比较准确、完整的认识。那么，当我们谈到文化时，该如何对其定义呢？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人类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绝不是单纯的自然界，而是一个复杂的对象化的文化世界；文化作为人的选择性创造物，集中地体现了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古代汉语中，“文化”意为“人化”。《易·贲卦》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表层意思来

① 参见李国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唯物史观理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 年第 2 期。

② 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人民日报》2020 年 1 月 16 日。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3～44 页。

看,这里的“文”“化”有文治教化之意;从深层意思来看,则有把圣人的精神品质对象化之理。从广义和狭义相统一的角度对文化进行学理分析,或许可以对文化的本质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广义上讲,文化包括一切“人化”的活动及成果,如物质产品、制度架构、伦理道德等。代表性的观点如美国学者怀特所说,文化不应被看作人对生存环境的直接反映或是人类天性的自然表达,相反,“文化是一个绵延不断的过程,是一条事件之流”^①。也就是说,文化是由人类所创造,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代际的传承、种族的蔓延和地区的扩张而形成的一切成果。法国学者阿尔伯特·施韦泽也说,从最为一般的意义上来讲,文化体现着“个人以及集体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②。国内学者则认为,从最根本上讲,文化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所采取的精神与实践活动的的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③。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行为方式和生存方式对象化的结果”,而不是自然意义上的表现和结果。^④狭义上讲,文化则仅仅指“人化”活动及其成果中的精神部分,主要包括价值观念、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⑤概括来说,文化是人们在物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由理论、价值和意义世界等共同构成的观念体系。在此基础上,关于文化可以达成一个“有限共识”即文化是“人化”的精神表征,具有“化人”的重大作用。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共同体。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来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其两个相互促进、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的方面。新时代,注重发挥文化的重大作用,不断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大势所趋、历史所昭和现实所需。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自信呢?对此,近年来学术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有学者认为,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通过对象性的文化认知活动所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心理特征的对自身文化价值和生命力的确信和肯定指向。^⑥有学者认为,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发展脉络、社会功能和时代价值的认知所呈现出来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状态。^⑦也有学者认为,文化自信表达的是人们对“自我文化效能的确认感。”^⑧可见,学者对文化自信的看法不尽相同。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文化自信的本质是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等综合实力的提升,各类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准确理解,形成的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和导向力所持的肯定性态度,从而在与外来文化的比较与选择中产生的对自身文化的情感依托和价值信仰。

① [美] 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曹锦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② [法] 阿尔伯特·施韦泽:《文化哲学》,陈泽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

③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④ 参见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⑤ 参见陈先达:《文化自信——做理想信念坚定的中国人》,吉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⑥ 参见刘林涛:《文化自信的概念、本质特征及其当代价值》,《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4期。

⑦ 参见秦志龙、王岩:《论坚定文化自信的三个基本问题》,《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1期。

⑧ 刘润为:《红色文化与文化自信》,《红旗文稿》2017年第12期。

进一步讲，以国家、民族、政党为文化自信的主体时，文化自信指的是相关文化主体在国家、民族发展的纵横比较中确立起来的对自身文化特质和价值的信心。以个人为文化自信的主体时，文化自信指的是生活于所属国家和民族文化环境中的个人对这种文化的现实价值认同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当然，不论以“谁”为文化自信的主体，文化自信都不是文化与自信的简单拼凑、连接和再造，它所代表的是一个新的独立范畴，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社会发展的自觉的文化心理、坚定的文化理想和正确的文化心态，也就是在把握文化传统、熟知文化精神、明确文化命脉的基础上对自身文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做出的肯定性判断、体认。

（二）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地位

在新时代的话语体系中，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逻辑严密的有机体，并且在其中处于重要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① 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独特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与创新中中华文化赋予人们共同的精神基因、价值认同和理想信念等丰厚滋养密不可分。^② 不论是道路自信还是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首先，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提供精神动力。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列强的频频入侵下，中国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甘屈辱的中国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辛探索，先后尝试过以日本、欧美等发展道路解救中国，但都没有取得彻底成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人民艰苦奋斗，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最终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历史前进的逻辑来看，这一道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体现了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是一条体现中国人民切实利益、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之路。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选择、确证和创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特征和文化理想，彰显了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必然逻辑。从意义的层面来说，道路自信是文化自信的现实根基，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提供精神动力。

其次，文化自信为理论自信提供思想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行动指南及其理论表达的自信。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中，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性、革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

^② 参见曲青山：《关于文化自信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9期。

命性、人民性和开放性,能够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完全正确的。”^①他用“三个完全正确”来说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必然性和合理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深度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其中蕴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对革命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与促进。一言以蔽之,理论自信引领着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又滋养着理论自信。

最后,文化自信为制度自信注入价值支撑。马林诺夫斯基曾说,如果要准确了解处于一定文化中的个体,就必须“列举和分析组成该文化的所有制度”^②。新制度经济学派则认为,在制度创设、运行和变迁中,意识形态等文化元素是优化制度安排最重要的因子。^③这就是说,意识形态处于文化的核心地位,从而给予制度以强有力的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基于其上的其他各方面制度、体制等构成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汲取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经验和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借鉴了人类社会一切先进的制度文明,形成了显著的治理优势、比较优势和创新优势。坚定制度自信,离不开文化自信的价值引导。

(三) 文化自信对民族复兴的价值审视

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特有的观念、态度和行为习惯,渗透在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每个人都因进入一种复杂的文化系统而获得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④,进而文化对生活于其中的民族和个人的价值和行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内在动力和关键指标。

首先,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指出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⑤。这就是说,从特定的意义上

①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15页。

② [英]马林诺夫斯基:《科学的文化理论》,黄建波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③ 参见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讲，一切问题皆由文化问题引起，同时也“由文化问题解决”^①。文化是最为潜在性的问题，它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心灵世界，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思想高度和灵魂追求。一个拥有文化自信的民族，往往在思想上更加深厚，精神上更为丰富，动力上更加充足，更有利于实现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实现。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及建基于此的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体现。^②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除了经济、政治、军事等硬实力的不断增强，还要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互交错、辩证发展的视角来看，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众多新兴国家，虽然在文化传统上形态各异，但是在发展壮大、不断崛起的进程中无一忽视文化的力量。世界文明发展史也表明，各民族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是不同的，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总的来说，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世界文明的中心发生过三次大转移。奴隶制时代，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发展水平最高，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最大；封建时代，中华文明发展水平最高，对世界文明影响最大；资本主义时代，欧美文明发展水平最高，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最大。^③换句话说，农业文明时期，中国文化领先世界数千年。到工业文明时期，英国通过工业革命登上世界巅峰，其文化也空前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领导世界的头号强国，其文化后来居上，逐步形成了文化霸权。由此可见，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总是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变化而变化。传统中国强大的综合实力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而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高峰。

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在探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先后发动了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制度层面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侵略势力和反动统治，但是都没有取得根本性胜利。由此，人们开始在文化层面进行反思，同时文化上的不自信也蔓延开来。从器物不自信到制度不自信再到文化不自信，呈现出由表及里、从外到内的变化过程。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凭借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全体人民的不懈奋斗，中国在经济的发展上迅速崛起，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④，由此逐渐转入了从器物自信到制度自信再到文化自信的正确轨道，验证了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从大历史观的视野来看，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坚定文化自信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其次，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内在动力。文化学者朱谦之在谈到文化的价值

① 钱穆：《钱穆学大义》，（台北）中正书局1981年版，第3页。

② 《习近平总书记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纪实》，《人民日报》2014年3月13日。

③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3页。

④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时提出：“我们坚信文化是民族活动的原动力。”^① 没有中国文化提供的精神动力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历史洪流中，中华文化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促使中华民族克服了重重困难，跨越了无数艰难险阻。在中国居住 28 年之久的意大利人利玛窦感慨地说到，虽然中国文化在 19 世纪中叶受到欧美文明的强力冲击，中华民族也因此面临瓜分豆剖的危难境地，但是最终中国挺过了重重危机，中华文化得以延续。

中华民族在古代达到的文明高峰，在近现代战胜的艰难险阻，在今天创造的辉煌成就，都离不开在中华文化引领和感召下汇聚而形成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国历史是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继承中创新的历史。作为民族精神和智慧集合的文化，为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提供积极的价值引导、向上的精神鼓舞、充足的智力支持和强大的文化定力。

当前，中国正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正处于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最接近的历史时期。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为实现这一目标聚集力量。对此，英国思想家科斯深刻地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在逐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终于走出了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的困境，“开始回归属于她自己的文化根基”^②。文化自信必将为中华民族更健康的生存、更持续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

最后，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关键标志。民族的兴衰存亡决定着文化的前途命运，文化的繁荣兴盛标志着民族的兴旺发达。纵观中华民族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文化的先导力和引领力从未缺失，每一次民族的进步伴随的都是对文化的追索、探求、总结与创新。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风骨在中华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中得以培育和滋养。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曾对亚洲和西方欧美国家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包括文字、绘画、建筑、服饰、饮食、雕刻等在内在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和韩国影响深远。在韩国，儒家思想特别是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对其思想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以致许多韩国人在阅读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等韩国学者的作品时，常常误以为他们是中国人。汉字在春秋战国时期传入日本后，对日语及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至今。^③ 在西方国家，儒家的经典著作如《论语》《大学》等从 17 世纪开始陆续传到欧洲时，引起了笛卡儿、卢梭、伏尔泰、莱布尼茨、孟德斯鸠等许多思想家的强烈关注，并对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赞扬和喜爱。伏尔泰在《论孔子》中写到，与世界上其他立法者相比，孔子宣布了最有用的真理。他认为，孔子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规范体现了真正的、最纯粹的道德。莱布尼茨则认为，中

① 朱谦之：《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218 页。

② 参见 [英] 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63 页。

③ 参见蒙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6 页。

国文化的影响和启蒙对于欧洲人能够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发挥了重要作用。^①除此之外，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西方思想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等文化创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现实来看，在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多样化的多重冲击之下，对自身文化传统生命力的继承与创新也必须借助文化自信来实现。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弗兰西斯·福山三人先后出版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诞生和死亡》《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大力唱衰社会主义，预言共产主义必败的结局。最为典型的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著的《1999：不战而胜》，妄图通过攻心战术从文化上动摇中国，最终搞垮社会主义中国。尼克松所谓的“攻心战术”实质是上一种和平演变的手段，其主要手法就是引导中国社会崇拜西方标准，用西方标准裁判中国，对中国灌输虚无主义，进而动摇中国人民的理想信念，摧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最终达到对中国分化、西化的目的。近年来，西方和平演变的手法更加隐蔽，文化渗透的攻势日渐强烈。在这样一种巨大的文化冲击和压力下，消除这种不确定状态，提升中华文化对内的凝聚力和对外影响力，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自信。

二、文化自信依据的核心构成

习近平总书记创新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系统、辩证、发展的观点，深刻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②这一重大判断深刻地说明了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依据为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的底蕴深厚、内容丰富、结构合理的文化共同体。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根脉

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曾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从公元6世纪到16世纪，在长达十个世纪里，中国政治、社会空前稳定，经济非常发达，文化十分繁荣。在这一千年里，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无可比拟。^③英国学者汤因比也认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唯有中华文化在几千年

^① 参见蒙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

^③ 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页。

的历史发展中从未中断,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攻坚克难奋发向上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人创造了历史文化,而当代文化的创造与创新也必须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资源中寻找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要素。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在文化上实现进步与繁荣都离不开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对此,费孝通先生认为,人类在漫长生存、发展和延续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其中历史和传统就是本民族文化得以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①。也就是说,一种文化生命力的延续、进步和扩充不是抛弃和背离传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吸收、转化和发展传统。对此,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②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优势,留下了许多文化珍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尊重历史,珍视传统。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时期的历史文化,都应当给予总结,批判和承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站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③当然,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不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迷恋和孤芳自赏,而是要更加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智慧和时代价值。

梳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史可以看出,早在2000多年前,中华民族就迎来了文化上的第一个高峰。儒家崇尚仁义,道家顺从自然,法家倡导法治等,诸子百家竞相争鸣,并汇聚融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源头,延续至今。对此,冯友兰先生自豪地说道,与希腊、罗马有古无今、世界列强虽新不古的境况不同,“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④。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化典籍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政治、道德等各方面智慧和丰富的治国理政理念和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具有独特标识的中国智慧、中国理念和中国价值等。“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惠民利民、安民富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一贯的处世之道、鲜明的价值导向、永恒的精神气质和内在的生存理念。^⑤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兼收并蓄、天下大同的大格局、大气象和大胸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⑥,由此聚合起磅礴之力,走自己选择的路,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无比强大的前进

①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6页。

④ 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页。

⑤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9页。

定力。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根脉，为我们在世界文化竞争中站稳脚跟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革命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底色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统一的中国惨遭列强侵略，“一盘散沙之民众”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割据并存的局面使古老的中国日渐丧失民族尊严和文化独立。传统农业文明在腐朽的政治文化的吞噬下难以抵挡西方工业文明与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西方文化的强势侵袭。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伴随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不自信”。究其缘由，是“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①。与西方国家相比，近代中国在工业化、商品经济、民主化和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十分落后。在这样一种处境中，近代中国一方面要解决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解决如何近代化的问题。为此，从义和团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斗争和革命。然而，由于这两个问题相互缠绕、密切相关，再加上时代的局限性和革命领导者的斗争方向、路线和策略的失误，旧民主主义革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人民的悲惨命运和中国文化的被动局面。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并直接促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有了坚强领导核心。通过对近代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思，毛泽东深刻地提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文化领域的目的就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②。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目的不仅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国家，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的国家，而且要把一个文化上愚昧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文化上文明先进的国家。革命文化是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包括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在内的各种精神谱系及蕴含于其中的红色基因。这些宝贵精神汇聚成为追求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强大动力，并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和文化气质提升到新的层次。可以说，革命文化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独特的思想和精神风貌。^③进一步讲，革命文化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实践的思想结晶，彰显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光辉历程和光明前景。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重新恢复了旺盛生命力，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被唤醒。

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文化的兴起，破除了近代以来逐步形成的“西方中心论”的迷信，扫除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卑感，逐步

① 《胡绳全书》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③ 马云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2页。

恢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进入新时代,革命文化充分汲取了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养分,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了新的发展,成为凝聚党和人民、提升文化自信的巨大能量。革命文化具有的非凡凝聚力,能够使中华民族在面对危难时团结一致;革命文化具有的深厚感召力,能够让人民群众在攻坚克难中众志成城;革命文化具有的持续推动力,能让中华儿女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举国同心。正是这种强大的文化能动性,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豪感,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打牢了底色。

(三)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自信的灵魂

先进文化就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反映时代向前潮流、体现社会生产力进步要求、代表最广大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文化。具体来说,先进文化需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先进文化要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保持一致,反映和引领时代发展的方向的趋势;二是先进文化要反映生产力进步的客观要求,它不仅要包含一定社会发展时期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能够有效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创新能力,还要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价值观念;三是先进文化要代表最广大社会成员根本利益,能够提升人的综合素质,进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先进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

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完善中,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思想文化运动,自觉承担起构建先进文化的历史责任。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自身蕴含着巨大的思想伟力和文化动能。正如英国文化学家卡尔兰·道尔所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使现代工人革命运动文明化、理性化、合理化,并与现代技术相互联结和协调,由此成为“人类自由的一个有效的保卫者”^①。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也是对革命文化的继承升华。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自信体现了中国人民顺应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和时代进步潮流,是在对社会主义本质深刻把握的前提下“对中国文化‘先进性’的确认与坚信”^②。可以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文化形态和表征。

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灵魂。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主轴展开。当前,全党全国全社会正在学习与践行进入新时代后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紧密围绕建

^① [英] 卡尔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下册,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51~652页。

^② 曾麒麟:《文化自信的实现路径》,《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4期。

设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最深层精神追求的表达，是新时代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越来越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有力地支撑和促进了全体人民的文化自信。

三、文化自信条件的生成确证

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人们的精神世界是人们的物质世界的直接产物和主观反映。文化的产生和价值离不开一定的经济社会基础，文化自信的产生同样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等综合实力。同时，文化自信的发生，源于人们对自身文化精神、文化传统、文化理想的认知和把握，缺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便无从发生。另外，只有把对自身文化的认知、情感和信念转变为一种持续的文化自强行动，化为现实的文化存在，文化自信才能得以生成。

（一）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

马克思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①也就是说，人们的精神世界是人们的物质世界的直接产物。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同时，人们又受到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制约。推而广之，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活动即精神生产过程同样受同时代该民族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制约和影响。这表明，一个时期在世界上最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必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实力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文化自信建基于经济社会生活，是人们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前景所持有的信心“在精神世界的反映”^②。文化发挥作用不可能脱离作为文化载体的社会整体，文化自信的产生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从历史成败与文化兴衰的内在关联可以看到，20世纪初中国传统的解体首先发生在经济、政治、军事等“硬体”方面，最明显的是废除了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③由此开始，作为文化形态的“软体”也先后经历了“视之不见”“博之不得”直至“死而不亡”的状态。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经济社会的变迁，传统中的一些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伦理操守等又和许多由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价值观念彼此激荡，相互生成，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十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

② 林志友：《坚定中国自信的根源》，《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5期。

③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9页。

重要的脉络。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从盛极一时到跌至谷底再到重新振兴的过程。与此相应,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经历了“逐渐丧失直至跌落到最低点,又从最低点逐渐恢复和提升”^①的过程。二者在发展变化中呈现出的一致性,是二者之间内在关联的必然反映,深刻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说明文化非常重要,但不能陷入文化决定论的陷阱。文化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它是在经济基础上的反作用。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仅仅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经济凋敝、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国防虚弱,是不可能自然地形成文化软实力,更不可能产生文化自信。

从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看,文化自信作为中国道路的重要元素,有其深厚的现实性基础。^②进一步讲,坚定文化自信,需要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教育、哲学、文艺、伦理思想等多领域的展开与合作方可实现。无论是科学文化的发展、教育文化的革新、伦理文化的建设,还是政治文化的创新、艺术文化的繁荣,都需要相应的物质基础。归根结底,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的硬实力构成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基础和动力。只有硬实力与软实力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硬实力对软实力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软实力的提升总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等物质基础为前提。坚定文化自信必须重视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所以我们不仅要知道什么是文化,还要特别强调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③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取得非凡成就,为坚定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基础。2020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沉着应对,积极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有序,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GDP突破100万亿元,“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正所谓“物质的成功带来了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实力”^④。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最坚实的底气。说到底,文化自信是以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为支撑的民族自我意识的回归、确证和自信。

(二) 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

“文化自觉”一词最早是晏阳初在1937年提出来的。晏阳初认为,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由“民族自觉及文化自觉的心理所推迫而出”^⑤。1997年,费

① 林志友:《坚定中国文化自信的根源》,《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5期。

② 参见孙民:《唯物史观视阈中的文化自信探析》,《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2期。

③ 陈先达:《文化自信——做理想信念坚定的中国人》,吉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页。

④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

⑤ [美]赛珍珠:《告语人民》,晏阳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4~65页。

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重点学科汇报会上再次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并对其内涵进行了阐述。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文化自觉主要指的是生活于一定文化中的个人对其文化的发生源头、形成过程、内容特色和发展趋向所具有的“自知之明”的意识和能力。^①“文化自觉”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复旧”“文化还原”，更不是文化上的“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所谓的“自知之明”表现在一个民族处于文化转型期，为了适应新环境、新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和能力。进入新时代，坚持文化自觉最根本的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状进行深刻检省，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气度和视野，对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发展道路保持清醒认识。只有这样，才能为文化自信创造前提。

首先，坚持文化自觉要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文化自觉包括人们对自身文化发展历程的认知与评价、对其现实状况的分析和反思、对其未来趋向的判断与预测，是一种将历史、现实和未来融为一体的总体性的自我认识和行动筹划。^②以此来看，面对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必须更加突出文化的民族主体意识，不断强化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中华民族的创造主体、生命主体和接受主体地位，坚决反对和批判消解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质，照搬照抄西方文化特质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论调。在文化建设中，只有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才能够做到文化自觉，才不致走入绝境，自毁前途。

其次，坚持文化自觉要具有阔达的开放意识。异质文化的存在与竞争是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的内在需要。^③文化自觉是以增强文化转型中的自主能力为核心的思想和行动。没有阔达的开放意识以及相应的文化交流对话难以形成科学、理性、准确的文化认知。^④可见，文化自觉就是在对话交流中实现文化生命力的延绵。事实上，当中国共产党还偏处延安时，毛泽东就以开放的世界眼光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⑤进入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一种经济交往，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时代表达方式。总之，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既要充分体现文化建设中的民族特色，同时又要在批判的基础上积极汲取外来文化中的先进养分。只有这样才不致掉入“只有中国文化能够拯救人类”的话语陷阱，在扩大开放中实现文化自觉。

最后，坚持文化自觉要具有积极的创新意识。列宁曾指出：“应当明确地认

①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② 参见任仲文主编：《文化自觉十八讲》，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页。

③ [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6页。

④ 参见黄晓波：《论文化自信的生成机制》，《科学社会主义》2012年第3期。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①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建设没有经验可循,没有模式可搬。只有靠自身的探索和积极的创新,才能创造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同向、同行、同步的先进文化,进而实现文化自觉。^②立足于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意识与对中西文化传统敏锐的批判意识的积极的文化创造意识是中国文化当代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与思维要素。

(三) 持续的文化自强行动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③在唯物史观看来,只有把对自身文化的信心、信念转变为一种强大的文化行动,转变为实有的文化存在,文化自信才能化为现实的力量。也就是说,“文化自信的实现靠文化自强”^④。文化自强就是一个民族、国家在追求精神上的自我提升过程中不断培育形成强有力的核心价值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的实践过程。文化自强,对内而言,表现为人民群众通过对文化认同达到身份认同,从而将文化转变为自己日用而不觉的生活方式;对外而言,就是当代中国文化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新思路、新选择和新方案,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的过程。通过持续的文化自强行动,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增强文化的创造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形成具有民族特色、比较优势的文化成果是提升文化自信的基石。

首先,文化自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马克思主义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结构和性质。文化自强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源于马克思主义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表示,时至今日,人类社会的进步仍在不断证明马克思所揭示和阐发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性,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必须向马克思求教”^⑤。“四史”进程也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显示出科学性、真理性 and 道义性的永恒价值。意大利前总理马西莫·达莱玛表示,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于全人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更好理解当代世界具有伟大功用。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大卫·哈维也表示,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足以促使我们继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孕育形成、发展、完善过程中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5页。

② 参见李翔海:《提升文化自觉五种意识不可缺》,《前线》2013年第5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④ 杨生平:《文化自信的意义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2016年第6期。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9页。

⑥ 参见《国际社会积极评价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人民日报》2018年5月4日。

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由此与其他各类文化形态区别开来，成为中国人民勇于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文化自信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性质、主体内容，阐明了文化自信的灵魂和原则等重大问题。

其次，文化自信要继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支柱，也是中国文化的鲜明品格和实现文化自信的价值归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① 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文化最核心的基因，维系着民族团结，激励民族振兴。“以天下为己任”“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等爱国意识、忧国情怀和报国志向，时刻鞭策和激励着中华儿女自立自强、百折不挠地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而不懈探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使中华民族在经受各种风险和考验时总能戮同心，上下接力，永续发展，并沉淀为中华民族最质朴、最深沉、最宝贵、最自然的情感。爱国主义历经民族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不断地丰富着精神内涵，彰显着时代价值。在实现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中，弘扬爱国主义就要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思想行动上积极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的价值追求和道德规范。

最后，文化自信要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几千年根脉不断、文明不衰离不开强大的创新能力。《周易》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观念被后世不断阐发为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创新思想。实践证明，一个敢于创新的民族，往往善于反省自身所短，学习他人之长，在广泛吸纳各种文化的优长中实现自身新的发展，同时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如果不重视改革创新，一切从本本出发，党和国家就会没有生机，“就要亡党亡国”^②。新时代，在中国国力日益强盛、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方面的现实境遇下，建设文化强国必须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对内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外积极为推动人类社会更好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综上所述，从唯物史观视域来看，社会发展总是与文化进步紧密相连。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正处于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协同作用，共同支撑。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缺乏坚定的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中华优秀传统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28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3 页。

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的文化共同体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主要依据。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持续的文化自强行动,以及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的合力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的生成条件。

Materialist Analysis on Cultural Confidence: Value, Basis and Condition

Zhang Yongqi

Abstra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a powerful tool to understand and change the worl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ystematically, concretely and historically analyzing China's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ir development laws in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the new era. In the new era, the perspective and methods provid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also inseparable to deeply grasp the internal law of strengthen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ocial development is always closely linked with cultural progress. Building a modern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requires the synergy of strong material and spiritual forces. Without firm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t is impossible to achie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ultural community composed of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is the main basis for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new era. A solid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 a high degre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sustained cultural self-improvement action, as well as the resultant force formed by th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of the three ar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New Era; Cultural Confidenc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责任编辑: 闫惠惠]

1978 ~ 2012 年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突破和坚守 及新时代启示*

李 阎**

【摘 要】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伟大工程，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呈现困境中坚守和突破的复杂情况。在意识形态工作薄弱与体制力量强势并存、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不断较量、文化领域的拜金主义趋势与对真善美膨胀性诉求共存的情况下，党领导的文化建设突破意识形态迷雾，超越文化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对立，突破道德困境，始终高举社会主义文化旗帜，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明确道德和价值的界说，推进文化建设工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1978 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伴随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和巨大发展，文化领域也旧貌换新颜，逐渐焕发生机。不过，与经济建设领域目的明确、成效显著且目的和效果统一的情况相比，文化建设无论是在效果还是在目的方面都呈现为一种复杂的状况。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思想文化上清醒的保留与勇敢的突破并存，其间夹杂懵懂和迷茫。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和侵入，内在文化基因的萌发和成长，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外来资本主义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的较量和抗衡在国家、世界和社会三个层面面临不同向度的困境。只有回顾和反思 1978 ~ 2012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发展向度的纠结和困境，总结和思考改革开放之初三十年文化建设历来的突破和坚守，才能够更全面和深刻领会新时代党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和部署，才能够更明确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新要求并预见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

* 本文系河北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和旅游研究项目“中国共产党英雄观融入新时代榜样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HB21-YB083）阶段性成果。

** 李阎，法学博士，唐山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与实践。

一、国家维度：突破意识形态迷雾，始终坚守社会主义文化立场

文化建设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侧面。文化建设的政治导向、价值取向、道德引领、文化渗透、教化遵循、宗教熏陶等具体内容一定程度上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晴雨表。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建设领域意识形态工作薄弱与体制力量强势并存，文化的“去政治化”倾向明显。1978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一文采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表述，隐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这在当时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文艺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和脸谱化，起到了缓解政治紧张的减压阀作用，一定程度上为文化建设松了绑。同时，这也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疏于防范。于是，在有关“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论战中，在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观念凸显出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冲击。这一时期党在文化建设领域惯于用体制力量掌控意识形态，但是疏于理论斗争。当时，为了避免人们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超越阶段的理解和产生超高标准要求的误解，为了最大多数地团结人民，胡耀邦在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决议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没有使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表述。^① 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指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1年3月和7月连续强调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反对错误思想倾向。他还在1985年、1986年的数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②，“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③。然而，从后来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发展不难看出，其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工作并不得力，意识形态风险一直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逐渐发展并造成恶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工作薄弱状况的形成有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风险控制尚不到位。面对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政治危险性的思想和思潮，党主要利用体制的力量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较少采用理论斗争的方式直面错误思潮，也几乎没有对“人道主义”“异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民主社会主义”论战的情况和结果给出权威结论。这固然有全力以赴进行经济建设的原因，同时也有对理论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不够，以及理论斗争水平不强的原因。疏于理论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较为薄弱，还没有形成具有感召力的特色、风格和气派。

面临改革开放的复杂国内外形势，文化建设领域尽管一度存在上述问题，幸

① 参见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运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关键问题上把握住了事关文化的核心问题，在突破与坚守中积累着文化的经验。首先，在文化建设领域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化大革命”之后，党在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成为社会整体和全局拨乱反正工作的先声。科技、教育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由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开始。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则以明确文艺工作方针为关键。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成为新时期文化工作的基本遵循。对此，邓小平指出，“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①，从而为文艺工作定了社会主义方向的调子。当各种文化流派和思潮蜂拥而入，人们的文化创造激情空前高涨的时候，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面对西方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政治思潮的冲击，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彻底解释，另一方面是对这些思潮的主张、实质、立场和危害等进行明确揭示，让群众在比较中辨别，在辨别中成长，在成长中自觉主动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有人主张单纯文化建设而不提意识形态，或者认为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无关，那么这样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其次，坚定巩固社会主义文化的经济基础。文化建设和发展需要建立在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文化属于精神交往的产物，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然反映着社会的经济、政治，相应地，经济、政治发展是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二者本质上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在社会革命的特殊时期，代表文化的意识形态话语可能暂时处于比较显赫的地位，能够起到教育、号召、指引、鼓动的强有力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从时间上来说则是暂时的，从本质上来说它最终不能脱离背后强大的物质基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②面对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文化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筑牢社会主义文化经济基础和增强国家实力。

二、世界维度：超越文化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对立，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建设纠结于文化现代化与文化“西化”的冲突，受到外来文化深度侵扰。改革开放后，“言必称希腊”一度成为时尚和现代象征，照搬西方的“西化”成为一种时髦。在拒斥“西化”思潮的前提下，如何走出一条妥善处理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的文化现代化之路是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主导世界文化话语权，我们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应用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过程中吸取的文化价值，大量渗透着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诸如经济至上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①渗透到我国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随着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逐步放开，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各种政治思潮趁机而入。诸多政治思潮倾向于围绕改革开放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展开论述，提出不同观点和主张。这些不同政治思潮的观点和主张背后隐藏着不同价值观及政治立场，集中表现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间的对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深陷与此诸多政治思潮的比较和博弈之中。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包的主体性特质渐趋弱化。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对外交往少，相对比较封闭，文化建设只须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即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全球化进程深入，想要在文化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就要积极面对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冲突所带来的问题。党对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推进一直处于多种思潮的冲突和撕裂之中，呈现为保守与激进、中国化和西化以及传统与现代在内的多个向度的碰撞。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一时期，我们自身在思想文化价值观领域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不容小觑。兼容并包原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但这是建立在保留和维护自身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的。改革开放后，伴随与西方文化深度接触，我国文化发展中出现消极倾向：尽管依然重视对各种文化的吸收，但这种吸收却是较为被动的、欠缺批判性的吸收，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出现了消解我国主体价值观念自主成长的情形。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包的主体性特质没有被有效提取，反倒造成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在面临碰撞时回击乏力的局面。

西方文化思潮大肆涌入，接纳什么、警惕什么、吸收什么、抵制什么成为文化建设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党的十六大之后，伴随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党秉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念，在文化发展格局上，不断探索和破除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立，确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立场。将对文化建设的认识提高到文化是社会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明确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开放格局。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坚持学习来自西方的且适用于我国的新观念；二是警惕在国外虽然有积极意义的新观念，但不适合我国国情的文化；三是扬弃那些从根本性质上看属于旧观念但其中包含着某些对我们创立新观念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四是坚决摒弃对我们有害无益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党的十六大关于以文化产业的形式推进文化建设的思路为新世纪新阶段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方向。尤其是对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致力于“中国内涵、国际表达”。2003年，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

^① 裴德海、陈光：《作为一种动力向度的中国文化》，《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①这一重要命题，这也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法。文化产品生产中的智力投入和物质投入所呈现出的社会生产力要素特征被认可。这种认识超越了以往认为文化是经济、政治附属品，至多作为与经济、政治并列且必须排在经济和政治建设之后的一项国家建设内容的观念，转而认识到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

中华文化表达的一个突出表征是不懈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表述最早是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由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出来的。之后，邓小平在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重申这一表述。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方针原则和根本任务。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专门决议，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献，不但揭示了社会主义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特征，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宝库，而且凸显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和作用。20世纪90年代，面对流行文化、奢靡文化、消费主义文化冲击社会主义主导文化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党引领文化前进方向上树立了旗帜。进入21世纪之后，党提出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文化建设上提出“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分离”，是文化建设理论的突破性成就，着力激发文化活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2011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②，宣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些都为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奠定了基础。

三、社会维度：突破道德困境，厘清道德和价值的边界

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冲击社会，影响广泛且隐蔽。文化领域出现了拜金主义趋势与对真善美膨胀性诉求共存的情况。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中国社会普遍聚焦于发展经济，“经济至上”思想渗透至经济、政治、文化各个行业和领域，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只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人文关怀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倾向。在人们的经济视野得到史无前例拓展的同时，强烈想要致富的主观动机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生活所呈现的种种美好场景一度使中国陷入了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7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2页。

展经济的恶性循环，GDP一度成为衡量领导政绩、民众能力、城市发展水平的标准，文化退居次位。这为之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明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民收入增加，人均消费支出增加；二是人们对服务和奢侈品的消费需求增加。^① 历来崇尚节俭的中国人，身处全球化浪潮之中，有一部分人在相当程度上被消费主义裹挟，以致出现“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着实惊艳了世界”的说法。与消费主义紧密联系的是享乐主义。没有足够金钱去消费的状况反倒成为刺激人们主张和追求人生享乐的条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成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面临的困境。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实况比预想的要艰难得多。究其原因，除了文化体制改革既牵涉经济基础又牵涉上层建筑，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经济属性因此比其他领域更复杂也更敏感之外，还有重要的文化体制历史成因问题。遗留的战时体制、计划经济体制、长期受“左”的危害等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因素导致按照计划经济模式组建的国有文化单位尚未有足够的思想建设和能力建设来应对文化体制改革。这时候，一些思想文化价值观已经迫不及待，跃跃欲试。当原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尚未融入体制改革而导致大量资源闲置、缺乏活力的时候，国外一些不良文化产品就打着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旗号大肆进入中国。文化产品与其蕴含的价值观是“体”和“魂”的关系。以瘦肉精、毒奶粉、小悦悦事件等为表征的价值失落和混乱、社会诚信缺失、突破道德底线的典型案例引发了全民讨论。人们不满于道德滑坡，开始反思和重新审视道德建设，以至于追溯到作为“体”的文化产品。

与此同时，文化的精神塑造功能愈发被重视。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② 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自此，提高人的素质逐渐被确认为文化建设的目的和归宿。文化建设也开始由配角变为主角，文化建设快速发展具备了前提。1991年开始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1996年5月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心连心”慰问演出下基层活动，2002年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实施的“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实施的“民族精神史诗工程”，2005年中国文学界联合会推出的“送欢乐下基层”文化惠民活动等，都是力图充分挖掘与发挥文化精神培育与精神塑造功能的行动和努力。从党的十五大开始，由之前的重点强调精神文明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到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突出，文化建设不再被

^① 裴德海、陈光：《作为一种动力向度的中国文化》，《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5页。

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遮蔽,而是以独立的姿态凸显出来。这意味着伴随经济体量不断增大,文化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全局工作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厘清概念层次,将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与道德规范、道德建设区分开来是文化建设深化的关键。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没有特别对道德建设作出说明。改革开放之初,中共中央在指导道德建设过程中实际上是将价值追求内含在道德建设之中,而不特别加以区分,现实中往往出现价值观与道德规范混同的情况。道德规范与价值观本不是平行概念,道德建设的前提和核心是道德观,道德观是价值观的一部分。因此,价值观是比道德观更具前提性、更为基础性的概念。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①的战略任务,初步将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分离,抓住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键和根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了更为明确、完整、稳定的价值体系支撑和价值观导向。

以往我们既有只看文化的思想培育和文化教化功能而忽视其经济效益的一面,也有忽视文化意识形态属性而无限度扩大文化消费经济属性的一面。深度挖掘文化产品属性,将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或者经济属性分离,是我们在文化建设方面努力的一个方向。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清晰判断,强调“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②。这就明确了文化产品既有意识形态属性,也有产业或经济属性。前者要求文化发挥引导社会、教育人民的功能,把文化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后者要求文化产品更好地占领市场,从而更多地占领阵地,要坚持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党在领导文化建设中已经更加明确认识到,在确保文化产品正确价值导向的前提下,经济效益越好,受到这种文化产品影响的人越多,社会效益就越好。按照党的十六大的部署,从2003年7月到2005年12月,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浙江、深圳、沈阳、西安、丽江等9个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地区和35个宣传文化单位进行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这为在全国推进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四、关于 1978 ~ 2012 年文化建设向度的反思与新时代启示

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的发展,矛盾决定了事物发展的属性与特质。文化建设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引发人们的关切和忧虑,成为困扰中国发展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的症结集中在对文化国情的了解。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当意识形态工作薄弱时,体制强制力量发挥较大作用,文化建设的国家向度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60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1页。

明显；当文化建设困顿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纠结时，文化建设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世界向度的特征；当物质至上与道德诉求互动并存时，文化建设的社会向度特征凸显。这一阶段党领导文化建设在困境中突破和坚守的经验和教训今天仍可以起到重要的镜鉴作用。

（一）文化建设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

首先，拒斥西化不代表文化“自闭”，中国共产党秉持“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阐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看法和主张。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文明交流互鉴”，在国际社会正式提出理解人类文明关系的新思路。^①之后，他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讲话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演讲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主旨讲话中，均坦陈文明多样性，应加强交流、学习和借鉴，而要避免隔膜、排斥和取代，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要“和合”“善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其次，在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坚守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的亮点之一是重提“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②。这对被禁止使用达30年的概念如今被重提，在宣传领域实际上打破了30年来人为制造的一个禁区，意义重大，^③无疑具有振聋发聩之功效。中国共产党根基于人民，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性立场，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将“为什么人的问题”真正视为“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④。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坚持党性，就要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⑤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坚持人民性，就要在实际工作中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

最后，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尤其要重视国家最核心利益。当前，国家稳步发展和人民政权巩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最大核心利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和坚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是在诸多国家利益当中最核心的方

①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58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54页。

③ 参见陈力丹：《宣传工作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读习近平总书记8·19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编辑之友》2013年第10期。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54页。

面,无论如何都必须恪守和坚持。简言之,既要反对任何形式的动摇“一个中心”,也要反对任何形式的动摇四项基本原则。做到这一点,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否定传统、全盘西化倾向;另一种是唯传统是从、故步自封倾向。前者完全否定传统文化,这意味着否定了民族价值观和民族精神,人为割断了自己的“根”,势必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后者全盘肯定传统文化,忽视文化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会犯主观主义错误。两种错误倾向都会导致陷入文化安全被威胁的境地。党领导文化建设必须具足底线思维。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日渐趋近,中华民族复兴不是西方文明的复兴,也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更不是对任何一种现成文化的照搬照抄,我们不断涵养并彰显的应该是标志性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使命。

(二) 文化建设中需处理好传统和现代的关系

首先,文化建设中要既恪守又扬弃地对待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脉,根脉不能断,但是它又与可以模仿的器物、制度和行为不同,而只能考虑在历史积淀基础上恪守或者扬弃传统从而实现自身发展。既然文化传统不可丢,就要在扬弃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变革。变革意味着对旧质状态的否定。马克思认为,“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①,否定是一切发展或变革不可或缺的一环。没有否定就没有发展,既否定又发展是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这要求我们在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文化不是形而上学地简单抛弃,而是辩证地扬弃。文化不是一个凝固封闭的系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往往以传统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试图影响人们的生活,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文化始终处于融合、扩散、发展中,既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未来;既具有独立性,又具有共识性。它总是以一种正在进行时方式,时时处处活跃与呈现在可感可触的现实情态中,不断与包括外来文化影响在内的现实生活摩擦、碰撞、融合,并由此渐进性地孕育着一切新文化形态。一切民族文化都是动态性、整体性的存在,往往是在沉积历史底蕴的同时又融进了生机勃勃的时代新貌。

其次,文化创新过程中要处理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文化现代化是在文化传承和创新矛盾运动中实现的。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倡导来看,20世纪80年代学界提出儒学的创造性转化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更大重视。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命题。党的文化建设理念既是前后承继又是与时俱进的。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实现文化现代化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正在致力于区分哪些文化传统必须摒弃、哪些文化传统应该坚守、哪些文化传统需要在扬弃的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9页。

性发展。文化传承要求我们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去创造新文化,使一个民族文化发展在历史的延续中沉淀、积累和传承。文化创新则要求按照一定民族文化内容和结构的既有条件和发展逻辑进行更新。例如为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赋予仁爱和谐、正义奉公、尚礼守法、崇智求真、诚实守信的现代内涵,为“忠”“孝”“廉”“耻”“勇”赋予克己致公、孝亲敬老、正派清白、为人底线、肩挑大义等现代内涵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传承使文化发展呈现出连续性,创新促使文化发展实现飞跃并具有前进的内在活力。

(三) 文化建设领域要有彰显社会主义本色的制度化建设

文化建设的制度化设想和探索自改革开放后就已经启动。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但成效一直不够显著。这是因为,一方面,体制机制障碍的破除不是一朝一夕即可完成的;另一方面,常年远离市场经济的文化单位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能力十分有限。以文化“走出去”为例,由于文化单位是事业单位,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对上级负责是其一贯的价值观念,习惯于伸手向上要钱,而不擅于筹集资金、广告策划、合资合作、收入分成等市场化的方式,总体表现是缺乏主动开拓市场的内生动力和能力。即使用行政权力推动,由于没有体制机制做保障,效果也是暂时的。当务之急,还是要深化文化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在确保我国文化安全和文化产品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有些文化领域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有些文化领域可以采取股份制的方式面向资本市场融资,有些文化领域可以进一步降低门槛容许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文化建设领域的制度化建设要着力实现整合和改进的统一。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既不能消除,也不能无视。我们虽然不能化解矛盾于无形之中,但是我们可以疏解矛盾于无害境地。面对复杂文化现象、领导中国文化和推进文化发展需要战略与策略的组合手段。文化整合是基础,文化改进是方向;在整合中体现改进,在改进中促进整合。

党领导文化建设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文化的疏解作用,使其在促进和谐过程中发挥作用。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是文化制度化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当西方“唱衰中国”、抹黑中国的种种论调变换身形,粉墨登场的时候,我们要善于划清界限和揭露本质,使意识形态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价值观是意识形态外在表现和表达,其导向是文化现代化必经环节。资本主义标榜“个人奋斗梦”,我们倡导“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中国梦;资本主义推崇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我们倡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资本主义奉行“强国必霸”,我们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重要途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在振奋民族精神、提振民族自信、凝聚爱国情怀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这也就意味着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在认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治国理政格局和方略、与时俱进进行道德建设等方面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社会生活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要永葆活力也必须不断探索和实践，最终建立起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又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The Breakthrough and Persist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n the Party's Leadership Culture from 1978 to 2012 and the Enlightenment for the New Era

Li Yan

Abstract: From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is period presents a complex situation of sticking to 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difficulties. At present, the weak ideological work coexists with the strong institutional strength, the continuous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ity and the world of culture, the trend of money worship in the cultural field coexists with the expansionary demands for the truth, the good and the beauty. In this case,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breaks through the ideological fog, transcend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cultural nationality and the world, and breaks through the moral dilemma. Cultur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dhering to the banner of socialist culture, insist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larifying the definition of morality and value, and promoting cultural construction,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ultural Constructio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 鲁法芹]

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马玉婕^{**}

【摘要】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健康党内政治生态、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必然要求。高度重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就要注重发挥党内政治文化塑造与培育党员正确的政治思想，指导与规范党员的政治行为；注重发挥党内政治文化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作用，营造风清气正党内政治生态的基础作用以及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关键作用。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必须遵循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理论指导与实践推进相结合、批判继承与开拓创新相结合、思想教育与制度保障相结合、注重时效与久久为功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努力建设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突出文化兴党、文化强党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党内政治文化；党内政治生活；原则要求；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定推出一系列管党治党的新理念新论断新举措。继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明确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强调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净化政治生态，必须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②积极推进以马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话语演进研究”（项目编号：21YJC710050）；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研究”（2020MYB049）的阶段性成果。

^{**} 马玉婕，法学博士，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81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795页。

克思主义为指导，融合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智慧、革命文化精髓、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核心价值要素的党内政治文化，从理论发展来讲，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科学创造，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中国化表现；从现实实践来讲，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时代要求，是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的关键议题；从未来发展来讲，是完善无产阶级政党治理的有效手段。为此，深刻把握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充分发挥党内政治文化在政党发展中的最持久、最深层、最本质力量，对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推进党的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

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伴随人类社会进步始终，“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①。问题是进行一切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基础，目标为创新理论和实践进步提供明确指引。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②，统筹理论创新和实践进步，因而科学把握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现实问题和基本目标，既是研究、制定与完善各项政策的基础，也是集中主要精力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所在。

首先，党内政治文化是加强党的建设的特殊文化样态。深刻分析政治文化的内部要素，客观把握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深化阐释核心要素形成、演变及其突出功能等，是准确掌握党内政治文化本质内涵的基础，也是今后需要进行重点研究的问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党员是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主要行为主体，党内政治文化是全体党员思想认识、价值理念、情感评价等深度融合的结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极易滋生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行为，“这些潜规则看起来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听起来悖情悖理，却可畅通无阻，成为腐蚀党员和干部、败坏党的风气的沉疴毒瘤”^③。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就要立足于对党内政治生活突出问题的正确判断和本质分析。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是帮助塑造党员正确政治理想的关键之策，必须有力推进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柔性治理，运用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从根源上解决党内政治生活突出问题。

其次，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出了总体要求：“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③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①坚持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不仅要求加强制度建设的硬性治理,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对党员政治行为的强制作用,而且更加要求完善思想建党、发展优秀政治文化的柔性约束,将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和要求贯彻落实到广大党员的思想认识深处,从根本上改变个别党员脱离人民群众、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恶劣现象,彻底扭转党内不正之风。为此,深刻把握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目标的内涵与特点,必须将坚定的目标导向融合在党的建设的各个阶段、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从思想认识和政治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共同推进塑造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各级党组织大力发展体现共产党人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文化,坚决铲除庸俗腐朽政治文化生存的土壤。

最后,坚持效果导向,提升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质量。效果导向重落实、抓实效,实事求是,稳扎稳打朝着既定目标有序推进,旨在实现问题、目标与效果的有机统一。坚持效果导向要求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②。尽管政治文化看不见、摸不着,但政治文化功能作用的发挥可以通过党员和党的组织等体现出来。如果管党治党存在“宽、软、松”的问题,形式主义的沉痾顽疾不能根除,就极易滋生脱离调查研究、弄虚作假、潜规则盛行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坚持效果导向还要善于运用科学方法,评判建设党内政治文化问题把握与目标设定的合理性。摆在第一位的是广大党员是否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站稳党性立场和人民立场。而且,政治性是政党组织的本质属性,党员的政治本领和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是关键内容,要求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做到积极加强党性锻炼,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组织路线,增强政治功能,不断强化政治引领。

二、坚持理论指导与实践推进相结合

党内政治文化是政党理论创新的结果,也是政党实践活动的重要产物。党内政治文化一般通过润物无声、潜移默化方式塑造着每个党员的思想观念,是影响政党发展最深层、最持久、最稳定的因素。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实践活动,必须广泛植根于政党政治实践,根据党的建设要求与时代发展特点,不断推进党内政治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理论指导与实践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8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推进相结合的原则要求。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①，是完善党的思想文化制度的重大创新，是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根本指南，也是指导政党文化建设的基本遵循。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必须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党内政治文化坚持正确方向、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政党理论基础的根本。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向纵深发展，利益诉求多样化、文化多元化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领域。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必须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多元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从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具体实际出发，需要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需要合理借鉴有利于政党发展进步的优秀文化成果，需要明确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

第二，以实践为根本动力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政治建党、理论强党、文化兴党是我们党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根据党的建设实际，依据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发展变化的现实，深刻把握党内政治文化成果转化的方向、内容与路径。一方面，积极推动党内政治文化理论成果转化为制度规范。政治文化作为管党治党的柔性约束，必须融合法规制度的硬性约束，才能更好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为此，要及时推动成熟的政治文化理论成果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党内法规制度，运用党章党规高压线约束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党内政治文化理论成果转化为党员的政治信仰。成熟的党内政治文化理论成果只有被每个党员真正掌握，才能高度凝聚和发挥政治文化的力量。但这个过程不是自发实现的，必须通过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活动将党内政治文化理论成果内化为每个党员的政治信仰。

总之，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直接作用于净化政治生态，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价值追求在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定政治信仰，强化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推进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必须明确推动党内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离不开对其历史演进逻辑的考察，离不开从既有的理论成果和建设实践中把握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规律，离不开探讨每一历史阶段党内政治文化发展的鲜明时代特征、理论支撑、内部运行机制”^②。并且，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然现实与理论要求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对于塑造党员形象、优化政治生态、提升党的文化软实力以及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健康发展的积极影响，但是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83页。

^② 吕薇洲、马玉婕：《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回顾与展望》，《理论视野》2020年第1期。

个别党员和一些党组织中仍然存在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因此,推动党内政治文化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必须坚持以政治文化、政治建设的科学目标为价值引导,充分调动全体党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善于从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的产生源头着手,着力建构有助于坚定政治信仰、加强政治领导、增强政治能力的党内政治文化。

三、坚持批判继承与开放创新相结合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基于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思想文化理念、价值原则规范,伴随着党的成立、发展、壮大,深受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心任务影响,呈现出阶段性、历时性、发展性特点。党内政治文化的接续性发展是一种客观现象,也是其内在要求,是党内政治文化发展内在规律的客观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①进入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遵循批判继承与开放创新相结合的原则要求,遵从发展逻辑、坚持创新要求,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优秀历史文化成果,充分吸收当代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夯实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基石,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守正创新。

首先,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具有丰富的传统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尽管古代中国政治结构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形态,更没有形成政党加强自身建设、领导社会发展的有益经验,但是历代政治清明时期流传至今的政治思想,对发展党内政治文化影响深远。“民贵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天下为主君为客”等朴素的民本思想为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供了关键的启示,努力建设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柔性治理,本质上就是不断完善党的政治领导力,坚守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做人品格,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等,蕴含着加强中国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思想精华。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意义、思想精髓和时代新义,为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资源。

其次,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具有宝贵革命资源。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创造的独特文化样态。它发端于五四运动中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形成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与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页。

伟大斗争，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①，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事业的重要精神遗产，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精神支撑，也是新时代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强大精神动力。革命性是革命文化最为突出的特性，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进行伟大斗争的革命精神。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淬炼逐渐形成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对当代广大党员发挥着铸魂凝魄的积极引领作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时刻牢记党的初心，肩负历史使命，为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民族复兴上下探索。因此，崇高的革命精神是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精神动力，也成为区分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文化的根本所在。

最后，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具有充足时代资源。当代中国在伟大社会革命中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充足的精神滋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不仅认识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重要性，而且明确提出了“文化自信”的概念，并将文化自信视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蓬勃发展和文化自信心态的生成，为广泛吸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提供了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新时代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必须避免两种倾向，即文化复古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一要克服固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拒绝接受新文化和任何外来文化的守旧主义和封闭主义；二要克服一味推崇外来文化，从根本上否定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

四、坚持思想教育与制度保障相结合

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同向发力、协同推进，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新发展，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出的管党治党的重大举措，“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③。推进党内政治文化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时代课题、理论问题和实践议题之一，必须坚持思想教育和制度保障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推进思想教育和制度保障相融合，二者互相补充、互相影响，提升思想教育的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7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③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制度化水平与增强制度文化的教育性功用。为此,不断推进创新理论的学习教育结合制度管党治党的保障机制,善于抓住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核心与关键,破解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难题,督促落实保障党内政治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在创新思想理论教育和强化制度保障相结合的过程中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一) 积极建构创新理论的思想教育氛围, 培育形成常态化思想教育体制机制

“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实践课题, 需要时刻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 充分确保思想教育的精神引领作用。广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准确领悟、深刻理解党的理论成果体系, 既需要持续推进创新理论的学习教育, 也要注重把握理论学习教育活动的表达形式, 以理论学习的主题、内容与形式达到理论说服人的目的。从时间维度来看, 党员的思想教育从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开始到发展为正式党员, 并将持续伴随着做一名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全部过程; 从思想教育的内容来看, 将党的思想建设与党的当前具体情况、党的政治纲领与奋斗目标等紧密结合, 善于运用正确思想方法,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对于各级党组织而言, 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需要深刻把握创新思想教育学习活动形式这一原则性要求, 运用多样化的党内教育传播方式和解读路径以及灵活的可接受途径, 不断提升党员的党性修养, 从而帮助党员坚定党性, 具备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树立在参与党内政治实践中的思想自觉, 着力塑造和形成优秀的党内政治文化。

(二) 强化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保障, 增强制度文化的思想教育功用

在现代政党政治时代, 政党组织的有效运行与有序开展工作离不开成熟的制度保障, 加强制度建设有助于促使党的各项活动有章可循, 更加规范化、制度化、体系化。百余年来, 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党内制度建设、改革与重塑的丰富实践, 逐渐建构起党的法规制度体系, 形成了富有时代特色、民族特色的制度文化。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价值充分展现, 就要立足制度文化的教育功能 and 作用, 将其深度嵌入到党的教育机制之中, 转化为党的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的重要内容, 实现制度文化对党员干部和各级组织的深度塑造。广大党员参与党内政治实践活动, 坚持制度管党治党要求每个党员必须遵守既有规则与准则, 以强制性特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与监督, 实现党的各项制度规范的本质要求, 在党内形成明确的制度规则, 进而成为约束党员和党的组织的基本遵循。党员要树立强化制度观念的思想自觉, 规范自己的所思所言所行, 严格遵守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 进而营造健康向上的党内政治生态, 形成优秀的党内政治文化。

^① 《列宁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53页。

五、坚持注重时效与久久为功相结合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党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方面，是关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维度。新时代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既要从事关时代紧迫性、问题针对性、现实回应性出发，注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时效，也要从全面从严治党根本性、长期性、复杂性、战略性出发，坚持久久为功。更为重要的是，从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丰富实践中，围绕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断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路径、形成新表述，在完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理论的同时有效增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力度。

（一）科学把握建设党内政治文化面临的时代紧迫性问题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是纯粹理论思辨和逻辑演绎的结果，更是党为所面临的现实环境和问题倒逼提出的时代命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这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既增强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紧迫性，也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增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时效性的关键，就在于从世界大势、基本国情、党情实际出发，不断提升现实回应能力。“要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等”^①，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补足“精神之钙”，避免“软骨病”，使全党理想信念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同时，不断发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切实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做到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毒、敢于壮士断腕，找到并有效消除有损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消极因素，使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纪律建设等密切结合，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二）坚持久久为功，积极打造建设积极健康党内政治文化的良好氛围

推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层面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方面创新，是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进行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纵观党的发展历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优良的历史传统、揭示了深刻的历史规律、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党内政治文化话语，这些都为建构和完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理论提供了丰富素材、宝贵资源和智慧成果。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理论发展步入快车道，不仅从概念、命题等层面实现了创新，而且在实践层面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3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①，明确了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是孤立存在的，党风正，则政风清、社风淳、家风好。因此，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不仅作用于塑造党内政治生态、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而且其溢出效应也会对国家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The Basic Approach to 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within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Ma Yujie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serious intra-party political life, creating a healthy intra-party political ecology, and 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Great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focusing on exerting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to shape and cultivate the correct political thoughts of party members, and guiding and regulating qualified political behavior of party members; The basic role of the political ecology within the party and the key role of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within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we must follow the combination of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goal orientation,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advancement, critical inheritance and open innovation,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nd emphasis on timeliness and long-term merit. Strive to build a positive and healthy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and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rejuvenation and cultural strengthening of the party.

Keywords: Political Culture within the Party;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Principle Requirements;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责任编辑：鲁法芹]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的内涵与特质^{*}

刘腾骏 董沐夕^{**}

【摘要】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有其重要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其思想内涵主要有：自觉地、坚定地推进党的建设；始终重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重视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和发展；狠抓党员干部政治能力的培养与提升。这些重要论述具有坚定的政治性、显著的创新性、完备的科学性和鲜明的实践性等鲜明特质。

【关键词】习近平；党的政治领导力；政治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①其中，政治领导力居于首位。政治领导力肇始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作用的发挥，表征了党对政治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对实现全面领导的现实追求，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政治领导力”在党的十九大上得以界定，实现了党的领导力概念的维度细化，突出了党的政治属性的关键地位。由此，可以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定义为：作为国家领导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把落实党的各项要求作为重要任务，统率广大党员干部服务人民并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引领人民群众逐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标的能力。党的政治领导力关系到党的自身发展和长期执政，也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民群众的福祉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的自身建设发展高度，对

^{*}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新时期党内政治生态优化问题研究——基于中国共产党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比较视角”（17DDJJ02）、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科研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史观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启示研究”（2022YB006）阶段性成果。

^{**} 刘腾骏，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董沐夕，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页。

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进而提高执政能力高度重视,做出了相关论述。这一系列论述有着丰富的内容、深邃的思考,对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完善党中央领导体制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以及推动现代化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一、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逻辑

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政党政治领导理论的探索是其形成的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人的百余年生动实践以及总结的经验教训是其形成的历史逻辑,国内外发展的复杂形势和党自身建设面对的问题是其形成的现实逻辑。

(一) 理论逻辑:对无产阶级政党政治领导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党与政治领导的学说为后来党的政治领导力话语体系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未直接界定“政治领导力”这一概念,但在其相关著作中,不难发现他们十分重视政治领导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领导力量,肩负着领导无产阶级推翻封建资产阶级政权、废除私有制、完成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使命。因此,马克思提出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任务就是掌握领导权,凝聚起广大工人的蓬勃力量。“如果它这样做,那么这里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会转移给我们,而我们就能把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①而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保持党领导的政治性。如果一些没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冒牌分子混入工人队伍中,“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②。针对谁应该真正掌握领导权这一问题,恩格斯指出:“大学生军团的委员会虽然通过了一些英勇的决议,但它根本不能掌握领导权。”^③这里,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牢牢掌握领导权,只靠相关的法案、决议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此外,对于巴枯宁主义支持工人运动应该舍弃政治的错误观点以及巴黎公社没有维护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威而最终走向失败的惨痛教训,恩格斯意识到维护无产阶级政党权威的必要性,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威,其实质就是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保证无产阶级政党是核心的领导力量。

十月革命后,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现实,他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科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2页。

理论的同时又充分结合俄国实际条件，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思想，科学探索了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政治领导的一般规律。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实行正确的政治领导并牢牢把握领导权。他指出：“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① 他这里提及的“总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的另一种话语表述，指明无产阶级政党要能够总揽全局、领导方针政策。此外，他认为正确的政治领导对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有着重要作用。对此，列宁采取了包括加强理论知识学习、重视党员成分的辨别和管理、完善党内规章体系、加强监督等措施保障无产阶级政党对政治领导权的掌握，为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提供了保证。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方式，他提出要坚持集体领导并且保证民主集中制的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有利于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威，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功效。

（二）历史逻辑：对中国共产党人政治领导思想的发展和完善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有关党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形成的历史逻辑。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的必要性。他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②，明确了我国革命斗争的获胜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是中国革命获胜的关键。在领导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强调坚持政治领导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其中就包括口号宣传、发挥榜样模范作用、建立统一战线等有效方法。此外，他还曾指出坚持政治领导有利于推动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使党凝聚起巨大革命力量，推动革命朝向胜利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主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要求充分保证党的领导地位，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优势。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③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局面，使国家、社会得到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怎样保持和增强党中央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人思考的问题。邓小平提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④，同时也指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保持和完善党中央的政治领导，使党的领导机构充满生机与活力、领导集体发扬创新精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充分发挥党的重要领导作用。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④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4页。

随着世情和国情出现新变化、新挑战,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增强执政能力,提高领导水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付诸强化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的工作中,强调全方位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江泽民指出要深入开展“三讲”教育活动,养成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好习惯,坚定党员干部的立场信念,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实现了干部的政治能力培养与增强党的政治领导的有机结合。

胡锦涛针对党的建设面临“四种考验”和“四大危险”的现实情况,指出要“从国际国内形势和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的高度,深化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①。要以制度建设为抓手,坚持从严治党,保证党的先进性;要通过制度完善干部教育,不断提升领导干部素质,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提升领导水平提供主体保障。此外,他还强调党要对民主党派、社会法治建设、社会文明建设等方面进行政治领导,充分发挥党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

(三) 现实逻辑: 中国共产党需要应对国内外的复杂局面以及风险挑战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政治领导力”这一概念,体现了党对自身建设的深入思考,追求的是巩固领导、长期执政、实现使命的重要目标。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应对当今世界的发展现状、维护党的全面领导以及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举措。

首先,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是对维护党的全面领导的深入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②这一重大论断深刻地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阐明了党的领导的关键性、决定性的重要地位,为破解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的难题指明了方向。新时代,“四大危险”威胁着党的全面领导,精神懈怠削弱执行动力,能力不足影响全局领导,脱离群众动摇执政根基,消极腐败破坏执政形象。这些问题违背了党的要求,影响了党的全面领导的实际效果,进而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

其次,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是实现党的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当今国际局势不断发生变化,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多变的世界环境中只有不断增强政治领导力才能长期执政。第一,世界政治发展复杂化的趋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升政治领导力以维护政治安全。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对我国内政发表不当言论,鼓吹民族分裂,严重威胁我国的政治安全。第二,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升政治领导力以适应经济变化。全球经贸联系越来越密切使得利益冲突、贸易保护主

^① 《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81页。

义等问题层出不穷。第三，文明交流多样化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升政治领导力以巩固思想阵地。当今世界文化交流成为常态，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容以“文化交流”为借口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进行攻讦和诋毁，试图达到“西化”中国的企图。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持续提升执政本领和水平，通过不断提升政治领导力以应对各种风险考验。

最后，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关键之举。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一问题妨碍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尽管新时代人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质的改善，但我国地域、城乡之间仍然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一些行业、领域中仍然存在着发展不充分、质量低的问题，这就对党的执政能力、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要不断提升政治领导力，掌握有效化解矛盾的本领，在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过程中统揽“四个伟大”，总揽全局，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地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完成民族复兴的重要使命。

二、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

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的首要任务、实践举措、主体保障、坚实基础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理论性、实践性、科学性的新思想新理念，为进一步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提供了指导。

（一）首要任务：自觉地、坚定地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到党的各项建设的关键位置，进而使党的政治领导力在百年实践中不断得到增强。新时代推进党的政治建设需要坚守正确方向，坚定正确立场，实现重要目标，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上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前推动政治建设应该遵循的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党和人民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探索国家、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总结的创新成果，做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统一，历史和现实证明它是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因此，党要始终坚持这一正确方向，凝聚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进一步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完成重要历史使命，始终保持领导核心地位。全党上下要坚持把

^① 习近平：《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求是》2019年第14期。

重视政治意识作为从政之基,深刻领悟“两个维护”的重要内涵,做到胸怀大局、心系大国,保证在思想、行动等各方面与党中央保持绝对一致,始终如一地落实“两个维护”。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①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推进政治建设需要坚定的正确立场。政治立场是解决处理问题的根本态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提高政治领导力要求广大党员要永远忠于党和人民,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问题,不做“墙头草”,坚决与各类腐败思潮、敌对势力进行斗争,捍卫党和人民的切身利益,切实做到在党为党,永远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在探索政治领导力建设的过程中,要站在人民的角度审视自身建设,把为民执政落实到位。党始终以人民群众为存在根基,人民群众的价值诉求就是党的重要追求,只有不断提升人民的获得感,才能为增强政治领导力奠定牢固基础。要始终坚持赢民心、聚民力,以人民的视角推进党的建设,实现党的建设和人民利益维护协调统一。

维护党的政治权威是推进政治建设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维护自身权威,保持政治稳定,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党治国理政的必然要求,也是党的显著优势。新时代,党要正确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把握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应对各方面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是保证“两个维护”得以实现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各项体制机制的落实,使党的领导作用充分发挥、领导核心地位更加稳固,保持团结安定的政治局面。

(二) 聚焦重点:始终重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从国家发展大局考虑,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发展的基础,直接关系到我国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与发展。

一方面,要完善与领导相关的体制机制,用科学体系支撑领导能力的提升。首先,要进一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突出各级党委(组)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中央对国家重要工作的统一领导,做好顶层设计,优化国家总体格局,设立相关议事协调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相关工作,始终确保党把方向、谋大局。其次,要把有关政治领导的相关制度落实作为重要任务,特别要重视民主集中制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要把民主与集中统一起来,既要保障广大党员干部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又要实现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凝聚力,既要克服独断专行的一言堂,又要防止过于散漫,确保党的领导能得以充分发挥。最后,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要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严格落实反腐败的基本方针,进行综合治理、协调治理,同时要充分发挥监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1页。

督的重要作用，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另一方面，要坚持改进领导的方式方法，用科学方式助力领导能力的提升。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是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的内在条件，领导方式能够与时俱进对党的领导效果有着关键作用。随着时代的进步、实践的发展，“四个伟大”成为新时代的显著特征，我们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创新方式方法，实现党的领导水平得到更大提高。第一，要用开放包容的眼光向世界学习，坚定中国立场，保持中国特色，吸取有益的经验，充分发挥党自身的政治优势，破解完善领导的难题。第二，要重视法治的重要作用，坚决贯彻依法执政要求。落实依法执政，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改进党的领导方法的主要内容。要从健全制度系统着手，逐步形成科学、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执行，在工作中做到依法办事、依法用权，真正实现党依法执政的程序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把党的领导活动纳入法治轨道。

（三）坚实基础：重视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和发展

“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①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质量和效果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功效，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就要把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放在关键位置，充分组织、动员群众，扩大政治影响。

第一，要保证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作用真正得到发挥，使各级党委的领导地位能够得以落实。各级党委（组）肩负着领导社会各领域发展的关键任务，影响着各地社会发展的质量和速度、执政水平的提升。在同级组织中要强化党委（组）的重要领导作用，制定好相关发展政策，并且督促有关部门严格贯彻落实，使落实效果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相关部门要优化宣传、组织、统战等部门的配置，整合各种资源，提高工作效率，在党委（组）的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第二，要充分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增强号召力。基层干部作为为人民服务的主体要有高度的责任意识，永葆为民之心，乐学人民之智，做好为民之事，从小事入手，了解人民的需求，解决人民的问题，真正成为老百姓的“贴心人”，获得群众的信赖和认可，增强群众对党组织的归属感。第三，要不断优化党组织的服务功能。首先，要构建良好的党群交流机制。要健全民意表达体系，为群众建言献策提供广阔渠道，有效引导群众参与基层事务治理。其次，要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真正做好服务。针对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要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尽快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避免出现办事难、面子工程等问题。第四，要更新宣传手段，科学合理地使用新技术，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形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

象。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重要宣传作用,营造透明、开放的政治环境,积极宣传各地方的决策信息、办事流程以及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事迹、人物,在使权力运行更加透明公开的同时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感。

(四) 主体保障: 狠抓党员干部政治能力的培养提升

党的干部是党发挥政治领导力的主体力量。新时代要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重要作用,下力气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干部人才,为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提供重要的主体保障。

首先,必须将政治纪律摆在首位。党的政治纪律是最基本的纪律,是所有党员干部都要严格遵守的纪律规范。第一,要加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通过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正确的政治价值观,树立正确的理想进而保持政治定力。广大党员干部要有不断学习的意识,善于利用时间,在调研中学,在工作中学,巩固自己的理论基础。同时,要常态化地开展相关主题教育、宣讲等活动,使党的方针政策不仅入脑,还要落实于行动,创造良好的文化学习氛围,坚决抵制各种消极思想。第二,要提高党员干部的道德涵养。党员干部想要修炼政治定力就要严于律己,勤于反思,要真正做到以人民、集体利益为重,对党忠诚,不铺张浪费,不贪图享乐,真正做到先公后私、忠诚老实、勤俭节约。要坚决落实党的“八项规定”并且坚定地治党从严,不懈怠,管好党员干部的权力,规范党员干部行为,为其道德修养的提升保驾护航。

其次,要从提高“政治三力”入手,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第一,政治判断力是提高“政治三力”的前提保证,领导干部要敏锐观察政治大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正确把握形势变化是增强政治判断力的首要前提,根据现实的发展变化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预判,保证决策科学有效,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准确把握本质是增强政治判断力的重要目标,党的干部要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避免被一些表象所迷惑,从而做出错误判断。明辨是非对错是让领导干部能够自主理性地进行思考并做出判断,避免盲从错误指示,轻信不实信息。有效抵御风险是让领导干部始终保持风险意识,保持政治定力,避免出现重大错误,对于突发情况能够科学从容应对。第二,政治领悟力是提高“政治三力”的重要内容,对保证政治判断力准确、确保工作执行有效具有重要作用。党员干部不仅要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自身领悟力,还要认真领会党中央精神,把党的精神融入日常工作。同时,要科学分析政治形势,增强看齐意识,在重大问题上使自己的行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第三,政治执行力是提高“政治三力”的实践要求,可以检验领导干部是否具有敏锐的判断力和准确的领悟力。要把狠抓落实作为工作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把工作落实情况作为考评“四个意识”的尺度。党员干部要把准确无误地落实党中央的要求和部署作为自己的工作责任,在思想上保持清

醒，在行动上保持自觉，干脆利落地完成组织布置的任务。

三、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时代我国发展的具体情况，就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提出了具有实践价值的相关论断，形成了内涵丰富、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为新时代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指明了方向，充分体现出坚定的政治性、突出的创新性、完备的科学性和鲜明的实践性的特点。

（一）坚定的政治性

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是围绕政治性展开的。这些相关论述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突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性，保证了党的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着力增强方针、政策上的引领性，将凝聚民心、厚植执政根基，使党的领导得到增强，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带领人民应对未来的各种风险考验作为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的重要目标。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把对政治性的关注和强调贯穿到政治领导力的全过程。第一，通过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确保党的政治领导地位，维护党的政治权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党领导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保证不走斜路、歪路。第二，通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保证党能够凝聚起巨大力量，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效能，使领导效果充分融入治国理政的过程，有效保证战略谋划、政策执行、抵御风险，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第三，通过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委的引领作用，在生活中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用富有感召力的政治目标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扩大党的政治领导的影响力。第四，通过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综合能力特别是政治能力，进一步培养大局意识，提高综合素质，打造立场坚定、素质过硬的干部队伍，保证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发挥“政治三力”的重要作用，贯彻落实党的各项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日常工作。

（二）显著的创新性

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既归纳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的政治领导理论，总结了优秀中国共产党人加强党的政治领导的生动实践，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又着眼于新时代的发展情况，把握了新时代的现实要求，具有显著的创新性，为更好地发挥党的政治领导优势提供了指向。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党的政治建设，指明了其在党的建设中的首要地位和关键作用。为了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优势，他更加强调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的发挥，通过完善相关制度体系，改进领导的方式方法，克服各领域的障碍，保障党的全面领导得以实现。为了打造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他不仅强调

共产党人综合素质的提升,更强调要加强党性锤炼,增强政治能力,真正做到保持牢固定力,正确处理复杂问题,有效防范风险;为了保证政治领导力建设效果,他十分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要打通“最后一公里”,密切联系群众,把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优秀共产党员的政治领导理论相比,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既强调增强党的政治领导本领,又凸显党的领导的巨大优势,重点发挥党的领导的号召力和感召力,实现了二者的统一,为党的政治领导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充分体现了其创新性的特点。

(三) 完备的科学性

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有着科学的理论基础、雄厚的历史基础,以及丰富的现实基础,把党的政治领导力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谋划,充分体现出其内在的体系性和科学性。这些重要论述聚焦于“如何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这一鲜明主题,形成了“首要任务—聚焦重点—坚实基础—主体保障”的总体思路,将党的政治领导力的提升路径构建于一个科学体系。其中,“首要任务”阐释了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从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权威的角度提供了原则指引,回答了“怎么做”的问题;“聚焦重点”“坚实基础”阐释了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的重点工作,从党的领导和基层组织入手为推进建设实践找准了着力点,指明了主要的行动路径,回答了“做什么”的问题;“主体保障”阐释了党员干部应该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回答了“谁来做”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联系紧密,思路清晰,体现出他对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使这一论述具有完备的科学性。

(四) 鲜明的实践性

习近平关于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一方面,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展现了党对抵御国内外风险挑战的信心和决心,为加强党的领导以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指导。这些重要论述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打造了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巩固党的基层政权,在把握大局的基础上系统全面地应对多方面的挑战,巩固了党的自身领导。通过具有系统性的实践举措,提升了党把握政治方向、筹划大局、制定并完善政策、推动深化改革以及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展现了党对治国理政的深入思考,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完善领导的体制机制,改进领导的方式、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等内容有助于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使党和国家机构的相关职能更加契合社会发展现实,把党的政治优势更好地发挥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动力。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Leadership

Liu Tengjun Dong Muxi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leadership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Its connotation mainly includes: consciously and firmly promote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lways attach importance to uphol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valu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political ability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It has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firm politics, outstanding innovation, complete science and distinct practicality.

Keywords: Xi Jinping; Political Leadership; Political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郝书翠]

从文化相对主义的反思到文化一元多线论的建构

郭海龙*

【摘要】文化相对主义在反对法国文化侵略的过程中萌生，并被用于反对殖民主义，后来又扩展到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当前，文化相对主义所诱发的挑战，主要是刻意强调民族自决的民族分离主义，以及排斥外来移民、主张一个民族在文化和生物层面纯净的新种族主义。弱势民族的文化相对主义是对强势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反抗，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陷入了弱势民族自我膨胀式的种族文化优越论等错误之中，因而存在重大缺陷。而立足于唯物史观的文化一元多线论，既立足客观世界物质性即经济基础（社会存在）所决定的质的规定性（一元），又兼顾历史发展阶段、民族特征、国际交往等量的多样性（多线），对文化一元论的普适性（强势民族的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多元论的相对性（弱势民族的文化相对主义）进行了有机整合。文化一元多线论意味着既要尊崇科学、理性标准，推动科技、思想、制度进步，又要尊重少数群体的文化权益，不同文化之间应在平等交流达成共识中互学互鉴。

【关键词】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一元多线论；普适性；多样性；方法论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的强势，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不自觉地变成了法国化、英国化或美国化，出现了文化侵略，存在以优势文化否定劣势文化等错误倾向。其背后是优势民族的文化中心主义。在反对文化侵略过程中产生过积极作用的文化相对主义，并未十分客观公正地看待文化差异和文化交流，且在后来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极端化现象。相对平等被肆意夸大，以致为弱势民族自我膨胀式的种族文化优越论提供了支撑，表现为民粹主义、国粹主义和纳粹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错误

* 郭海龙，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员，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进程中的东方社会发展比较。

倾向。文化中心主义已经被证明是大国沙文主义的产物，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而文化相对主义仍然存在一些错误和缺陷，需要认真反思，并树立正确的文化交往观。文化一元多线论既尊崇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基本准则（一元），反对文化相对主义过分强调文化差异，承认全人类文化的共同价值；在此基础上，又尊重民族文化差异（多线），提倡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在平等对话、形成共识过程中交流互鉴，反对打着自以为是、以偏概全的“普世价值”旗号实行文化侵略的文化中心主义。因此，文化普适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有机整合，符合唯物史观，是比较正确的文化观。

一、在反对文化侵略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相对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起源于 19 世纪上半叶遭受法国启蒙文化霸权侵略的德意志、意大利等地。启蒙思想影响下的法国大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铲除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尤其是路易十四以来的绝对君主制，影响遍及欧洲大陆。此前，在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 年）中获胜的法国逐渐由于绝对君主制等因素成为欧陆霸权国家，其政治、经济、文化对欧洲大陆具有很强的辐射力和渗透力。^① 比如，当时德意志各邦国，包括强大的普鲁士王国，其杰出国王腓特烈大帝（1740～1786 年在位）都以说法语、亲近法国名流、建造无忧宫（Sanssouci Palace）等法式建筑为荣，对自己的母语德语反倒感觉“很土”。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礼记·缙衣》）。当时，整个欧洲以法国文化为模板，形成了法国化的世界：法国是欧洲政治、经济、文艺中心，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亦步亦趋地模仿法国的制度、政策、时尚，法语是欧洲通行的外交语言，国际条约以法语为蓝本。法国大革命后期，随着拿破仑征战欧洲大陆，法国启蒙思想以拿破仑法典等形式与被占领地区的居民亲密接触，法国的影响达到了巅峰。然而，拿破仑的军事侵略引起了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反感和抵抗，人们不再把拿破仑作为革命的英雄来欢迎，而是当作侵略者来抵抗。比如，贝多芬曾经很仰慕拿破仑，为他创作了《英雄交响曲》，认为他是赶走外来干涉者的革命英雄。可拿破仑称帝后，贝多芬十分愤怒和失望。^② 最早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由此产生。^③ 其他国家的民众也开始在文化上反击法国，文化相对主义由此缘起。这种文化相对主义最初反对的是强势民族的文化中心论，反对法语、启蒙思想等法国特征的文化。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等人就是这个时期德意志地区反对法国文化侵略的代表。

① 参见陈文艺：《评十七世纪后半期法国的欧洲霸权政策》，《史学月刊》1982 年第 3 期。

② 参见柯莉：《从〈英雄交响曲〉到〈战争交响曲〉：贝多芬对拿破仑态度的两次转变》，《艺术探索》2012 年第 4 期。

③ 参见郭海龙：《略论国家主义对法国社会党政治观念的影响》，《法国研究》2014 年第 2 期。

同一时期,反对法国文化侵略的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阐发了原生形态的文化相对主义理念,被视为“文化多元论”最重要的思想源头之一。正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所言:“无论维柯本人怎么想,他都是文化多元主义的创立者之一。”^①但维柯却不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他认为可以对不同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找到某种普遍的共有的东西。^②无独有偶,与康德同时代、主张文化相对主义的德国历史哲学家约翰·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依然崇尚不同文化体现出的普遍性特征,即人道主义特征。^③总的来说,虽然文化相对主义产生的确与文化多元论密切相关,可以说文化相对主义是从文化多元论中衍生出来的一种比较极端的文化哲学思潮,但早期的文化相对主义者并不局限于本民族文化,而是着眼于全人类,并没有把人类历史、文化史或文明史看成是各种文化形态或文明形态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要从中找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普遍规律。

后来,随着欧洲向全世界进行殖民扩张,以欧洲政治、经济、文化为蓝本,西方强势民族的文化中心主义扩展到全世界。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们为了获得独立,借助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有利的思想武器来反对西方。其中,不需要像马克思主义进行诸如本土化、大众化、时代化等“深加工”,就可以直接运用且比较得心应手的理论工具,就是文化相对主义。同时,由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后来居上,文化相对主义反对的语言不再主要是法语而是英语,反对的文化不再只是法国文化,而是整个西方近现代历史上的殖民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功利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

而文化相对主义所针对的普适性(一元论),正是西方以强势文化为标准对其他民族强制同化的文化中心主义政策的本质。长期以来,西方强势民族的文化中心主义立足于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提倡进步观念,反对愚昧和倒退。进步观念强调人类社会总体上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进化,倡导人类自身在历史运动中的革新精神。这种观念使人类摆脱了上帝的控制,走出了自身历史或命运循环论和退步论的深渊。^④但是,文化中心主义以启蒙思想倡导的科学为标准,追求整齐划一,甚至迷恋科学。比如,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儿(René Descartes),从“我思故我在(Je pense, donc je suis)”的命题出发,提出了与近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绝对主义学说——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这种学说“否认历史、文学、文化和拉丁学识的全部价值”,否认“人文主义的内在精神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它企图通过“数学理性和机械

① 参见[意]罗杰·豪舍尔:《〈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序言》,[英]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② 参见袁鑫:《当代文化哲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8期。

③ J. C. O'Flaherty, *Johann Georg Hamann: Einführung in sein Leben und Werk*, Frankfurt am Main, 1989.

④ 参见姚军毅:《论进步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论来理解生活和人类灵魂本身”,^①这种思潮发展到极端就是“一切能用数学表述的学科才是科学”,把众多人文学科当作伪科学来贬低、嘲讽,对落后或感性的文化现象进行歧视。换言之,如果把西方社会的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当作唯一可行的标准,无疑会导致贬低、否定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由于赤裸裸地宣示文化侵略,西方强势民族的文化中心论在世界范围内遭到广泛质疑。

而正是在反对强势民族的文化中心主义过程中,弱势民族的文化相对主义逐渐形成一种流派。20世纪上半叶,由于人类起源和人类文明多中心状态得到广泛认可,文化相对主义在人类学领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普及。由此,在反对文化侵略、提倡文化平等方面具有进步历史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文化相对主义,扩展到了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在美国形成文化相对主义学派。^②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有理论家使用文化相对主义范式分析西方国家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提出了“时机未到结构”(not-yet structure,即他们希望殖民地能够自治和民主地参与政治,但是时机未到)^③,并用文化相对主义来分析东西方社会主义的历史分野,认为苏联模式比较适用于东方专制主义传统浓厚的俄国、东欧和中欧国家,不适用于西欧国家。^④无独有偶,英国工党理论家、费边社主席柯尔(G. D. H. Cole)也认为自己主张的从个体自由出发的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基础社会主义、超国家社会主义)应只限于西欧,不适用于俄国等东方国家。^⑤苏联的领袖集权出发点是人民群众,而不是纳粹的领袖原则^⑥,对苏联和纳粹进行了客观区分,这是其文化相对主义思路的集中体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也持类似看法。^⑦文化相对主义也深深影响了当代中国,随着三星堆^⑧等考古发现取得重要进展,中国考古学界逐渐放弃了长期以来中华文明以河洛文化为代表性源头的“黄河流域中心论”,代之以中国的“两河(黄河-长江)流域”说^⑨以及“群星灿烂”说(即多个中心同时发展并融合)。^⑩

① [意] 卡洛·安东尼:《历史主义》,黄艳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② Melville J. Herskovits,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 Abridged Revision of Man and His Works*, New York: Alefred A. Knopf Inc., 1955, pp. 351-365.

③ 参见张頌仁、陈光兴、高士明主编:《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304页。

④ A. W. Wright, *G. D. H. Cole and Socialist Democrac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⑤ 参见郭海龙:《自由人的联合——G. D. H. 柯尔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页。

⑥ 参见[英] G. D. H. 柯尔:《费边社会主义》,夏遇南、吴澜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4页。

⑦ 参见[奥] 奥托·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史集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15~119页。

⑧ 白路:《满天星斗 三星堆光彩夺目》,《成都日报》2021年3月22日。

⑨ 项永琴:《中国古代的两河文明与儒道互补》,《寻根》2002年第4期。

⑩ 参见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86年第2期。

综上所述,文化相对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征有: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差异性,反对线性的、一元的文化进化观和历史进步观,否认人类文化发展具有普遍的、共同的一般法则和规律;强调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和独特性,否认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存在普遍适用的价值尺度;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具有不可比较性和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文化相对主义理论对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历史哲学观及白人种族优越论进行了严厉批判,强调不同民族文化的平等地位和相互尊重的关系,鼓励尊重差别和平等对话。

二、文化相对主义的缺陷

文化相对主义的兴起符合时代发展逻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人们的精神活动置于资本逻辑的统治之下,使其独特价值附属于商业活动,甚至把人物化成可用金钱衡量的消费品。这就导致了一切价值的相对化和功利化,以往人们对崇高理念、绝对价值和确定性的崇尚和追求,要么被迫放弃,要么遭受质疑,诱发了文化相对主义。这是人们呼唤“回到康德”,提倡新康德主义的大时代背景:在资本主义物化的世界中,康德提倡的绝对价值由于超然物外而具有崇高地位。从历史上来看,“相对主义哲学为文化相对主义的萌生播下了思想的种子,反启蒙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出现及二者的结合为文化相对主义的发芽提供了思想土壤,而民族观念的流布则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破土打通了出口”^①。

文化相对主义在反对文化侵略方面具有历史进步性。然而,文化相对主义否认人类文化发展具有普遍法则或普遍规律,否认在各民族的文化系统中存在着普遍适用的、绝对的价值尺度。例如,文化相对主义学派的奠基人、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独特之处,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尊严。因而,不同民族文化之间没有普遍的、绝对的衡量标准,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他的学生、正式创立文化相对主义学派的美国人类学家 M. J. 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 Herskovits)认为,一切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对各民族所起的作用都是相等的,因此,文化谈不上进步或落后。这实际上是文化相对主义的绝对化,虽然突出个性,但反对共性,陷入了相对主义诡辩论的误区。

文化相对主义在哲学上的这些不自洽之处,导致其发展为反对科学、反对启蒙思想,反对人类共同价值标准,反对进步,反对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比较、学习和借鉴的观念,陷入孤芳自赏、妄自尊大、自我优越的境地。比如,如果认为压制人的自由、维护奴役和剥削的传统社会,其文化模式与维护人的自由、消灭奴役和剥削的现代社会没有先进落后之分,那么自古以来特别是自近代以来整个社会演进过程的进步性、发展性就都被全盘否定,甚至对未来社会人的自由而全面

^① 杨须爱:《文化相对主义的起源及早期理念》,《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

的发展等的期待也会一片茫然。这样，弱势民族的文化相对主义，从与强势民族的文化中心主义相反的路径，导致了理想信念动摇和文化虚无主义。

这种思潮往前发展，就是劣势民族文化狭隘的极端民族主义。而劣势民族自我膨胀的种族文化优越论，是对文化相对主义的滥用，走向了其反抗优势民族文化霸权的反面，形成了盲目自大型的新文化霸权，实际上为劣势民族的国粹主义、纳粹主义和民粹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提供了某些理论支撑。比如，义和团运动盲目排外，近代中国一些旧文人把裹脚等民族陋习称作国粹并极力主张发扬光大；德国纳粹则把普鲁士军国主义不良传统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极权主义。这种极端化发展，印证了一句箴言：“真理只要向前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

而当前文化相对主义所诱发的挑战，主要是刻意强调民族自决的民族分离主义和排斥外来移民、主张一个民族在文化和生物层面纯净的新种族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已经成为加拿大、英国、西班牙，土耳其、苏丹、伊拉克、叙利亚，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泰国等维护国家统一面临的重大挑战。在这些国家，民族分离主义者常采取极端恐怖主义手段在公众场合制造灾难，严重干扰了公共安全。比如，“埃塔”组织为了谋求巴斯克地区从西班牙独立出去，经常制造恐怖袭击。正因为如此，瑞士学者克里斯蒂安·乔帕克（Christian Joppke）认为，正是多元文化主义“为少数群体的‘分离主义’和‘聚居化’提供了养料”^①。

新种族主义则是一些国家的民众在全球化面前为捍卫自身利益而主张本民族生物和物理纯洁性的一种极端表现。这种新种族主义在欧洲各国难民配额方面表现尤其明显，中东欧的匈牙利等国宁愿多出钱也不愿在本国安置难民。而德国最初张开双臂欢迎难民的政策，也不得不在发生难民刑事案件后收紧。而这进一步强化了中东欧国家拒绝接受难民的态度，强化了新种族主义的国际影响。秉持“白人至上”理念的特朗普政府采取修建边境墙等措施限制移民；印度莫迪政府实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犹太人在西方饱受“隔都”（ghetto）之苦后建立的以色列却通过修建隔离墙、以《犹太民族国家法案》强化犹太特征。这些都带有浓厚的新种族主义色彩，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西方学界著名的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者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也认为，西方一些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民族政策虽有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公正社会的崇高动机，但是在实践中却产生了鼓励种族隔离、分离的灾难性后果。^② 文化相对主义正是文化多元主义发挥到极端的一种典型。

^① Christian Joppke, “The Retreat of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Liberal State: Theory and Polic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5, Issue 2, 2004.

^② 参见[加]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总之,文化相对主义作为理论批判工具,既可为深怀人类良知及具有平等主义精神的反种族主义、反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斗士所采纳,又可为追求极端性、非理性民族利益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所利用;既可以服务于摆脱异族奴役、文化霸权而追求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爱国者,又可以蛊惑破坏现有民族国家统一性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其作为一种文化批评理论,既可以成为多民族国家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促进民族文化地位平等、制衡“多数暴政”及协调族际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又可以为民族分离主义、新种族主义背书,还会成为多民族国家内部“先进族群”帮助“欠发达地区族群”发展的“伦理障碍”。^①因此,文化相对主义远远非善尽美的文化观。

三、文化一元多线论是文化普适性与相对性的有机整合

如前所述,西方强势民族的文化中心主义崇尚理性,排斥感性和历史,提倡世界主义,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其实质是一元论,背后的哲学基础是近代机械唯物主义,机械地强调统一性、共性,抹杀了个体差异,压抑和窒息了个性。与此相反,弱势民族的文化相对主义虽然支持文化多元论,提倡国际、族际平等,但它反对科学、理性的整齐划一,反对文化进化论,反对进步思想,陷入了故步自封、孤芳自赏、盲目排外的文化优越论之中,背后的哲学基础是二元论(物质与意识同等重要),陷入了夸大个性、反对共性的“白马非马”式诡辩论。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都没能正确对待文化交往。应吸收各自的合理部分,摒弃其消极部分,通过扬弃融合创新生成新的文化交往观。

这种新的文化交往观,既要在不同文化之间达成某些共识,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②,又要在共识的基础上尊重差异,提倡文明交流互鉴,反对文化侵略和扩张。这就是文化一元多线论:一元,即物质世界社会存在即经济基础内在质的规定性;多线,即民族、宗教、历史发展阶段、国际交往、人物性格等差异所导致的量的多样性。文化一元多线论建构在客观物质世界的运动和发展、人类社会不断变革的基础上,主张文化会发生进步,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共性的物质基础,反对单纯以强势民族的文化或价值为标准去否定、贬斥另一种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学习、借鉴应遵循平等和自愿原则,反对强制性的文化同化,^③更反对文化侵略,在文化共性基础上尊

^① 参见杨须爱:《文化相对主义与当代世界的两种民族问题:对文化相对主义的再认识》,《世界民族》2016年第5期。

^② 王毅:《迎难而上 为国担当 奋力开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求是》2021年第2期。

^③ 参见杨须爱:《文化相对主义与当代世界的两种民族问题:对文化相对主义的再认识》,《世界民族》2016年第5期。

重个性，是平等基础上的差异，符合分配正义原则。^①

文化一元多线论，首先立足于世界的物质性（一元）。文化是一种反映客观世界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存在。人类历史上，唯心主义曾不乏市场，但往往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中，重点批驳了各种唯心史观，是论述一元论（唯物史观）的典范。不过，坚持一元论并不意味着要机械地一切都以科学、理性为唯一准绳，把历史、文化等无法用科学和理性解释的感性和历史习惯进行简单否定。正确的一元论历史观、文化观应以物质世界社会存在即经济基础为质的规定性（一元）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充分考虑各种非理性因素所允许的度，即量的多样性（多线）。只有这样，用度去把握质（一元）和量（多线）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现原则性（一元）与灵活性（多线）的高度统一。量的多样性在文化方面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其独立性以社会存在所允许的范围为界限，随着时代变迁即社会存在的发展而逐渐演进。比如奴隶制时期普遍流行人殉制度，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到了中世纪晚期，例如明朝初期，朱元璋恢复人殉制度，就是开历史的倒车。

就文化模式的发展来看，一定社会文化模式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当强的保守性、滞后性，新的文化因素一般很难从旧的文化土壤中产生。因此，文化的变迁、新文化因素只能产生于人们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发展。例如，新教伦理不会产生于中世纪，而是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后才开始萌生，并最终发展为资本主义精神（capitalist mentality）^②；奴隶贸易经历了从一开始的大张旗鼓到后来被视为非法的演变，时至今日，即便是最落后的国家也实行了禁奴政策。这反映了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共识。又如，20世纪以前，虐待战俘现象非常普遍，但自1949年《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生效后，虐待战俘就成为不文明行为。类似地，随着人类社会物质发展水平的提高，禁止核武器扩散、禁止地雷、防止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国际公约逐渐成为人类社会普遍共识，是社会存在变化带动社会意识在具体领域进行相应变革的典型事例。

文化作为社会意识，虽然由物质世界的发展程度限定了范围，但是在这范围内其变化是多线条的。这些多线条既与民族特性、习惯、领袖人物的性格有关，也与时代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国际交往程度有关。比如，英国光荣革命后，虽然确立了“王在法下”的原则，但是玛丽二世和威廉三世及其女儿安妮女王的权力仍然非常大。后来由于偶然因素形成的虚君元首制，因适应时代取得了成

^① 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②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页。

功。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后无嗣，不得已按照王位继承法从德意志汉诺威邦请来了远亲担任国王，即乔治一世（1714～1727年在位）。乔治一世从小在德意志长大，性格内向，不会也不想学英语，只会德语、法语和拉丁语。而英国的大臣则基本不会德语、法语。于是，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用蹩脚的拉丁语和可口的混合甜酒控制了乔治一世”，逐渐形成了“国王统而不治，首相掌握实权”的局面，沃波尔事实上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首相。后来，出生在英国、会英语的新国王乔治三世1760年继位后，企图夺回原本属于国王的权力，但为时已晚，因为经过乔治一世、乔治二世（1727～1760年在位）两代国王的近半个世纪（1714～1760年）的统而不治，虚君元首制得以巩固，这客观上适应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因而成为惯例。相比之下，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也来自德国却主动学习俄语，赢得朝野爱戴，其精明能干大大加强了沙皇专制制度，但也迟滞了沙皇制度的变革。时至今日，英国王室仍然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可以说，是英国汉诺威王室（一战时改名温莎王室）乔治时代的偶然性直接促成了英国君主立宪制长期成功。然而，这种偶然性（多线）带来的成功是适应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的客观需求（一元）使然，具有必然性；反之，任何脱离了社会存在（一元）所允许的范围而进行的个性化变革（多线）都不可能长久。文化领域的变革虽然不可能如同政治、社会领域的变革那样清晰可见，但其基本脉络大致类似，且与政治、社会领域密不可分。因此，文化一元多线论是比较合理的文化交往观。

四、文化一元多线论的方法论和文明观

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所涉及的文化交往观，不仅是理论层面的哲学问题，更是涉及民族情感等现实层面的政治问题，因此不仅需要在世界观上予以批判，形成符合客观情况的文化一元多线论，还要借鉴政治发展的智慧处理好文化问题，从而树立切实可行的方法论和科学的文明观。

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多数人的民主无疑是民主最基础的诉求。这早在原始社会部落酋长的选举中就已经出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古代雅典民主政治中曾出现苏格拉底等正直人士被陶片放逐（ostracize）或判处死刑的情况。这个问题使得政治学领域开始关注反对多数人暴政的问题，而古代雅典民主政治也因此被认为是暴民政治而遭批判。对此，后世政治学家提出应当保护少数人的正当权益以防止暴民政治。直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各国纷纷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在以宪法为根本的法律体系保护所有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实行多数人的民主），民主才得以正名（justification）。但随着近代西方国家政治实践的发展，社会出现了职员、自由职业人、经理阶层等中间阶层，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宪政民主的基础（市

民社会的同质性)遭到破坏,宪政民主遭遇危机。^①这促使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等政治学家开始积极研究探讨异质群体之间协商一致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从而提出了共识民主的范式。^②这一理论在欧洲大陆多党制的氛围中开花结果。比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长期与人民党合作执政,荷兰鉴于自身社会“支柱化”(Pillarization)的事实形成了主流政党合作组阁的惯例,瑞士更是四大政党按比例分配联邦委员会席位,实现了长期联合执政^③,而德国在战后出现的四次大联合政府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这些共识民主在理论上为协商民主的出现提供了土壤。西方的协商民主,注重市镇自治层面内部的基层协商,这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柯尔的观点“民主的实质是自治,只能存在于小范围内(车间、行会、社区)熟人之间”^④如出一辙。

与政治领域类似,文化一元多线论既尊重科学、理性所确立的客观标准,推动科技、思想、制度等方面的进步,又充分尊重少数群体的文化权益。在文化交流方面,不应实行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强制同化那样赤裸裸的文化侵略,也不应闭关自守、盲目自大排外,以致孤芳自赏、故步自封。换言之,先进文化应该帮助而不是干涉、侵略落后文化,正如《道德经》所言:“为而不持。”“善利万物而不争。”在具体操作层面,需要首先达成广泛共识,即在被接收方认可和愿意接受后再进行交流互鉴,按需进行帮扶,才是符合道义的做法。

在国际层面,应以联合国大会、安理会、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或机构共同认可的规则为基础,对发生人道主义危机的区域实施人道主义救援,反对个别强势国家绕过国际社会(如联合国安理会)打着“人道主义”旗号、叫嚣“人权高于主权”对主权国家强行干涉或侵略。例如,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制止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这是合法行为,得到了全世界广泛支持;而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伊拉克并未违反国际法,英美却执意绕开联合国,肆意侵略主权国家伊拉克,导致伊拉克政权更迭、人民流离失所,这是非法的侵略行径,遭到中国、俄罗斯及英美的北约盟友法国、德国等大国的反对。国际层面的文化交流也应如此,当启蒙思想在欧洲广泛传播的时候,人们觉得它是进步的,普遍予以接受,这是正常的文化交流;当拿破仑穷兵黩武,借助武力输出法国革命的时候,就是军事、政治和文化侵略,自然遭到人们的激烈抵抗。同样,当西方思想经过日本传入中国等亚洲其他国家的时候,人们主动学习日语、求学东洋以了解先进文化,这是正常的积极现象;而当日本

① David Jayne Hill, “The Crisis in Constitutionalism”,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98, No. 697 (Dec., 1913), pp. 775-776; Benjamin Arditi, “Populism as a Spectre of Democracy: A Response to Canovan”, *Political Studies*, Vol. 52, 2004, pp. 135-143.

② 参见陈炳辉:《多数民主与共识民主:利普哈特的民主理论》,《江淮论坛》2012年第1期。

③ 参见林勋健:《西方政党是如何执政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426、450页。

④ [英] G. D. H. 柯尔:《费边社会主义》,夏遇南、吴澜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4页。

帝国主义在侵占的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和东南亚等地拿着刺刀强迫人们学日语、实行皇民化教育的时候，这是非法的，遭到了顽强抵抗。

在国内层面，为了维护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统一，一些多民族国家会实行国语等文化统一政策。比如，古代世界上，秦国统一六国后，实行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近代世界史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独立后，都把马来语作为全国通用语，甚至华人居多的新加坡于1965年脱离大马来西亚联邦之前，在李光耀领导下开展过马来语国语化运动；印度独立后，把印地语和英语作为通用语。^①这样做是为了便于不同地域、不同族群高效交流，形成国内统一市场。但是，这种统一政策与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自治之间应把握好“度”。例如，新加坡实行“英语+母语”教学政策和组屋政策，并让各个族群相互杂居，培养各个族群的理解和包容之心，从而相互熟悉并尊重彼此的习惯，实现了族群和谐。^②中国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推行汉语和本民族语言双语教学，既能保证全国范围内的交流，为民族地区加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商机和就业机会提供了便利，又尊重了少数民族的语言传统和风俗习惯，促进了民族团结。

由此看来，在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统一之间必须把握好“度”。这取决于双方的态度、实际发展态势。对于文化方面的少数群体而言，可实行有限度的文化自治，不宜进行无限度的自决和分离；在精英阶层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积极对外交流、学习，是明智之举。比如，当前，美洲的印第安人要不要学习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不学习的话，他们可能无法融入欧洲殖民者后裔土生白人主导的国家，甚至濒临消亡；为了求生存、求发展，美洲的印第安人主动学习原宗主国的语言未必就一定是西方文化的侵略。但在此前，欧洲殖民者为了一己私利侵夺印第安人土地并肆意破坏印加文化、阿兹特克文化等印第安文化，则是赤裸裸的文化侵略。宗教等文化现象也是如此，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不应强迫改宗。历史上，亚美尼亚人、罗马人、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突厥人、波斯人、回鹘人、西征的蒙古人主动皈依伊斯兰教，斯拉夫人皈依东正教，西征的匈人皈依天主教。南下的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满洲人、蒙古人主动学习中原文化，皈依佛教或者服膺儒家文化。积极学习中华文化的日本、朝鲜、越南，都曾以“小中华”自居。这些都是主动进行宗教或者文化皈依的先例，值得肯定。

在文化领域，应欢迎主动学习，反对强制兜售。在这方面，一些先贤的理解非常值得借鉴。中国古人主张用先进文化引领文明发展，“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春秋》），勤修德政，自可怀敌附远，以德行促进文明传播，此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这些主张以及鲁迅先生主张的“拿来主义”是比较切实可行的文

① 参见肖宪、毕媛媛：《印度的语言政策与族群关系》，《思想战线》2021年第2期。

② 参见潘少红：《新加坡语言教育政策的教化色彩》，《东南亚纵横》1999年第1期。

化交流之道：传承优秀文明、吸收先进文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具体而言，文化一元多线论视角下的文明观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一元不应机械化，要在保持国际共识和尊重少数群体正当权益之间保持弹性。在国际共识基础上形成的人类共同价值准则，应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同时，积极关注人道主义危机和灾难，积极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尊重主权，反对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干涉他国内政，强行颠覆他国政权。^①只有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等国际社会达成广泛共识的前提下，方可开展军事行动进行合法的人道主义干涉，擅自对主权国家采取强制手段进行武力或文化侵略是违背道义的侵略行径。

另一方面，提倡文明多样化，提倡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鉴。应尊重各个文明历史发展阶段、各自发展道路的差异，根据其需要，不附加条件地帮助少数群体自行实现社会变革和进步。同时，明确反对强制输出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反对把经济援助与援助对象国进行新自由主义性质的政治改革或经济改革挂钩，反对把某些区域狭隘的价值观包装成“普世价值”强制进行推销。西方国家在推广“普世价值”的过程中，以西方为标准，即凡民主必须与多党制、三权分立、普选等挂钩，这实际上是将实现民主的方式等同于民主本身，将西方模式的民主等同于全人类的民主。这种以偏概全、混淆视听的做法，导致了恶劣后果，是一种话语绑架和道德绑架，本质是文化和政治侵略。这些构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化对他国进行渗透的手段。美国在价值观外交方面采用了多重标准：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高压渗透，把西方价值观强加给这些国家，以混淆是非，推动“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对沙特、革命前的伊朗等盟国专制、忽视人权的行为，则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故意忽视和默许；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极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造成这些国家两极分化、社会动荡，发展受挫，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得不依附西方势力，从而强化了西方的全球主导地位。“美国等西方大国常将双重标准作为推广所谓‘普世价值’的手段，用‘普世价值’来打压战略竞争对手，维护本国私利，这就更容易让人对普世价值敬而远之。”^②

文化交往观是一个开放的话题，无论是优势民族唯我独尊的文化中心主义，还是劣势民族的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的一种），都存在自我膨胀、忽视其他民族文化权益等错误倾向。透过现象看本质，二者在哲学层面上没有处理好统一性与多样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尊重科学、求同存异的文化一元多线论，是避免上述种种错误倾向、从理论上解决问题的重要探索，必将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① 参见艾四林、曲伟杰：《西方“人权高于主权”学说的局限及其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3期。

^② 刘建飞：《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挑战与应对》，余潇枫、魏志江主编：《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5—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3页。

From the Reflection of Cultural Relativism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Monistic Multi-linear

Guo Hailong

Abstract: The Cultural Relativism originated in the process of fighting against French cultural invasion, and was used to fight against colonialism, and later extended to anthropology, politics, sociology and other fields. At present, the challenges caused by cultural relativism are mainly the national separatism that deliberately emphasizes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new racism that excludes immigrants and advocates the purity of a nation at the cultural and biological levels. Cultural relativism is a counterattack and reaction to cultural centralism, but it goes to the other extreme and falls into the mistake of racial cultural superiority. Like cultural centralism, cultural relativism also has major defects. The Cultural Monistic Multi-linear Theory (CMMT)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not only established in the material nature of the objective world, that is,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other social existence, but also takes into account the diversity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has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Cultural Centralism) and the relativity of cultural pluralism (Cultural Relativism). CMMT means that we should not only respect the standards established by science and reason,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deology and system, but also fully respect the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nority groups. Different cultures should reach consensus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through equal exchanges.

Keywords: Cultural Relativism; Cultural Monistic Multi-linear Theory; Universality; Diversity; Methodology

[责任编辑: 吴文新]

爱尔兰民族文化建构的深层意蕴*

——基于叶芝与阿诺德对凯尔特文学的不同认知

周 琦**

【摘 要】阿诺德与叶芝在文学领域发扬凯尔特文学的呼声前后相继，反映了他们相异的认知。阿诺德在文学领域将爱尔兰民族文化纳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统，消解爱尔兰的民族性。叶芝通过文学作品让美好的爱尔兰与瑰奇的凯尔特神话进入人们的视野，拒绝将凯尔特文化与英国文化合流，破除人们对凯尔特文化是野蛮、感性与放纵的偏见，使式微的爱尔兰文学与凯尔特文化传统相连接，赋予凯尔特文化与古希腊文明相比肩的地位，并借欧陆颓废主义思潮的时代波澜，将凯尔特文化重新融入欧洲文学与文化的主流，在欧洲掀起了凯尔特复兴的热潮。叶芝对凯尔特文学的推广有力地促进了爱尔兰文艺复兴，使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凝聚成一股强有力的文化话语，与爱尔兰本土的民族解放运动交相呼应、并蒂生辉。

【关键词】叶芝；阿诺德；凯尔特文学；复兴

1859年，英国学者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结识了法国学者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后者撰写的《凯尔特人的诗歌》（*Sur la poesie des races celtique*）一文使阿诺德对凯尔特文学产生了莫大的兴趣。1866年前后，马修·阿诺德在牛津大学举办了四场关于凯尔特文学的讲座，并于1867年将讲座内容结集为《凯尔特文学研究》（*On the 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一书出版，对凯尔特文学及其与英国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虽然阿诺德的研究承袭了勒南的诸多观点，但立意完全不同。阿诺德希望通过对凯尔特文学的研究来建构一种凯尔特性，并追溯英国文学中具有相关特性的部分，以此为英帝国实现与爱尔兰等历史上的凯尔特区的统一奠定文化基础。20年后，爱尔兰诗人叶芝亮相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1批面上资助项目（2022M710337）阶段性成果。

** 周琦，文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化学。

于伦敦文坛,他对凯尔特文学及文化的诸多观点与阿诺德的相关观点形成了有趣的互文现象。叶芝在1898年创作的《文学中的凯尔特要素》(The Celtic Element in Literature)一文中,试图在勒南研究的基础上对阿诺德的观点进行迂回式的反驳,并阐述自己对凯尔特文学特质的理解。但叶芝对于凯尔特文学及文化的其余论述散落在他的诗歌、散文、神话集等作品中,构成了若干不同的面相。因而,有必要通过整理、提炼散落于叶芝作品中不同面相的线索,论析叶芝在对阿诺德观点反驳的基础上所倡导的凯尔特复兴,以探究19世纪爱尔兰民族文化建构的时代主题。这对于当今人们进一步反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意蕴,揭示民族文学发展的特殊道路和特殊规律,增强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文化自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

凯尔特是一个复杂的族群概念,它包括欧洲的多个种族,其外延也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地得到扩展。对凯尔特人的最早记述可见于公元前1世纪中期的希腊史学家的著述,米利都的赫卡泰乌斯(Hecataeus of Miletus)以及希罗多德(Herodotus)曾提及“Keltói”,“这应是‘Celt’一词的早期形式”^①。公元前1世纪末,地中海附近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将他们北方的蛮族邻居、高卢地区的居民称为凯尔特人。但凯尔特一词在族群、文化、语言、物质文明、历史时期等方面的界限仍然是学界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②历史上凯尔特人曾由欧陆迁移至大不列颠岛的苏格兰、威尔士、康沃尔(Cornwall)等地,地理范围大幅扩展。公元前100年前后,欧陆和大不列颠岛的凯尔特人经由海峡进入爱尔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由于地理因素等原因,爱尔兰并没有遭受到当时正处于强盛时期的罗马帝国的入侵,凯尔特文化在爱尔兰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延续和发展,直到公元432年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将罗马天主教传入爱尔兰,凯尔特文化才逐渐式微。^③古典世界的凯尔特人曾与罗马人发生冲突与战争,留下了精力充沛、骁勇善战、野蛮狂暴的民族印象,而凯尔特人的多神教也构成了与罗马一神教相

① Miranda J. Green, “Introduction: Who Were the Celts?” in Miranda J. Green, ed., *The Celtic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4.

②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将欧洲铁器时代(约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的欧陆居民称为凯尔特人是一个错误和虚假的概念,认为当时并没有“凯尔特”这一具有自我意识的民族存在。有学者认为,“凯尔特”不过是一个代表“异国”“边缘”“野蛮”“他者”的松散概念,不指代任何具体的族群,也不足以构成民族概念,但也有许多学者认可这一系统的命名法。一些认为凯尔特民族的确切存在的学者依据的是一种由欧洲北部古代居民延续下来的传统,这种传统在现代的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等地的居民身上依然可见。与此相关的争论在学界十分广泛,总而言之,“凯尔特”至今依然是一个内涵和外延不断变迁的概念。Miranda J. Green, “Introduction: Who Were the Celts?” in Miranda J. Green, ed., *The Celtic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3-4.

③ 参见欧光安:《主题·民族·身份——叶芝诗歌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8页。

对立的异教世界。

历史上,凯尔特是异族人、野蛮人文化的象征,它充斥着放纵的激情、超自然的狂想以及对神秘主义和巫术的崇拜,这在启蒙运动后的欧洲显然是“文明”的反义词。马修·阿诺德在《凯尔特文学研究》中不无贬义地评论道,凯尔特气质是“无规训的、混乱的和狂暴的”,它与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气质正好相反,而后者是“有纪律的、稳固地遵守一定的限度但自身中又蕴含不可分割的自由和自力更生”。^①凯尔特人是感性的、欢乐的,他们所充盈的激情和感伤具有强烈的力度,却又短暂而放纵。这使得情感敏锐的凯尔特人未能建立一个良好而令人满意的物质文明:“即使在他们理想的英雄时代,他们的欢愉和感性的本质也未能使他们超越……他们所鄙视的粗野而迟滞的撒克逊人。”^②

阿诺德认为,凯尔特人不但在物质文明上无法与撒克逊人相比,在精神文明方面也是失败者,远逊于同为古老民族的古希腊人。阿诺德虽然承认英国文学中存在着诸如神秘、狂喜、忧郁、对自然的激情等源于凯尔特文化的要素,但只将它们看作英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以补充撒克逊人民族特质中不足的部分。凯尔特人拥有的这些感性特质本身实际上是一种缺陷,这种缺陷使他们沉溺于神秘主义式的狂想,追求超自然世界,缺乏务实精神,因此不足以成为良好健康的文明的源泉。阿诺德认为,凯尔特人只有情感,关注不可表达之物,没有理性、耐心和尺度(measure),因而无法创作伟大作品,他评论道:

甚至在精神创造(spiritual creation)的世界,尽管他(凯尔特人)拥有迅捷感知和温柔情感这些极好的天赋,他却从未获得完美的成功,因为他从来没拥有过足够的稳健、耐心和清醒……希腊人拥有与凯尔特人一样的感知和情感气质,但他给这气质加上了尺度,因此他在造型艺术领域获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功,而在这个领域……凯尔特人一无所成。^③

在这段话之后,阿诺德并没有停止对凯尔特人的批驳。他指出,由于理性、清醒和尺度意识的缺乏,凯尔特人在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方面并不成功,在诗歌创造方面也无甚建树:“他的这些过错妨碍了他,使他无法创造出那些具有诗歌天赋的民族——例如希腊或意大利——所创作出的伟大诗作。”^④至此,阿诺

^① Matthew Arnold, *On the 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 and on Translating Home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2, pp. 82-83.

^② Matthew Arnold, *On the 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 and on Translating Home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2, p. 80.

^③ Matthew Arnold, *On the 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 and on Translating Home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2, p. 78.

^④ Matthew Arnold, *On the 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 and on Translating Home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2, p. 79.

德对凯尔特人进行了全面批判,将凯尔特人的感性放纵与古希腊人的审慎节制进行了对比,暗示了凯尔特文化的野蛮本质。虽然阿诺德多次指出凯尔特的情感性的缺陷只是相对的,它可以对工业文明发达的英国所盛行的非利士主义与撒克逊人的黏液质性格进行调和^①,但这种论调依然暗含贬义,使凯尔特文化居于附属性的地位。阿诺德对凯尔特文化的描述展现出殖民帝国对难以驯服的“化外之民”的焦虑,他试图以更加柔和的手段,在文学领域将爱尔兰民族文化纳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统中,消解爱尔兰的民族性,使大英帝国的统治实现从文化领域向政治领域的统一。

二

在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爱尔兰诗人叶芝力图恢复爱尔兰历史上的凯尔特传统,建构爱尔兰的民族性。叶芝本人并不是爱尔兰土著居民的后裔^②,但在爱尔兰的斯莱戈(Sligo)郡度过了童年,自小便受到爱尔兰文化的熏染。1875年,叶芝与父亲前往伦敦,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反复往返于伦敦和斯莱戈,在爱尔兰和英格兰的生活经历使叶芝深刻地感受到了两国之间的冲突和隔阂。他在《童年与青春的遐想》(*Reveries over Childhood and Youth*)一书中记录了对两地的不同印象,斯莱戈的自然风景、风土人情使叶芝深深眷恋,而伦敦给他留下的大多是厌恶和不满。他回忆道:“在十岁到十二岁的时候我在伦敦,我常含泪思念斯莱戈。”^③当时的伦敦正在经历速度惊人的人口膨胀,居住环境愈发恶化,中产阶级从城区迁往郊区并铺设喧闹的火车轨道,留在城市中心的是生活悲惨的穷人,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关于城市堕落的末日预言。^④与斯莱戈优美的风景和宁静惬意的生活相比,叶芝在伦敦目睹的更多是现代城市令人厌恶的一面,自然不可能对阿诺德所赞扬的辉煌的工业文明和中产阶级的功绩产生好感。不仅如此,叶芝在校园里还遭受到了英国男孩的欺辱,仅仅因为他是爱尔兰人;

① 非利士人(Philistines)是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一书中提出的对英国中产阶级的称呼。非利士主义是指英国中产阶级的阶级特性,阿诺德在《凯尔特文学研究》中对非利士主义持蔑视态度:“从美与趣味的角度看,是粗俗;从道德与情感的角度看,是粗野;从心灵欲精神的角度看,是不智。这就是非利士主义。”黏液质(phlegm)是阿诺德对撒克逊人脚踏实地、平稳前行的性格的定义,它使科学得到发展。阿诺德认可撒克逊人在科学和现代工业文明建造方面的成就,认为它确实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它过于沉滞,需要凯尔特特性中的激情和张狂来进行调和。Matthew Arnold, *On the 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 and on Translating Home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2, pp. xi, 83, 84.

② 叶芝的父母双方的祖先分别是无可置疑的盎格鲁-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并非爱尔兰土著。严格来说,叶芝是英国新教徒后裔。Brown, *The Life of W. B. Yeats: A Critical Biography*, Oxford and Malden: Blackwell, 1999, p. 63.

③ W. B. Yeats, *Autobiographies: Reveries over Childhood and Youth and The Trembling of the Veil*,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7, p. 21.

④ Terence Brown, *The Life of W. B. Yeats: A Critical Biography*, Oxford and Malden: Blackwell, 1999, p. 24.

他自己也看不起英国人，觉得他们不聪明也不文雅，只有艺术家是例外。^① 长期客居异国他乡的经历以及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使叶芝更为怀念爱尔兰故土，并且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

在斯莱戈，叶芝的舅公威廉·米德尔顿（William Middleton）一家人买下了一片土地并建造了庄园。他们出租小屋子给当地的下层人居住，并与这些人交往密切，常常出入他们的小屋。叶芝因此听到了许多乡村故事与仙子神话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也发现，在斯莱戈当地，所有知名的家族都有他们自己的奇异、悲伤或浪漫的传说，这使叶芝产生了一种冲动，他想把在斯莱戈的成长经历和见闻都记录下来。他常常对自己说：“如果我就这样离开并死去，却没人能听到我的故事，那真的是太糟糕了。”^② 因此，当他开始在伦敦写作时，他希望找到能聆听他的听众，文学成为他表达故土情结和抒发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路径。

也许正因如此，作为诗人的叶芝并不热衷于政治上的民族独立运动，他更希望能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让美好的爱尔兰与瑰奇的凯尔特神话进入人们的视野。正如他自己所说，“不存在没有民族的伟大文学，也不存在没有文学的伟大民族”^③。叶芝认为，爱尔兰在现代文学中还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主要是由于爱尔兰在新闻界和政治领域处于弱势地位，而非爱尔兰民族文学本身之过错。另外，这种与现代文学主流的“脱离”虽然导致了爱尔兰文学的式微，却也使之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远离了“世界主义”等可能对爱尔兰造成负面影响的现代性因素^④，为爱尔兰独立的民族性的建构提供了可能。

1890年前后，叶芝本人一直以狂热的爱尔兰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形象活跃于伦敦文坛。1886年，他于伦敦结识了芬尼亚运动领袖之一、爱尔兰诗人约翰·欧李尔瑞（John O'Leary），并在他的影响下开始阅读和翻译爱尔兰神话。在对爱尔兰历史素材的考察和整理中，叶芝发现爱尔兰民间流传的凯尔特神话具有代代相传的历史延续性，而且这些神话的主要受众多半是爱尔兰乡村的农民，因此民俗神话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政治和新闻领域的异国语言与文化的冲击，使在凯尔特神话内部构建一种具有连贯性的民族文化传统成为可能。叶芝试图对爱尔兰乡间口口相传的凯尔特神话进行探索、发掘、整理并公之于众，以作品的形式进入文学市场，在受众群中传播并造成影响，在文学与文化领域建构爱尔兰的民族身份。1888年，他参与编纂了于都柏林出版的《青年爱尔兰的诗歌与民谣》

① 参见傅浩：《叶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② W. B. Yeats, *Autobiographies: Reveries over Childhood and Youth and The Trembling of the Veil*,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7, p. 21.

③ W. B. Yeats, *Letters to the New Island*, ed. by Horace Reynolds, 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p. 103-104.

④ W. B. Yeats, *Letters to the New Island*, ed. by Horace Reynolds, 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 106.

(*Poems and Ballads of Young Ireland*), 并于同年在伦敦出版了他整理的爱尔兰民俗神话集《爱尔兰农民的仙子神话和民俗故事》(*Fairy and Folk Tales of the Irish Peasantry*)。1890年, 叶芝与在伦敦出生的具有威尔士背景的诗人欧内斯特·莱斯(Ernest Rhys)共同组建诗人会社(Rhymers Club), 这成为1892年建立的伦敦爱尔兰文学协会(Irish Literary Society of London)的前身。在叶芝等人的努力下, 众多以凯尔特神话为主题的爱尔兰民间故事以文学作品的形式面世。当时的文学气候也为叶芝的文化民族主义理想提供了较好的时势, 在1890年前后的伦敦文坛, 受到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意象派、颓废派等艺术潮流的影响, 人们的审美趣味也偏向于对传统的悖逆, 艺术中的新颖、怪异、神秘和无理性在审美领域大行其道, 而凯尔特文学不但充斥着具有强烈异国色彩的神话故事, 还具备迎合主流趣味的瑰奇的想象、神秘的世界观、颓废而忧郁的气质, 足以激起读者的兴趣, 并以异国文化的姿态冲击了伦敦文坛, 这赋予了叶芝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爱尔兰作家独特的民族身份, 使之在文学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并使凯尔特文化得到更广泛的关注, 为爱尔兰民族性的建构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阿诺德在《凯尔特文学研究》一书中论及凯尔特文学时, 对爱尔兰、威尔士、康沃尔等地区的凯尔特文化传统均有涉及, 并主张这几个地区与英国进行“文化融合”。他说道:“让我们按此考虑这个伟大原始民族正在萎缩和消失的剩余部分, 除了布列塔尼, 他们都属于英帝国; 我们拥有爱尔兰、苏格兰高地, 威尔士, 曼岛, 康沃尔。”^①但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 叶芝拒绝将凯尔特文化与英国文化合流, 他一直致力于将凯尔特文化建构为独特的爱尔兰民族特性。1893年, 叶芝出版了《凯尔特的薄暮》^②(*The Celtic Twilight*)一书。作为由叶芝本人独立搜集、编纂、创作的爱尔兰民间故事集, 这本书是叶芝将爱尔兰民俗文学与凯尔特传统糅为一体的重要尝试。在1893年版的前言中, 叶芝清楚地说明了他的创作意图:“在幻象中向那些愿意顺着我的指示看去的同胞们展示爱尔兰的一些特点。”^③事实上, 虽然题目中标有“凯尔特”的字眼, 但书中内容全部取材于爱尔兰西部的斯莱戈和戈尔韦(Galway)郡, 并没有涉及苏格兰、威尔士等历史上其他的凯尔特地区。全书的40个故事均为爱尔兰本土的乡村神话,

① Matthew Arnold, *On the 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 and on Translating Home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2, p. 135.

② 《凯尔特的薄暮》一书出版于1893年, 此后叶芝对其进行多次修改, 分别于1908年、1912年、1915年、1925年等发行多个修订版本。1932年, 包含《凯尔特的薄暮》一书的《神话集》(*Mythologies*)由叶芝定稿, 并委托给伦敦的麦克米伦(Macmillan)出版社进行后续工作, 最终由麦克米伦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Edward Hirsch Coming out into the Light: W. B. Yeats's translating Homer 4 Trembling of the Journal of the Folklore Institute 18, No. 1, 1981, pp. 1-22; W. B. Yeats, *Mythologies*, eds. by Warwick Gould and Deirdre Toom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xxii. 本文引用的《凯尔特的薄暮》的内容来源于《神话集》一书。

③ W. B. Yeats, *Mythologies*, eds. by Warwick Gould and Deirdre Toom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439.

充斥着瑰奇的想象和神秘的氛围，讲述爱尔兰农民遭遇仙子、鬼魂等超自然生物的经历。在《凯尔特人的薄暮》中，叶芝不但将爱尔兰置于凯尔特文化的核心位置，更试图在更细致的层面区分凯尔特人内部各民族文化的区别，区分的对象主要是同为凯尔特人后裔、位于海峡对岸的苏格兰人。在《对爱尔兰人扭曲了他们的鬼魂和仙子的性情的抗议》（A Remonstrance with Scotsmen for Having Soured the Disposition of Their Ghosts and Faeries）一文中，叶芝对爱尔兰和苏格兰民族对仙子的看法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具有截然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苏格兰人拘泥于神学、太过阴郁，它们将仙子和女巫等神秘主义人士看作危险的异教徒而进行审判，但爱尔兰人与仙子的关系显然更加友好，甚至可以在仙子的帮助下使用药草来治愈伤者。在进行了一系列此种具有褒贬性质的举例后，叶芝总结道：

这两种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式对这两个国家造成了影响，使两国的精灵和妖精的世界也有所不同。对于它们快乐优雅的行为，你一定要去爱尔兰寻找，对于它们的恐怖行径你要去苏格兰寻找。我们爱尔兰的仙子的恐怖事迹在一定程度上是假装的，如果一个农夫迷路走进一个有魔力的小屋我们不会觉得焦虑，因为我们知道他会在绿色田野中醒来。在苏格兰，这却是截然相反的。你们已经歪曲了鬼魂和妖精的天然的良好性情。^①

叶芝指出，在爱尔兰民间故事中，“人类与鬼神之间有一种怯生生的感情”^②。但在苏格兰的神话中，洞穴里的怪物、水鬼和水怪都可能成为杀害人类的凶手。在叶芝看来，苏格兰人的鬼神观导致自然的神秘不再是一种美，而是一种源于未知的恐怖，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误、一种歪曲。叶芝的指责无疑对苏格兰神话进行了贬低，并暗示了爱尔兰在凯尔特文化中的正统地位。虽然叶芝的论证与结论略显武断与偏颇，但也流露出一种将爱尔兰人与其他凯尔特人分支区别开来的急切，展现了叶芝在民族身份建构方面的某种焦虑。

三

若要从凯尔特文学中寻求爱尔兰民族性的建立，就必须首先消解凯尔特人在欧洲文化中的野蛮、放纵等印象，为凯尔特性在现代文明中的延续寻求合法性依据。而阿诺德所著的具有巨大影响的《凯尔特文学研究》一书无疑首当其冲，成为叶芝为凯尔特文学辩护的出发点与首要的反驳对象。

阿诺德将凯尔特人与古希腊人进行了对比，指出作为古老民族的凯尔特人无

^① W. B. Yeats, *Mythologies*, eds. by Warwick Gould and Deirdre Toom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71.

^② W. B. Yeats, *Mythologies*, eds. by Warwick Gould and Deirdre Toom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70.

法造就出如古希腊一般伟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暗示了凯尔特文化的野蛮与落后。叶芝认为凯尔特文化并非被历史所淘汰的野蛮文化，他对于凯尔特民族的悠久历史抱有自豪感，如同古希腊的多神教世界一样，凯尔特人的信仰远比英国人所信仰的上帝更加古老悠远：“在上帝创造天国的氏族之前，她的历史就已开端，她那红玫瑰色的衣边，将这一切记录在书页之间。”^① 凯尔特人与古希腊人都是世界上的古老民族，它们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共鸣，而非野蛮与文明的对立。在《文学中的凯尔特要素》一文中，叶芝重申并认可了阿诺德对凯尔特人的理解：“与自然的‘美’相比，凯尔特人对自然的激情更多地源自自然的‘神秘’，这种激情为自然增添了‘魅力和魔力’。”^② 但他继而指出，这种看待自然的眼光并不是凯尔特人所独有的，而是世界上古老民族所共有的一种“自然魔力”（Natural Magic）观，是一种古代宗教、一种古老的自然崇拜，是对于万物有灵论的确信，是对于自然界诸多生物和现象的神秘的共情。凯尔特人相信世间万物均有生命，自然现象就是鬼魂和仙子活动的印记，而神灵无处不在，人与神灵可以面对面地交谈。古希腊人也持类似的自然观，因而才诞生了恢宏的万神殿和灿烂的神话，它与凯尔特人一样，拥有对于现代人而言难以触及的异教世界（the pagan world）。凯尔特人与古希腊人在信仰方面的相似性对叶芝来说至关重要，这确保他能够将凯尔特人的民间宗教和民俗故事置于欧洲文化的伟大传统的中心。^③

对于阿诺德所批判的凯尔特人在造型艺术领域的失败，叶芝的短诗《雕像》（*The Statues*）构成具有针对性的回应。在他看来，由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按照比例精密设计的古希腊人体雕像虽然伟大，却缺乏由激情而带来的性格。更有甚者认为，现代文明所发展出的审慎冷静的科学知识驱逐了神话，当人们观看雕像之时，所发现的只有由计算、数字、尺度所构成的严格公式，所欣赏的更多的是古希腊人在数学和雕刻技术方面的成就，古希腊的人体雕像成为一件“用锤规测量”的冰冷物体。在这精细雕琢的人体之中，真正赋予雕像以灵魂的人类性格却缺失了。在叶芝看来，具有悠久信仰和历史的凯尔特人比现代的数理知识更贴近古希腊的造型艺术：“我们爱尔兰人，生于古老的宗派……登上我们特有的黑暗吧，如此我们可以探索一张用锤规测量的面孔的轮廓。”^④ 凯尔特人拥有与古希腊人共通的情感气质，在现代文明看来，“黑暗”的神话与信仰并没有使凯尔特人在艺术上迟滞，虽然凯尔特人缺少对于激情的制衡，但这种激情却能赋予伟大的古希腊雕像以性格和灵魂，深入探索古希腊雕像在精细而静穆的表象背后所蕴

① W. B. Yeats, *Collected Poems of W. B. Yeats*, London: Collector's Library, 2010, p. 89.

② W. B. Yeats, *Ideas of Good and Evil*, London: A. H. Bullen, 1907, p. 271.

③ Daniel Hoffman, *Barbarous Knowledge: Myth in the Poetry of Yeats, Graves, and Mui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68-69.

④ W. B. Yeats, *Collected Poems of W. B. Yeats*, London: Collector's Library, 2010, pp. 430-431.

含的丰富精神世界。在此意义上，凯尔特人远比“文明”的现代人更能接近古希腊艺术的核心，虽然叶芝以“黑暗”来形容凯尔特文化，但这种黑暗中蕴藏着的已经不是野蛮而是与古老民族的信仰之间一种神秘的共情。

虽然凯尔特人缺乏伟大的史诗，但它的民间神话与诗歌中暗藏着与古希腊人相联通的精神潜流。在《尘土已合上海伦的眼睛》（*Dust Hath Closed Helen's Eye*）一文中，叶芝提及一位叫拉夫特里（*Raftery*）的爱尔兰盲诗人，他歌颂一位拥有惊人美貌的姑娘，这位名为玛丽·海恩斯（*Mary Hynes*）的女子引得无数男性争相追逐，为她心醉神迷，甚至为了一睹芳颜而丧命，她的美貌因此造成了众多的灾祸。虽然这位姑娘年纪轻轻就死了，但爱尔兰农民认为她是被仙子、神灵掳走了。叶芝将这位盲诗人笔下的玛丽比作荷马笔下的海伦，爱尔兰青年会为玛丽变得温柔，就好像特洛伊的长老们看到城楼上的海伦心肠就会立刻变软一样。这一传统的爱尔兰传说与荷马史诗形成了互文，无论是在凯尔特神话还是在古希腊神话中，盲诗人与美女的故事都反映了美应当与神灵共在的人类信仰，体现了真与美合一的哲学理想和人类对美的永恒追求。叶芝因此而感叹：“在他们的信仰和情感之中，这些穷苦的乡村男人和女人比我们这些有学问的人更接近古老的希腊世界。”^① 由知识的进步而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已经远离了古代的智慧，而恰恰是被“有学问的人”看作迷信、愚昧和野蛮的凯尔特神话反而搭建起了与古希腊的精神桥梁。

人类学家弗雷泽（*J. G. Frazer*）在《金枝》（*The Golden Bough*）一书中指出，人们往往嘲笑、憎恶与蔑视野蛮人，但“我们和他们共有的东西，我们认为真实有用故意保存的东西，都应归之于我们野蛮的祖先”^②，自诩为文明社会一员的现代人为自然祛魅，将古代神话看作迷信、愚昧与野蛮的代名词，但人类得以传承至今的一切知识，实际上都建立在古老民族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叶芝的观点与弗雷泽有着相似之处，他在一生中对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科学理性主义都持反抗态度，支持浪漫主义的知识形式。^③ 在叶芝看来，以超自然、万物有灵、神秘、想象等元素为代表的凯尔特民俗故事和传说更能传达人类真理性的认识，古代民间诗人传唱的神话故事甚至比现代文明的知识更贴近真正的智慧：“他的诗歌是全能的神的礼物，全能的神有三种礼物——诗歌、舞蹈和原因可以给予。这就是为什么古时候一个无知的山里人会比你们现在遇到的受过教育的人举止更得

① W. B. Yeats, *Mythologies*, eds. by Warwick Gould and Deirdre Toom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18.

② [英]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页。

③ James Pethica, “Yeats, Folklore, and Irish Legend”, *The Cambridge Company to W. B. Yeats*, eds. by Marjorie Howes and John Kell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29.

体、更有学问，他们的这一切直接来源于神灵。”^① 看似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其实追求的是超脱于具体事物的无限与永恒的真理，它以隐喻、寓言、形而上的启示等形式，传达了古代人民对自然与生命实质的洞见。因此，叶芝在谈及爱尔兰乡间的凯尔特神话时说道：“民间艺术的确是思想中最古老的贵族，它拒绝短暂易逝、微不足道的东西，拒绝仅仅小聪明与俗艳，正如它也拒绝粗俗和虚伪；它将一代代人最质朴、最难忘的思想纳入自身，所以它是所有伟大艺术植根的土地。”^②

叶芝对凯尔特文学的前景充满信心。他认为现代艺术已经远离古代智慧的精髓，舞台上上演的古希腊题材的戏剧至多不过是对古典时期的现代模仿^③，但在爱尔兰民间，古老的凯尔特神话依然代代相传。这是一座蕴含着古代智慧遗产、仍需人们去挖掘的宝库，它将使人们重新回到以“自然魔力”为主旋律的神话时代。正如叶芝所说，“只有我们将自己置于生活的各个处境之中，从最悲惨的处境到那些太过崇高以至于我们只能在象征与神秘之中才能谈及的处境，真正的智慧才变得可能”^④。凯尔特文学将在现代理性所构建的科技文明之外重现古代人民的激情与智慧，在狂想与幻视中孕育伟大的艺术作品，并打开新的真理向度。

四

凯尔特神话不仅是爱尔兰民族文化复兴的源泉，也是推动欧洲文学发展的动力，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在《凯尔特文学研究》中，阿诺德区分了英国文学中描述自然的四种方式：传统的描述方式、忠实的描述方式、希腊的描述方式、魔法的描述方式。^⑤ 其中，魔法的描述方式是凯尔特文学的特点，它赋予自然以魔力和魅力。在阿诺德笔下，这四种方式穿插交替在英国文学之中，难以区分高下。叶芝对于阿诺德的分类方式颇为认可，但他赋予了凯尔特文学特质以更重要的地位。在《文学中的凯尔特因素》一文中，叶芝论述道，前三种看待自然的方式只是以人类看待花园的情感来看待自然，忘却了古老宗教时代人们对于自然

① W. B. Yeats, *Mythologies*, eds. by Warwick Gould and Deirdre Toom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18.

② W. B. Yeats, *Mythologies*, eds. by Warwick Gould and Deirdre Toom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91.

③ W. B. Yeats, *Letters to the New Island*, ed. by Horace Reynolds, 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 106.

④ W. B. Yeats, *Ideas of Good and Evil*, London: A. H. Bullen, 1907, p. 243.

⑤ Matthew Arnold, *On the 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 and on Translating Home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2, pp. 124-125.

的心醉神迷、狂喜与激情。凯尔特因素对于文学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它曾为欧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素材，例如亚瑟和圆桌骑士与圣杯的传说影响了欧洲的骑士小说和浪漫精神，并“改变了人类情感的根基”^①，使欧洲文学从凯尔特文学中获得了众多幻想的元素并得以保持活力：

文学缩减到仅仅是一种事件编年史，或者是毫无激情的幻想、毫无激情的冥想，除非文学不断地被注入古时的激情和信仰，而在斯拉夫、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凯尔特这些欧洲古老时期的激情和信仰的泉源中，唯有凯尔特在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接近欧洲文学的主流。它又一次地将“过度”的“生机勃勃的精神”带入欧洲艺术。^②

凯尔特神话不但在历史上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它对当今时代的欧洲文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叶芝认为，随着18世纪以来理性与科学的兴盛，对“外部秩序”的阐释一度成为艺术的重要主题，科学、政治、哲学和道德被引入诗中，由此诞生了一系列以实证主义为依据的现实主义小说和严肃诗。但理性主义与物质主义也使人类变得死板僵硬，使人类看待世界的眼光变得冷漠而了无生趣，各国已经不再产生可与古代文学相媲美的伟大作品，因为“人类的心灵已经被各种实际变化填满，活生生的想象已经被逐出这个世界”^③。相应地，众多的政治风云和社会动荡也使人类的心灵疲惫不堪，对现实的不满与无能为力的苦闷使一切终归虚无的颓废之感充溢内心：“人类追求并赢得世界，并筋疲力尽地倒下……他最后真实地看到了它们……发现它们就是空气、尘埃、水汽。”^④在此背景下，叶芝认为，艺术需要做出改变并肩负起解放人类心灵的责任，引导我们回到“我们的旅途”。他指出，我们需要“用炼金术的蒸馏法来代替化学分析和其他科学”^⑤。作为巫术、宗教和魔法的符号的炼金术，代表了早期人类看待自然的神秘方式，代表了一个与科学相对立的神话世界，这正是凯尔特文学的典型特质。

在《垂暮之年》（*The Autumn of the Body*）一文中，叶芝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文学发展的脉络，他指出，各国文学中都出现了“颓废”的迹象。19世纪末期，艺术上的颓废主义运动已经在英法等国兴起，并孕育了颓废派、象征派、印

① W. B. Yeats, *Ideas of Good and Evil*, London: A. H. Bullen, 1907, p. 291.

② W. B. Yeats, *Ideas of Good and Evil*, London: A. H. Bullen, 1907, p. 290.

③ W. B. Yeats, *Explora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62, p. 148.

④ W. B. Yeats, *Ideas of Good and Evil*, London: A. H. Bullen, 1907, pp. 302-303.

⑤ W. B. Yeats, *Ideas of Good and Evil*, London: A. H. Bullen, 1907, p. 303.

象派等美学分支。著名批评家亚瑟·西蒙斯对此做出了经典定义,他认为颓废主义运动与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等伟大民族的晚期时代一样,展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一种永不停歇的探索的好奇,一种精致之上的过分精致,一种精神和道德上的反常”^①。艺术家们不再关注外部事物,转而探求心灵的幽暗深微之处。叶芝敏锐地意识到,颓废主义与凯尔特文学之间有着诸多共通之处,这不但为凯尔特文学的推广提供了良好的时代契机,也为凯尔特文学进入欧洲文学主流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颓废主义与凯尔特文学在风格与内容上有着诸多共同之处。凯尔特民俗神话所关注的是无限和永恒之事,面对神秘而无穷的大自然,人类一方面能够感觉到生命的渺小、脆弱、孤独而短暂,由此孕育出忧郁与感伤的情绪,但万物有灵论的信仰也使人们在对自然界的交感与幻视中产生了对于神秘之美的狂喜与激情。颓废主义文学作品中也充斥着激情的风暴与病态的忧郁、想象的肆虐与幻觉的错乱、五彩斑斓的意象与非理性的感知。作为颓废主义运动一支的象征派意图通过象征符号来达成与自然万物的交感,在对自然的聆听与反馈中,达到“对无限(the infinite)的展现与揭示”。^② 颓废主义与凯尔特文学都专注于表现意识的幽暗晦涩、感官的敏感性,拒绝以理性与科学对世界做深度阐释,而是将之看作一个神秘、变幻无穷而深不可测的感觉对象,或者用阿诺德对凯尔特文学的一个经典定义来说,它们都是“对事实专制主义不屈不挠的反抗”^③

颓废主义文学因此反对将外部题材引入艺术之中,主张艺术应源于心灵内部的声音,抗拒任何刻意的修饰、雕饰与艺术传统,正如西蒙斯在形容象征派时所说,这是艺术在科学的时代“对外部性、修辞和物质主义传统的反叛”^④。这种艺术内部的反传统、反理性运动在此之前就初露端倪,18世纪晚期,浪漫主义运动已经开始主张文学创作中情感的自然流露优于智性的说教与刻意雕琢。作为浪漫主义遗产的一部分,民俗艺术也开始被视作经验与情感的宝库,它比受教育者创造的人工文化与艺术更加有力、更加真实。^⑤ 凯尔特文学以充满激情与幻想的民俗神话为主体,天然地对理性、科学、艺术规则保持反抗姿态,而凯尔特人民长久以来在欧洲人心中“野蛮”“迷信”“放纵”的印象恰好切合了颓废主义运

① Arthur Symons, "The Decadent Movement", in *Literature Victorian Prose: An Anthology*, eds. by Rosemary J. Mundhenk and LuAnn McCracken Fletch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50.

② Arthur Symons, *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Literature*,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1919, p. 3.

③ Matthew Arnold, *On the 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 and on Translating Home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2, p. 77.

④ Arthur Symons, *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Literature*,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1919, p. 9.

⑤ James Pethica, "Yeats, Folklore, and Irish Legend", *The Cambridge Company to W. B. Yeats*, eds. by Marjorie Howes and John Kell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31.

动反理性、反传统的旨趣。此外,凯尔特的还拥有悠久的历史与尚未发掘的丰富传说,每一个新故事都与象征主义者的想象一样,可以构成“对于世界想象的新的陶醉”^①。因此,叶芝相信凯尔特神话可以为欧洲文学的发展提供全新的素材:“现在有一股新的传说泉源,一种比欧洲任何泉源都丰富的泉源,即伟大的盖尔语传说泉源,正在开启。”^②

在叶芝所处的时代,人们对于凯尔特文化的印象大多停留在野蛮、感性与放纵,不仅阿诺德等英国人对爱尔兰的文学仍然怀有一定程度的轻视和不屑,爱尔兰人自身也对本民族文学的前途抱有怀疑。1891年,在写给伦敦的爱尔兰诗人艾伦·欧李尔瑞(Ellen O’Leary)的信中,叶芝提及一位睿智的爱尔兰青年,他认为爱尔兰人太过诗性,以至于不能成为伟大的诗人,因此爱尔兰人是一个充满“才华横溢的失败者”(Brilliant Failures)的民族。^③但叶芝始终没有对爱尔兰文学的前途失去信心,他一方面认可爱尔兰人所创作的这种以短篇作品为主的现代民谣文学(Modern Ballad Literature),将其看作在这个繁复精细的时代里独一无二的壮举,另一方面又坚信爱尔兰文学的未来将会改变,正如他所说,“凯尔特人已经在过去创造了伟大的作品……也将毫无疑问地在未来创造伟大的作品”^④。作为凯尔特人的一支,爱尔兰人如果以其波澜诡谲的历史为素材创作戏剧和故事,终有一日会树立文学上的丰碑,以至于“全世界都将聆听我们并像儿童听到新颖故事一样围坐在我们脚下”^⑤。在叶芝眼中,凯尔特的感性特质、悠久历史和丰富的神话故事,将为凯尔特文学、为变化中的欧洲文学带来新的生机。

结语

时隔20余年,阿诺德的《凯尔特文学研究》与叶芝在文学领域宣扬凯尔特文学的呼声前后相继,展现了英国与爱尔兰在文化领域的传承。二人不同的民族立场使他们的观点针锋相对,虽然叶芝鲜少直接攻击阿诺德的观点,但他的反击却散落在他的作品中。诚然,叶芝搜集神话的渠道较少、范围狭窄,而且不通盖

① W. B. Yeats, *Ideas of Good and Evil*, London: A. H. Bullen, 1907, pp. 293-294.

② W. B. Yeats, *Ideas of Good and Evil*, London: A. H. Bullen, 1907, p. 292.

③ W. B. Yeats, *Letters to the New Island*, ed. by Horace Reynolds, 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 130.

④ W. B. Yeats, *Letters to the New Island*, ed. by Horace Reynolds, 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 130.

⑤ W. B. Yeats, *Letters to the New Island*, ed. by Horace Reynolds, 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 159.

尔语。纵有格雷戈里夫人 (Lady Gregory) 等友人的协助, 他仍不足以称为科学、严谨的民俗学家。在叶芝的一系列宣扬凯尔特文学的神话集、诗歌、散文作品中, 我们所发现的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诗人和神秘主义信仰者所特有的浪漫、想象与诗性的建构, 而不是对爱尔兰历史与凯尔特文学作品所进行的深入严谨的语文学和史学考察。正因为此, 叶芝一度感受到了对“凯尔特”一词的使用给他施加的压力, 因为这个定义颇为模糊、站不住脚。^① 相应地, 他对于爱尔兰民间文学与凯尔特文化的观点也出现过反复。^② 但是, 这何妨叶芝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呢? 他对凯尔特文学的阐释, 使式微的爱尔兰文学与凯尔特文化传统相连接, 赋予凯尔特文化以与古希腊文明相比肩的地位, 将其看作古代智慧的代表与现代文学的泉源, 并借欧陆颓废主义思潮的时代波澜, 将凯尔特文化重新纳入欧洲文学与文化的主流, 在欧洲掀起了凯尔特复兴的热潮。叶芝对凯尔特文学的阐释和推广有力地促进了爱尔兰文艺复兴, 在《凯尔特的薄暮》出版几年之后, 爱尔兰文学剧院和阿比剧院相继成立, 一系列爱尔兰民族戏剧的上演与爱尔兰民俗作品的出版行使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凝聚成一股强有力的文化话语, 与爱尔兰本土寻求独立的革命活动交相呼应、并蒂生辉, 并对 1921 年爱尔兰自由邦的建立起到了促进作用。阿诺德在《凯尔特文学研究》一书中将没落的凯尔特文化看作英国文学的支流, 但叶芝使这股“支流”获得了新的源泉, 不断壮大, 滋养着他的故土。“爱尔兰的文学依然年轻, 在这条道路上处处都是凯尔特的传统和热情, 迫切地等待歌者来歌颂它们。英格兰已老, 她的诗人只能积蓄几乎已经结束的盛宴上的残渣, 但是爱尔兰的盛宴桌却依然盈满。”^③ 这也许就是叶芝对阿诺德关于凯尔特文学最贴切的回应和超越, 也彰显了爱尔兰民族文化建构的深层时代意蕴。

① James Pethica, “Yeats, Folklore, and Irish Legend”, in *The Cambridge Company to W. B. Yeats*, eds. by MarJorie Howes and John Kell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35.

② 叶芝于 1899 年前后开始将民间神话的想象核心归因于具有文学天赋的民俗诗歌作者, 而不再将其看作广大爱尔兰乡村人民的敏锐情感, 换言之, “凯尔特性”不能被看作爱尔兰人民普遍拥有的民族性。也许正因为此, 《凯尔特的薄暮》一书在 1925 年修订版中对《一个幻视者》(A Visionary) 与《食宝石者》(The Eaters of Precious Stones) 两文进行了修改, 删除了“凯尔特式的悲伤”“凯尔特人的狂念”“凯尔特幻景”“凯尔特地狱”等描写爱尔兰人身上“凯尔特特质”的语句。但 1903 年之后, 叶芝在其作品中又重新强调了爱尔兰乡村人的“古代想象”这一丰富的传统。James Pethica, “Yeats, Folklore, and Irish Legend”, *The Cambridge Company to W. B. Yeats*, eds. by MarJorie Howes and John Kell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37-138; W. B. Yeats, *Mythologies*, eds. by Warwick Gould and Deirdre Toom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282, 443, 445.

③ W. B. Yeats, *Letters to the New Island*, ed. by Horace Reynolds, 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 148.

The Deep Implic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rish National Culture Based on Yeats and Arnold's Different Perceptions on Celtic Literature

Zhou Qi

Abstract: The voices of Arnold and Yeats to promoting Celtic literature reflect their different perceptions on this issue.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rnold incorporated Irish national culture into the Anglo-Saxon tradition and dissolved the Irish nationality. Yeat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eltic literature connected the fading Irish literature with the Celtic cultural tradition and gave Celtic culture a position comparable to the ancient Greek civilization, bringing back Celtic culture into the mainstream of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Yeats' promotion of Celtic literature strongly motivated the Irish Renaissance, making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coalesced into a powerful cultural discourse, which echoed and reinforced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Ireland.

Keywords: Yeats; Arnold; Celtic Literature; Renaissance

[责任编辑:焦佩]

百年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李梦睿 鲁法芹^{**}

【摘要】一部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历史，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展开的历史。百余年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主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主题性特点。晚清民国时期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几乎与人类文明史相伴而生，并以此论证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成为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主导，并推动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以及社会主义流派史、经济思想史、政治学说史等不同领域的专门研究，拓展和深化了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领域。新世纪特别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理性发展阶段，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四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背景下，应继续深化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同时亟须加强和提升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

【关键词】社会主义思想史；科学社会主义；编译

社会主义思想史又称社会主义学说史，是一门研究社会主义思想或学说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我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关注，起于20世纪初，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从纵向看，大致可划分为晚清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初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时代五个阶段，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主题性特点，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主题相呼应；从横向看，以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为基础，带动了社会主义

^{*} 本文系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资助项目“五四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流派的文献发掘、整理、汇编与研究”（IFYT1908）的阶段性成果。

^{**} 李梦睿，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鲁法芹，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理论与现实。

运动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流派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以及社会主义国别史等不同领域的专门研究，研究内容越来越深化，也越来越丰富。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特别是受学术视野和学术能力的制约，本文难免会挂一漏万，顾此失彼，而预先指出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

一、晚清时期：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的开端

本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主导的洋务运动，“不自觉地最早开启了一道接触西方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的窗口”^①。通过这个“窗口”，国人有幸目睹了巴黎公社起义，这也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起始。之后，在传教士创办的《西国近事汇编》《万国公报》杂志以及《富国策》《富国养民策》《佐治刍言》等早期译著中，出现了 Socialism、Communism 的汉语音译，以及对这一学说内容的简单概括。这些信息尽管构成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源头，但正如《申报》创刊号（1872年4月30日）“本馆告白”所指出的那样，“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也就是说，在早期传播者看来，这也不过仅仅是一种“猎奇”性的新闻报道而已。历史的辩证法在于，这些星星之火却最终形成燎原之势，并将中华民族的前途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了一起。

甲午战争后，变法图强逐渐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1896年，在国人自办报刊《时务报》上，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一词，并注释其为“学派之名”。^②将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科学或学问来看待，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一大显著特色，从而为接下来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史预埋了伏笔。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以及一批东渡日本的青年学子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新路的同时，开始真正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并一度在20世纪初形成将日本社会主义方面的著作介绍到中国的热潮，从而真正开了国人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先河。

1901年，《译书汇编》连载的《近世政治史》第一次提及国际共运史的相关内容，即简介了第一国际的历史。^③从1902年开始，中文报刊上开始出现专论社会主义的文献，如《翻译世界》第1～3期连载的《社会主义》和《新世界学报》第10～15号连载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两篇译文。与此同时，一批社会主义的译著也陆续出版，比如幸德秋水的《广长舌》和《社会主义神髓》、岛田三郎的《社会主义概评》、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以及矢野龙溪的《新社会》、西川广次郎的《社会党》，等等。其中，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

① 皮明麻：《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② [日]古城贞吉：《硕儒诂音》，《时务报》第12册，1896年。

③ [日]有贺长雄：《近世政治史（续）》，《译书汇编》第2期，1901年。

17万余字,首版于1903年,再版于1927年,是第一部系统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史、流派史和运动史的作品。该书第一编“第一期之社会主义——英法二国之社会主义”着重介绍了英、法的社会主义思想,依次介绍了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卡贝、蒲鲁东、路易·勃朗的生平、著作与学说;第二编“第二期之社会主义——德意志之社会主义”着重单独介绍了德意志的社会主义,涉及马克思的生平、学说,以及第一国际的历史、洛贝尔图斯和拉萨尔的生平与学说;第三编“近时之社会主义”,依次介绍了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流派的沿革及其主要观点;第四编“欧美诸国社会党之现状”,分别介绍了英国、法国、德国、中欧诸国、东欧诸国及美国社会党的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世社会主义》明确提出了“必以学理为社会主义之根据”的命题,并认为以“学理”而“创立新社会主义,以唱道于天下,舍加路马克思其人者,其谁与归。”^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部译著已经隐含着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对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分析范式,即社会主义经过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运动的发展历程。这部译著所涉及的史料及其用语,也对后来我国学者接受和理解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②

以《民报》创刊为标志,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围绕“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虽然双方立场针锋相对,但却在中华民族发展前途问题上取得了一致,即双方都主张应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民生主义”政策。^③随后,伴随着《天义》《新世纪》杂志的先后创刊,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围绕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探究,在机械进化论引导下,将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流派正式引入中国。^④尽管他们还无法廓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流派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不自觉地成为介绍、宣传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先行者,并首次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部分内容。

二、民国时期:译著与自撰交相辉映

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改造中国与世界”^⑤成为时代最强音

① [日] 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赵必振译,上海时代书店1927年版,第125页。

② 比如,蔡元培和郭沫若对此书的印象就极其深刻。参见《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页;[日] 向坂逸郎:《郭沫若与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田家农译,《郭沫若研究》第7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81~285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23~324页;《梁启超全集》第十七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0页。

④ 参见鲁法芹:《“别筹革命之方”——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入及论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年第1期。

⑤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激励下,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社会主义思想史译著作品的出现,特别是国人自撰作品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工作的真正开始。经过大浪淘沙和仔细甄别、取舍,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成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唯一选择,并结出了累累硕果。

(一) 民国初年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概述

民国初年,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对民生主义的坚持和宣讲,尤其是1912年10月,他在上海社会党总部连续三日作了题为《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批评》的演讲,江亢虎发起成立的以鼓吹“广义的社会主义”为宗旨的中国社会党对社会主义大肆渲染。这些宣传在民初掀起了一股社会主义传播热潮并引发了争论。大致说来,以“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先后下令解散中国社会党和国民党为标志,民国初年中国社会主义思潮可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政见相标榜、围绕国会选举而成立的各政党对“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问题展开讨论,促进了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形成了师复所谓“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伴随着《晦鸣录》《民声》以及“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的成立,在第二阶段形成了本土的“师复主义”。^①在这一论争过程中,正如孙中山演讲标题所揭示的,必然涉及社会主义流派史的相关知识,自然而然促进了国人对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关注。比如《生活》杂志连载的署名“畏垒”的《法兰西社会主义家小传》依次介绍了巴贝夫、卡贝、圣西门、傅立叶的生平、学说和主张。《新世界》杂志发表的署名“煮尘”重治、“势伸”译述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尤其是施仁荣译述的《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即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首个中译本,对大致理解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以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均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此外,《进步杂志》刊载的《德意志社会主义之发展》《法兰西社会主义之发展》和《东方杂志》刊载的《晚近社会主义之派别与宗旨》《社会主义商兑》《社会主义》等文,对社会主义及其运动的最新进展和动态做了介绍,进一步拓宽了国人的视野。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思想史翻译代表性作品分析

大约从1919年下半年开始,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讨论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形成了极普遍的社会舆论,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②正是鉴于“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澳、美各洲非常发达,而派别亦复甚多;我们对于这种运动要想

^① 鲁法芹:《民国初年中国社会主义思潮概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1年第1期。

^② 参见朱志敏:《五四民主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

具一种有统系的知识，须先从历史下手”^①，李季着手翻译了克卡朴（Thomas Kirkup）原著、辟司（Edward R. Pease）增订的《社会主义史》。稍后，薛嘯成和沈端方合译了辟司（E. R. Pease）的《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22），以及孙百刚翻译了（Thomas Kirkup）的《社会主义初步》（中华书局，1923）。这三部译著，初步奠定了国人了解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基础。

如果说《社会主义史》的内容侧重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李季随后翻译的美国学者列德莱（Harry W. Laidler）的《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商务印书馆，1923）的显著特色，就是进一步回答了“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此正如《新青年》第8卷第6号所刊登的李季对本书的简介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第二部分的内容即“社会主义之运动”与之前所译的《社会主义史》“恰相衔接，尤足资研究大战后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之人之考镜，故特译成国语，以飨国人”。之后，又有杨代复《社会主义及其运动史》（中央政治学校，1929～1930）、郑学稼《社会主义思想史》（黎明书局，1933）和沈嗣庄《社会主义史》（商务印书馆，1937）三个不同译本。沈嗣庄译本在“原著者自序”中介绍道：本书力图着力解决以下六个问题：社会主义中各种重要派别的学说、各派的异点和互相影响之处、社会主义运动中各种趋势代谢之社会原因、决定各派色彩和方针的较为重要的人格、略述各地社会主义党进展中之重要事件、分析一切有连带关系的社会改造运动。^②对此，郑学稼译本认为，作者原序“因为价值不及内容，并且对于中国人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把它删去”^③。不过，郑学稼译本的优点，《申报》（1933年11月2日）所作广告说：“由译者增补十余万字之注释，不啻一部最完备的社会主义大辞典。”

1927年6月，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了胡汉民由日文转译的德国学者俺·伯亚（N. Bear）《社会主义史》两卷本，即麦克司·比尔（Max Beer）《社会主义和社会斗争通史》（*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sozialen Kämpfe*）的第四、五两部分。之所以特意选择这两部分内容，胡汉民曾回忆说：“我当时译这两卷书，有一个小小的意思：以为国内的知识分子，虽有一部份在大谈其唯物论，可是当时所谈的，实在很浅薄；至于能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去解释历史的，所见更稀少；我译这两卷书，一方面想介绍这唯物史观的方法之应用，这个意思，是相等于我从前做‘唯物史观的伦理之研究’的；一方面我从产业时代译起，要我们明了近两世纪西欧社会主义思想的演进，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情形。”^④随后，民智书局又以《产业革命时代社会主义史》和《马克思主义时代

① [英] 克卡朴原著，辟司增订：《社会主义史》，李季译，新青年社1920年版，第1页。

② 参见[美] 列德莱：《社会主义史》，沈嗣庄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4页。

③ [美] 雷岱尔：《社会主义思想史》郑学稼译，黎明书局1934年版，第4页。

④ 胡汉民：《三民主义的历史观——序叶译贝尔（Max Beer）所著〈社会斗争通史〉》，《三民主义月刊》第3期，1933年。

社会主义史》出版了该译述的单行本。1929年冬，在汤澄波的建议和推荐下，叶启芳开始着手从头翻译该书的全部内容。^①随后，在《社会斗争通史》的总书名下，由神州国光社陆续出版了五分册，即《古代社会斗争史》《中世纪社会斗争史》《近代农民斗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近代社会斗争与社会思想》《现代社会斗争史》。1936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M. Beer原著、汤澄波译的《英国社会主义史》二卷本。此外，还有丘哲翻译的日本学者久保田明光原著的《社会主义思想之史的解说》（启智书局，1929）、何飞雄和黄尊三分别翻译的美国学者伊利（R. T. Ely）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商务印书馆，1922）和《近世社会主义论》（商务印书馆，1926），以及汤浩翻译的英国乔治·宾森（George Benson）的《英国社会主义史》（民智书局，1929）等。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人自撰社会主义思想史代表作品分析

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对社会主义误读、曲解甚至诋毁的言论也开始甚嚣尘上，以致连社会主义主张“公妻”这种“毫无常识的话，却有许许多多人说，许许多多人相信”。^②为了澄清是非和矫正思想界的混乱，梅生特意编著了《社会主义浅说》（新文化书社，1923）。《社会主义浅说》以“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主线，着重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修正派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布尔雪维克主义等流派，开启了国人自撰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先河。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孙倬章撰写的《社会主义史》，共分七章，依次为“理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科学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基督教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际的运动”“社会主义的原理”^③，大致梳理了社会主义思想史发展的脉络，是国人自撰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奠基之作。之后，又陆续出版了几部社会主义思想史方面的专著，如赵兰坪《社会主义史》（商务印书馆，1928）、熊得山《社会主义之基础知识》（新生命书局，1929）、吴黎平《社会主义史》（上海南强书局，1930）、华超《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商务印书馆，1930）、王德周《社会主义史大纲》（益群学社，1933）、刘炳黎《社会主义史纲》（中华书局，1934）、沈嗣庄《社会主义新史》（青年协会书局，1934）以及陶大镛《社会主义思想史》（士林书局、三联书店、上海书店，1949）等。其中，吴黎平和陶大镛的著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又进行了修订和再版，此不赘述。

时人就曾指出：赵兰坪的《社会主义史》著述，极有可能是“著者平常上讲堂时所常携带的讲义”，并批评该书的内容“不过略述各派社会主义的理论或

① M. Beer:《英国社会主义史》，汤澄波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② 梅生：《社会主义浅说》，新文化书社1923年版，第6页。

③ 孙倬章：《社会主义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1～3页。

思想,而未稍注意于各派社会主义的运动,乃竟称之曰社会主义史,未免失当”^①。该书由八章构成,包括“社会主义概说”“初期的社会主义”“一八四八年法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其缺陷则正如著者自己所说,各流派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连带关系,“在这本小书里面,没有地位,可以分别讨论”^②。熊得山《社会主义之基础知识》的写作主旨,尽管是“为一般初学者指示途径,并不是向专门研究社会科学家供给一个贵重的贡献”,但该书确是“一本社会主义思想略史”的著述。^③该书由十章组成,包括“序说”“空想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拉塞耳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修正派”“工团主义与I.W.W.”“基尔特社会主义”“多数派主义”。华超《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一书由“绪论”“本论”两篇九章构成,“绪论”四章分别阐释了社会主义的定义、起源、派别及其与他种主义的比较,“本论”五篇则依次叙述了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尤侧重于俄、德、英、美、法、日等国,内容多取材于已出版的汉译作品,诸如伊利(R.T. Ely)《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塞利格曼《经济史观》、列德莱《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以及胡汉民译《社会主义史》等。^④对于刘炳藜《社会主义史纲》一书,《申报》(1935年6月21日)所作广告简介道:该著“述历代的社会主义的演进以及最近各派社会主义的争斗,自柏拉图的共和国,经摩尔的乌托邦,以至近代空想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等,均叙述无遗”。而蔡元培为沈嗣庄《社会主义新史》所作的“序”中说,该著“详人所略,侧重基督教与社会主义之关系,使读者公认此种运动(指社会主义运动——引者注),为人类普遍的要求,而决非一学派之所杜撰,则其对于社会主义之研求,将益增兴趣”^⑤,其内容包括“圣经中的社会主义”“自教父至谟耳间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波尔雪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

在此,应特别指出的是,王德周《社会主义史大纲》是一部“站在群众的立场”^⑥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书写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专著。该书一开始就用近一半的篇幅,分两章概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并指出:“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不同的地方,他并不由道德方面,攻击资本家,也并不攻击资本主义制度,不过分析它的内部,说明它的矛盾,证明资本主义必然的崩溃,这是马氏

① 刘英士:《社会主义史(赵兰坪撰述)》,《新月》第2卷第1号,1929年3月10日。

② 赵兰坪:《社会主义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页。

③ 参见刘英士:《社会主义之基础知识(熊得山著)》,《新月》第2卷第3号,1929年5月10日。

④ 参见华超:《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2页。

⑤ 沈嗣庄:《社会主义新史》,青年协会书局1934年版,第1页。

⑥ 王德周:《社会主义史大纲》,益群学社1933年版,第8页。

自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地方。”^①此外,该书还单列一章,从十一个方面详细介绍了列宁的生平、著述和主要活动,以及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如列宁的国家观、过渡时期理论、农民问题、民族问题、战略策略问题等。

三、新中国初期:旧译本重校是最鲜明的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并于1956年底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此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起的动员、组织和改造的作用,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这一点,在黄志顺所译《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一书的“内容提要”中得到充分体现:“本书简要地说明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特点及其改造作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务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阐明了在进行共产主义建设时,提高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反对资本主义遗毒,反对旧的观点、思想和理论,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性。”^②以此为契机,三联书店分别于1950年、1952年再版吴黎平《社会主义史》和陶大镛《社会主义思想史》。1958年和1959年,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又分别出版了Max Beer《社会主义通史》(嘉桃、启芳译)和《英国社会主义史》(何新舜译)的重译本。《英国社会主义史》重译本“序言”指出,该书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点,一是有系统地叙述了从中古到20世纪30年代末英国历史发展各个阶段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二是书中实际材料十分丰富,但其基本缺点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思想性。^③也就是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编写新的社会主义思想史著作,就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

为此,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出版了陶大镛《社会主义思想史略》。这一版本几乎是把旧版《社会主义思想史》“全书改写一遍”^④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略》,曾被错误地评价为“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但却偷运修正主义的货色”^⑤。尽管这一评价带有深刻的时代印记,但从国人关注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发展历程看,将社会主义思想史等同于一部人类文明史,即“社会主义史是人类一部历史,它是被社会改造者们,用斗争和鲜血构成的”^⑥,进而将科学社会主义

① 王德周:《社会主义史大纲》,益群学社1933年版,第97页。

② [苏]康士坦丁诺夫:《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黄志顺译,时代出版社1955年版,版权页。

③ [德]马克思·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何新舜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4页。

④ 陶大镛:《社会主义思想史略》,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⑤ 李济棠:《错误百出的“社会主义思想简史”》,《读书》1958年第5期。

⑥ 王德周:《社会主义史大纲》,益群学社1933年版,第1页。

视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是民国时期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共识。否则，很难想象，他们会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翻译、写作和出版有关社会主义思想史方面的作品。就此而言，李学昆对《社会主义思想史略》的评价是中肯的，即深刻指出了该著并没有着力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过程给描述出来。^①进一步说，李学昆明确提出了撰写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写作任务。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发展方向却一度中断。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学科确立带来繁荣发展

社会主义思想史被确立为一门独立学科，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标志性事件是全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会于1985年8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了成立大会和首次学术讨论会。之后，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最为显著的就是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为主导，带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分支如社会主义运动史、发展史、流派史、制度史、经济思想史、政治学说史等领域的研究。

（一）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异军突起

刘佩弦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史纲》（1983）是奠基之作，该书共分为八章，前四章论述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包括从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一学说的整个思想发展过程；后四章论述了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期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情况，包括从19末到20世纪50年代初，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创造性发展，以及斯大林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具体运用和发展的历史。之后，陆续又出版了湖北省党校系统科学社会主义教材编写组编写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简编》（1986）、《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与成熟》（张式谷，1986）、《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马啸原，1990）、《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历史发展》（荣长海，1992）、《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罗昭义，1997），以及宋士昌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通论》（2004）等教材和研究专著。

（二）空想社会主义史论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系统地从思想史上阐明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把

^① 参见李学昆：《评介“社会主义思想简史”》，《读书》1956年第11期。

空想社会主义史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正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李凤鸣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1980）开风气之先。贯穿该书的思想主线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阶级矛盾的深化以及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成长相一致的。在该著中，作者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划分三个阶段并指出：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关于理想社会的描绘，还流于单纯的幻想；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开始从理论上论证社会主义诸重要原理；19世纪初，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像其先驱者那样从对社会不平等的抨击中得出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结论，而是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的高度出发，主张用现有的生产力改善无产者的处境。^①此外，作者还细致发掘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阐明了其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但又严格从原则上将二者区分开来。之后，又陆续出版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史》（1981）、《近代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杨宏禹等，1989）、《空想社会主义比较论》（王兰垣等，1991），特别是许耀桐《新世界的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分析》（1995）以“新世界的思想”体系即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重点，分经济、政治、文化三篇14个专题，全面探索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各个理论观点，着力阐释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框架结构，并梳理了其理论观点的演进及其发展脉络等内容。

（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通史性著作成为主导

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为适应教学和科研的迫切需求，198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了陶大镛的《社会主义思想简史》。而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十几年间，陆续出版了十余本社会主义思想史方面的教材和著作，如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社会主义思想史》编写组编写的《社会主义思想史》（1984）、华东七省市《社会主义思想史》编写组编写的《社会主义思想史》（1985）、高放和黄达强主编的《社会主义思想史》（1987）、杨嘉靖和杨光彦主编的《社会主义思想通史简编》（1988）、王永江的《社会主义思想史新论》（1989）、萧贵毓和张海燕主编《社会主义思想史纲》（1998）、蒋建新主编的《社会主义思想史》（1999）、荣长海和董四代编著的《社会主义思想史》（2000）、冯秀珍的《社会主义发展史纲》（2002）等。其中，王永江所著《社会主义思想史新论》侧重于从哲学思想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观点出发研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主张社会主义思想史应按社会历史分期来划分，而每个时期又可分为若干阶段。全书共分13章，从古希腊的公有思想写起，一直梳理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较为丰富完善。

^① 参见李凤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四) 社会主义流派史等新兴学科崭露头角

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有戴清亮等编著的《社会主义学说史》(1987)、黄万畴编著的《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及其流派思潮简介》(1987)、余文烈主编的《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2000)、马健行编著的《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2003)、徐觉哉的《社会主义流派史(修订本)》(2007)、杨群红《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2010)、蓝瑛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2014),以及李典军等编著的《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史研究》(2003)和《国外社会主义农政思想史》(2009)。此外,法国学者亚历山大·泽瓦埃斯的《一八七一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1983)、曹松豪翻译的《法国社会主义简史》(1992)、罗徽武的《法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史》(1993)、陆镜生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1986)、陈慧平翻译的《美国社会主义传统》(2013)、雷虹艳的《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潮》(2018)等,则是社会主义国别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此外,几部翻译作品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现,如美国学者卡尔·兰道尔的《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上下卷,3册,1994),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历史学家让·饶勒斯的《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第一卷,制宪议会,上下册,1989、1995)、英国学者唐纳德·萨松的《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下册,2008)、波兰学者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三卷本,2015),等等。

五、新时代:平稳中持续健康理性发展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①随后,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它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一次彻底的重大转向,由此重新回到原典去思考和回答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迫在眉睫,从而带动我国学界掀起“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的学术热潮。进入新时代,先后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列宁诞辰150周年、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为契机,特别是在“四史”学习教育常态化背景下,学术界又掀起了一股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的热潮,相关学术期刊文章可谓汗牛充栋,此不赘述。而仅相关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著作就有十几部，如《社会主义发展史纲》（叶庆丰、白平浩主编，2011）、《社会主义通史》（王伟光主编，2011）、《列宁、卢森堡、考茨基与伯恩斯坦主义》（贾淑品，2013）、《卡尔·考茨基的生平与思想研究》（苏颖，2013）、《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人物传略》（高放主编，2014）、《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曾长秋编著，2014）、《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党员干部读本）》（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2014）、《卡尔·考茨基及其中派主义》（张玉宝，2014）、《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研究》（曾瑞明，2016）、《第二国际思想家若干重大理论争论研究》（方章东，2017）、《“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比较研究》（杨贵颖等，2017）、《托洛茨基研究》（陈秋霞，2018）、《社会主义500年编年史》（闫志民等主编，2018）、“世界社会主义史丛书”（高放主编，2018）、《第二国际的理论争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分野》（刘雅琪，2019）、《恩格斯思想年编》（姜辉等，2020）、《科学社会主义前史导论》（刘海涛，2021）、《社会主义发展简史》（本书编写组，2021），等等。

其中，刘海涛的《科学社会主义前史导论》是对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章的扩写，其上限追溯到古代世界的文化传统，下限延伸到英国作家威廉·莫里斯1891年出版的《乌有乡消息》，而之所以把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称作“前史”，就是为了突出“社会主义”而不是“空想”，突出“先驱者”而不是“空想家”。王伟光主编的8卷本《社会主义通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阐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的著作，该著紧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围绕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历史顺序、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逻辑顺序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顺序三条主线，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叙述了五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空想到科学、从理想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由高潮走向低潮以及在低潮中中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高放主编的“世界社会主义史丛书”由四本书构成，第一部《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到科学（1516～1847）》着重展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莫尔、康帕内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变动为线索，梳理和分析了社会主义空想阶段的发展特色；第二部《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1849～1917）》集中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如何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拓荒之路；第三部《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1917～1991）》展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由一国到多国的情状与特点；第四部《社会主义革新：从地区到全球（1991～2013）》，以新时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为根基，展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变化的全新面貌。

六、结语

晚清民国中国知识界把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追溯到柏拉图《理想国》，其主流观点倾向于把社会主义思想史等同于人类文明史，并以此论证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们把科学社会主义视为社会主义思想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从一开始就确认了马克思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划时代贡献，甚至一度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转译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因此可以说，他们意识到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诞生以后人类真正开始进入社会主义运动时代，并以此论证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前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党和国家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撰社会主义思想史，进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历史任务。改革开放之后，在探索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迎来了大发展时期，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为主导，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社会主义流派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脱颖而出，从而深化和拓展了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命题被明确提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又明确提出了“两个结合”的新论断，提出了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的时代课题。尽管这一领域在民国时期就有人涉足^①，在“四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背景下，接续、拓展和深化社会主义中国史研究，加强和提升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Review and Prospect: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in the Last Century

Li Mengrui Lu Faqin

Abstract: It is a history of the spread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t thought in China,

^① 王坚壁：《社会主义中国史》，社会科学研究会1932年版。该书由绪论和主体四章构成，绪论阐述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改造问题，内容侧重于经济制度的发展而不是依朝代叙史，主体四章内容依次为太古氏族共产时代、封建时代、商业资本时代及帝国主义统治时代，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和意蕴。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history study as it developed in China. One hundred and twenty years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obeying and serving the theme of the era of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presents obvious stag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matic feature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in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 is the belief that socialist thought almost accompanies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argues in this way that socialism is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especially since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t thought has become the leading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and with it has promoted the history of ideal socialist thought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schools,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doctrine, and other specialized research in different fields, expanding and deepening the field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In the 21st century, especially since the new era,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has entered a sound, stable and rational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has achieved more fruitful resul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study and education on the "Four Histories", it is urgent to strengthen and enhance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ocialist thought while continuing to deepen the study of the world socialist thought history.

Keywords: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Scientific Socialism; Compilation

[责任编辑: 郝书翠]

背离与回归：基于行政发包制的社区文化治理研究

刘彦武*

【摘要】我国社区的功能定位是基层自治组织，同时被赋予了基层政府行政职能的延伸，服务于社区居民。在社区文化治理中，如何正确处理国家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与上级政府项目激励机制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社区居民闲暇性的日常生活文化与引领性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这是社区文化发展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考验着我们的政治智慧。只有坚持辩证思维，“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坚持系统观念，做到互动与平衡，而不是把两者对立与割裂开来，才能回归社区文化治理的本来。这就要求强化系统观念与工作统筹，促进社区文化自治与公共文化服务相统一；发挥社区党建示范引领作用，加强党对社区文化治理的领导权；扩大社会组织有效参与治理的渠道与机会，在服务社会中增强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界定权力和行为边界，赋予社区文化治理自主行动能力。

【关键词】社区；文化治理；行政发包制；系统观念

社区虽处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末梢，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事关治理功效与治理目标的实现。在实际生活中，社区居委会是作为自治性的居民组织存在，同时又被赋予基层政府行政职能，这种边缘化困境使社区的角色与职能较为尴尬、模糊。其体现在社区文化治理上，是根据自治定位大力发展居民日常文化，满足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还是仅仅响应基层政府的发包项目，满足上级政府的各项考评？二者之间的张力使社区文化发展出现矛盾与偏差。如何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成为当前社区文化治理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基于行政发包制研究社区文化治理的起点和落脚点。

* 刘彦武，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教授，《党政研究》常务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文化、文化经济。

一、社区文化治理及文献回顾

从实践来看，社区文化治理是文化治理的基层实践。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研究中的社区文化治理，文化作为治理工具（govern by culture），讨论的是发挥社区文化的治理性功能，社区文化治理成为一种建构社区公共精神的集体行动。这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这里讨论的社区文化治理，文化是治理的对象（governance of culture）。它是以治理理论与文化权力思想为基础，旨在建构合作共治的主体架构，借助市场与社会等多重机制，实现社区文化的发展与进步。社区文化治理具有以下结构特性：一是社区文化治理主体的多元性。社区文化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与公民等主体的多中心协同参与过程。二是社区文化治理机制的三重性。社区文化治理不再局限于利用行政机制，还要运用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促进社区文化发展。三是社区文化治理行动的交往性。社区文化治理是以文化空间、文化活动等为行动场域，相关行动者在其间相互对话与交流，不断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认同。因此，社区文化治理需要建构起政府、市场与社会并存的主体架构，并推进主体间多中心协同合作；同时，还需要在社区文化具体实践行动过程中，发挥文化权力的治理功能，建构社区的共同体生活。^①

理论上，有学者认为社区文化治理研究需要从社区文化治理体制末梢研究、政策工具研究、平台工具研究、治理方式研究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论述。^②类似的研究可能有意无意间忽略了社区的政治定位，把社区视为政府或政府的延伸，与社区自治、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的理论研究可能有些偏差，与社区党建在文化治理中的领导实际可能出现错位。长期以来，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象征体系和客观事实背离的现象：一方面，中央不断强调居民自治和协商民主；另一方面，各级城市和街区政府却在不断强化社区居委会的公共管理职能和专业服务体系。^③

回到现实语境中，基于居民社会文化需求实践的分析，社区文化可分为回应市民闲暇文化需求的日常性文化与回应社区精神文明和社会秩序需求的引领性文化，前者强调文化建设的实践性和生活化特点，后者强调文化建设的先进性与仪式性特征。^④

社区作为基层自治组织，是基层政府的延伸，还是合而为一的统一体？社区

① 参见李山：《社区文化治理：主体架构与实践行动》，《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② 参见王列生：《论社区文化治理的命题取向》，《文化软实力研究》2018年第3期。

③ 参见郭伟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现象及其探源》，《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④ 参见毛一敬：《农村文化建设实践路径的类型化分析——基于对农民文化需求实践的分析》，《重庆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文化治理是看国家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还是看行政发包的具体清单和激励监督机制？是倚重社区居民闲暇的日常性文化，还是依靠先进性的引领性文化？这些都是社区文化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社区文化包括五大要素：（1）文化参与者和传承者的居民群体；（2）分布在社区聚落内的文化设施、设备和场所；（3）社区与外界的物质和信息交换渠道；（4）与社区文化活动相配套的组织和制度；（5）面向社区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社区文化治理虽是针对“与社区文化活动相配套的组织和制度”，但牵一发而动全身。社区文化治理既是静态的制度体制，也是动态的机制与活动，涉及社区文化的诸多要素。行政发包制是周黎安用以概括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各级政府间关系、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的一个理论框架，以此用来分析社区文化治理中社区如何根据自身定位和居民的文化需求，纵向上处理政府的引领性文化项目和活动，横向上完成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共治，从而回归党建引领社区文化方向发展的政治定位。^①

二、国家法律法规中的社区文化治理

社区文化因在社区治理中的交往性，对培育社区精神、社区社会支持网络与社区认同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党和国家一直重视社区文化建设（见表1）。社区治理毕竟是一种民主自治，尽管承担一些公共管理职能却没有专项经费的落实，只是规定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由此我们也看到，社区文化治理过程就是政府、市场、社会与公民等主体的多中心协同参与的过程，并且不再只靠过去的行政逻辑来推进文化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要运用市场机制，展开文化资源的生产、流动与消费，还强调发挥社会机制，促进社区文化民主化进程。

表1 我国法律、法规对社区文化治理的相关规定

序号	时间	法律、规章	相关内容
1	1989年 (2018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2	2000年	中办国办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	繁荣社区文化

^① 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续表

序号	时间	法律、规章	相关内容
3	2006 年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	推进社区文化、体育服务，使政府公共服务覆盖到社区；鼓励并指导、教育社区居委会组织居民参与文化进社区活动；指导志愿组织和志愿人员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4	2010 年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意见》	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协助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文化体育工作；建立有效承接社区管理和服务的群众文化委员会
5	2013 年	《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	引导和培养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和社区事务，加强社区居民能力建设，增强社区发展能力，建立健全社区支持网络；组织社区居民实现自助、互助和社区自治，形成理性平和、宽容接纳、诚信友爱、平等尊重的居民关系，增强社区凝聚力、归属感和人文关怀，促进社区文明、和谐与稳定
6	2015 年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	协商内容包括经济社会发展中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党和政府部署在社区的重点工作落实
7	2017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	大力发展文体娱乐活动的社区社会组织；做好与社区居民利益相关的文化体育公共服务事项；合理规划建设文化自助服务设施；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面向社区开放文化教育体育设施；强化社区文化引领能力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内容整理。

下面结合社区文化治理的行政、市场、社会三重逻辑，来分析成都市同德社区在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归纳其在社区文化治理中积累的重要经验。

成都市同德社区位于青羊区府南街道，辖区占地面积约 0.42 平方公里，有居民院落 17 个，居住人口 1.5 万余人，是城市老居民院落与商住小区共存的复合型小区。社区党委整合服务资源，紧紧围绕“大党建促大和谐”主题，以共驻共建区域化党建为抓手，通过组建涵盖 15 家单位的区域化党建理事会，充分整合辖区各类服务资源特别是金沙遗址、西南财经大学和财经书城等文化资源，

综合打造休闲绿化广场、全民健身路径等社区活动场地,切实增强社区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搭建服务平台,统筹建设集“六站一室”为一体的综合服务机构,积极创办社区党校、市民学校、社区图书馆等教育基地,创新构建信息数字社区、社区便民服务网等信息化平台,主动对接社区居民群众的各项服务需求,让居民群众不出社区就可以直接享受各类公共服务,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网络零距离享受社区便民服务。

作为成都市的“明星社区”,同德社区2020年度开展了16项文体活动(见表2),受疫情影响上半年暂停。通过分析,同德社区文化治理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充分发挥了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偶尔也使用了市场的手段;二是公益讲座与专业培训的形式和内容受到居民欢迎,参与度高;三是主题鲜明,“喜迎大运会”“非遗进社区”等鲜明体现了成都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点。

表2 2020年度成都同德社区文化活动

序号	时间	文化活动	参与主体
1	2020-01-17	同德社区新春公益集市游园活动	社区、东坡诗社、志愿者、居民
2	2020-07-09	同德社区开展“F.S.C”——儿童欢乐淘	社区、学生、居民
3	2020-07-17	“喜迎大运会 乐享青羊美”——柔力球健身运动	社区、教练(志愿者)、居民
4	2020-08-05	全民健身日——“律动青春”健身操运动	社区、教练、居民
5	2020-08-20	非遗文化走进同德社区——版画印染体验活动	社区、画师、居民
6	2020-09-06	同德社区文创达人秀	社区、同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达人、居民
7	2020-09-18	“喜迎大运会 活力最青羊”羽毛球培训活动	社区、教练、居民
8	2020-10-10	坝坝电影进社区	社区、市总工会、居民
9	2020-10-16	同德社区“天天乐自组织服务队”成立20周年文艺汇演	社区、自组织、居民
10	2020-10-19	“传承非遗 助力大运”之面人教学活动	社区、青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非遗传承人、居民

续表

序号	时间	文化活动	参与主体
11	2020-11-20	同德社区“邂逅美丽，优雅绽放”——护肤篇	社区、桃树下社会服务中心、培训师、居民
12	2020-11-20	同德社区“读书漂流，共享书香”阅读沙龙	社区、桃树下社会服务中心、社工、志愿者、居民
13	2020-11-23	同德社区“冬季养生”公益讲座	社区、医生（志愿者）居民
14	2020-12-10	爱成都·迎大运——我运动·我快乐	社区、关爱路社会服务中心、居民
15	2020-12-18	“爱上阅读，心拥智慧”阅读沙龙	社区、桃树下社会服务中心、居民
16	2020-12-31	“文艺家进社区”之四川非遗传统文化进我家活动	社区、非遗传承人、居民

资料来源：成都市青羊区府南街道同德社区网站“文化活动”，http://jcpt.chengdu.gov.cn/qingyangqu/tongdeshequ/300105/fwz.html?more=whhdmore_0.html&#。

三、行政发包制条件下社区文化治理的背离

当前政府、社会分别从两个向度介入社区文化治理，一是纵向的行政发包制，中央政府通过“从上到下”的科层制派发文化资源；二是横向的分类控制机制，融合工青妇群团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通过横向合作形成社区文化治理的分类控制体系。前者因拥有文化领导权而占有优势，后者居于劣势地位。而除了少数明星社区外，绝大多数社区无力聚集和吸附上述两个方向上的资源，文化治理最终只能“悬浮”在区街政府的会议传达、表格填写等文本性表达上。^①

周黎安认为，当下地方政府间关系可以概括为行政发包制，也就是说在行政科层结构的统一权威之中，纳入了一个准市场化的内部发包制。它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在行政权分配上，委托人拥有正式权威和剩余控制权，而承包方则被授予执行权和决策权；第二，在经济激励上，承包方拥有剩余索取权和强激励机制安排；第三，其内部控制不是科层制应该采取的程序和规则控制，而是一种结果导向的、人格化的责任机制，这就导致承包方拥有较多的自由裁量权。^②

① 参见廖青虎等：《乡村文化治理的创新机制——控制权共享机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② 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用行政发包制来分析基层文化治理的矛盾与背离是一种比较新颖的理论分析框架。在行政发包制的分析框架下,虽然上级政府保留着最终的控制权,通过审批机制、考核机制和任免机制等来控制下级承包方的行动,这种治理模式对于基层政府集中力量完成一件大事是非常有效的。然而,这种政府治理模式如果面对的是多部门、多任务的公共事务问题,就会出现如何调动各个部门完成多个任务目标的难题。调研中发现,成都某社区挂有39个上级政府延伸的服务项目牌子。如此多的任务,按照规则和程序办事往往是完不成目标的,而需要集中资源和精力来完成多个任务,但是承包方的时间和注意力是受约束的,所以只能根据委托方的发包任务进行优先排序和行动取舍。这就导致基层社会的非均衡治理。仔细梳理可以发现,这种非均衡治理,一是体现在不同社区治理能力的非均衡发展。明星社区、样板社区就比一般社区承包项目的机会与渠道要多得多,出现基层治理的马太效应,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二是基层不同的公共事务的非均衡发展。公共文化事务,相比于其他硬任务,体现为软实力,治理绩效缓慢,无法执行行政发包制的收入分成激励政策,因此在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在社区文化治理上缺乏建设驱动力,只是为了应付上级考核,留下一些所谓的“台账”。社区仪式性规范性的引领性文化因发包任务优先而被重视,而社区居民日常性文化却由于发包任务排序靠后往往受冷落,导致基层文化治理失衡。这告诉我们,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效能不是受一般制度和规则的均衡调节,而是受具体的行政发包的任务目标排序和相应的激励和控制机制的影响。在政府重视和能够激励社区竞争的事务领域,就能实现治理效能的提高,反之,就只能是停留在纸面上、挂在口头上,出现名不副实的背离现象。

社区出现的非均衡治理,除了行政发包制的影响外,也与社区政治定位的背离有很大关系。研究发现,当下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双重背离:第一,国家的立法和中央的文件都规定城市居委会是一种居民自治组织,应该实行居民自治和协商民主;第二,各个地方城市街区政府在实际政策落实中,都是选择性执行相关文件中提出的社区公共管理职能,促进居委会成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发展社区专业服务,但是并不支持社区居委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职能。^①的确如此,现实生活中的社区在管理体制上走上了一站式窗口化、规范化公共管理服务道路,日益淡化了居民自治的性质,这与现行的中央文件依然强调社区民主自治的精神是不相符的。社区居委会工作者的行动角色是社区自治组织的人员,还是街区招聘的具有专业社会工作资格水平的职业社区工作者?他们应该对投票选举他们的社区居民负责,还是向聘任他们的街道办事处交代?按行政发包制的理论,这要看谁掌控着资源,并能施加实际的监督激励权。在实际运行中,因社区治理的具体业务涉及居民动员和居民关系的协调,社区居

^① 参见郭伟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现象及其探源》,《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委会又不能完全按照规范化行政管理模式进行社区管理，必须发展居民关系和人情网络，培养积极分子，通过社区人情机制来完成任务，从而又偏离了街区政府行政吸纳的趋势。

四、互动与平衡：社区文化治理的回归

社区在功能上是走向自治还是行政管理？社区文化治理中是引领性文化主导还是日常性文化主导？这都考验着我们的政治智慧。只有坚持辩证思维，“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坚持系统观念，做到互动与平衡，而不是把两者对立与割裂开来，才能回归社区文化治理的本来。

（一）强化系统观念与工作统筹，促进社区文化自治与公共文化服务相统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错综复杂，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①可见系统观念是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当前，面对社区发展中出现的自治空间越来越狭小、行政化态势越来越强烈的问题，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与工作统筹，从理论高度谋划和解决社区发展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全面协调推动社区文化治理工作。

一是遵循系统的耗散结构特性，推动社区文化迈向新的发展。“依据耗散结构理论，有机系统是开放的，系统只有在对外开放条件才能产生‘负熵’，以此抗拒‘熵增’。”“经济社会系统是开放的、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其整体性和协同性依赖于内嵌单元要素在适应环境变化过程中的聚集调整和相互作用。”^②当前社区发展，增加了一些公共服务能力，这给社区内部系统带来些调整 and 变化。“系统在有序和无序之间会出现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通过‘涨落’来触发，之后就跃迁到新的结构形态。”^③社区文化自治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是不相矛盾的，社区文化自治程度高，有助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效果好，反过来也能帮助改善社区文化自治状况，推动社区文化迈上一个新台阶。当前要深刻认识和把握社区文化发展的规律，树立辩证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趋利避害，奋勇向前。

二是遵循系统的非平衡态分布特性，促使社区文化治理达到平衡。“在物理学的意义上，平衡态与非平衡态指的是：对于某个物理量，在系统内部各处的均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6页。

^② 徐浩然：《坚持系统观念的理论逻辑》，《学习时报》2021年1月4日。

^③ 徐浩然：《坚持系统观念的理论逻辑》，《学习时报》2021年1月4日。

匀分布,则称系统在宏观上呈现出的完全均匀状态为系统的平衡态;反之,则为非平衡态。这些物理量可以是温度、密度等。”“系统在远离平衡态时会产生一种自发的动力,使之趋近于平衡。”^①这样,经济社会系统要素的非平衡态分布是一种常态,平衡态反而是一种理想。不过,非平衡态分布并不意味着系统结构杂乱无章,它同样也可以形成一种运转中的稳态。上文分析到社区文化的非均衡治理,各社区文化发展不平衡,社区内文化治理与市容治理、社会综合治理等不平衡是常态,所以需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文化治理,通过互动与均衡达到社区文化治理的理想平衡态。

(二) 发挥社区党建示范引领作用,加强党对社区文化治理的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②在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框架下,党的领导就超越了社区在功能上是国家代理人还是社区当家人的约束。社区党建一方面要组织动员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另一方面,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最末梢,还要协助政府将国家资源用于建设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和服务群众是政党建设的本质。离开社区党组织对群众的组织和动员,仅仅强调为群众服务,仅仅帮助群众,不宣传组织群众和凝聚群众,就会造成社区治理的低效或失效。因此,在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要强化党的文化领导权,发挥社区党建的引领作用。

正如政府会失灵、市场会失灵,治理也会失灵。社区文化治理也是有限度的,其治理过程充满了各主体行为互动与利益协调,只有当各方都持合作共治态度,不仅考虑各自组织的个体利益,而且考虑共同利益最大化,治理才是有效用的,否则社区文化治理便会失灵。导致社区文化治理失效的原因,一是合作网络未能形成利益制衡,各组织依据自身的运行逻辑,如果只专注于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就会导致治理失败。二是组织理性突破临界水平,文化治理网络中的各组织出于自身利益、公共利益和治理目标通盘考虑,一方面组织理性的存在促使采取合作博弈态度,推动治理增效;另一方面,组织理性也会过度自我保护,对合作治理形成抵制,消解治理效果。三是治理制度基础不健全,导致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可信承诺难以保证,有效的激励、制裁与监督机制缺乏,弱化治理失灵的制度环境尚未健全。^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针对这些问题,明确提出“强化社区文化引领能力”^④,提高方向引领作用。

在社区文化治理实践中,社区党组织要居于主导地位,发挥方向性引导作

① 徐浩然:《坚持系统观念的理论逻辑》,《学习时报》2021年1月4日。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6页。

③ 参见黄浩:《文化繁荣的逻辑》,孔学堂书局2017年版,第271~273页。

④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用。在社区文化治理进程中，要牢牢把握住执政党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方向性，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积极健康社会风尚，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强化社区文化引领能力，不是简单地用意识形态去统领，也不是单纯的宣传灌输，要由原来的直接干预变为间接性的观念嵌入，实现党组织的价值理念与社区自治的观念相融合。加强社区党组织文化引领，还要展开社区党建与文化治理的互动，防止分而治之，出现“两张皮”现象。社区党组织要注重将社会分散、多元的要素纳入文化治理框架，引导社会组织在文化服务中传播党的执政理念，组织动员不同价值取向的多元主体凝聚信念共识、制度共识、政策共识，使社会组织成为党在社区治理的重要资源。

毋庸置疑，引领性的先进文化在社区文化治理中居于主导地位。先进文化的认同、推广，甚至被推崇为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深刻影响着日常性的社区居民文化，而在本地化的实践中往往有着自己的理解与编排，往往还有一个交融的过程。文化治理的主导权就在这样的互动与博弈中此消彼长。城市社区内部存在着文化精英与社会贤达，他们会在传统节庆仪式、传统文化活动中树立自己的威信，而且背后所体现的则是对基层文化主导权的竞争。要处理好这样的竞争关系，不至于破坏传统的社区平衡格局，又能贯彻基层政权的主流价值文化，从而真正提高对社区文化的引领能力。

（三）扩大和增加社会组织有效参与治理的渠道与机会，在服务社会中增强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

从国家-社会的视角看，改革开放以前，文化资源的配置与供给完全由国家主导，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起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文化建设领域也增加了社会的视角。社会视角的实质意义是开放权利，推动文化民主或人民文化权利的实现^①，于是才有了多元治理、合作治理和民主治理。文化民主就是向社会分权，亦即在文化体制领域多大程度上包容、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的成长，让社会组织特别是新的文艺组织和文艺群体不仅实现自我治理，而且能够纳入国家文化服务工作的覆盖面，做好团结、引导、服务工作，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有生力量，成为社区文化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② 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一方面取决于权利开放空间大小、参与治理的渠道与机会多寡，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组织自身的治理能力。

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政策出台，为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契机。在具体实践中，目前专业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资源主要依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资金，多通过项目制的方式进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这一资源供给体系与运作方式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异化，主要遵循市

① 参见刘彦武：《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研究的治理转向》，《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2期。

② 参见刘彦武：《文化治理中的新文艺组织：现实发展与政策完善》，《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场化、体制化与关系化三重逻辑,但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社会组织服务的社会性特征。一是市场化逻辑,即完全以契约形式与政府合作,实现资源的市场交换。二是体制化逻辑,即主要以地方政府的行政意志为导向,形成单向度的资源依赖。三是关系化逻辑,指社会组织积极建构并依赖政缘关系网络,以形成资源的利益交换。但从整体来看,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与参与社区治理效果的有限形成了强烈反差,多数社会组织仍然面临无法深入社区的嵌入性问题与服务能力较低的专业性问题。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精英化与悬浮化。^① 回归并深入社会,发现和组织群众,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文化治理的正反馈才成为可能。社会组织必须深刻把握社区需求,了解社区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规范,拥有社区居民的信任和关系网络资源,以及扎根于社区,才能提升自己参与文化治理的能力。此外,作为引导者和推动者,街区政府应引导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培育成长;推动社会组织规范发展,建立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各项制度,完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加强专业化培训,在满足受众的新期待新要求中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文化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为保护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文化治理,还应健全公共协商机制与法治约束和保障。公共协商机制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联结机制。健全公共协商机制需要解决几个关键问题,例如社会组织以何种身份、何种权力和责任、何种方式来参与社区治理。因此,需要通过身份确认、权责对等、协商高效等环节来增强公共协商的有效性。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文化治理的法治约束和保障,包括对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对社会组织及公民权利的支持和保障。为保障多方治理主体的权益,应建立竞争机制和考核机制。通过公开招标遴选优质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文化项目,哪家机构有实力和经验,更能满足公众文化需求,就由哪家机构来负责,并对活动总量、受众满意率、参与人次等设定标准,定期进行考核,加强监督。

(四) 界定权力和行为边界,赋予社区文化治理的自主行动能力

基于宪法给予基层社会自治的授权范围,社区文化治理自治向度由此具有行为合法性。^② 社区文化自治体现为“选择自由”“需求自觉”和“出场自律”三个方面。因此,必须科学界定街区政府与社区之间权力边界和行为边界,明确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上述行政发包制用目标结果导向弥补了过程规则的缺失,虽然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以牺牲规则和程序为代价,这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精神不相符。要改变公共行政单纯为了追求效率而架空民主法治程序规则的状况,关键是要调整各级地方政府的相关行为。

一是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避免出现“地方请客,街区买单”。合理划分

^① 参见陈锋:《悬浮的社会组织》,《文化纵横》2020年第6期。

^② 参见王列生:《论社区文化治理的自治向度》,《甘肃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省以下公共文化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要将适宜由地方更高级政府承担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支出责任上移，避免过多增加基层政府支出压力。形成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① 把基本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纳入各级政府预算，全面实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预算绩效管理，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发挥财政资金最大效益。^②

二是优化调整财政事权事项，健全基础标准，进一步规范支出责任。比如，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在城镇主要街道、公共场所、居民小区等人流密集地点设置公共阅报栏（屏），提供时政、“三农”、科普、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信息服务。服务标准按照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等有关部门相关规定执行，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③ 在社区文化项目事权事项、支持责任明确之后，社区自主行为能力才能进一步提升。

五、结语

通过行政发包制来分析基层文化治理实际，可以看到社区文化治理的非均衡性与基层治理的马太效应，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出现了在公共文化事务中相比于其他硬任务而名不副实的背离现象。究其根本，与现实生活中的社区居委会在管理体制上是迈向公共管理服务还是坚持社区民主自治的矛盾定位有关。我们认为，只有坚持辩证思维，坚持系统观念，做到互动与平衡，而不是把两者对立与割裂，才能回归社区文化治理的本来。

随着我国经济财力的增强和有效支撑，越来越多的文化项目被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序列，成为文化民生基本保障意义上的政策工具实施对象。同时，随着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成熟，社区文化治理可引入社会力量，在社区、园区创新新型文化业态，将文化创意融入社区生活场景，增强环境的美观性和服务的便捷性。社区文化场馆可根据实际通过政府委托运营整体场馆或部分项目的形式，引入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提高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逐步由行政主导向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治融合发展转变，逐步形成“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区协调、社会参与、企业资助”的社区文化治理工作新格局。

① 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公共文化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0〕14号），2020年6月23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6/23/content_5521313.htm。

②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国文化报》2021年4月2日。

③ 参见《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的通知》，2021年4月20日，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104/t20210420_1276842.html。

Deviation and Return: A Study on Community Cultural Governance Based on Administrative Contracting System

Liu Yanwu

Abstract: The function of the China's community is orientated towards the grassroots self-governing organization, and it is also endowed with the extens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to serve the residents. How to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project incentive mechanism of higher-level government, and how to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isurely daily life culture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the leading socialist advanced culture, are the core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culture and its governance, which is to test our political wisdom. Only by adhering to dialectical thinking, "holding both ends and using the middle",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system, achieving interaction and balance, rather than seeing the two as opposition and separation, can we return to the origin of community cultural governance. We must strengthen the systematic concepts and the work coordin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unification of community cultural autonomy and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we must give play to the leading demonstration role of Party building and strengthen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community cultural governance; we must expand channel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governance, and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serving the society; we must define the boundaries of power and behavior, and endow the community with the ability to act autonomously in cultural governance.

Keywords: Community; Cultural Governance; Administrative Contracting System; Systematic Concept

[责任编辑: 于少青]



动 态

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与共建文化繁荣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繁荣高端学术论坛暨世界文化论坛第三届中国文化分论坛”综述

崔 微*

【摘 要】2022年8月,“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繁荣高端学术论坛暨世界文化论坛第三届中国文化分论坛”在山东大学(威海)举行,百余位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交流与研讨。第一,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一般理论的相关研究,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解读阐释,彰显文化自觉;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入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维度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与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第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理研究以及转化创新路径研究,继续夯实文化自信的根基;第四,以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借鉴,实现文化繁荣。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文化自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自信

在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之际,为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领会“两个结合”等新论断,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化繁荣,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编辑部,于2022年8月20~22日联合举办“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繁荣高端学术论坛暨世界文化论坛第三届中国文化分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天津大学、

* 崔微,哲学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期刊编辑部等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本次论坛主要探讨了以下问题。

一、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增强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对文化自觉相关问题的探讨也是本次高端论坛的首要议题。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问题，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深化了对文化自觉问题的理解。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彰显文化自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指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认识逻辑中，文明是社会生产力的反映与体现，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本源动力是人类科技提升的生产力发展。迄今为止，在人类文明演进历史中，社会主义文明是相对最先进的。此外，文明包含八大文明，除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建设文明外，还有经济文明、对外交往文明、军事文明。除了物质文明以外，美国的多种文明性质严重扭曲，文明程度不仅落后于中国等社会主义，而且落后于北欧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相对最先进的。我们要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林建华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现代化。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新中国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懂得中国要实现的不是西方式的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第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谱写21世纪新篇章。推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一日之功。第三，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与文明密切相关，文化自信必将升华为文明自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高文书从民生领域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展示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和成就。他认为，共同富裕与收入、保障等民生领域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民生领域的现代化过程也是共同富裕的过程。第一，国民收入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在缩小。这是因为我国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二，按照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标准，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逐年上升。现代化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

是中等收入群体的现代化。第三，城乡和区域差距缩小。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呈缩小趋势。第四，作为共同富裕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晓冉博士从辩证法视角研究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化向度。他指出，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化向度时，为了克服文化虚无主义，需要促进文化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发展；为了克服道德相对主义，需要坚持同一性与差异性相统一；为了克服文化消费主义，需要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海波博士和卓高生教授认为，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创性需要从整体上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究竟“新”在何处。

（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读人类文明新形态，增强文化自觉

北大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熙国探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点。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第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五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文明。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整体推进和协调发展。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文明。它摒弃了资本主义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两极分化的旧发展道路。第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它超越了资本逻辑与生态帝国主义逻辑。第五，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占领了真理与道义制高点的文明。

复旦大学哲学院王凤才教授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和谐型的生态文明，是未来文明的发展方向。首先，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看，现有的工业文明根本不能完全“生态化”，这是由工业文明发展模式背后的“征服论”自然观决定的。生态文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自然观，是“和谐论”自然观。其次，只有解决生态危机才能走向生态文明。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文化危机，它意味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机。“生态治理”是通往生态文明的“消极路径”，“绿色发展”是通往生态文明的“积极路径”。生态文明建设还有赖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确立，有赖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简言之，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真正超际的全球性事业。

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山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商志晓围绕世界文化激荡背景阐释中华民族文化概念。第一，新一轮文化激荡展现出文化交流互鉴深化、博弈对抗加剧、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不断增强等诸多鲜明特征。第二，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的角色转换使激荡中的世界文化深深感知到中华民族的分量和中华文化的魅力，也必然将把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推向核心位置予以关注。第三，当代中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自强之道包括：夯实文化交流互鉴和竞争对抗的物质基础；巩固思想文化阵地，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坚守交流互鉴；坚守人类共同价值，坚决回击文化霸凌。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冉认为,在两个大变局的背景下,思考文明走向问题正当其时。就民族复兴而言,中国要解决精神上强大起来的问题,这构成文明新形态生长的重要内部原因。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层来看,这涉及文明和文化的差异,代表了未来的不同方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两个衰落的迹象。第一,疫情下以美国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出现衰败的迹象。它表现为国际霸权主义以及国家机会主义。第二,疫情之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大众文化也出现了衰败的迹象。如号称最讲人权的西方大众文化丢掉了生命权;最讲自由的大众文化,丢掉了自由的前提,把自律与他律、责任与义务等自由的条件抛诸脑后。

(三) 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一般文化理论问题的相关研究,提升文化自觉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尚会永教授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文化。他指出,中小企业数量增加并没有违背马克思资本积累历史趋势的规律。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小企业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但是核心企业垄断的趋势并没有被削弱。中小企业的主体存在于产业链最底端,劳动者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劳动者遭受的强制性劳动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因数字技术的应用受到更严密的监视。马克思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规律的立论逻辑基础和结论仍然坚实、可靠。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关系到我国如何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科学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及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于少青博士立足于马克思对资本逻辑文化批判的思想,指出元宇宙的实质是资本逻辑渗透到文化领域的数字呈现。他认为,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至元宇宙阶段所出现的问题,都没有脱离资本逻辑,都与资本逻辑依据数字技术对人的文化消费控制有关。正是这一实质决定了在数字时代,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数字文化符号成为资本为实现其在发展中的文化效力而选择的主要出场方式。元宇宙致力于打造“虚实结合”的可能后果是文化发展脱离物质生产,资本逻辑的数字文化宰制进一步造成人的不断抽象化。元宇宙未来的发展前途取决于能否真正超越资本逻辑,从而在精神维度上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武晓玮博士和吴文新教授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休闲价值文化。针对当前休闲价值被异化的问题,他们认为应该从马克思主义休闲价值观中找寻答案。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建立在自由时间基础上的休闲是人类寻求生存的意义和真正的目标所在,即自由时间为休闲奠定了基础,而自由时间的利用及休闲的最终目的在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整个社会的时间都变成了自由时间,那人们所从事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休闲与劳动的统一,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以及其他公共活动的组织形态也都将演变为“休闲人共同体”。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冯争博士研究了费尔巴哈与克尔凯郭尔

的宗教批判。她认为，费尔巴哈与克尔凯郭尔尝试以神圣性的、无界限的、无条件的爱来消融现实的冲突与不平等。然而，由于缺失了社会历史这一重要维度，他们的探讨无法触及现实中的不平等及阶级冲突的根源。

二、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为原则，坚定文化自信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常务副院长郝书翠教授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推进理论创新，是文化自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增进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之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文化问题的探讨也是本次高端论坛的核心议题。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深入解读与多维度挖掘，为坚定文化自信奠定了深厚基础。

（一）深入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根本遵循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世界文化论坛名誉主席王伟光认为，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因素。第一，精神充实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在维度。美好生活是人们在物质需求基本满足之后进一步追求的人生幸福、精神充实、富有意义的生活，是人自身素质的提升和内在精神的充盈。第二，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是优化文化供给的根本保证。第三，优化文化供给，需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全方位发展。要进一步围绕增强文化引导力、创造力、竞争力深化改革思路和举措，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更加清晰地凸显“服务人民”在一切文化事业中的地位和意义，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探讨了如何深入理解“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他指出，需要从五个方面理解这一论断。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自身实现。“两创”就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生成与提炼过程，构成习思想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品质。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呈现出新时代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新风貌、新品格，展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第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形态和思想体系贯通着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时代精华的鲜明脉络。第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融入中华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过程之中，增强了历史自觉，坚定了文化自信。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周向军探讨了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的内在逻辑。他认为,首先,围绕发生、历史、特点、内容、价值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对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了全方位的阐释。其次,关于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体现的总要求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体而言,要自信、自觉、尊重、保护、学习研究、阐释挖掘、继承利用、转化发展以及交流互鉴。另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对待传统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主任余斌指出,文化自信的根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飞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它使文化自信能够复兴并得到彰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这次飞跃使文化自信得以复苏。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两次飞跃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此次飞跃使文化自信油然而生。因此,文化自信的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孙克副教授认为,习近平关于文化遗产的重要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观点,秉承中国共产党人“知行合一”的优秀理论和实践品格,形成了以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观、文化遗产创新发展观、文化遗产国际交流传播观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观点深刻揭示了保护和传承优秀文化遗产是新时代文化遗产事业的核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文化遗产事业的灵魂,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新时代文化遗产事业的落脚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新时代文化遗产事业的根本目标。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跃博士探讨了习近平大历史观整体性特质的形成过程与科学内涵。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姜逸指出,习近平文艺观是对“文以载道”的继承与发展。淮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邵奇博士和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王倩倩都认为,国际社会要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合作抗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徐聪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和发展是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结果。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王朋朋主张运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应对价值相对主义。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杜曼利研究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哲学意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张燕妮和硕士生甘婷婷探讨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重要论述。

（二）多维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全方位支撑

青岛大学劳动人事研究院院长谭泓从劳动伦理的视角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她指出，中国特色劳动伦理以马克思劳动伦理为主线的始终贯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与市场经济文化交流互鉴融合中确立形成，从而实现“马克思劳动伦理主线贯穿”、“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创新发展”与“市场经济伦理互鉴融合”理论渊源的辩证统一。基于历史传承与理论渊源形成的中国特色劳动伦理，从劳动伦理反应劳动关系劳资政三方主体的道德关系定位维度，集中体现在国家责任伦理、企业经营伦理与劳动职业伦理三位一体、辩证统一的具体内涵。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党圣元从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批评角度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他系统总结了中华民族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过程中我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轨迹和演进逻辑。此外，他指出当前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建构过程中存在若干重要理论问题：一是现实主义视域的“文论何为”与“文论为何”问题；二是以文艺多样化规律推动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繁荣发展；三是以现实主义文艺观引领新时代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要在立足本土和传统的基础上，破除文论中的西方话语霸权，注重文化语境、实现视域融合等。

《中国文化报》周刊中心主任杨晓华从文化视角切入分析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他认为，文化的结构包括物质载体、规范规则和价值范畴三个层次。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主体精神深入文化结构的核心层即价值体系层面寻求彻底变革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文化逻辑的演变历程如下：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是改变物质力量和规则体系的所有关系和支配关系；二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质是在文化的结构性存在中建立特定规则下的物质载体的生产体系；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的实质是从价值体系的深层全面认识和推动文化结构的历史性根本性变革。

此外，众多学者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丰富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海量教授对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机制进行了研究。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闫惠惠副教授指出，为了抵制历史虚无主义，需要树立马克思主义英雄观，借助多种方式向大学生讲好英雄故事。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张磊副教授认为，在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中，需要用好红色资源建立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内容与方法的长效机制。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李谷悦博士指出，中国传统“四书”文化资源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更加适合在“两个结合”理论背景下融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刘晓慧博

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以话语创新提升党性教育亲和力进行了深入思考。北京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张雅楠从构成要素、总体样态以及实践方略三个方面讨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权的建构。

（三）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坚强保障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蒯正明教授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文化建设。首先，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历史表明：一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二要增强意识形态生命力和亲和力；三要扩大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四要提高意识形态感召力和渗透力；五要增强意识形态说服力。其次，应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态势，需要我们始终注重强化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持续推动坚持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与话语创新；坚持敢于斗争，使意识形态领域发展态势向上向好；注重发挥文化的载体作用；构建与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相适应的支撑保障体系。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房世刚副教授认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文化积淀基础上形成的，蓄蕴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布局，为中国共产党人所认同和践行的涵盖精神观念、制度规范、行为作风等构成要素的复合系统。深入认识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属性特征，需要以习近平关于党内政治文化重要论述为基本遵循，从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观的理论深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厚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广度、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准度，对其专门性、时代性、科学性、承传性、党性、先进性、整体性等属性特征加以系统把握，不断深化对全面从严治党内规律的认识。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靳贺博士探索了党内政治文化涵养党内政治生态的现实路径。她认为，以党内政治文化涵养党内政治生态，关键是要进一步萃取党内政治文化核心意蕴，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奠定坚实基础。要深刻认识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内涵，增强党内政治文化自觉；要准确把握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精髓，实现党内政治文化自强；要充分发挥党内政治文化的凝心铸魂功能，聚力党内政治文化强党。通过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高度统一赋予党内政治文化真理性、价值性和引领性，努力创造一种基于经验的知识体系。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李红霞副教授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她认为，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主要围绕精神谱系的形成逻辑、科学内涵、时代价值、赓续传承等方面进行并取得了丰富成果，但仍存在用语泛化、重理论宣传轻学理研究、研究主题同质化程度较高、研究视域有待提高等问题，未来应进一步丰富研究方法、拓展研究广度、提升研究深度。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杨修文从概念生成逻辑、功能发挥逻辑、价值表达逻辑等维度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学理进阶。

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筑牢文化自信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文化自觉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另一重要路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与会学者的共识，也是此次论坛的重要议题。只有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理研究以及转化创新路径研究，才能继续夯实文化自信的基础。

（一）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理研究，夯实文化自信之基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规划办原主任张国祚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结合，而且二者能够结合。首先，二者结合具有必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与魂，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基础。此外，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应以中国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极其重要的实际。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结合。其次，二者能够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捷径。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传利教授从思想材料和思想体系的视野探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可能性。首先，他认为，恩格斯区分了思想体系与思想材料，思想体系的概念不能超越阶级，思想材料仅是构成思想体系大厦的材料，符合真理要求的思想材料常常助力建设新的进步的思想体系。其次，从思想材料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可以相结合的。这并不影响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质的规定性。就中国封建历史而言，其中有反映人民群众反封建压迫的文化，这可以成为我们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厦的材料。但是，我们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不能盲目地肯定传统，更不能让封建文化死灰复燃。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吴文新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融通的本体基础是“公道民本”。这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原理内蕴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之道；世界整体性原理内蕴天人合一、天道仁德之理；真理与价值相统一原理内蕴求真至善、公道民心之义；生产劳动决定性原理内蕴食为民天、务本重农之义；所有制决定性原理与去私趋公、立公为民相一致；“两个必然”原理昭示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必然性；等等。在“公道民本”的基础上，从实践和理论的不同领域，具体地、全面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融通，促其实现具有共同价值和拯救功能的文化-文明新生。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永怀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结合是各种条件耦合的结果,其中既有基于相资为用的现实考量,又有精神气质的牵引,还有具象耦合点为之搭建桥梁。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贺振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基于二者在功能、程度、进程、现代与话语等多方面的条件。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涛从“两个结合”的角度指出方东美对马克思的人性论存在误判,并认为马克思的人性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论之间有许多可会通之处。

(二)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路径研究,筑牢文化自信之根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付文忠教授和博士研究生梁少春认为,新时代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是把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融入现代社会生活,把传统文化丰厚的道德资源与人文精神,转化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精神需要的现代文化形式,为人们品德养成与人文精神培育提供文化资源。这需要在日常生活领域传承中华文化重善崇德的价值体系、传播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需要以创新性的形式让中华文化宝库的大门向日常生活领域敞开;通过参与式体验引导广大青年担负起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副院长马秋丽教授分析了孟子“平治天下”的思想及其现代转化问题。她认为,孟子“平治天下”的思想由仁心而仁政、由仁政而王道,层层展开,涉及国家的施政原则、邦国关系和对天下定于—的“仁义共同体”的设想。孟子“平治天下”思想是对西方现实主义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纠偏,为改变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供借鉴和支持。此外,孟子“平治天下”思想之安民的价值追求,顺应各国人民对和平安宁美好生活的期盼,为当今中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方向提供了价值和理念支撑。

四川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建锋副教授主张以和合精神引领新时代中国小乡镇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新风尚。他认为,小乡镇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和合精神,表现为个体与家庭、小家与大家族之间与人文文化与自然生物之间的融合等。小乡镇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新时代需要以和合精神重塑小乡镇文化,让美丽小乡镇焕发全新的活力和魅力。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孙阳阳博士探究了传统政德主体的现代转化问题。他认为,明确政德主体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加强政治道德建设的题中之义。从古至今,政德主体的名称变了,但其中起主导作用的逻辑并没有变。辨析现代政治道德主体,其基本原则离不开权力要素、社会公共资源要素和公共影响力要素。从这一基本原则出发,结合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实践,除了公务

员法所约束的公务员群体之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群团组织和具备较大影响力的大型行业协会的领导干部，亦应被视为政治道德的主体。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岩博士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建设经验出发，总结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三条实践路径：破除唯物唯心的简单化研判，吸取传统文化精神的真谛；全面分析礼法学说，吸取传统文化的法政智慧；以辩证思维扬弃教条化的经学注疏式治学形式，面向现实、会通古今。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韦思指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在传承、创新、交流中持续发展，在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下“活起来”，“走出去”。

四、以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借鉴，共建文化繁荣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是本次论坛的主要关注点。与会学者围绕此议题进行了详尽探讨，助力文化繁荣。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副院长焦佩教授和硕士研究生马小月聚焦美国左翼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关研究。她们认为，在次贷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接连影响下，美国左翼势力抬头，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表现出浓厚兴趣。美国左翼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国家治理、外交战略和国际地位三个方面。在国家治理方面，关注经济改革、民主法治建设、生态环保、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在外交战略方面，关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冷战等问题；在国际地位方面，关注中国对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影响等问题。但是，研究主题之间的系统性不强，部分观点有失偏颇，这些问题还需要在有效沟通的基础上加以消解。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陈旭博士着眼于海外对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的相关研究。她指出，海外相关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代际演变，主要体现为问题意识和研究对象的变化。中国学界应理性认识海外对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研究的丰富成果，辨析其观点背后的研究范式，警惕结构化研究对中国道路的误读，避免技术路径依赖，重视对中国道路宏观理论的建构，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机遇重塑中国共产党研究范式。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马莲副教授研究了赖特“社会”社会主义的思想。她认为，赖特提出资本主义的替代模式是一种“社会”社会主义，即追求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通过社会权力控制经济资源的生产与分配，使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保持有效平衡，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尽管赖特的“社会”社会主义在资本逻辑下较难实现，但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从唯物史观视角推进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论思考，提供了拓展社会解放的想象空间，展现了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美好愿景和可能路径。

浙江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心凌哲宏博士探索了拉丁美洲解放哲学的“文化解放”策略。他认为,拉丁美洲解放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产物,核心旨趣是解放,其解放策略包括批判与解放的对象、解放的路径与方式、解放的价值和目标指向等。具体而言,首先,拉美解放哲学发现了“中心—外围”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解构欧洲中心主义。其次,拉美在尝试政治斗争、经济革命等解放实践失败后,尝试通过探索一种深层持久的文化解放来实现民族精神独立,进而通过文化解放推动经济解放、政治解放、社会解放。最后,拉丁美洲解放哲学的价值目标是建构包容“他者”、缔造“新人”的新秩序。

此次论坛既有对世界文化激荡背景下中国文化立足之基的分析呈现,也有对国际文化比较视野中中国人类文明新形态优势的刻画凸显;既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一般理论的解读与阐释,也有对具体文化问题的多角度分析与挖掘。与会学者既坚守马克思主义文化立场,也立足中国实际、赓续传统、学贯中西,在纵横比较的宽广视野中提供了诸多富有启发的创见。论坛的举办,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增强文化自觉,在“两个结合”中夯实文化自信的基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

论点摘编

一 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张志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的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从中华文明长期历史实践中提炼而出的，是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经验中总结而来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就是成功实践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例证。中华文明蕴含的核心价值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涵。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从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来探索实践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途径，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演进中寻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破解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的文明史根据。在新时代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要深入揭示中华文明对于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独特而重大的贡献。从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深刻阐释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具有的宇宙观、道德观根源，深刻阐释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天下观、社会观基础，对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性意义。

（摘自《哲学动态》2022年第8期）

二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基础

孙春晨

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在诸多重要场合都曾谈论“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一再表明中方对这一共同价值观的看法及态度。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承认世界文化和文明多样性以及承认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国家的人们存在不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追求全人类价值的最大同心圆和最大公约数。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文化结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在全球层面形成价值共识和伦理共识。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了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在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和共同发展领域的公共善，是全球化时代重构国际社会互动规则和交往秩序的伦理遵循，代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伦理愿景。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伦理基础，其中和平与发展表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存伦理共识，公平与正义倡导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内达成新型国际关系伦理共识，民主与自由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伦理共识。

（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1期）

三 大历史观与中国道路的哲学审思

张 明

坚持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重要历史经验，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从总体上可以归结为立足本土、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的历史。以大历史观为指导探究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起源，可以有效回应西方社会关于中国道路是实用主义选择的误读，进而超越中国道路在形成史问题上的时间相对有限性，从更加深厚的历史根基与更加宽阔的理论视野出发，把握中国道路历史必然性背后的逻辑必然性。一者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接续发展的大历史出发，有助于厘清中国道路的深厚历史根基与文明基因，集中展现“走自己的路”是由中华文明内在特质决定的必然选择；二者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艰辛求索的大历史出发，

有助于澄明中国道路开创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逻辑必然性，深入把握中国道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本质性关联；三者从人类现代化探索的大历史出发，有助于彰显中国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

（摘自《哲学研究》2022年第5期）

四 从三个历史决议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马克思主义观

欧阳奇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贯穿在党以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在不同时期先后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纲领性文献，蕴含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马克思主义观。三个历史决议从本体论、实践论、价值论出发，集中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实践路径、重要价值，整体上建构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要义。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指引，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推动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21世纪社会主义迎来振兴、人类文明发展进入新阶段。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和发展经验，有助于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也有利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5期）

五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根基

沈湘平

现代化与传统并非简单二元对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其传统文化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解答西方现代化道路总问题也是人类总体性危机的基本提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逻辑之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之一的“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理念与实践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底蕴和传统文化基因，其核心要义在于：天地乃生命之本体，人与万

物共生、并育，安所、守位方能并育、遂生，致中和而参赞化育是人的最佳选择，生而有道则存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这一理念的继承、发展可以从“生”“位”“所”“育”四个角度体现出来，即生命至上和追求美好生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各得其所和各尽所能，以存在看待发展和以发展成就生命。不过，“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理念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底蕴式作用目前尚未得到足够自觉的彰显，亟须引起高度重视与深入开掘。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六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臧峰宇

马克思既是资本现代性的批判者，也是新现代性的构建者，他在肯定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同时指出资本逻辑的现实化体现为资本无限增殖和膨胀的过程。在批判资本现代性的同时，马克思提出现代化发展的新版本，从而提升了现代文明的品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提供了科学指导，激活了支撑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历史的伟力。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起步于近代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碰撞，以由先进思想指导的社会革命为现实根基，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中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表明，特定的世界历史民族选择了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取得的成就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七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文学文化自信

张福贵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化自信之间具有理论的和实践的内在关系，也是我们重新理解和认识中国文学内容构成与价值取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往在对中国文学文化自信的理解中，多强调古典文学固有的民族精神和审美价值，相对忽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所彰显的现代文化自信。文化发展要做继承传统的考

量，更要做发展传统的考量，已融入中国文化大传统中的现代文化是中国文学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理解自信的文化构成，然后阐释和传播自信的文化，进而被其他文化认同而获得他信，通过交流和交融取得互信，最终实现文化共信，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起点，寻求人类精神文明的共鸣点，是中国文学从文化自信走向文化共信的完整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人类意识不仅是文学创作的主题，也应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个新尺度。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八 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观的演进逻辑与理论品格

邢红梅

如何认识和对待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中，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文化，形成了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系列文化观。文化观是指对文化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是指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基本观点和看法，表现在党的文化政策、文化方针、文化战略和文化制度等方面，体现了党对文化的内涵、价值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正确的文化观是一个党正确认识文化并指导文化实践的前提和基础，既能凝魂聚气，又能固本培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是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进行的文化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推动着文化观的形成、发展与创新，实现了党百年文化观演进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三重逻辑的内在统一，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人民性、开放性和创新性，展现出独特的理论品格。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3期）

九 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生成逻辑及时代呼唤

张国祚 刘新伟

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可分为四个层次：从理论上要“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从实践上要“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从精神上要“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从宗旨上要“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必然要求，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必然要求，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既面临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也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必须大力弘扬和践行伟大建党精神。只有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才能面对纷纭复杂的形势不动摇、不迷航；只有积极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才能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新功；只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才能战胜各种困难、风险和挑战；只有始终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才能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摘自《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4期）

十 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百年探索与基本经验

代玉启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成长史，是一部不断锤炼党的先进性的历史。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能一直保持党的先进性不动摇，才能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引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依托自身的先进性建设克服内外部诸多困难，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前行，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先进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属性，也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保持党的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接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党的先进性建设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总是同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任务结合在一起。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先进性建设已然成为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使命，不断推进改革创新与自我革命，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纯洁型政党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王忍之题写刊名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集刊简介

本集刊由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合作主办，属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专业集刊。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中外文化发展现状、中国传统文化、多领域文化问题（比如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外交、军事等领域的文化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世界文化思潮等。

本集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外文化理论与实践，积极刊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坚持学术第一的标准，大力推荐富有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的关于中外马克思主义相关领域的文化研究成果。

我们将力争把本刊办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园地，并与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结合起来，注重前沿和热点问题研究，大力扶植青年学者，推出一系列有分量、有深度、能够引起理论反响与学术争鸣的高质量研究成果，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建言献策，并不断提升学术质量，扩大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影响力，拓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ISBN 978-7-5607-7753-5



9 787560 777535 >

定价：54.00元